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序言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巨古以来给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冰心

1992年3月15日

怀念周总理

舒强

我没在周总理身边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只是和总理有过零星的接触。可是，周总理的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心和他的感情——特别是他对一般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群众关心和爱护的真挚感情，是我终生难忘的。每一想起，我就要流泪的。

抗战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江西苏区的时候，对苏区的情况一律封锁，人们只能从国民党报上看到“朱、毛”如何如何，只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朱德和毛泽东，对周总理则完全不知道。直到抗战开始后，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其中有周总理的事迹，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是军委的副主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过去我曾看见过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的大人物，他们都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周恩来这个大人物是个什么样的呢？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 1935 年 7、8 月间的武汉。那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周总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我在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十个抗敌演剧队中的第二队工作。那天，周总理给十个演剧队的全体人员做时事报告，讲保卫大武汉问题（那时日军正从安徽向武汉进攻）。报告会由陈诚主持，他身穿一身国民党的上将军服，脚踏带马刺的长筒马靴，将军气派十足。周总理则是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一脸络腮胡子，一点领袖和大人物的架子也没有，更不像一个带兵打仗的人。他说话也不像国民党的大人物，既不拿腔拿调，也没有什么引群众注意的手势，真是比普通人还普通。当时报告的内容很丰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圈圈，小圈在大圈圈里面，表示如何在外线保卫大武汉，又如何在内线保卫大武汉，再就是如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大武汉。他在报告中还和陈诚开了个玩笑。他笑着对陈诚说，“从前我们打了好多年的内战，现在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了么？”说完哈哈大笑。

这是总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国民党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官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再就是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不像武夫，而是像文人、学者；不叫人害怕，而是使人感到亲切。

1939 年，我离开演剧队到育才学校工作。那时陶行知从战时各难童保育院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儿童，办了育才学校，他自己任校长。学校分五个组：文学组由魏东明负责，艾青在这个组任教；音乐组由贺绿汀负责，任光、任虹在这个组任教，小提琴家杨炳荪和作曲家杜鸣心就是这个组的学生；美术组由陈烟桥负责，现中央美院的教授伍必端就是这个组的学生；戏剧组由章泯负责，教员有我、张水华、袁文殊、沙蒙、王家乙等；社会组由孙铭勋负责，组内几位教员都是在延安抗大、陕公学习过的，也可能都是地下党员，现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当时就在这个组学习，那时他还只有十岁左右。

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大镇子，陆路有公路通重庆，不过一般从重庆去北碚都是坐轮船。距北碚水路 10 里左右有个小村庄叫草街子，古圣寺是距草街子三四里地四周很少人烟的一座古庙，育才学校便设在这座古庙里。从重庆走水路到北碚，有小轮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当中要经过许多急流险滩，弄不好就要翻船。有一次音乐家贺绿汀从重庆回来，轮船碰到礁石翻了，淹死了许多人，他幸而在水中抓到一个行李，顺水漂流了 10 来里才被人救起。

而从北碚到草街子只能坐小木船，也要经过许多险滩，木船在激流中触礁撞得粉碎的事也时有所闻。总之，这条路是很危险的。

1940年9月间，周总理、邓颖超和徐冰同志突然冒着嘉陵江急流险滩的危险来到育才学校。他一方面是参观，关心这个学校，同时也是要和一些将要到延安工作的人员见见面（在这以前，章泯曾告诉我们，总理要我们去延安鲁艺工作）。章泯把张水华、袁文殊、王家乙、沙蒙和我，一一介绍给总理。这是我和总理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更觉得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个月以后，我们按照总理的安排，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去见他，章泯告诉他，我们有家眷的人都到重庆了。总理问了我们在重庆的生活如何安排，并告诉我们不久就有两批运送物资的卡车去延安，我们将搭这车子去，叫我们安心等待，并告诉我们水华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会教他们如何化装成商人，抄小道去延安的。他说，许多人都是这么走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总理为我们去延安想得周到，安排得非常具体，当时很令我吃惊。心里想，他是个大人物，是管革命大事的，可是他竟然也管我们这些小事。他完全不象一个高级领导对普通群众讲话，就象是对知心朋友谈话似的。他的话使我心里很踏实，深感前途光明，有了依靠，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周总理——共产党是怎样关心群众的，是在去延安以前，“皖南事变”以后。

原来去延安的计划是：办事处的两批卡车分两次出发，妇女儿童先坐第一批卡车去。出发时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办事处许多负责同志都去送行，那部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车子，东西很多，把车厢装得满满的，直堆过了卡车的栏栅，十几个妇女和儿童就得爬上去，坐在物品箱子上。妇女们上去都很困难。那时我爱人的脚上生了一个大疮，正在化浓，疼得厉害，走动十分困难，手上还抱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出发前，办事处的同志见她行动太困难、曾劝她留下别走了。她托人带信给我，我回信让她克服一切困难坚决随车去延安。可是她要爬到卡车上上面去太困难了、她硬是咬着牙忍着痛往上面爬。正在十分困难的时候，总理发现了，问她是谁，邓颖超同志告诉那是我的爱人，总理责怪身边的同志，为什么不前去帮助她，边说边跑到卡车前要扶我爱人上去。这时，其他许多人也都跑来帮助，终于把她送到车上去。这件事使我爱人深受感动。当我4年以后到达延安时，她第一件事便是告诉我总理如何帮助她上卡车的。她说：“周总理真是太关心人了啊！”

谁知风云突变，在第一批车子去后的第三天——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掀起反共高潮，在皖南以几十万大军包围了新四军，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我们原定搭第二批车子于1月10日出发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国民党封锁了陕甘宁边区，断绝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线。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也开始破坏，逮捕和迫害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时，作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周总理，责任重大，要准备和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作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他有多少事要做啊！在这最紧张的时刻，他还一心挂念着在重庆的许许多多文化人。在文化工作方面，他也作了很具体的安排，他把有受迫害可能的人分成三类：一是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或党外骨干，必须从速离开国统区的，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或江苏新四军所在地（如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等）；二是在重庆已不便工作，但以后仍可继续在白区工作的，则安排去西南或香港（去西南桂林、昆明的有田汉、

光未然等)；夏衍、杜国库、柳亚子、章泯、宋之的、风子、丁聪和我等则被安排去香港。

那时，周总理一面布置、安排地下党员撤退，指挥如何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他把身边的一些重要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分散保存。1962年我在阳翰笙同志家里的照片簿上，看到一张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年轻时候的、可能是他们结婚时的纪念照片，总理身穿一套深色的西服，打着领带，邓颖超同志身着一件浅色的有深色条纹的旗袍，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总理站在她的右边，两人靠得紧紧的，相亲相爱的样子。显然这是大革命以前拍的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照片。我问阳翰老这照片是哪来的。他说：“这是总理在皖南事变以后，在万分险恶的白色恐怖的重庆与敌人斗争时，交给我保存的。”看来，那时总理是作了随时可能为党牺牲的准备的。

我们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从内地去香港的文化人都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又是总理组织力量把我们营救出来。他让广东东江游击队派大批游击队员化装到香港去，把所有文化人都营救到东江游击区去，以后再设法送到内地来。经过东江游击队和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把我们都送到游击区去(其中有乔冠华、胡风、戈宝权、叶浅予、丁聪、章泯、宋之的等)。后来从游击区辗转到达桂林，又于1943年初和司徒慧敏一道去了重庆。

到重庆不久，周总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宴请我们(章泯、来之的，风子、王萍、沙蒙和我)吃饭。刚吃完饭，外面响起了敌机空袭的警报。总理对我们说，“走，到我们的防空洞去。”从办事处后门出去，几十米外有一个约20来米高的小山岗，下面，办事处的同志自己挖了一个专用的防空洞，可容二三十人。董老、叶剑英同志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也都躲进去了。不一会儿，敌机来了，外面响起一片轰炸声、高射炮声和敌机机枪扫射声。叶剑英同志就坐在我们对面，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若无其事、聚精会神地看着；董必武同志也在全神贯注地看书；其他人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书报在阅读，很少人说话，只有周总理陪着我们这些人谈话。他问起我们在日军进攻香港时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告诉他当时我们的一些狼狈相，他时常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谈笑把敌机轰炸造成的紧张恐怖气氛完全冲散了。等敌机走后，警报解除了，我们才离开办事处。

1943年我在中国艺术社演出的《北京人》¹和《家》，周总理都看了。他对导演章泯说，他很欣赏我在《北京人》里的演技，对我塑造的曾皓这一形象比较满意。他又对章泯说：“以后最好别让舒强演觉慧这样的角色了。”章泯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总理一定是对我演的觉慧不满意，我自己心里明白，那个角色我没有演好。当时我的想法不对头：因为前面一个戏演的是一个垂死的老头，接着《家》里演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青年，我一定要把两个角色的形象完全区别开来，叫观众看不出是一个演员演的，于是在演的时候，就拼命做小孩状，自己也知道那个角色演失败了，可是总理很客气，怕伤了我的创作热情，没有正面批评我，而是怪导演不该让我演这个角色。总理是多么体谅人啊！他这句话，后来我想了很久。我想，那不

¹ 此剧我饰曾皓，蓝马饰文清，风子饰愫芳，王萍饰思懿，凌琯如饰文彩。
此剧我饰觉慧，金山饰觉新，张瑞芳饰瑞珏，蓝马饰冯老太爷。

仅是一个角色没创造好的具体演技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有问题。总理的话给我敲响了警钟。

我和沙蒙是1944年2月到延安的。到延安的第三天，周总理派车接我们到他家去，分配我们去鲁艺工作，并对我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情节，我在《我和党》一文中（见《新文化史料》1989年第5期），已经述及。当时我对总理这句话并未理解，心里想：回到了“家”——党中央的怀抱里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后来到了鲁艺，周围的同志对我都很冷淡，就连过去的老朋友也不多说话。我原以为老朋友们凡年不见，现在终于在革命圣地团聚了，大家一定会热烈拥抱、欢呼、彻夜长谈的，谁知老朋友看见我们，总是轻轻地点点头，便逃避似地走开了，连我的爱人也是说话吞吞吐吐，对我也不热情。这时，我才开始感到气氛不太对头了，心里十分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去延安以前的一两年中，延安经过了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由于康生搞了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凡是从大后方去的人差不多都搞成“特嫌”了，连我的爱人也是。我去的时候，党中央正在纠偏，重新甄别。我是从大后方去的，穿的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办事处的细布做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而延安的同志们都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八路军制服，相比之下，我们的样子就象国民党，所以大家躲得远远的，害怕接触我们，甚至用怀疑和蔑视的眼光看我们。老朋友们虽不至于怀疑和蔑视，但问题还未搞清，彼此也不便多接触。这时，我才懂得周总理那句话的含意，他是怕我们也受到不应有的误解和委屈，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万一有了什么事，就去找他，他来解决。我心里想：总理真是太伟大了！他对同志、对党外人士（那时我还没有入党）的团结工作是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入而有远见啊！象这样的共产党，谁不愿永远跟着他走呢！

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那是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八路军、新四军向各沦陷区进军收复失地，要从延安调出大批干部去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全鲁艺的人员除少数留驻延安以外，成立了两个团，一是华北文艺工作团，一是东北文艺工作团，让大家自愿报去华北或东北，去华北的编入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艾青，副团长江丰、舒强），去东北的编入东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舒群、副团长田方、沙蒙）。团员是鲁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和文学系的教员和学员，还有少数延安其他文化团体的干部。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周总理到鲁艺来给大家送行，并作了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我惊奇地发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布中山服，还是6年前他去育才学校时穿的那一件，只是颜色已经洗得几乎成白色了。似乎那件旧衣服就是总理出访或参加重要会议的大礼服。我仔细看去，那袖口边上已经有些发毛了。我心里想：副主席啊！副主席啊！你在生活中又是何等的艰苦朴素啊！

1949年8月间为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民主青年联欢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参加，总团长是廖承志同志（后临时因事未能去，改由副团长肖华同志代团长），代表团里有一个演出团体是中国青年文工团，团长是李伯钊同志，团委有周巍峙、吴雪、任虹、李焕之、丁里、张水华、金紫光和我。演出团的队伍是以我领导的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和吴雪、任虹同志领导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为主要骨干，并从全国各大解放区的文工团中抽调部分骨干分子所组成。我们行前作了充分准备，排了大秧歌舞、腰鼓舞、秧歌剧及舞蹈、独唱节目。临行前，周总理

把我们全体团员调进中南海，请毛主席接见，他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团的骨干和主要演员，几乎每个人的姓名和过去在延安演过什么戏，唱过什么歌，他都能说得出来。最后，他向我们作了临别赠言，我至今难忘的是他要我们挺起胸，昂起头来到外国去表演，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怕外国人瞧不起。“不！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将要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这次出去，外国人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佩服你们的！”原来，我们总有些自卑感，到外国去扭秧歌、演秧歌剧行么？不寒碜么？听了总理的一席话，真是给我们打足了气，一个个精神突然振奋起来。果然，一进入苏联境内，人们一见是中国人，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中国！中国！好！伟大！”到了匈牙利，各国人民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就鼓掌欢迎。我们演的节目更是不同一般，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并且得了金奖牌回来。

我们是1949年9月下旬开国大典的前几天回到北京的，先是李泊钢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出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开国大典那天，周总理竟把我们出国演出团的几十个人全都请上临时搭起的观礼台去观礼，参观开国大典和首都30万军民的壮观游行。

就在开国大典的那天晚上，党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欢庆新中国的诞生。我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总理、董必武、任弼时和陈毅、贺龙、叶剑英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宴会规模不大，只有5桌（或7桌），除了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外，赴宴的就是我们出国文工团的人员，我们看到那些领导同志都情不自禁地上前热烈欢呼，甚至大家把贺龙同志高高地举了起来。周总理来时，我们都拥上去向他祝贺、欢呼，并汇报出国受欢迎的情景。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当然喽！出国前我就跟你们说么，不要瞧不起自己，要有民族自信心！”

今天回想起来，周总理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何等的爱护、关怀和重视啊！在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上最光辉的伟大节日里，竟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的光荣和优厚的待遇！

周总理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过问的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际上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政治、军事、工农业、铁路、矿山、水运等等，等等，哪一样重大的事情他不管？可是他竟有时间和精力，把北京和各地来京参加盛典的各大剧院的戏，差不多都看了；他不仅看戏，而且和演员们交朋友，几乎所有剧院的主要演员他都认识。

50年代末，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到北京来演出时，总理看了非常高兴。昆剧原来已经没有了观众，处境垂危，《十五贯》的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昆剧又活了！周总理高兴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此，他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一个文化艺术界的干部会，到会的将近200人。他让昆剧团介绍创作的成功经验，他也作了重要的讲话，主要内容是肯定浙江昆剧团的创作成果和方向，鼓励戏曲工作要改革、创新、古为今用，为新中国搞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从上午汗到中午还没开完。这时，我看见总理走到屏风后面去，向一位女工作人员说了些

那时天安门还没有现在这样高级的观礼台，只是临时叫架子工用本搭的台子（就象农村临时搭的戏台一样），四周是用芦席围着，台子不大，金水桥后面左右各一个，每个上面大约可容二、三百人。

什么，手指指会场，说完就又回到座位上，那位女同志出去后过不多久，一些工作人员拿来许多小碟子和许多糕点，每人发一份。我心里想：总理啊！你真是太关心人了！你管的事太多了，连大家可能肚子饿了，该吃点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亲自去布置。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是不可能想象到的。

总理还有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情。那是在 1959 年 9 月里，当时我们剧院一部分人到张家口、桑干河一带去深入生活搞创作，我因病在家里休养。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和我爱人晚饭后去北海公园散步，坐在北海北岸的一个小饭馆门外一张椅子上休息。那个饭馆很小，很简陋，门是用竹子扎的篱笆，有个小饭厅在里面，外面是个小院子，上面有遮雨的芦席篷，院子里放 4 张竹桌，几把竹凳。

公园里已经很少游人。我们在寂静的公园里坐着看初秋天空变幻着的云霞，忽然发现前面走来两个人。我想天就要黑了，还有人来玩哩。等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和一个工作人员。我们立刻起身向他打招呼。总理首先向我爱人喊了声：“熊焰同志，你好呀！”我爱人连忙恭恭敬敬他说：“总理好！”我说：“这么晚了，您还来……”总理没等我说完便说道：“我们刚刚去看了一场足球赛，来吃点东西。”我说：“你那么忙，还看球赛，不太累了么？”他笑笑说：“我看球赛就是休息呀！”接着他邀我们和他一起进饭馆吃饭。我忙说：“我们已经吃过了。”他说：“吃过了再陪我吃点么！”我们不好再推辞，便随他一道进去了。他没有进到里面餐厅去，就坐在院子里一张竹桌旁。他对我说：“怎么样，吃点什么？”我连忙说：“不，我们实在吃过了”。他说：“那就喝点酒吧！”我听了吓一跳，心想，我怎么能跟总理一道喝酒呢，连忙说：“啊不，不，我不能喝。”总理说：“不喝呀，那就吃点吧。”他对服务员说：“来些肉未烧饼吧。”那年轻的工作人员便和服务员进到里面去了。总理问熊焰：“孩子部长大了吧？都好么？”正说之间，服务员把一盘小烧饼和一盘肉未送上来，又端来一碗鸡蛋汤。总理叫我吃，我没吃，就坐在一旁陪着他。他一面吃，一面问我们剧院在于什么，我都一一向他汇报了。当他听到剧院的同志们都下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搞创作，十分高兴，说：“好！好！搞艺术创作的同志就应该经常下到生活里去，下面有多少新人新事需要你们去反映啊！”他一面说着，很快就吃完了，站起身来，我们就起身送他出了饭馆，看着他健康愉悦的身影慢慢走去。我想，他回去以后一定还要彻夜地工作吧。

回到家里，我们都感到非常奇怪，我爱人与总理第一次见面还是 1941 年初从重庆搭车去延安，那天是总理帮她爬上车的。以后 1944 年在延安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周总理邀她跳舞，还问起她。“熊焰同志，舒强同志来延安以后好么？身体怎么样？”那次，时隔 4 年，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记得我们的关系，已经使我们十分惊讶；这次已经又过了十五六年，总理怎么能一见面就叫出她的名字来呢？

邓颖超同志也是这样。我爱人 1941 年和邓颖超同志见过面，以后多少年一直没有接触过，可是 1949 年开国大典的晚上，在中南海党中央的宴会上，我和邓大姐坐在一桌，她问我，“熊焰同志好么？”我忙说：“好，好。”又过了十三四年，1963 年剧院在工人俱乐部演出《三人行》，邓颖超同志来看戏，临走时，我送她上车，她又问我：“熊焰同志好么？代我向她问好。”回到家里，我和爱人谈起这事，象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这样的领导人，一年到头要管多少事，接待多少人，他们为什么还能记得一个一二十年未曾见过

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呢？这除了使人叹服他们的惊人的记忆力以外，我们认为这是基于对同志的真诚的关切和对事物的认真和执著；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心；为了党的事业，他们诚心诚意地关心群众，他们对人，从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都看成是革命的一份力量，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革命队伍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在艺术创作上，总理对我的教育也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那是 1944 年春我初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当教员的时候，系主任张庚同志让我跟张水华同志一起导演陈荒煤和姚时晓同志合写的反映太岳地区军民和敌伪军抢粮斗争的戏。排演前，周扬同志把周总理请到鲁艺来听剧本，提修改意见。开始，我心里有些纳闷，写戏么，应该请些作家、导演来提意见，周总理是政治家，会打仗，可是，懂得艺术么？当作者把剧本读完以后，已近黄昏，晚饭后首先请总理提意见。总理开始好半天没对剧本提具体意见，而是向作者提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太岳地区的敌、友、我军的情况，当地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情况，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当地生产、人民生活和政府各项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未涉及剧本的具体内容。我越听越莫名其妙，心想：谈那么多不相干的事情干什么呢？我过去在大后方曾和许多著名的导演一块搞过戏，从来没有这样搞过，心里很不耐烦。好不容易等作者把总理提的问题一一回答后，总理才对剧本的内容、人物、人物间的关系、矛盾、矛盾如何解决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意见。从他的讲话里我才听出来，他不仅了解剧本所反映的现实情况，熟悉剧中人物和情节，而且他精辟的分析也令人折服。这时，我才猛然感到自己脸红、身上冒汗了。心里想，周副主席讲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办法，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甚至都听不懂，真是一窍不通！我怎么排这个戏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原来想得很简单：拿来剧本，对对词，搞好舞台布景设计就排戏、排地位，再搞好舞台构图、节奏、音响、效果便成了。现在才觉悟到，搞边区的戏，光靠那一套不行了。我刚到解放区，不但前方未去过，八路军从未见过，连鲁艺的大门也没怎么出过，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老家也没去过，我能创造出什么反映解放区前方军民对敌斗争的舞台形象呢？八路军是什么样子？党政军干部是什么样子？游击队、老百姓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待人接物，怎么说话、走路？怎么站和坐？……等等，等等，我连影子也未见过，我感觉到干戏以来从来没有现在那么无知、无能、吃瘪！原来以为自己早就读过，而且全读懂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才深深感到自己什么也没有懂，得从头老老实实在地虚心学习了。

到解放区第一次听总理对剧本提意见，使我明确了艺术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明确了毛主席的《讲话》不是文字上懂不懂的问题，也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要在艺术实践中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的。

从这以后，我的艺术创作生活获得了新的生命，走上了新的道路。总理这次谈话对我后半生的工作和思想政治修养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操纵的“中央专案组”以我 1935 年因左联被破坏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过牢一事，硬要把我打成“叛徒”。我一再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就是不听。1975 年秋他们强迫我在定为“叛徒”的结论上签字，我坚决不签，我感到他们真是太不讲道理了。

我到哪里去申诉呢？我是多么需要有人能帮助我把问题搞清楚啊！最

后，我还是想到了周总理。因为我被捕的原因、经过和出狱的全部情况，一到延安就如文详细地向组织上交待过。周总理是厂解我的。可是，那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里，我怎么忍心去打扰他呢？后来我想到了邓颖超同志，她也是了解我的。于是我写了封信给她，请一位过去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转去。

1976年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如巨雷轰顶。我和亿万人民一起痛哭、哀悼。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最好的领导人。这时，我很后悔，责怪自己不该在总理重病之中，在邓颖超同志也十分困难的时候，写那封信，给她增加麻烦。

跟着，万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被党中央解散了，由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接管了原“中央专案组”全部悬案和冤假错案。1979年，我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

我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界春节团拜会上，邓颖超同志被邀请出席了大会。会上，我前去向邓颖超同志问候。邓颖超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舒强同志，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和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啊……！”

我听了眼泪直想往下流，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对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感念之情，有对总理不幸逝世的哀伤，也有在极不适当的时候给她写信的自责！

亲爱的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您离开我们已经10几年了。我们天天想念您。您那亲人，长者、同志和知心朋友般的形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永远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您啊！

1989年10月3日

在一次难忘的舞会上

郎毓秀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6 年了，可是他那亲切温和、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记得在 60 年代初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联欢舞会上，会前有个短小的音乐会，我也应邀演唱了两首歌。舞会开始后，周总理有礼貌地邀请所有在场的女代表跳舞。当轮到我时，起步后我问周总理：“听说总理较喜爱民乐伴舞，可有此事？”他语调温和地回答说：“也不一定，不过民乐节奏细腻是不错。”他又夸奖我唱的朝鲜民歌风格亲切。当时我还向他抱怨当声乐系主任的难处，因为自己缺乏做行政工作的经验，并怕耽误演唱时间，可又无法推辞掉这个职务。他听了笑着说：“日常工作可以交给秘书去办嘛，推辞掉可不好。”这一番短暂的话语，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演员的动作不符合农民的实际生活。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终于改进了这个动作。使这个舞蹈更接近于民间生活的实际，符合民间生活的习惯。

我想，周总理的建议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舞蹈艺术也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理应来之于群众，又要服务于群众的。从群众中来又要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优良传统。我是十分赞赏这样的方针的。

我心里想，周总理日理万机，国家大事如此繁忙，还能抽出时间关心和指导这样一个舞蹈表演艺术方面的小小的动作。一直关心到改进为止。

周总理不但关心发展民族舞蹈的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还经常关心基层的工作和艺术团的情况。每当我陪他跳舞时，总理都要问起团里的工作情况和演员的意见等。有一次，当周总理知道团里没有搞好工作方针任务时很生气，并耐心地指点和出主意。他总是关心和鼓励大家把工作搞好。

现在口想起周总理对民族舞蹈表演艺术的关心和指导，使我感慨万千。50年代，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事业达到高峰。

1976年周总理不幸病逝。到了80年代，我国的民族舞蹈真是处于低潮了。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派”、“迪斯科”，很少有人问津民族舞蹈的发展和前途。看到这种状况，我这个从事民族舞蹈表演艺术几十年的演员，内心里充满忧虑和不安。我是多么渴望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能遵循周总理当年的教导，更快地繁荣和发展起来啊。

我们想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1991年5月10日

总理和我们一起看展览 毕克官

1956年，一个深秋的早晨，我们一群青年人朝着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走去——这天，《埃及艺术展览》要开幕了。那时候，外国艺术展览不多，象埃及这样的大型展览更是少见。加上当时正处于世界正义力量反对英同侵略埃及领土的高潮中，所以，展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记得，我这天还大着胆子特地穿了一身别人送给的西装，有点“盛装”赴会的味道呢！

将近9点，展览馆的人群沸腾起来，只听人声喧哗：“总理来了！总理来了！”要跟总理一起看展览了，同伴们内心都有一种幸福的欢悦感。

为了不影晌总理参观，大家主动散开，没有人去围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正当我们在一条长桌前热烈讨论展览时，总理由埃及大使陪同走过来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心都很盼着能和总理多呆一会儿。总理象是看出了大家的心愿，在我们跟前站住了。总理先问我们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我身旁一位同志告诉说大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这时，总理指着面前的几种图案设计，问袁浩同学知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流派的？袁浩同学就个人的体会，答说是埃及民族的抽象图案。总理听后嘱咐我们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没想到，这时总理将目光转向了我，问我是学什么的？是不是也是美院的？说来也怪，看着总理平易慈祥的表情，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告诉总理我是学绘画的，刚从美院毕业到工作岗位。因工作关系，正在学画漫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漫画》月刊任编辑）。总理接着又问我画出漫画没有？我说画了，是支援埃及人民反侵略的。总理说，好哇！又问发表了没有？我说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张，老人家听后指着身旁的大使对我说，要是画得好，可以赠送大使一张。

总理和美院的同学谈了话，这件事马上在北京美术界传开了，那一阵，同学。朋友见了我们，都会不约而同问起这乎。

如今，时间过去30多年了。回忆30年前，北京文艺界的同事是经常有机会与总理在一起并聆听他的教诲的。就以展览说，总理有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观。第二次文代会，我做为记者有幸参加。总理在人大大会堂为大会做报告那天，我特地选了二楼左侧离主席台最近的座位，为的是能最近距离看清总理。还记得总理那天穿的是短袖白衬衫。整个下午，老人家站在讲台前谈论国际国内大事和文艺政策，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回想那时自己不大本分地跑来跑去挑选“最佳”座位，确是表达了一个年轻文艺工作者对总理的感情。

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记述一下。

那是1962年全国政协期间，我到民族饭店去看望文艺界委员丰子悄先生。那天丰先生深情地对我讲述总理对他的关怀。就在大会期间，上海的委员们有一次和总理相逢，当有人介绍到丰先生时，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也许是总理见丰先生留着飘然长髯，是位上了年纪的委员，就关心地问他这次是否把老伴带来北京了。当知道没有带来时，总理一再关照一些老先生下次都要把老伴带来，也好相互照顾。一年后——1963年，再开政协时，丰先生果然遵照总理的嘱咐，把老伴带来了。待我到民族饭店看他们时，丰先生又激动地告诉我说，总理记性真好，这次与他一见面就问：“老爱人来了吗？”1975年，丰先生病危住院，夜间睡不着，曾向陪住的女

儿一往深情地回忆周总理关怀他的这段往事。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自己在北京展览馆的经历，就会自然地将丰先生在政协会上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1991年6月30日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吴祖强

周恩来总理是全民爱戴、举世景仰的伟人，离开我们一晃就是 15 年了。对于他，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语言或文词来加以描述，一切褒扬赞颂大约已全都是多余的了。提起笔来写一篇纪念短文，不过是抒发一点对他的心头思念，和为了表达些许长存的崇敬之意而已。

我生也晚，在工作中没赶上和总理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倒也保留着不多的、难得的记忆。例如，1959 年和 1964 年他来观看过我参加创作的舞剧《鱼美人》及《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演出结束后都上台来向作者及演员们表示祝贺，并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以热情的鼓励。当年他曾对《红色娘子军》特别赞赏，亲自指定要以这个舞剧作为招待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晚会节目。1965 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中苏两国政府总理的会晤，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然极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总理对柯西金在北京的全部活动日程都精心做了安排。文艺晚会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场子比较小，尤其是舞台和乐池颇难满足这些大型舞剧的演出要求。总理请编导们设法重新处理一下舞台上演员的调度，管弦乐队则必须将编制压缩到 40 人以下，使得能够进入乐池。任务紧急，我作为音乐创作集体的负责人，承担了调整总谱压缩乐队人员的工作。记得和乐队指挥李华德同志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抢着总算做完了这件不很好办的事情，最后终于把乐队演奏员压缩为 39 名，这样就连同指挥一共 40 人，没有超过限额。晚会很成功，柯西金总理盛赞这个舞剧的创作和演出。客人离开后，周总理特意到乐他边和我们握手，告诉我们柯西金非常满意，他十分高兴地向大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下，正是有了这一次在小礼堂演出的实践，才有可能随后请毛泽东主席、少奇同志及各位中央领导人在同一场所审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并接见全体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安排。至于说到周总理对这出舞剧的关心，则还应追溯到 1964 年为庆祝建国 15 周年和探索芭蕾舞剧“革命化”任务提出的时刻，我记得《红色娘子军》舞剧在国庆前夕正式彩排前后，他就曾和周扬同志等，还有江青一同来看过并发表了意见。这部舞剧他先后看过多次。

我后来在工作中常常听到不少老同志谈起周总理在世时对文艺工作何等细心关注，并对此深深怀念，他们都说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最爱好文艺的一位，他是带着对文艺巨大的兴趣来关切和支持文艺工作的。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文艺，也理解文艺工作者，他真挚地和艺术家们交朋友，这很自然，他也就成了艺术家们最感亲切的好朋友。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提到亲切这一点，我不能不回忆起对我而言应是非常难得的，在我青少年时代和总理及邓颖超大姐（文艺界大伙儿都这么称呼）的一次偶然的直接接触。这是周总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也是后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印象。也许还值得写一下。

那大约是 1946 年的初春，重庆的进步音乐界为了悼念在莫斯科病故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一周年，在旅渝江苏同乡会大厅举办了一次纪念音乐会，演出星海遗作。最后的节目是由校址远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和讼林岗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师生，特意前来演唱星海的名作，用钢琴伴奏的全部《黄河大合唱》。这成了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次重大聚会。厅在楼上，并不

太大，但来的人很多。我是一个一般中学生，知道了这件事却没能弄到票，于是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径自到门口找熟人将我们设法带了进去。这时场内已经熙熙攘攘，没什么空座，连靠墙的走道也站满了人，还有人干脆在第一排座位前临近台口两旁边沿地上就坐了下来，好在台很低，坐在地上也还可以，而且并不会妨碍座位上听众视线。我一看正好快接近台口中间地方还有空当儿，两个人赶紧挤过去填进了这个第一排前的“地座”。在我们背后，也即是第一排差不多正中，其实还有几个空位，但有人看住了，明显是留座。我们两人坐到前面地上倒也无人干涉，我们很得意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还往台上张望，却没有注意到背后已然有人入座。这时忽听见有个很熟的声音叫我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新民报记者高汾姐正坐在我的同伴后面。她的旁边即我的背后是一位身着深色中山装，黑发浓眉、气宇轩昂的人物，看来却有些眼熟，啊，这不正是新闻照片上见过的，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吗？高汾先对我说：“你也来了。”然后向周恩来同志介绍说：“这是祖光的六弟祖强。”周恩来马上对我说：“噢，你是祖光的弟弟，你哥哥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很不错啊，你看过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高汾接过去说：“祖强刚刚在戏里扮演了序幕中的乞儿乙。”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嘛！那好啊。”他侧过身去朝坐在他另一边的邓大姐说，“把糖拿来，喏，吃糖，吃糖。”他先拿了一块糖给我，又给了我的同学和高汾，自己和邓大姐也各自都剥开一块放进嘴里。记得他似乎还问了我喜不喜欢《风雪夜归人》这个戏？在哪儿读书？多少岁？有什么爱好等等。随后音乐会就开始了。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周恩来会这样和我说话，自然也有点不知所措，倒是一吃糖，立刻就松弛了。当时我觉得，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竟如此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可亲，真和一些国民党大官全然不一样。我明确意识到，周恩来是共产党大人物，也是中国的大人物，而给我的印象他却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一个和蔼又亲切的普通人！

音乐会自始至终十分热烈。最后全体起立，由李公朴先生指挥大家高唱星海的《救国军歌》离开会场，下楼出门，走上街头，群情激荡，连相互道别都没有了可能，这情景如今想起来还叫人难以平静。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等是怎么离开会场的，我一点都没有注意。

这场音乐会是我参加过的最富情感的，一直记忆犹新的音乐会之一，在这场极不一般的音乐会上，周恩来同志曾经请我吃过糖，则更成为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桩美好往事。大约三年之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都南京，地下入党。那是1949年初，距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为时无多。我那时候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觉悟，可以说主要是在解放前南京如火如荼的反蒋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也有平时所接近的一些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同志朋友们，包括大哥祖光的影响。这自然不能是因为共产党的某位高级领导者曾经请我吃过糖。不过，真的也很难说，周总理当年请我吃的那颗糖果，以及在一个少年人心目中一并留下来的，虽是偶然的接触却是深深地沁入肺腑的，一位伟大共产党人所带来的党的亲切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我的入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产生过某种无形的、不知不觉的作用呢？

周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希冀他能够记得我上面所说的这件小事，这件事的确太微不足道了。50年代我在苏联留学时曾经见过他，60年代前后由于舞剧音乐创作引来过少许接触已见前述，我多次聆听过他对文艺界的讲话。“文革”前他还曾陪同西哈努克亲王

采访过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过一些见面的机会。他自然都不会，也不可能想到我就是那个曾经吃过他和邓大姐一颗糖果的，曾经坐在他和邓大姐座位前面地上听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中学生。

但是，那个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学生却会永远记得这件事，而且记得相当清楚，这已经成了他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永不忘却的美好记忆。

1991年7月4日

难忘的教诲

陈学昭遗稿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 15 年了，然而，在延安时期他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当我写成了《延安访问记》不久，当时的生活伴侣就觉得我在这里受欢迎，而他却被冷淡，一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我只好听从他。回到重庆后，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在自己住处设诊所，可是没有什么病人来。原来寄养在他的一个亲戚那里的一个男孩子，突然患伤寒病，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及时找医师，还吃错了药，竟死了，埋在了江对面的荒地里，使我们十分伤心。

本来由于这个孩子才一直下不了到延安去的决心，如今已不存在这个羁绊。再加上我第一次去延安时，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理想令我钦敬，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再次去延安的决心。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般只叫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我还是要去延安！”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要我搬到办事处的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这一次，我坐的是公家的大卡车，同车有 20 多人，有的是请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有女有男。没有意料到在离陕甘宁边区不远的地方——同官（现铜川市），国民党反动派的便衣警察和武装特务把我们的车扣留了，我们被赶下车，关了起来。女的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一张铺，两个女同伴睡了，我睡在泥地上，司机不知从哪儿想法弄到了一点干稻草铺在泥地上。这次上路前我听从周副主席的话，改了姓名和职务，还留了长发，在被扣的日子，敌人常让我们到山上站着，要我们喊拥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我们装作听不见也不喊。他们也没法。有时，一个一个地叫去谈话，有一天晚上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们当中有个叫陈学昭，会写文章的，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是男还是女？”我问。“笨胚！滚！”敌人恼怒了。

敌人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西安，把我们送进集中营里关押起来。司机说他是被雇佣的，车子开到延安，还要回重庆，只管拿钱，其它什么都不管。他们也没法对付他。司机吃、住、行动都自由，他常在街上游来荡去。一天他终于遇到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卡车，他赶上去对车上押车的人说明了这里人车被扣的情况，请他迅速告诉党中央。于是党中央打电报给在重庆工作的周副主席，经过周副主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蒋只得命令胡宗南把我们释放。到延安后，才知道司机是个共产党员。

到延安，又是忙着参观、访问，然而，在这热烈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原先早就不和睦的家庭，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分道扬镳，一个女孩留下给我。从此，我得到新的生命。

一天，突然得到邓大姐的条子，告诉我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址托她带来东西，要我去取。我在次日上午就去了，见了邓大姐和总理，我很激动。他们当然已知道我的事。总理说：“你年轻时不识人，不是犯错误。好，不要难过！”“现在不要再去想它了！”邓大姐接了一句说。

“喏，吃这！”总理说着，伸手从手边的纸包里拿出一颗巧克力，塞到我手里，“现在吃这！”

邓大姐问到女孩的情况，我谈了常送鸡蛋给她，烧汤吃。后来，知道送鸡蛋的人更多了，幼儿院里的阿姨说，“这小女孩有这么多母亲！”

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到很多同志下乡，我也

想下乡，领导和同志们劝我暂时下去，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大好，语言也不方便，下乡去，我听不懂当地陕北话，当地人听不懂我的浙江话。

接着，我被调到《解放日报》任编辑，我没做过编辑工作，心里很不安。我分配负责第四版的工作，四版是综合版，刊登科学、医学卫生、农业、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文章。

我住在报社的一个窑洞里。

在报社工作两年，得到极好的学习，受到深刻的教育。曾经参加审干、搞大生产，我学会了纺线，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劳模大会，我被报社分配去采访劳模，写报道，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两篇。劳模大会结束，我被分配去中央党校四部去做文化教员，并学习党的政策。

周总理知道了我调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政策，让邓大姐转告我，他觉得很好。

令我难过的是身体不好，可仍旧向往着下乡。我把这个想法跟周副主席说了，他说，以后总有机会下乡的，写作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写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对年青人也有帮助么？还鼓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

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我陷入深思。想起以前在法国学习的日子，为了专学法文，有一大段时间住在寄宿女学，这学校专招收外国女学生的。一个意大利同学，她常说：“Qu, il est beau, quand on travaille”——“工作着是美丽的”。于是我听周副主席的话，开始写起来。写了近两万字，觉得没意思，不写了。过了些时，周副主席问我，我老实相告。他要看看，我送呈他和邓大姐看，他和邓大姐都鼓励我，我又继续写。后来，在行军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苦，行军多么累，我还是坚持写，终于写成，蒙几位领导人看过，1949年在大连出版，这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轰炸延安，延安的人们立即分散到其它根据地去。

这时，周副主席曾对我说过两次：你要有准备，今后你的工作在国外。

组织上要我到哈尔滨去，有两位男同志因事要出国，可以同行，于是我上路了。到了哈尔滨，我住在一间招待所的小房间里，整天看点书和报纸，等待着动身。李富春副部长早发给了我不少黄金，为了在国外用黄金换法郎比银元方便。两位同行的男同志来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动身，他们好象是去德国，我心里不安，只怕睡得太好，误了时间。突然，半夜，十一时过，有人敲我房门，听声音象是组织部的秘书长，说：“通知你，明天早上你不动身了。”说完他就走了。

后来，还是组织部长的夫人悄悄告诉我，是一位女作家对刚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说我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去看朋友。这位同志没有调查，正好组织部在开会，就在会上提出反对我出国看朋友而被通过了，别的人员不便出声。

我住在这小房间里很安静，提笔写一点散文，就在通知不出国的这天下午，这位女作家来看我，问，“你怎么还不动身呵？”我问：“动身到哪里？”“不是出国么？”她说。“出国干么？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说。她不出声，看我要写东西，坐一下她就走了。在哈尔滨，我请求组织上给我点工作，他们要我到报社去帮忙看些稿子。

不久，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文代会结束后，过了两天就召

开妇代会，也是第一次。在妇代会上，我见到了邓大姐，她很吃惊似的，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没有去？”

我很激动，说：“谈起来话长！太嗜苏！有机会好好和您谈。”她说：“好！”看旁边正有好些代表站着，就没说下去。晚上，我去看望了邓大姐，周副主席出去了，不在家。我告诉了她没有出国的原因。她听了很吃惊，也不愉快。

后来听说周副主席询问了这件事，还说，派女同志出国工作，没什么不好。安慰我留在国内，仍旧要好好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的心胸豁达大度，为争取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他总是想方设法团结同志。他的心投在党、祖国和人民的怀里！

我觉得总理对我比较了解，是在重庆的时日，他看到我是怎样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引诱。我不贪钱，不怕死，宁死也不跟他们走！宋美龄请人送钱给我，发请柬约我去游园、集会，我都不予理睬。

过了些时，我很想回家乡去。当时浙江还没有彻底解放，社会秩序很乱，组织上在我的请求下同意暂时回去半个月。1949年我回到杭州，参加了农村的民主反霸，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我曾写信给邓大姐，表达了我对祖国大好形势的欣喜心情，同时感到总理的担子更重了，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注意珍摄，劳逸结合。邓大姐后来也有信给我。不久，我调往某大学搞教育工作近一年，又到农村参加土改，直至反右斗争，我都没有断绝和邓大姐、总理的联系。当我摘除右派帽子的消息见报后，曾写信给邓大姐，她回信给我，大意是要我与省的领导互相尊敬，亲切相处，争取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大约是1962年夏天，中央文艺界组织学习政策的学习班，要我去参加。到北京后，在许可的情况下，我打了个电话给邓大姐，说我很想见见她，邓大姐和我约了时间，我如约去了。邓大姐在门口接我，免去了我在传达室登记的麻烦。她把我邀进卧室外边的一小间，不是会客室，这小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长桌子，两只清洁的木椅。我们两人并排地靠小长桌坐着，她一边削苹果给我吃，这是她准备好的，早已放在长桌上的，一边对我说：“昨晚他（指总理）忙到今早二时才睡觉，我们不去叫醒他了。”

我吃惊地“呀”了一声；说：“您要劝劝他不要这么劳累！”

她说：“唉！我自己也睡得很晚，有时帮他做一点事。”她问我的情况，还是鼓励我：争取解决组织问题。注意健康！健康第一。

我想：总理在休息，在这小间里谈天不免会打扰他，我就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竟永远失去了与总理见面的机会！

在和总理接触当中，觉得他对我的思想，鼓励多于批评，他总是谆谆说服，以身作则。

尤其是在50年代、60年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就努力克制住不被人理解的感伤心理，拿起笔，继续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下册和续集的写作。

每当想起总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和蔼的神情，栩栩如生地进现在眼前！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您没有去，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永不消失的微笑 莫德格玛

我曾不只一次看到敬爱的周总理那动人的微笑。那微笑，曾给我们温暖和力量；任凭年华流逝，那温暖依旧、力量永存。在我心间，那微笑已成永不消失的微笑。

总理微笑闪金光，
“以我为主”是栋梁。
星星月亮普天照，
甘为人间铺大道。

总理微笑闪金光，
我敢登天摘月亮。
月亮月亮伴我走，
天高地厚谁敢挡。

总理微笑闪金光，
我的青春献太阳。
太阳太阳伴我走，
天长地久容宝藏。

总理微笑闪金光，
“以我为主”是栋梁。
精英亿万奏凯歌，
闪闪里程诗汪洋。

我成长在诗的海，歌的、舞的海。但是，前几年，民族虚无主义日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民族舞蹈人才断层。尤其文艺界“流行病”蔓延，“走穴”浪潮四起。在那社会大舞台上，国家一级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质量层次下降，流行歌星当主角……。我团也开始强调“亚非拉为主”，偏离了当年周总理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也出现了随波逐流，追风赶浪的现象，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我看到这些现象，难过极啦！面对凶猛的潮流，我深知个人的力量难以阻挡。啊！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我要到人民中去寻找！

啊，您的英灵在召唤。我要走到天涯海角。

正当告别北京登车而去的那一时刻，伴同我的只是五只服装、道具箱。送行的只有丈夫、女儿。

奔向草原的列车离开北京的时间正值午夜，候车的人寥寥无几，风吹落叶的飒飒声更增添了这里的静寂和凄清。一次次只身远行，每次出发前的那种情景，都使我感受到一种撕心般的痛楚，特别是舍不得孩子。此刻，我忍着忍着，泪水可别当着女儿流出来。等到车启动，随着那一声“铿登”，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过惯了演出集体生活的我，只身出走，九出北京城，九入内蒙古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列车奔驰着，穿行在峻岭崇山间，驰向八达岭。我透过浓重的夜幕举首仰望着山巅。我觉得在高山之巅正有一位伟人在俯视着自己，浓黑的双眉下，

一双睿智的眼睛正关切地注视着我所走的路。不由从我的心底深处涌起一声声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车轮滚滚，在那深深的山谷里，回音四起。幻觉中，周总理亲切的笑容，淳厚的教诲，交相出现，抑制不住的泪水洒落我的胸前……

记忆的长河，一下回溯到1965年1月27日的下午6点钟。

在前门饭店，我和参加全国青联会议的同志们正坐在餐桌旁边用饭，突然听到服务员喊了一声：“谁是莫德格玛？”我应声站了起来：“我就是莫德格玛”。服务员向我走过来接着说：“有你的电话……”我心想，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谁给我来电话？觉得奇怪，便问道：“哪儿来的？”服务员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总理来的电话……”总理？我肃然起敬，又立刻跌坐在椅子上。我转向自己身旁久负盛名的京剧艺术家杜近芳：“是你吧……”

“不，是你。”

我真不敢相信，举世闻名的伟人——总理，给我来电话？我甚至不敢拿起电话筒。杜近芳看着我那疑惑的神情，又补充说：“我的名字是三个字，你四个字，是你！”

虽然在组建东方歌舞团时周总理、陈毅外长通过乌兰夫主席指名调我来的，总理也不只一次地看过我表演的《盅碗舞》，尤其是在人大礼堂为访问我国的总统们演出是经常的事，似乎每星期在国事演出中见面，可我觉得总理直接给我来电话是不可想象的。此时此刻服务员拿着电话记录催我拿起话筒，我强自镇定了一下，对着话筒问候：“您好！”“你是莫德格玛吗？”“我就是……”

“我是总理办公室秘书成元功。刚才总理打了电话，他要我们找你，我们派人找了你好一个下午，这才把你找到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总理要接见你……”

“接——见——我？”

这时候，我才如梦初醒，急急地握紧话筒问道：

“我怎么去呀，门岗能让我进去吗？”

成元功秘书告诉我：“不要急，我们已经安排好啦，七点钟去车接你，你等着。”

“7点钟？”我急得连连叮嘱成秘书请快点来呀！

当我放下电话，才发现身边已经围了許多人，都想通过电话听听总理的声音，大家听说总理要接见我，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而且就象接见自己一样幸福和温暖，陪我等着来接我去紫光阁的车。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楼外，寻视每辆开进大院的车。

楼前开来一辆红旗小轿车，时间是6点半。大家一拥而上询问：“是总理办公室派来的车吗？”“是接莫德格玛的车吗？”“是不是接到紫光阁？”

车停稳之后，司机走下车，拿着条子，在人群中扫视了一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说：“是你吧？”

当我见到司机亮给我看的条子，“啊”了一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真的总理要接见我了，扭头就跑到四楼去向内蒙古的青联委员们报告了喜讯，随着又跑下来，上了车。

7时整，到达了中南海紫光阁。总理办公室秘书成元功已经候在门前。他微笑着走过来说道：“你等着，我去向总理报告你到了。”

稍顷，周总理在成元功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莫德

格玛你来啦！”

我高兴万分跑过去，两手合掌在胸前深深地鞠了躬，向总理曲膝间安（蒙古礼节）。总理让我坐下，手里拿着载有我在全国青联会议上发言的那期简报，简报上面总理已经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用红色笔写的）。

坐在总理面前，感到他老人家是那样的亲切，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我高兴地说：“总理，您叫我的名字发音那么准，我感到格外亲切。”

总理笑了，说：“在会议简报上看到了你的发言，你对艺术团体出国访问中的情况反映得很好。”接着又说：“你还有什么，可以直接同我讲，不要有顾虑，哪怕提出问题，我很想听听，往往许多情况从群众中来……。”我肃然起敬：“总理，我特别想聆听您的指示”。

总理，“坐，坐！”抬手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坐下来。

听到传来的乐曲声，才意识到放的是唱片。我站起来鞠了一个躬、邀请总理跳舞，一边跳交际舞，一边交谈：“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演出轰动了欧洲，每到一个国家，著名报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演员们每场演出都为为国争光而拼搏。可是，外国人说我们演员平常生活中的穿戴不入流，太寒酸，象农业代表团。

欧洲人兴穿超短裙，我们领导决定把旗袍剪短。旗袍剪短后，只能站着，不敢坐，怕西方记者拍照腿。欧洲人爱看女人脚，领导又决定让我们穿上火箭鞋，我们变成了穿超短旗袍加上火箭鞋的中国姑娘。西方记者就提问：“你们国家的礼服是旗袍吗？”我们既点头又摇头……，那么，我们生活上到底向谁看齐呢？”

总理：“西方名角演员们只是花枝招展罢啦，没有政治地位，与你们不同。我们国家有成就的名演员，有很高的荣誉地位，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当家做主人嘛。”

赵燕侠从香港演出回来，也向邓颖超提出过旗袍的事……

总理停了一下，指了指椅子说：“我们不跳舞啦。你的汉语讲得很不错嘛，蒙古语不要忘了，好啦，我还要听你讲下去。”

“我们在米兰一次上千人的大型酒会上，有一位意大利友好人士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小小的舞台上，通过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我看到了古代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看到的太少。”

“我们带的节目很多，每个节目的艺术质量都很好，外国人欣赏，我们自己也喜欢。我觉得每一台晚会的组成和比例，经常出麻烦。出国带什么节目？怎样组成一台晚会？主导思想是什么？”

总理微微点头：“反映的意见很好，很好，我很高兴，等一会儿，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这里来，我同他们讲一讲。”总理看了看表，“已经9点了，还来得及。”说完这话，走出了大厅。

22点至零点30分。

总理：“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讲几件事情。莫德格玛在全国青联会议上发言内容很好，反映了文艺团体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和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派出许多文艺团体，很少有人象她这样反映情况，提出问题。我很赞成她的发言。文件还在我这里。她的发言，很诚恳、质朴、生动活泼……。你们是不是也谈一谈呀，说错了也不要紧。”

总理：“只有几个人发言，看来，还有人不敢讲话，莫德格玛在青联会上豁出去发了言。可见，我们干部的民主作风差。值得注意呀。”

总理翻了一下手中的简报，说：“这里莫德格玛反映艺术团出国还规定演员不能直接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只有团长答记者问，让演员们站在旁边看着。她说：‘这样，我们难过极啦！’为什么作这种规定呢？她们不仅是艺术家，也可以争当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嘛！”

“再一个，关于出国带什么节目及组成一台晚会的主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三分之一是反映当代人民的精神面貌，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强的新节目；三分之一是传统的、健康的、人民性强的历史题材的优秀剧目；三分之二是外国的优秀节目，健康的、艺术性强的节目。

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写出书面总结，送到我这里。”

.....

列车的颠簸把我从沉思中摇醒。东方已透出曙光，彩色的云霞仿佛是在紫光阁看到过的灿烂的笑容。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滚滚而落，因为总理的音容笑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

情感的河流一直在心底流淌，回忆象一条扯不断的线。

我理解，总理讲的三个“三分之一”的核心思想同总理以前指示的“以我为主”一脉相承，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是总理的直接关怀，诞生了东方歌舞团；是总理“以我为主”的指示，确定了“东方”的文艺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东方的艺术家们走向世界，传播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以我为主”显示了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自豪感。

然而，曾几何时，变为“亚非拉为主”呢？

文化艺术交流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策略思想当作目标，更不能用异国他乡的东西，取代自己民族民间的艺术，不能作这样一种没有出息的“艺术家。”

啊！叶落也要归根！

.....

天亮了，玫瑰色的云霞照亮车窗。随着目标的逐渐接近，我心中的太阳、月亮、星星照亮了日日夜夜的旅程。

.....

啊！周——总——理

1991年7月6日晨于北京

亲切的怀恋 资华筠

和许多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革命前辈相比，我和周总理的接触不算多，但那仅有的几次亲切会见，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之中，日月的流逝，使它变得愈加清晰、深刻。今天把它记叙出来，是想通过这一滴滴水，映射出日月的光辉，也可能把自己无尽的思念汇入亿万人民的情感波涛之中。

1963年的元宵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回响着优美的音乐和阵阵欢声笑语。敬爱的周总理来参加首都文艺界的联欢会，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我因有演出任务，一直在休息厅候场，心里十分焦的不安。这不仅口为一时兄不到周总理——不能请他老人家跳上一曲，更主要的是当晚我被指定表演的节目——独舞《白孔雀》，在动作创新和服饰设计上，步子迈得较大，引起了舞蹈界的争论。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特别指示，“演给周总理看看。”那么，这时的候场，就有点象“候审”——等候宣判的味道了。

上了舞台，我就“忘乎所以”了。老实说，作为演员，我偏爱这个节目。因为导演十分注意发挥我形体条件和技巧方面的优势，跳起来感到挺过瘾，当晚的演出效果还不错。

卸了妆，我坐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忐忑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减——不敢主动去靠近周总理。

“资华筠同志，祝贺你，孔雀舞从集体到独舞，从绿孔雀变白孔雀，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嘛！”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主动走过来请我跳舞，并且以这样幽默的话语作开场。

意外的高兴并未减低我的紧张心理。我深知周总理对待演员从来是十分爱护、宽容的，但这并不等于对这个节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如果节目最终被“枪毙”了，演员的劳动岂不付诸东流。于是我迫不急待地把对于这个节目的最尖锐批评和盘托出：“有人说这个节目有印象派倾向，不能上演。”（那时我对“印象派”似懂非懂，却很清楚这个意见对一个节目的批判意义）。

“噢？”周总理轻松地笑了，似乎没有理会所谓“印象派”的严重性。“我看，这个节目主要是民族风格不够浓郁。只追求美——尽力发挥演员的线条、技巧，是不够。应该注意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意韵……”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周总理和我边跳舞，边讨论起《白孔雀》的修改方案。舞曲终结时，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修改节目，演员也有责任。你要好好向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学习，在加强民族风格上好好下功夫。”

徐平羽同志把我悄悄叫过去问清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会心地笑着说：“今天你的演出收获不小！我知道，周总理一定能够保护这个节目的。”

1964年夏，一次小型联欢会上，周总理问起我的近况后，对我说：“舞蹈家不能孤陋寡闻。譬如，最近正在搞京剧现代戏汇演，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认为与己无关。”

“我们都有观摩、学习的愿望，但是观摩票不好搞……”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实际困难。

“把国务院的票分一部分给你们嘛！”周总理回答得十分爽快。当即交待给工作人员：“统计一下观摩人数，从次日招待人大代表专场演出的票中，提取一部分来解决。”

我记得第二天是在政协礼堂观摩关肃霜主演的《黛诺》。我还有幸拿到一张红请柬，在人大常委的保留席入座。当服务人员对我的“身份”表示质疑时，又是周总理帮助解了围。

几天后，接到了徐平羽同志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周总理交待过要关心一下你们的观摩问题，特送上《奇袭白虎团》的观摩票……

20多年过去了，在我观摩过的许许多多京剧名作中，我对《黛诺》和《奇袭白虎团》的演出，印象特别深，不只是因为艺术家们精湛的演技，更因为这两场观摩是在一位伟人的关怀、指点下进行的。有如凭添了一双隼智的眼睛在帮助自己汲取艺术养分……

在学习乌兰牧骑的热潮中，文化部组织了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上山下乡，为广大农民服务，在艺术实践中，磨练自己，改造思想。

我自愿放弃了参加《东方红》的演出，报名参加了这支乌兰牧骑试点队。为了适应农村演出，我和过去演熟了的“仙女”、“花”、“鸟”告别，剪了头发，扮起了“女民兵”、“妇女队长”、“包身工”……

1965年末，回京汇报演出期间，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由于风吹日晒变了颜色，又剪了辫子，他老人家几乎认不出我了。当了解我曾去海岛体验生活，又参加了农村文化工作队时，他高兴地鼓励我说：“是啊！应该多搞一些富于时代感的节目。”又说：“你剪了短发，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要请你原谅。不过，也说明你确实别有一番风采了，要珍惜自己这个变化，努力和群众相结合……”一席话说得我眼睛潮湿了。我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出几个富于时代气息的好节目，向周总理汇报。

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向他老人家汇报新节目的愿望也变成了泡影。每每想起，无限怅然几次短暂而亲切的会见中，周总理的语话虽然不多，所包含的内容却涉及到如何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扶持年轻人的热忱，令我终身怀恋。

我的第一份提案

张权

1962年3月下旬，我刚结束了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几个城市和矿区的巡回演出到了天津，这是音乐会最后的一个演出点。一下火车就见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沙青同志。他是前一天从哈尔滨赶到天津来通知我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我听了这个消息既兴奋又觉得太突然。想到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演出了近百场的独唱音乐会，每次我必定要唱《想念着你啊，北京》这首作品，是通过它，诉说我无法割断的思念之情。此时，我将有机会再一次投入它的怀抱，心里反而产生了一种迟疑，我反复询问沙青同志，究竟怎么会让我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直到他给了我一本毛主席著作，指出其中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叫我仔细学习。原定演出十场音乐会的票虽已售完，经过商谈改为五场。大会方面由组织帮我请假数日。

当我赶到北京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做完，并开始了小组讨论，我心里很着急，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本来就不大明白，还迟到了好几天，真不知如何才是。整整一周，大家围绕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学习讨论。到了周末，我居然写出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政府工作的提案。内容是我们这个文明大国，有着许多艺术人才，尤其在黑龙江，不仅仅是演唱和演奏，更有着大批层次较高的听众，他们需要听音乐，假如能在哈尔滨创办一个歌剧院它肯定不会比北京差大多……总之，这是我到哈尔滨这一年中通过实际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一些美好的、但尚未成熟的设想。交上了这个提案，我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我跟大家走到北京饭店参加周末晚会，许多熟悉的同志把我推上了那个小舞台去唱歌，当我快唱完时，周总理走进了大厅，他一路鼓掌径直走向舞台与我握手。我胆怯他说自己迟到了，等待着他的批评。他却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在演出。接着详细地问我在东北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还十分关心我的老人和孩子们，当他听我回答说我爱人已去世时，我看到他的眼神突然停滞了，我不觉低下了头。只听到他很轻的声音似自语地说道：“你离开北京我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身体很单薄，如果不适应，还是回来吧……！”我说不出什么话，只是努力让溢出的眼泪停止流淌。我随他走到桌边坐下，赶快换个话题，我告诉他哈尔滨也有了自己的音乐节……哈尔滨音乐节不会次于布拉格之春或维也纳音乐节，希望总理夏天到哈尔滨休假，参加我们的音乐节……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倒很想来，可是我哪里来的时间呢？”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到了北京饭店，我和中央歌剧院的几位老同志坐在陈毅同志一桌，陈老总要我和李光美同志唱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个作品我已好几年没唱，怕连歌词也忘记了，最后只好边编词边唱。唱完走回来，看见周总理已来了，并且也坐在这个桌子，我为自己忘词。编词抱歉，又申明这得由陈老总负责。总理大笑说：“这是陈老总乱点鸳鸯谱。”陈老总忙说：“这里没得外人嘛……”大家都十分愉快，时光飞逝了。

第三个周末，我到北京饭店刚坐下不久，周总理就进来了，他一开口就对我说：“你的提案我已看了，很好”。接着他领我找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领导，他让我把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创建歌剧院的理由设想向这几位领导阐明。同时，他对这几位领导说，“你们听听她的想法……”之后，

他就走入人群中去了。我大胆地讲了我的设想和希望，在我返回民族饭店的路上，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又闯下了祸，那一晚我虽然睡不好，但也并未害怕。

4月中，大会结束，我回到了哈尔滨。省市领导似已知道了我的这个“提案”。围绕着它，找我谈了好几次话。7月，哈尔滨歌剧院就在友谊路94号那幢淡黄色房子里成立了，而且在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由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白地黑字“哈尔滨歌剧院”大牌子。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创办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歌剧院，这在全世界也未曾有过。想想，如果没有周总理，如果没有周总理周围那么多的好领导，又怎么可能呢？就在最近，哈尔滨歌剧院还带了一台自己创作排演的音乐歌剧《焦裕禄》来到北京参加了党的70年大庆的演出。

1962年11月，我应中国唱片社之约，来北京录制唱片，同时，哈尔滨歌剧院建议我在录唱片期间开几场独唱音乐会。我就和钢琴伴奏、院长及一位负责演出的同志先后到了北京。经过三方面商量，决定先开音乐会，然后再录音。这样，从11月18日到12月9日这20天中，我们在北京音乐厅、北大、清华和八大学院以及外贸部等演出了13场独唱音乐会，其间还与一些文艺单位的同行们进行了业务交流和座谈，并得到了许多的关怀和鼓励。整个演出结束后，我和伴奏立即转入录音工作，两周内完成了歌曲部分，伴奏同志就返回了哈尔滨，我留在北京与中央歌剧院乐队合作录制歌剧选段。这时，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12月底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一场音乐会。我临时找到了中央乐团的巫漪丽同志，请她帮我找钢琴伴奏，29号晚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这次的音乐会共请了11位女高音，这种同声部演出的独唱音乐会在那个时候还是创举。我们11个人都尽心尽力，非常愉快地完成了这个工作。尤其使我永生难忘的是，我演唱刚开始，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场内十分安静，总理很快地在台前左面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我虽没有停止演唱，却还是为这非同寻常的气氛所感而更加投入到《乌苏里江》这个作品的内涵之中。我想我从未唱得如此人情，音乐结束在掌声之中，我深深地鞠躬致谢。当我起身抬头时，见到总理手拿一杯热茶从他自己的座位向舞台走来，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了我，我激动地接过这杯热茶，并握了总理的手，他脸上充满着慈祥，眼光里饱含着关切，他连声说：“唱得很好，你把赫哲人的历史又给我们讲了一遍，休息一下再唱吧！……”我再次俯首鞠躬，然后转身把这杯热茶放置在乐队空位子上。我不断地深呼吸，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回到琴边再开始唱下一个作品。整个演出结束，我都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语的心情之中，最后，统战部的两位领导徐冰和张执一同志安排我们大家在周总理和另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身边合影留念。它留下了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信任、关怀和鼓励。

1991年7月北京

是总理，更是朋友

李默然

1956年初，全国首届话剧会演结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留在首都作近三个月的公演，地点在首都剧场。

剧院先后演出三台话剧。即参加会演的，反映建国初期军工生产的《前进、再前进！》、苏联话剧《在那一边》及曹禺同志的名著《日出》。

5月的北京，正是春去夏临空气清新的季节。特别是每当夜色降临，一丝凉意，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在当时，人们在这美好时刻，走进剧场欣赏一出好戏，是极大的乐事。所以，我们演出虽长达一个季度，但观众始终不减。特别是《日出》上演后，观众更为踊跃，我们这一代演员，当时正值青壮年，连续演出，亦不知什么叫疲倦、劳累。

一天晚上，演出照常进行。但我们的院长洛汀同志却显得与往常不同，只见他一会儿前台，一会儿后台，神情也有点紧张，对我们只说一句相同的话：“不要松懈呵！”后台的演、职员，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摸不透、猜不着有什么事儿发生。

戏结束了，大家照常谢幕，不知是谁眼快，一眼发现了周总理在台下鼓掌。他小声传送给周围的人：“周总理，周总理来了！”这时，大家的眼睛一下子集中到一个目标，都发现了总理在鼓掌。台上控制不住了，有的站了起来，有的嚷出了声：“周总理，周总理。”大幕比往常至少晚闭上一分钟。因为司幕的同志也跑到了舞台上。

大幕闭上，谁也不愿立即去卸妆，议论、喜悦、兴奋，每个人的面孔，都与往常不同。一会儿，洛汀同志来告诉大家：“都到左侧休息室，总理要见大家。”霎时间，舞台上竟然寂静得令人窒息。我只觉得心律跳动在加快，大家被这无准备的喜讯，弄得一下子呆住了。

我们30余人，自动地排成了队，像去参加一个什么庄严的会议，脚步轻轻，呼吸紧张地走进了休息室。

周总理早已坐在休息室等待我们。大概是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站起来主动伸出手，先和演陈白露的白玲同志握手，然后一边和每个人握手，一边让大家坐下。他看出进来的人多，沙发和座椅坐不下，就说：“坐不下就坐在沙发扶手上，这样，一个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一句话，大家放声大笑，刚才那种紧张气氛顿然消失。每个人都抢着往总理身边挤，想和总理坐得靠近一点。每个人亦好象忘了面前坐着的是总理，而是个许久未见的朋友、长者。这一刹那的人际关系变化，时过近40年，但就是这一刹那的变化，我40年记忆犹新，我40年常常思念，因为正是这一生活细节，把一个大国总理待人的亲切、慈祥，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开始谈话，大家还是有些不自然，总理就自问自答地说：“陈白露头上插一朵粉色的花儿，不适合这个人物吧？应该戴一朵白颜色的嘛！你们说呢？”当时，老实讲，我们并未完全理解总理这个建议的深层次内涵，就异口同声地答：“对！”总理接着问：“为什么？”大家又都剩下了傻笑，而回答不出。总理笑着对大家讲了陈白露的出身、性格、旧社会对她的逼迫等一系列简明精辟的意见，说基于此，戴白花能反映她的性格。我们瞪着眼睛听。我边听边想，这样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对一出戏，对一个人物讲出这么多好意见，而且一朵小花儿都注意到了。我们这些演员真是大幸福了。

正想着，总理突然问我：“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都干过什么？”我很紧张地答，“读书不多，学过小工，当过邮差、卖过烟卷……”总理又问：“你见过李石青这样的人吗？”我答，“没有！”总理说：“那你怎么演的？”我答：“除了导演启发以外，我回忆了卖烟卷时，看见过的一些人，觉得那些人的穿戴，行为有点象李石青。”总理点了点头，又问：“你还演什么戏？”洛汀同志替我答道，“我们演的三出戏，他都是主要角色，有工厂党委书记，还有一个苏联话剧，是写有关日寇侵略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儿。”总理立刻问：“这出戏怎么写的中国人？”导演答：“没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总理露出了不悦：“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我们一个同志勇敢地举起手说：“我看过。”总理说：“你说说写得怎么样？有什么看法？”这个同志一下子怔住了，脸涨得通红，不知怎么回答好。总理说：“看完了书，说不出个道理来，不是等于没看吗？！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你们的戏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导演答：“没有，这出戏没反映这些。”总理说：“那还好！”话不多，道理深。总理对文艺作品中怎样反映中国人民的指示，40年来我一直不忘。是我审视、阅读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指南。

接着总理又叮嘱大家：“演《日出》要注意历史背景，要请曹禺同志来看看戏，要多听各方面意见，把戏越演越好。”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秘书正在催促总理。等我们反应过来，总理已经走出了休息室，并回身向大家打招呼。这时，我们才一拥而上，抢着和总理握手告别。总理尽可能地满足了每个人的要求，然后，急促地登上了车。

直到今天，我们深为遗憾的是：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竟没留下一张照片。当时，剧院没有专职摄影，每个人也没有相机。一些老同志，每谈及这次与总理的会面，都为没有留下照片而叹息。因为，短暂的会晤，不多的谈话，指导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如今，我们这一批人，皆已年过花甲，有的已经作古。但是总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却将继续下去，直到很久、很久……

“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陈伯华

汉剧是具有300年左右悠久历史的古老剧种，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出现过一个蔚为壮观的繁荣局面，但到解放前却奄奄一息，濒于衰亡的危境了。解放后，党的“双百”方针使凋残的汉剧获得了复苏和新生，发展和兴旺。其间周总理对汉剧无微不至的关怀及指导，如春风春雨般及时地赋予汉剧以盎然的生机、蓬勃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

1952年的深秋，国庆前夕，崔鬼同志率领中南地区戏曲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汉剧代表队演出了《宇宙锋》、《打花鼓》、《战樊城》等戏。其中《宇宙锋》获演出二等奖。《战樊城》获荣誉奖，《打花鼓》获观摩演出奖。我因主演《宇宙锋》而荣获演员一等奖。一天，周总理到代表队驻地看望大家。他平易近人地坐在大家中间，询问了汉剧的源流、曲调、行当以及剧团的筹建工作后，亲切地对我说：“陈伯华同志，你一个《宇宙锋》的演出就反映了汉剧艺术的丰富。你是有功劳的，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自此以后，周总理常看汉剧的演出，并且非常喜爱。只要是汉剧进京，或者周总理到武汉，或者在外地遇上汉剧的演出，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赶到剧场观看。他常常是带一个警卫员悄悄进场，坐下就看，从不惊动大家。有一次，周总理路过武汉，我们武汉市汉剧团正在省府礼堂演出《张羽煮海》，快演完时，我们发现周总理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坐在剧场角落里，大家顿时欢腾起来。他连忙走到后台，亲切地问候大家，并对我和其他同志说：“我作为一个观众，给你们提一个意见。戏曲乐队在正台口伴奏，声响太大，压住了演员的演唱，也影响了观众听戏看戏的效果。我看是不是可以把乐队搬到侧幕里面去。”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果然效果很好。

周总理常常因为政务繁忙，一出戏要分几个晚上才能看完。1952年，国庆十周年的晚上，我们在北京“长安剧场”演出献礼剧目《二度梅》。周总理在接见外宾和观看焰火后，兴冲冲地赶来观看。看完后，他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照相。然后走到后台，象老熟人一样向大家问长问短。周总理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我的琴师刘志雄、化妆师徐福林和一些老演员他都认得，并能叫出名字。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分几个晚上看完了，非常喜欢。但我要提一个意见，你们演的是少数民族的戏，少数民族的帽子上不要安尾巴。这样对民族团结不利。”

记得这次赴京演出的一天上午，我们和首都文艺界同行举行了座谈。不知谁拿来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刊载了一篇署名石千山的文章：《传奇的艺术——评陈伯华同志主演的〈二度梅〉》。文章见解独到精辟，是建国以来该报第一次发表有如此分量的评介汉剧的大块头文章。这位石千山同志是谁呢？后来我总算了解到，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后，他亲自召见了文化部领导以及首都各报的负责同志，并对他们说，“要宣传汉剧的演出。”当时《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汇报说：“我报已予以报道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日报》对赴京演出的剧团只报道一次。总理马上又说，“像陈伯华这样的演员，可以破格宣传。”于是，邓拓同志当晚挥笔疾书，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署名石千山的那篇文章。

周总理不仅喜欢汉剧，不时给予指示，而且非常关心和重视汉剧培养接

班人的问题。记得还是在 1957 年，我们巡回演出到北京。一天我们在文联大楼小礼堂汇报演出。周总理穿一件旧汗衫，手拿一把芭蕉扇赶来观看。他老人家从来不让别人给他留座位的，哪里有空座便坐哪里。看完后，他很高兴。我还没卸妆，周总理便语重心长他说：“陈伯华同志，你演得好，我希望你能培养出三个陈伯华出来。”

除了具体的及时的指示外，周总理还亲自对汉剧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1960 年秋，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旦角名演员讲习班。一天，我接到通知：周总理和邓大姐邀请我和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去中南海他们的家中赴宴。傍晚，周总理准时派车来接我们。因为周总理临时有一个外事活动，接外宾去了，邓大姐亲自在家门口欢迎。她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说：“总理早就想单独请你们，一直没空，这次正好你们都在北京，机会难得。总理是非常关心文艺和你们这些艺术家的。”这时，周总理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大家立即站起来。周总理连连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客气。”他在空座上坐下，不时招呼大家吃菜，并亲自为大家夹菜，和大家谈笑风生。他询问了各人的情况和剧种的发展现状，对我说，“汉剧源远流长，对京剧和许多剧种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是有资料有根据的嘛。全国 13 个省有汉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有发展前途的。主席也说了嘛。”接着他笑着说：“你是中南地区的四大名旦嘛”。（另三位指，常香玉、红线女、尹羲）最后，他又认真地对大家说：“全国主要剧种都应该各自建立剧院，形成艺术中心，以便更好地发展地方剧种，全国要建立八大剧院，你们都当院长，由中央直接批准。你们回去后要积极筹备，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直接找中央。”就是在周总理亲自规划和指导下，我们湖北省于 1962 年元月建立了以我为院长，吴天保、胡桂林为副院长的武汉汉剧院，名称便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武汉汉剧院的建立，使全国汉剧有了一个艺术中心，对促进和推动全国汉剧艺术的发展起了深远影响，汉剧又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如今，周总理逝世已经整整 15 年了，但他那伟大领袖的远见和气魄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尤其是当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汉剧艺术的发展，碰到了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但是一想到周总理那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汉剧的亲切指示和深切关怀，我顿时就勃发出了力量和信心。去年，在省、市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我亲自指导成立了武汉市汉剧艺术研究院，我想借这块振兴汉剧的新艺苑，奉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以促使汉剧雄风再弘扬！

你是怎么想的 荒煤

我犹如在梦游之中，独自一人在丛林中漫步徜徉。在异常寂静、阴凉、潮湿的夜空里，仿佛有一阵浓雾笼罩在我的心头，许许多多的回忆不断闪现在眼前，简直象一股无法阻止的寒流渗透我的身心。

我并不愿意去搜寻记忆，然而我无法阻止记忆搜寻我。

我在潘家坪招待所开阔的庭园徘徊。这是 1991 年元月 13 日的夜间，我回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晚上。

我不禁想到，1979 年 1 月初从重庆迁居北京后，整整 11 年了，我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为什么？是怕回忆起 1975 年 5 月到 1978 年 4 月这短短三年难熬的岁月？

那三年的日子，我的确觉得比 1968 年冬天到 1975 年 5 月近七年的“监护”的时间还要漫长、艰难。住了七年的监狱，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一人，脱离人间的生活。我的名字在人间消逝了，我没有名字，我的代号叫 203。在那间小小的空旷的屋子里，我整天、整月、整年没有说话的机会，也不想说话；日间沉思，夜间多梦，幸亏我的脑海里还能自由地波澜起伏，终究还有一块不受干扰的辽阔的自由天地——除非死亡，没有人可以消灭的一个自由天地。

1975 年 5 月 21 日上午，我被宣布“即日起恢复自由”。当天就被重庆来的两位同志押送回重庆。我回到了人间，恢复了姓名（当然，我也永远不能忘却我的代号 203），恢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里清理旧书刊，写卡片。可是，我十分苦恼。我觉得非常不自由。

因为，我毕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从 30 年代到 60 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我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我的亲人。我怕见一切人，却又在人间，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反省、不检查……也不能不警惕、思考、怀念、回忆……总之，这三年，在人间，接触人，太累了。

只有到晚间，把自己关在图书馆宿舍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才有了自由，独自一人生活的不受干扰的一个小天地：我可以在窗前眺望那日夜奔流的长江，看到航船上的灯光恍如流星一闪而过，使我不免回想到我青少年时代在武汉长江身边的一些往事。我也可以在窗前眺望不远处的火车站上灯光，听那汽笛声嘹亮地飞向远方，因而使我怀念在祖国四方远处的亲友和同志们，虽然久已失去联系，但肯定或多或少会受我的牵连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更值得庆幸的，我不时利同一点点“私权”，悄悄从库房里拾来一两本“封资修”的中外古典名著重新温习一下。尽管也自我嘲笑一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却也“死不悔改”。因为我太寂寞了，太孤独了，太缺少温暖了。这可是在七年“监护”绝对无法享受到的幸福和自由！

我继续在庭园里徘徊。

我觉得那三年在图书馆生活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可是这天上午我重返图书馆的故居，又一次踏进我离开整整 11 年的小房间——正好现在还没有人住——仍然显得那么狭小而孤独，我感到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好像突然坠入一个噩梦中难以自拔。这些从酷热的夏夜到阴冷的冬夜互相交替的

上千个夜晚，我做了些什么？我想了些什么？我怎样活着？我渴望什么？我期待什么？谁知道！

我在庭园里转了一个大圈，不知不觉漫步来到一号楼门前。

一号楼现在没有人住。整个楼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没有一丝灯光，黑漆漆的。

据说，这栋楼本来是准备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来的时候接待他老人家的，可是他没有来过。

我茫然走进一号楼的小院，不禁凝视着这座漆黑的楼房。

刹那间，我清晰地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幻觉——我很清晰地看到了我很久没见到的那非常亲切熟悉的的笑容，那双在浓眉之下显得格外炯炯有神的眼睛，听到一声高兴的呼唤，“荒煤！”我顿时泪水盈眶，眼前一切都模糊了。

我的确听见了这一声亲切的呼唤，使我兴奋和激动，恍如一声惊雷震撼在我的心头，响彻在高空，盖过了我整天24小时不断吱叫的耳鸣。我不禁把身子偎依在门柱前，觉得两腿有些发软而且已经微微颤抖了。原来我全身紧张地仁立在一号楼前，沉湎在回忆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了。

时间的确很长，很长，26个年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只有52岁，现在已经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周恩来同志呼唤。

那是1965年9月25日。周总理从北京飞到重庆，并在当天下午就要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船去武汉访问。这天中午就在一号楼举行宴会。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心情十分惶惑不安而且非常矛盾。我很想借此难得的机会再见一周总理，又怕万一周总理谈起我在文化部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错误”——在“文革”期间就被称谓“滔天罪行”了——没有时间详谈。说真话，还真怕周总理看到我会不高兴。因为，我在整风最后检查中，承认厂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964年国庆15周年前夕，周总理接见法国一位电影导演时。我还参加了。不料到11月我就被停职检查，到1965年5月就调到重庆市人委工作，离开了北京。快离开北京时，我想写封信给总理，还想找总理谈谈……结果，我悄悄离开了北京……

犹豫了许久，我终于还是去参加了这次宴会。甚至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远远看一眼总理就可以了，不然，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我一去，就站在宴会厅一个角落里。没有想到，周总理提前来到宴会厅，当时还只有重庆市一些领导同志在场。当周总理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陪同来到大厅时，场内的人不多，周总理高兴地用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圈，远远地就看见我，立即伸出手来指着我，微笑地亲切地叫了一声“荒煤！”我顿时觉得全身涌起一股热流，赶忙上前紧紧握住总理的手。

总理问我爱人张听来重庆没有，还笑道：

“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

他还记得我爱人张听的大姐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不会忘掉她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活动了。

周总理然后满脸笑容地和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相识。

周总理当然没有时间和我谈我在文化部的“错误”。我也就高高兴兴参加了宴会，心情激荡地听了周总理讲话，尤其是听到他对重庆有一种特别的

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是重庆的一个“公民”，曾经在这里战斗过多年，我也想到我一定在重庆好好工作下去。

最后，我也随着周总理和贵宾的车队之后，在几十万群众热情澎湃欢送的呼声中，来到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浩荡的长江岸边，一直看到那首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逝。

我怎么能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周总理的会晤！

我不能不感到一阵深深的悲痛……

就在周总理回到北京不久，我接到了延安鲁艺的战友张颖同志给我的来信。她告诉我，她陪同总理从武汉回到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紧促了，他觉得遗憾，没有时间找我谈谈，还说他看过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然后说了一句：

“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我当时翻来覆去地看这封信，也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句话。我想了一夜，我失眠了。我那泪光闪闪的眼前，不断展现出总理浓眉下沉思的神情，最后亲切地凝视着我，似乎在问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能不感到一种痛苦和内疚。我既没有想到，总理在百忙中居然觉得没有机会找我谈而感到遗憾，而且他还在思考，我作了那样的检查，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手头并没有保留这份检查。但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检查，最后承认了：我领导的电影事业已经形成了一条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文化部经过半年多的整风，1964年11月又被停止工作，直到1965年1月22日，我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上的检查。

我并没有觉得我作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惟愿还有机会彻底改造自己。

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我当时不止一次想给总理写信，请他放心，我是真心认罪的，我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但我又极力克制自己，总在想，等我工作真的有些成绩的时候再写吧。却没有想到，1966年6月，我就被调回北京进了文化部集训班，然后在“文革”中被批斗，被群众专政，被“监护”，直到1975年5月才恢复自由回到重庆，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清理旧书、写卡片。

更没有想到，1976年1月9日，我正因病在重庆联合医院住院期间，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1978年3月1日，我在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散文《永恒的纪念》中写道：

“那是前年一月九日的深夜。我住在简陋的联合医院里。同房的几个病友都睡熟了，我悄悄爬下床来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在那面临长江的黑暗的空房内徘徊、眺望。

我站在窗前，任寒风冷雨浸湿我炽热的前额，许多回忆涌上心头……

我听到风雨中的长江，波澜滚滚，发出阵阵悲痛的呜咽，心头突然紧缩，我不禁伏身窗前，失声痛哭。

就这样，在那走廊尽头的黑屋里，度过了好些不眠之夜。

多少次，我想拿起笔来写点悼念、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但是我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悲痛都有罪，悼念更有罪。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我只得在痛苦的熬煎中发誓：一旦能拿起笔来时，就首先要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自然也觉得，这可能只是幻想……”

不料 1978 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宣布我的问题平反了，当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张光年同志立即来信约稿，希望我写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文章，我也就在整整搁笔 14 年之后，终于重新提起笔来，实现了我的誓言，第一篇首先写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永恒的纪念》。

这时候，我已经是 65 岁的老人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无法在庭园里继续徘徊了。我不知道，是细雨还是眼泪在我脸上蔓延。我不能不感到忧伤地走出了一号院。我回到房间，关了灯闭上眼睛和衣而卧。我毫无睡意。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捉弄我、折磨我？

为什么在 26 年前，让我在重庆潘家坪和周总理有这样一次会晤，给我留下一句无法忘却的遗言：

“荒煤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又正好是总理逝世的 15 周年，我又回到重庆潘家坪想起了这句话？

我突然想起来，1965 年 1 月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中，我一开始就声明，我在电影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多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尽管得到中央、中宣部的批准，但这是我们向领导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干扰了领导，甚至可以说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不能把责任往上推；也还承认了整风开始，自己有委屈情绪，态度不端正等等。

可是，我当时想过没有：周总理记忆力特好，他会忘记他亲自过问和处理过的问题么？

是他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并且批准试行“文艺八条”，随后我们才根据“文艺八条”精神提出了“电影三十二条”。整风中批评的有些“坏电影”是周总理亲自看过并且肯定的。整风中尖锐、严厉批判电影界有“一股 30 年代的阴魂”，在搞“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些被总理称之为“老朋友”的同志却大都是在抗战时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直接领导下，为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辛的斗争，取得巨大的成果；后来投身到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来，又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曾经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新片展览月的讲话上指出：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新片展览月的优异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异峰突起的空前记录。”

为什么这些同志到了 60 年代突然要去推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总理能够不思考这些问题么？……

我似乎猛然清醒过来，我的灵魂颤抖了，我怀着无限内疚痛苦的心情睁大了眼睛，我又一次清晰地看到周总理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深沉而坦率地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很清楚、很透彻地回答周总理呢？我到哪里去向总理面答？

1991年1月30日初稿

1991年4月14日定稿

他让我们多为孩子们演出 方掬芬

记得那还是建国初期，我刚由华东团工委介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参加工作不久。一天晚上小组长高兴地跑来说“今天晚上北京饭店顶楼上有个露天舞会，有好音乐还有冰淇淋……”在当时能有冰淇淋吃那可是不简单，于是我们一大帮人都去玩了。

第一次到北京饭店，真是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尤其是上了顶楼空气清新，凉风习习，登高远望，北京城灯火辉煌……乐队奏出动人的舞曲，人们在起舞，在谈天说笑……真是妙极了！的确确实是消除了一天的疲劳。不一会儿就听说有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参加舞会……“谁来？谁来？”好家伙，中央领导同志可不是一般的领导要来参加我们的舞会，这对于我这个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既意外又兴奋又好奇。“来了！来了！”啊，周恩来总理！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穿着深色的中山装，乌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舞姿也好极了……好多同志都去请总理跳舞，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跳，我真担心总理会累着，我们也很想请总理跳舞，但又不太不好意思，有点胆怯。可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非常坚决，她一直在一边等着，别人捷足先登了，她就等下一次，一次复一次，她也不灰心，后来总理注意到这情况了，主动去请她跳舞，她高兴极了。总理很风趣他说：“唉呀，小同志，你真有解放台湾的精神啊！”说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这一切对我这个头一次接触总理的人真是大意外了，他可不是一般人啊！总理是中央领导人，可这么平易近人。

1954年底至1956年夏，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课教师（苏联专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毕业剧目中安排一个中国剧目，他选中了周立波同志的《暴风骤雨》。这是一本小说，如何形成舞台剧呢？我们从小说中选取片断，用小品的形式进行排练，使它逐步完整起来。那时我们表演班设在交道口香饵胡同里。一个院子里有我们排戏用的大教室，还有一个很像样子的小舞台。有一次我们正在连排小品的时候，忽然发现周总理来了，他端坐在小舞台前的木椅上，很仔细地观看我们的表演……。演完以后热情地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谈笑中把意见和看法告诉了我们。还愉快他说：“唉呀！看了你们的表演，我也想上台来演戏。”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却能抽出时间来深入到这样一个简陋的教室里来看我们排练，使我意外、惊讶、感叹不已。

1960年4月22日列宁90周年生日。我们剧院排练演出了米·沙特罗夫写的《以革命的名义》，由留苏回来的朱漪同志任导演。舞台戏演出以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5月份《以革命的名义》到中南海去演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戏。

邓颖超同志看了戏以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戏很好，我一定让恩来同志来看……”几天以后周恩来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来到东华门中国儿童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他和往常一样，看完戏以后上台来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灯光和装置组的有些同志习惯地站在侧幕里不往前来，周总理主动地走进去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寒问暖，有一位师傅这次与总理见过一面，四年后在另一次演出中总理还记得他，认出了他，他除了惊讶总理的超群记忆之外更感激他对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关注，总理几乎走到每一个角落

关心每一个人。

当周总理和我们合影的时候，大家请他坐在扮演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演员中间，他笑着说：“不！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我是小学生。我在十月革命时还是普通青年，那时我19岁，你们邓大姐13岁。瓦夏（剧中人，由覃小昆扮演）你也13岁，我们是兄弟，我们坐在一起吧，小别佳（由我扮演）你最小，坐到列宁同志身边吧！”周总理的风趣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谦虚品德，体现了对革命前辈的尊重和对少年儿童关怀。也就在这一天，周总理说：“这个戏很好，加些群众场面，可以拍成电影。”三天后北影成立的摄制组就到剧场来看戏，给演员试镜，一部两个钟头的舞台纪录片，40几天的时间就拍完了，而且保证了质量。那是在困难时期，但在工作上不仅要求速度快，还要求质量高。剧组的同志们为了突击这部片子，真是不怕累、不怕苦。有一回连续拍摄了48个小时没有任何补贴，大家毫无怨言，团结互助，互相友爱……今天回想起那个创作集体的一切，心中还是热呼呼的，十分怀念，还感受到一种鼓舞的力量。

1962年在全国青联会的联欢会上，我们文艺界的几位委员轮流坐在周总理旁边和他聊天，当我坐在总理身边的时候，舞池里传来了王玉珍同志演唱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总理非常高兴地一边轻轻地打着节拍一边低声跟着唱，一字一句一点不错，偶尔还问我：“你会唱吗？”我说：“会唱！这是我家乡的歌，只是不如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总理一直很有兴趣地跟着把歌唱完。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么长的歌词，他怎么能记得那么全，那么准确，他一天到晚多忙啊，哪还有时间学歌呢？我真是难以想象。

1962年12月，在一次优秀辅导员的集会上，我们剧院《小雁青云》剧组的同志们见到了周总理，他问这个戏在少年儿童中的反应，同志们汇报了，周总理很高兴，发出了他特有的爽朗的笑声，他满怀深情他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你们应该多为他们做贡献。”周总理又问：“儿童热爱你们的剧院吗？”同志们回答：“我们每次演出孩子们都非常欢迎，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还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周总理真切而深情他说：“你们应该多为他们演出，要让孩子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作他们的老师和朋友。”这成了我几十年来甚至于一生的行动指南和动力。

我们剧院最早演出的《马兰花》，剧中人大兰好吃懒做，忌妒妹妹小兰得到的幸福，在老猫的教唆下干了坏事，最后得到惩罚掉到河里淹死了。

总理看完戏后，谈观感，其中谈到“大兰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帮助她改正，不要让她死嘛！最坏的是老猫，应该惩罚他。”其实这就是总理在教我们如何掌握政策哩！这以后我们演出的《马兰花》大兰没有死，而是很羞惭地承认错误。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以前，周总理就看过我们剧院的同志演的《爸爸参军》、《进军舞》、《小白兔》。

不管周总理有多忙、多累，但我们感到他经常在我们身边，时刻在关心我们的进步和成长。

十年浩劫中，周总理千方百计在保护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也非常想念他。

我没有想到我最后见到总理时，他却是躺在北京医院一个最偏最小的太平间的灵床上。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

天空阴沉得可怕，长长的长长的络绎不绝的悼念队伍，党、政、军、文教、体育、科技等等各界人士，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都在哭泣，

当我们走进那个狭小的灵堂，看见周总理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样子躺在堆满马蹄莲和松柏树枝的灵床上，大家的心碎了，尤其看到在总理脚旁放着邓大姐献上的一个用鲜花做的小花圈，人们的哭声更大了，有的同志哭晕倒了。

“总理没了，我们成了孤儿了。”这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我们剧院一些同志之间的悄悄话，也是我们当时真情的流露。在那悲痛的日子里“上边”要我们照常演出《草原儿女》，我们笑不出来，也跳不起来，推说演员病了改期演出。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年了，我们排除一切困难，排演《报童的怀念》，到天安门纪念碑前去悼念，当时我们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想法，我们就是要去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儿艺恢复建制，全院同志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地编排演出《报童》、《喜歌》来寄托我们对周总理的哀思。

《报童》是反映周总理在重庆领导《新华日报》的斗争史迹的多幕话剧。在排练过程中，一些当年在总理身边的报童到剧院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们满怀深情地流着眼泪讲述周总理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对他们的辛勤培育，指导他们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喜歌》是反映一部总理和孩子剧团的事情。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周总理在武汉成立孩子剧团的感人故事，为了使这支儿童文艺新军免遭迫害，周总理亲自布置孩子剧团的转移。

从武汉到长沙大火，到后方重庆，周总理和邓大姐关心每一个小演员的冷暖、成长。

他一贯重视对革命后代的教育培养，一贯重视儿童戏剧事业，热情关怀儿童戏剧工作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他。

1991年7月30日北京

《东方红》的总导演 黄贻钧

我是建国后在党培养下成为音乐指挥的。在我的几十年指挥生涯中，参加过几百次不同对象、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演出，其中有几次演出是我永志不忘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观赏过的演出。

（一）

1954年6月，周总理陪同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上海期间，上海为总理和国宾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是独奏独唱节目，下半场是上海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上交）演奏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我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陪同总理和国宾观赏了演出。这是上交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外事演出，也是上交第一次以全部中国演奏员的阵容接受总理的检阅。当时上交仍有三分之一外国演奏员留甲。我们请了歌剧院乐队部分同志来协助演出。我们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去演奏的。这次演出，预示着上交这个原来全部由外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即将发展成为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自立”于黄浦江畔。我们也感受到，党和政府是重视交响乐事业的。

（二）

1961年8月，周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交副首席陈慧尔（女）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交协奏，我指挥。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在台上谢幕，总理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总理十分高兴，带着微笑和独奏者陈慧尔握手并问她，“你是哪里人？”陈答：“浙江人。”又问：“你几岁开始学琴？”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心里想该对总理表示些什么，没有立即回话，我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总理接着又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事后得知，国宾和总理对演出是满意的，总理对陈慧尔尤为关注。《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应良好，有“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污浊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这样的评语。总理要求我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

（三）

1964年7月13日，周总理来沪观赏了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196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十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以下简称大歌舞）。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

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 2000 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演出由司徒汉、我和另外三位指挥担任执行指挥，分别指挥全剧的一部分，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的经验。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二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七场。

6 月 18 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事后得知，国宾看了大歌舞受到感动，陈副总理也觉得大歌舞是好的，并指示：“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7 月 13 日晚，周总理在陈副总理、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赏了大歌舞。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台上谢幕，等候总理上台接见。总理和陈总退场时，场内一万观众欢声雷动。总理和陈总走过舞台一侧时，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围住了，小朋友们高兴得又叫又跳，原定的接见被小朋友们代替了！

事后获悉，总理觉得大歌舞的基础是好的，可以和北京合作，作为首都一项国庆活动。

（四）

8 月 6 日，司徒汉、董本一、我和另外 12 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调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以下简称《东方红》）上海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已先期抵京。

作为首都庆祝建国 15 周年一项隆重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倡议并亲自主持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演工作。这是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它的总体构思、体现构思的“六部曲”的具体实施方案，歌、舞、乐的有机结合，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总理审定。分场排练也经总理亲自审看，提出加工要求。预演八场，总理全看五场，每场结束后总理都主持座谈，征求意见。周总理就是这样的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我们以自豪的心情称颂：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由总政文工团和各大军、兵种文工团，各大军区文工团以及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的共 3000 余人参加演出的《东方红》，于 10 月 2 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连演 14 场，轰动了北京城，盛况空前，赢得了中外观众的盛赞。我恭逢其盛，深感幸运。作为《东方红》六名执行音乐指挥（部队二名、北京二名、上海二名）之一，我不仅有机会和庞大的、优秀的合唱队和管弦民乐混合乐队以及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在一起进行二度创作，而且还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形象的党史教育。这是一次终生受益的实践，我曾撰文谈了体会，发表在 10 月 23 日上海《文汇报》上。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0 月 10 日夜晚，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同奎、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我有幸和几位同志一起受到接见，分享了殊荣。周巍峙同志向总理介绍我时，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喔！我看过你指挥！”我讷于言，一句活也说不出。这是我第二次和总理握手，也是第一次、仅

有的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见总理。面对一代伟人，我激动万分，再次深感总理是那樣的亲切、平易近人。

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说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的谦逊呀！上海的大歌舞只是做了一次探索，6月27日陈毅副总理在上海接见参加大歌舞的部分工作人员时指出，大歌舞还需要把各部分的内容再作一些充实和调整，而《东方红》则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传世之作。

周恩来同志生前总揽百揆，日理万机，宵旰辛劳。总理对文艺创作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发展，文艺队伍的成長，如同对《东方红》一样，始终给予满腔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在那年月，难以表达对总理逝世的哀思和缅怀之情。“文革”结束后，当我重新有了工作室，我在朝南墙正中挂了周总理的肖像——总理坐在沙发上凝视；在朝东墙上首挂了总理署名写的条幅——“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八个笔力遒劲的大字。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激励着我方为党的文艺事业敬献余力。

1991年7月31日

“要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

章宗义

1957年12月中旬，我们浙江省绍剧团正在萧山演出，那天突然接到通知，不日赴上海作招待演出。

按预定日期，我们赶到上海，下榻于北京旅馆。上面通知所有演职员不要随意外出。看样子这次演出十有八九是招待中央领导了。我高兴之余不免有些担心，首先是二儿子章金星（小六龄童），当时只有八岁，似懂非懂，要紧关头不知他听不听使唤。尽管他跟我演出五个年头，在《闹天宫》中扮演罗猴也挺机灵，然而毕竟年幼无知，倘出了洋相，岂不误事！谁知我把这担忧告诉他时，这小家伙竟然眨着小眼睛对我说：“爸爸，我一定听你的话，做只乖小猴。”

孩子算是说定了，却又遇到了别的小意外。那是次日一早，我们乘车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小礼堂“踏台”。开始排演一段开打，不知道什么原因，许是情绪太兴奋或者是紧张，扮演神将的韩一虎，手持单刀，与我交架，一失手，就劈了我鼻子上一刀，疼得我猛地跳将起来。韩一虎一见这情景，紧张得脸色发白，连连问我：“还能演出吗？”我宽慰他说：“不要紧，只是一点皮伤。”他这才放心了。

12月24日晚，演出准备定当，但我依然紧张，不知来看演出的是哪一位中央首长，后台已经化妆穿戴完毕，而我还是按照自己平时的习惯，在登台前五分钟开始描金粉。因为这金粉是用麻油调的，调得过厚，不起光亮，只能调得薄一些。但描得过早，便会流掉。所以，不到时候不描。而这时候，有人兴冲冲地跑到我的身边说：“门口到了许多小车，有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像是周总理。”我一听，有些不信：“你看清楚了？”他说：“不会有错！”这下，我更显得紧张了，那只描金的手再不能控制，总是微微地颤，几次勾眼眶，都勾不准了，只能比往日勾得粗一点。然而这也好，无意中更增添了猴王的一种威美之感。

这一夜演的是两出戏。先是俞振飞和言慧珠合演昆曲《长生殿》，接下来是我们的川剧《闹天宫》。一文一武，也很有特色。演出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戏上去了，适才那种紧张感似乎被平抑下去。在众小猴的簇拥下，我身穿盘龙大蟒袍，头戴紫金冠还插上两根滞洒的雉鸡挑毛，肩垂两条雪白的蝴蝶围，以袖遮面，从上场口疾步走至台前……。美猴王的壳虎雄姿顷刻赢得了台下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此时，我已完全进入了角色，心中无半点杂念，全神贯注对付“十万天兵天将”的到来……

戏演得十分顺畅，下了幕，俞振飞先生就跑过来向我表贺，连声称赞：“演得很好！”帷幕重新开启，台上台下掌声一片。不多时，早有两人抬着一只大花篮送到我们面前，随后是周总理陪着外宾健步走上舞台。我终于看清楚总理的身影了，顿时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总理伸过手来，一下子将我握住，我赶忙又用左手将总理的手抚住，总理也立即用左手覆上我的手背，于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使我的眼睛变得模糊了。我听总理说：“我是绍兴人，看绍剧可还是第一次。你们演得很好，外宾看了很满意。”他还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我部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夸奖说：“你的武功不错。”我说：“这是总理对我的鼓励。”接着，他又问到绍剧的曲调，我告诉他主要是「二凡」和「三五七」两种。他点了点头，回身就抱起我的儿子小六龄童，

将他擎起，悬空举着。看总理十分高兴的样子，我猜想他一定是感到这小孩在戏中扮演天真无邪的罗猴时逗人喜爱了。这时，台下掌声雷动，记者连连拍照，许多观众在座位的过道上欢腾雀跃。这当儿，总理又用手拍着孩子并问他：“你几岁了？”小六龄童答道：“八岁了！”总理十分满意地对我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你要把后一代带出来，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说着，他放下孩子，走到俞振飞先生那里，握手、谈笑。待到与所有演员握过手后，总理又招呼我和小六龄童过去，他右手抱起孩子，左手紧搭我的腰部，再次让记者拍照留影。临走时，总理又对我说：“这次来观看你们的演出。是陈毅副总理推荐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

我们最亲近知心的老师 于蓝

一、“她是第一代……你们是第二代……”

在旧中国我只是一个中学生，从十岁起就尝受了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使我的家乡沦亡、过着灾难深重的黑暗生活的耻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疮痍满目的旧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诞生了！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涤荡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短短的三年内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人民过上了安宁和平的生活；接着，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伟大的变革使人民群众迸发出空前的热情，热爱党、热爱新中国。

1953年春节，在举国欢腾安乐的气氛中，文艺界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举办了盛大的联欢舞会。多么荣幸，敬爱的周总理也来参加联欢！有那么多们的老艺术家，我不好意思靠近总理，就远远地坐在一边。当时有远道从香港来京的著名影星夏梦，也有30年代的老演员白杨等，舞会开始了，大家起舞了。我以为总理自然要先邀请香港来宾，谁知总理走向白杨，首先邀请了老演员白杨，我深受感动，这是总理对老艺术家的尊重。接着，总理才去邀请夏梦，对这样年轻的香港来宾，也是够重视了，总理处理得十分得体，我深深敬佩总理的政治风度和素养。

我也有幸能受到邀请和总理一起起舞。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翠岗红旗》很好，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苏区的人民！”我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思念老根据地人民的感情激动着，心中默默地想，我们文艺工作者也不要忘记根据地人民，要多多地反映他们！

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阵没有跳舞，他坐在桌边休憩观赏。我感到他的思绪似乎已经离开会场，我动也不敢动地望着他，不愿打扰他。此时，总理却面向我，轻轻他说：“你看，伯钊同志（李伯钊，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是红军时代的演员，她是第一代……”我随着他的话语也注视着李伯钊同志那矫健的舞姿，跳得多么熟练、欢快！总理停顿了一会儿，语重心长他说：“你们是第二代！”我体会此时他那短暂的停顿，似乎是回到了刀光火影，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现在歌舞升平，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多么寄希望于第二代呀！当然，还有更年轻的第三代！他相信第二代、第三代的文艺工作者会继承他们第一代人开创的革命道路走向前去！

二、“于蓝……不要怕！”

1954年，我被通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委员，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我以一名普通的东北流亡青年，历经新旧社会的不同感受做了发言准备。大会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里过去曾是明、清两代王朝议政的殿堂，现在这里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在这里曾庄严地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国旗、国歌也在这里议决而飘扬激荡到全世界的！在这崇高庄严的会场上，当我坐在第一排等待发言的时刻，我的心跳得几乎要进出心房，双手拿着稿纸竟在颤抖，因为不是演出，而是在这种神圣的殿堂里议政，我真怕自己要晕台了！这时，我的背后传来了轻轻的声音：“于蓝，心跳了吧？不要怕！”那样亲切，那样安详！这是谁呀？我多么感激他！我微微地转回头……多么惊讶！怎么？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洞察与了

解每个人的心态！面对他那平和与鼓励的眼光，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与会的政治家及各界代表的距离！我终于屏弃了过分紧张的心境而走上讲台，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又激励着我动情地宣讲了党领导人民怎样走向胜利，又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业绩！会场是那样的安静，好象我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时时又赢得热烈的掌声！这一切都是敬爱的周总理，以他平易近人的风范缩短了我和伟大的政治家们的距离，给我以勇气和信心，使我在讲台上成长了！使我适应了党和政府所给予我的庄严使命，成为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普通一员。

三、“表演要掌握分寸感”

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诞生了，建院演出的剧目是岳野同志编写的话剧《同甘共苦》，受到各界的重视。一天，听说周总理也来观看演出，大家十分兴奋。导演孙维世同志嘱我演完自己的角色到观众席中和她一起陪伴总理观看演出，以便及时听取意见。这一天，后台的气氛十分活跃，大家心气十足，都铆足了劲要好好地演出。我自然也不例外，感到格外幸运，总理能亲自来观看演出，我一定更要好好地演出自己的角色。当我卸完妆，坐到总理身边陪他看下边的戏时，他却轻声他说：“于蓝，你戏演得不错，但是就是太用劲了？表演要掌握分寸感！”总理一语点中了我的要害，恰恰因为要为总理更好地演出，就使足了劲，所以也就过了火头。“表演要掌握分寸感”，以后经常在我的耳边萦绕，总理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更深知表演艺术层次的高低，“分寸感”恰恰是艺术成熟与过火或不足的分界线，正是总理教导我省悟了这一点，使我逐渐走向成熟。周总理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经常以精辟的见地诲人不倦，使我惊奇的是，在表演专业上，他又能以平等切磋的态度来指点你，这个指点又是那样准确，正像画龙点睛一样，使你的创作获得了走向成熟的境界。

四、“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

1957年春，也是一次电影工作者会议之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把参加会议的女演员都请到他们家中，会见后在紫光阁前合影留念。当时邓大姐问起我的病情，我曾告给她，医院已嘱我易地治疗，我将去杭州疗养。这是不经意的谈话，谁知不久，周总理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赴杭参观时，他竟向各疗养院询问我的情况。当时，我尚未住进疗养院，他找不到我，又让邓大姐问我的爱人田方同志，方知我住在孤山杭州美院莫朴、孙铮夫妇家中。一天下午，他竟然和秘书步行到孤山看望我，而我又外出散步未归。此时左邻右舍的老百姓迎上前来，周总理就像普通人一样，和老百姓并肩而立地攀谈起来。从菜篮子直到生儿育女的情况都在总理关怀之内。他平易得不象个总理，群众就更无比亲切地靠近他，和他谈个不休，后因秘书催促还有任务在身，他才离去。群众举目凝望着他远去的方向，迟迟不走，深深地品味着这幸福的邂逅。我回来时，还有一些人停在门前不走，他们以亲切敬慕的眼光望着我，为我未见到总理而遗憾。总理总是与人民平等地心心相通着，并作为人民中的一员和人民交往着。他的心永远系念着千家万户。

当天下午，总理又叫警卫员送来一封亲笔信，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我眼睛潮湿了，一下子使我想起了紫光阁前邓大姐与我的对话，她和总理对一个普通的演员竟如此关怀！两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当然不只是对我，而是对人民群众一向有着深情厚意！所以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他们能领导与团结亿万群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这封信

我珍藏了多年，现已送到党史资料室，它将永远启迪我们应该怎样地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五、“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

从1957年到1960年间，电影界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电影历经“拔白旗”、“打擂台”、“反右倾”等政治性的批判，电影工作者无论在创作上或生产上都处在困惑和紧张的阶段，为了电影创作得到发展，1961年得到周总理的批准，于6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创作会议。会上他不仅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有关艺术创作规律的讲话，还为电影工作者安排了一天游香山的日程。电影工作者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怀抱中，心旷神怡地散步谈心……几年来紧张不安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记得我和田华、赵丹等一起散步。田华说：“我们几个演员在一起拍张照片吧！”一下子，许多演员都跑拢来，笑语喧天，周总理在一旁也笑意正浓，为大家的气氛所感染，轻声慢语他说：“我也参加一个！”大家高兴极了，又跳又叫，因为周总理读书的时候也演过戏，当然和我们是同行！大家把他拥到前排中心的位置上，他却说：“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温馨暖人的话语，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和他靠得那么近！大家没有理由不听他的话了，并且谁都愿意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谁也都愿意留下永生难忘的这幸福的一瞬！不只是演员，来了那么多的电影工作者，遵照他的愿望，让他站在人群之中，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摄影师及时地摄下了电影史上这一珍贵的镜头。

敬爱的周总理是文艺界、也是全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最亲近最知心的好老师！他的精神和风采将万古流芳！

1991年9月19日完稿

这一次会见使我永生难忘

陈沂

周总理生前，我曾多次见过，但 1962 年夏天在哈尔滨的一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并鼓舞我度过 21 年艰难的岁月。

1962 年夏天的哈尔滨，正是美好的游览季节，男女游人成群结队，携儿带女，乘轮渡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去旅游、去享受在松花江水中沐浴的乐趣和在树丛下聚餐的快活。

当时，我被错划右派还未得到改正，为了看望爱人和孩子，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一天傍晚，我同爱人正沿着一块块方石铺成的道里的中央大街，向松花江边走去。忽然，一队车队迎面驶来，向南岗方向驶去。从车队的阵容看，我马上就联想到近日报上报道的周总理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到大庆参观，路过哈尔滨的消息。我当时对我爱人说：“怕是周总理的车队吧！”我爱人还没来得及回答，车队就如飞地驶过去了。

尽管我在北京时同周总理多次见面，但我现在还是未改正的“右派分子”，总理能否见我，我能否去请见总理，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敢想。在江边漫步了一会儿，就到地处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委党校去看一位我在齐齐哈尔下放时的直接上级，就是电影《老兵新传》的模特儿周光亚同志。在那里一直坐到 9 点多钟，才回到经纬二道街我爱人的住地。

不料刚一进门，我们的孩子便惊呼：“爸、妈，你们到哪里去了？刚才省委交际处来电话，说中央有位客人要见你们。不久他们便开车来了，一看你们都不在，马上决定要我们陪着到你们常去的地方寻找，找遍了你们常去的地方，问了那些地方的阿姨和叔叔，都没有找着，交际处的同志只好回去了。临走时留下电话，让你们一回来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接你们。”

听孩子们这么一说，我肯定那位中央的客人就是总理。我当即给交际处打电话，不一会儿，交际处的车就来了，把我和爱人一起接到“107”——省委招待处的和平宾馆。

我们到时，总理正在参加舞会，让他的卫士长在门口等我。一见面，卫士长就对我说：“陈部长（50 年代我任解放军的文化部长时，曾不只一次同卫士长见过面），你到哪里去了？总理派人找了你好久呵！”说完，他便把我和爱人引进舞厅。总理见我们来了，马上停止跳舞，把我和爱人一起拉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这些年受苦了。”

总理说罢，紧紧握着我们二人的手，我们感到那双手是那么的温暖和热情，感动得我们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总理接着就告诉我们：“刚才在街上我没见到你们，是小超（邓大姐）见到你们后跟我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所以我一回宾馆，就要他们去找你们，要他们在 11 点钟以前一定要找到。”

总理让服务员给我们端上茶水，还问我们抽不抽烟，我当时就想起，总理一向对人关怀备至，不管是准，总是那么周到。

我向总理简单地谈了这些年我在乡下的情况，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对我说：“在上面工作一段，又到下面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了。”

我边听，边琢磨，我的问题迟早一定会解决，要不然，总理怎么会说，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呢，这样一想，我心里就很踏实了。

接着，总理问我：“最近毛主席讲了司马迁的故事（这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你知道吗？”

我回答说：“我听到了一点。”

总理继续对我说，声音也提得很高：“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

这话深深打动了，大大鼓舞和提高了我继续在下面劳动锻炼的勇气。我对总理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有比司马迁还硬的骨头。”

总理当时对我的这个教导，我一直是铭记在心的，我之所以能够在黑龙江坚持劳动锻炼21年，一直到1979年平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总理的这个教导。

总理还问我：“你这些年去过北京吗？”

我摇摇头。总理接着就说：“应该回北京去看看这些年首都的变化，看看老首长、老战友。”

我只是点头，没有回答，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结束监督劳动，还没有行动自由。停了好久我才跟总理说，等我回到我乡下所在的单位，给那里的领导说说看。

这时，又有人来请总理跳舞，总理便拉起在一旁听总理和我谈话的我的爱人一起去跳了一场。我爱人不大跳舞，可以说是总理拖着她跳的。我深知，这是总理对我们夫妇的爱护和关怀。

一曲终了之后，总理又回到我坐的沙发边来，一边用毛巾擦手，一边问我：“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说：“听说军委要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正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方针），希望总理给我催一下，如果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是希望回到军队去。”

总理说：“我回去跟肖华说一声。”

总理去大庆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陪同总理去大庆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也来催总理快到火车站去。总理在门口当即把我介绍给李剑白同志，并给他说，今后省委要多多关心我。

我和爱人本想到火车站去送总理的，顺便看看邓大姐，总理说：“她怕早已睡了，她本来说要见你们的，你们来晚了，她只好先上车，她要我见到你们时代她问好。”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在心中默念：“我们尊敬的邓大姐呵！”

我们送总理上了汽车。总理上车后，还伸出手来频频向我们招手，这时，我们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在滕陇的泪花中，我们目送总理乘坐的汽车远远驶去。

第二天，哈尔滨就传开了总理接见我的消息，有人情不自禁他说：“看来陈沂的右派是打错了，要不然，总理怎么会接见他呢？”

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周而复

一、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 三将军到了北平

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与周恩来将军不久要到北平来了。这消息无翼而飞，传遍九城，古城人民日日夜夜盼望三方和平使者尽快来到北平，扑灭各地发生冲突的战火。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三位将军什么时候来北平呢？准也不确切地知道，唯一的办法是：耐心等待。

1946年2月28日上午，我正在翠明庄那间日本式建筑设备略为改变的卧房里看采访张家口的记录，准备写点什么，收到执行部新闻发布组送来一张西郊机场欢迎证和一份请柬，由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具名，让我参加欢迎军事三人小组的鸡尾酒会。不用问，三位将军今天肯定要到北平了，准备停当，带上照相机——我不只是文字记者，还任摄影记者，如果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新闻记者，那么，做为摄影记者更不合格。世界上有些事大半从不合格开始，朝合格的方向发展，经过努力，慢慢接近甚至达到合格。本着这样的愿望，按着规定的时间，乘上汽车，向西郊开去，过了西直门城楼大门，汽车速度加快了，下午2时到了机场。过了不到十分钟，叶剑英、郑介民、罗伯森先后到达，接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了，负责接管东北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也赶到机场来欢迎了。

晴空万里，远望西山残雪未消，近看他塘薄冰犹存。随着嗡嗡的巨响，蓝湛湛的天宇出现一架银色C54号巨型飞机，平静的停机坪，顿时戒备森严，刚才还在练习的美国一排仪仗队、立即排队肃立；前来欢迎的三方要员陆续走了出来；人称无冕之王的记者向来自由单独活动，这时也奉命排队，招待人员对散处各方的记者说：“对不起，请记者们上一次军训，排队，站好。”摄影记者受到优待，免受“军训”，可以跑到飞机附近。我这位南郭处士也和其他摄影记者一同前往，滥竽充数，抢拍历史性的镜头。

机门开处，放下舷梯，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一位瘦高个儿，身披皮领浅棕色呢大衣，没有雄纠纠气昂昂的军人气概，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曾被人描写为“冷静犀利犹如一把外科大夫的解剖刀，他就是66岁高龄的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马歇尔。马歇尔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通”，不是偶然的。早在1924年到1927年。他是美国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副团长。根据耻辱的辛丑条约（1901年）规定，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八国得驻兵天津，以保护平津侨民以及天津至山海关段京奉路，以备撤侨之需。这次是他第二次来华，做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任务是协助中国解决团结问题，调处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冲突，以便统编整编全国军队，促成国共组织联合政府。

马歇尔到重庆以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Alhert Coady Wedemeyer），曾告诉他：国民党兵力强大，决不再让步；而共产党要求增加部队编制，定将继续争权，魏德迈认为调解合作，恐非易事，内战烽火，实难避免，马歇尔充满信心地对他说：“我必完成使命，你务必助我。”他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北平的。

接着张治中与周恩来将军走下舷梯，和李宗仁、熊式辉等欢迎人群一一握手。

机场通往城里的路线，岗哨林立，哨兵背向马路，马路空荡荡，如同给水冲刷过一样。车队进入西直门，马路行人见了车队，都仁立观看，见三方和平使者来到了古都，生活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人民，脸上闪着微笑，心里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

记者群的车子，在车队的最后面，我们紧紧跟着大队。我知道美国的工作作风，十分讲究效率，而周恩来将军思维敏捷，办事迅速果断是有名的，即使张治中将军安排他们休息，他们也不会到住处休息的。我和少数记者一直尾随车队到了协和医院南门，这个建筑群一律红柱灰墙飞檐，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大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上书“军事调处执行部”七个楷书大字。进了大门，找到美方代表办公室，准备采访马歇尔将军，接待我的是杨上尉。他指着左边的会议室说，马歇尔将军和美方人员锁门开会，没法进去，片子都没法递进去，更别说接见记者了。我不好打扰美方会议，便到楼上去访问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将军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同共产党有长期的历史关系，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蒋介石对红军五次“围剿”，他都巧妙地设法避开，没有参与。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邀请曾飞重庆，他把自己的公馆——桂园让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住，自己到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小院暂住；他把国民党的以发表“剿共”消息和文章而臭名远扬的《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他是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主张和平，人称“和平将军”。国民党借口“军队国家化”，想把八路军新四军整个吃掉。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识破蒋介石的阴谋，也做了让步，从提出整编为48个师降为24个师、以至到20个师也可以。张治中认为中共原来有100多万正规军和200多万兵力，已经降低了整编要求，是可以考虑接受的。他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蒋介石不以为件，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将领之一，人称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蒋介石这次听了他的意见十分恼火，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原来面孔非常红润，一争论就更红了，恰巧这时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走了进来，一见蒋介石板着长马脸，神色异常，不禁愕然。问道：“委员长，发生什么事了吗？”蒋介石忿忿他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听蒋介石语义双关地把他当做“共产党代表”，立即以眼光暗示随从参谋，皮宗敢会意，没有翻译，信口译了其他的话，把“家丑”遮掩过去。

我到张治中将军办公室，秘书说，张将军晕机，在飞机上没有吃午饭，中途从南河沿便道走了，吃点心去了。我怅惘地辞出，走到楼梯口那儿，全副武装的二级上将回来了。因为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就相识了，上去和他握手，说明来意，他请我们进了会客室，抱歉他说，待一会儿要开会，很对不起，只能谈十分钟。我问他到达北平的印象。他说1932年左右来过北平，十多年没有来了，对北平的印象是甚为萧条，不如重庆，也不如从前，但市民对军事调处三方代表寄予和平的希望，从沿途行人对我们的欢迎可以看出。

除东北国共部队不断冲突外，广东国民党部队也对东江纵队开火，我问“和平将军”，这次三方代表是否去广东巡视？他说，这次三人小组到北平来，十分匆忙，因为国民党二中全会十号闭幕，必须在闭幕以前赶回，所以这次行程很短，广州不可能去了。张发奎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准备去重庆，和周恩来将军面商广东停战问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国民党代表、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走了进来，请他去开会。

他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笑着对我们说：“对不起，只谈七分钟，还有三分钟没谈，下次再补吧。”

我们到了周恩来将军的办公室。周将军是 1920 年在天津学生运动中被捕，释放后曾到北平，不久去了欧洲勤工俭学，并创建共产党组织，离开北平已有 26 年了。他对我们说：年轻时候在北平，只是在陆地上做浅薄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相当美好；但这一次在飞机上俯视北平，并不像记忆中那么美好壮丽。记忆中的往事常常美好，但再到旧地去看，和记忆中的往事一比，就显得逊色了。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切在前进，若想回到过去，实在没有可能了。有记者问，最近公布的整编军队方案，为什么要迟到 18 个月才能完毕？他笑嘻嘻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很大，国军这么庞大，数百万部队，怎么能够在短期内整编和复员完毕呢？只要大家根据《双十协定》办事，具有和平的诚意，整编和复员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是次要的。中共希望尽快实现和平，这是首要的。

周将军匆匆谈完以后，到 J 楼大讲堂去了，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三将军听取执行部罗伯森、郑介民和叶剑英三位委员工作报告，然后到协和医院向执行部全体工作人员训话。

六点半钟，北京饭店（即现在北京饭店的老楼）宾客盈门，车水马龙，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的盛大鸡尾酒会。酒会会场设在弹簧地板的跳舞厅里。我提前一刻钟到了北京饭店，走进会场一看，穿着白大褂的服务员站立两旁，手里捧托盘，盘子里满是装了大半杯鸡尾酒的高脚玻璃酒杯。李宗仁、熊式辉他们已经到了。郑介民、叶剑英、罗伯森他们准备欢迎客人。出席酒会的有北平军政要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当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三将军准时到达时，立即成为全场宾主视线的中心。因为在执行部没有见到五星上将，我当然不能放过良好的机会，找到在场的杨上尉翻译，请他向马歇尔转达我们的愿望，他陪我们走到马歇尔身边，我们就谈开了。

马歇尔说，1927 年离开北平，已经有 19 年没有来了。这次是他第 4 次到北平，旧地重游，十分高兴。这次选择巡视各地执行小组有两个因素，一是当地有较好的飞机场，二是执行小组问题比较复杂急需解决的。

全国整编统编军队，当然包括东北部队在内，可是东北战事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而且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了北平，这不是偶然的。全国人民遥望东北，希望和平使者降临，我问马歇尔最近是否准备在东北设立执行小组？他严肃地点了一下头，说：“这个问题已经在考虑中……”

国内一些通讯社和报纸记者，见马歇尔在回答我的问题，纷纷拥上前来，把他团团围住，真个是水泄不通。一家报纸记者问，关于东北整军是在苏联军队撤退以前，还是撤退以后？马歇尔幽默地回答：“这是否要我撰写一篇论文？”那家报纸记者哑口无言。其他通讯社和报纸记者，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提出国内国外大问题，他见形势不妙，连忙采取回避战术，说：“这是鸡尾酒会，不是记者招待会。”他站记者群中，几乎比任何人都高。环视了一下，不苟言笑的五星上将，微笑道：“你们这些记者，也和美国记者一样，没完没了提问题。对不起，我要敬酒去。”他突出记者群的重围，从服务员托盘中取了一杯鸡尾酒，向李宗仁、熊式辉那边走去。

记者群转移目标，包围周恩来将军。周将军老练地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边谈边走，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张治中将军别有妙法，一见记者上来，回答两句，转脸就走了，使你没法包围他。

鸡尾酒会上，人们拿着酒杯，信步往来，互相寒暄，低声细语，不断发出欢快的笑声，只是马歇尔和李宗仁、熊式辉他们谈得十分严肃，不知在议论什么。

一小时鸡尾酒会结束，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先行告辞，准备出席三方委员在东华门萃华楼举行的晚宴。记者们也随着离开，我回到翠明庄房间收拾行装，准备明天和军事三人小组出发到华北某些执行小组去。

二、古今两战场

太阳还没有从北平东郊升起，我起床了，看了昨天下午收到的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和北平出版的报纸，到前面楼下餐厅吃了早饭，便乘车到六国饭店去了。

7时3刻，三方记者到齐，大家乘上美军卡车，经过东西长安街并不宽敞的大道，前往西郊机场。今天第一站是张家口，当地机场不大，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乘DC—3运输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森也上了这架飞机，上有五星标志，表明是五星上将马歇尔的座机。其余工作人员另乘一架。昨天下午刚从承德乘飞机到北平的萧克将军也来了。1941年我曾在平西拜访过这位名闻遐迩的将军。他当时是冀热辽挺进军司令员，现在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亲热握手，寒暄几句，他上了工作人员那架飞机，我上了新闻记者专机，这里有三方新闻发布组十多人，记者十人，由美方罗素上尉领队。记者专机最后起飞，上了天空，发生故障，旋又降落，排除操作杆故障，再次飞上蓝天，马、张、周的专机已飞向远方，看不到踪影了。

飞越北平附近蜿蜒雄伟长城不久，机舱玻璃窗忽结了一层薄冰，我用纸将薄冰擦去，向窗下俯视，只见一片滚动着的云海，好比千千万万雪白的绵羊在飞机下面走动。有时露出空隙处，我看到白云下面的荒芜的土地，陡峭的奇峰，原来已进入察哈尔上空，快到张家口，怪不得气候转冷哩。

9天前，我曾访问过张家口，可以说今天是旧地重游，有一种亲切之感。我们下飞机，才知道马、张、周三位将军早十分钟就到了，受到聂荣臻、贺龙等将军欢迎，已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了。机场上整齐英武的仪仗队仍然肃立，欢迎后到的客人还有丁玲、萧三，邓拓、沙可夫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三方记者和文化界朋友上了车头插着美国旗的大汽车，一路谈谈说说，指指点点，到了军区司令部，这原来是日本侵略军队的根本博司令部旧址。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他们一到军区司令部，就听取张家口执行小组报告，三将军听完以后，勉励小组三方代表，称赞小组工作成绩很好，今后整编军队工作更加繁重艰巨，希望三方共同继续努力。接着，三位将军与聂荣臻、贺龙、萧克他们进一步会谈。

我们给招待在宽敞的西式会客厅里，让记者无拘无束地找对象做闪电式采访。《大公报》记者徐盈坐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劲文身边，拿着笔记本边问边记，畅谈边区情况。中共边区党委负责同志刘澜涛回答合众社、美联社男女记者提的问题。边区参议会成仿吾和于力正副议长身旁也坐着记者，问长问短。我因为已经访问过张家口，没有参加那些记者采访，便和丁玲、萧三与邓拓他们畅叙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与新闻界近况。邓拓是《晋察冀日报》总编辑，几乎是与晋察冀边区一道成长。1939年秋天，我到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工作，就和他相识。他和丁玲对我谈了文化界朋友热切希望早日实现和平，重建家园，团结合作，建设祖国。这是边区人民的心声。

在大家谈笑风生时，美国摄影记者和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四处猎取镜

头，被采访者与采访者一时都成为新闻人物。

中午 12 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后院举行宴会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等，记者群即陪末座。第一桌上，马歇尔殷勤询问张家口的情況，有多大面积，整个晋察冀边区有多少平方公里，张家口与边区人口各有多少，军队数量和装备，司令部的房子原来是敌人什么机关等等。他和聂荣臻、贺龙、萧克将军们，互相频频干杯，共祝和平早日实现。

宴席上的菜肴，一律是中国北方和四川的名菜，备有刀叉和牛油果子酱，算是例外。马歇尔尝试用筷子，远没有用刀叉利索，耸了一下肩膀，又拿起刀叉吃下一道菜。一道又一道菜上来，罗伯森边吃边赞赏不已，认为他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吃过的饭当中，这是最美好的一顿。马歇尔也嗜好美食，但非常注意工作时间与效率，不等最后几道菜上来，他站起来，退席，与贺龙将军继续会谈了。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在机场上检阅仪仗队，旋即向聂荣臻将军等告别，登机，直飞集宁。

在集宁飞机场上，晋绥方面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以及集宁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克瑞格上校、蔡文猷上校、孙志远少将已在机场等候。

我走下飞机，一片荒凉，阵阵寒气扑面而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真象韩愈描写的那样“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紫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挺亡群。”我仿佛到了古战场，忧虑集宁可能成为今战场。“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韩愈：《吊古战场文》）过去十年内战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千千万万人死于非命，家已亡国已破，濒临亡国的边缘。内战教训还不够惨痛吗？我盼望把和平带给集宁和全国人民。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位将军下了飞机，和欢迎人员一一握手，就到工作人员所乘的专机上开会，听取集宁小组美方代表克瑞格上校报告工作。三位将军简短训话，大意是要根据政治协商会议与《整军方案》原则，解决集宁小组的问题，非原则的无关小事，双方不要斤斤计较。马歇尔强调今天不研究谁是谁非的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三位将军赞赏小组已取得成绩，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当他们在飞机上开会的时候，贺龙将军没有参加听取小组工作报告，他在机场上悠闲地踱来踱去，成为记者注意的目标，要我请贺龙将军到记者专机上来，好采访。

贺龙将军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他当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北伐劲旅。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想把这支劲旅抓到手里，等贺龙到武昌的时候，汪精卫给他派来陈裕新当参谋长，企图通过陈裕新控制劲旅。蒋介石办法不同，派人前来游说：只要他拥护蒋介石，马上委任他当江西省政府主席。贺龙对蒋、汪拉拢，十分厌恶，他认为封官许愿是花招，决不上当。他对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共产党员，以后介绍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说：“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继续做政治工作。”周逸群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了贺龙军长明朗的政治态度。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向他分析当前形势和党的政治主张，请他出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贺龙十分激动，立即向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坚决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

1939年冬，我在晋察冀军区和他相识，他穿着一身灰布棉军服，留着“一”字胡须，勃勃英姿，高大的个儿，健壮的身体，真的浑身是胆，充满了力量和智慧。他率领一二九师部分劲旅支援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他现在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我走过去，把中外记者的要求告诉他。他爽快答应了。我陪他上了记者专机，受到热烈的掌声欢迎，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贺龙衔着那支烟斗，吸了一口，环视记者一眼，你们把我包围了，看来不回答你们问题，突不出包围圈了。他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坦率地回答中外记者问。

晋绥军区现在有250万人口，7万正规部队，三人军事小组的命令，一定彻底实行；现在正着手准备复员，使战士解甲回家务农。如果战士回家没有土地，政府将给他钱，做为生产资金。老解放区人民生活，一般都提高了一些，自己生产，种棉花织布，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做到自给自足程度，即使没有外边的粮食支援，边区以内的军民也有饭吃。新解放区生活，也有所改善。过去敌人统治时，人民需要的粮食油盐 and 布匹等等都是配给的，经常不够吃不够穿。现在自由贸易，可以随便买卖了……

贺龙将军还没有回答完，周恩来将军请他参加中共方面的会议去了，国民党方面又借用记者专机开会，我们只好走了。下了飞机，我看见马歇尔将军和罗伯森、伯劳德、克瑞格他们平行背风而走，边走边开会，别开生面。

三方各自开会完毕，各人返回原来飞机里，张宗逊、甘泗淇他们摇手相送，飞机起飞了，1小时15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一行专机到达北平西郊机场，随后回到住处，他们又到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出席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宴会。

周恩来、贺龙将军今天晚上住在翠明庄。周恩来将军从勤政殿归来已经很晚了，但他不知道疲劳，也不休息，召集中共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大家努力做好工作。我做笔记可以说是比较快的，但是听周恩来将军讲话，却很难完全记下来，因为他没有重复的话，也没有多余的话，速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如果漏了两三句，当时很难补上。

三、“济南式的和平”上演

3月2日上午9时零5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一行专机，从北平飞往济南。这次记者专机又落后一步，我们赶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检阅仪仗队了。车队开出机场大门，沿途不见一个行人，岗哨林立，每隔数十米还有一挺机枪和数名持枪哨兵，郊区实行特别戒严，进入市区，情况完全不同，大路当中悬挂横幅标语：“欢迎马歇尔元帅”、“欢迎和平使者”……大路两旁站满群众，不少人手中还摇晃三角旗，也有标语，竟然有污蔑造谣的标语，什么“打倒汪精卫第二毛泽东！”“制止共军没收入民财产！”等。在欢迎的行列里，忽然有4个彪形大汉带头高呼：“打倒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应声叫者寥寥。绝大多数群众都不开口呼叫。

这显然是国民党当地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企图假借民意，诬陷共产党。我看到这般情景，感到形势不妙，济南国民党在向共产党挑衅，必须严肃对待。欢迎和平使者，却又谩骂共产党代表的和平使者，还要打倒这个打

倒那个，这是什么和平呢？那不是自我暴露对和平没有诚意吗？等于战争贩子，打着幌子，叫卖和平。怎么能够使人相信呢？我拭目以待，看“济南式的和平”上演。

三位将军一行给领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里（前日本领事馆）开会，听济南执行小组美国代表雷克上校报告工作，张治中代表政府对小组成员的努力，深感谢意；目前的困难是粮食，人民没有粮食无法生活，是最痛苦最迫切的问题，要首先解决。

周恩来将军指出济南执行小组工作是最困难的，山东地区特别大，问题特别多，情况特别严重，对小组的工作和已初步解决的问题，表示感谢。除了粮食问题以外，目前最重要的是伪军问题。因为大部分伪军被国民政府加委，摇身一变，成为国军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解决，不能敌我不分，是非不明。粮食困难是由于过去在抗战中城市与乡村处于对立状态，一时不容易很快改变这种状态，但要加速改变。还有交通问题，因为在战争时期分割成数段，非很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要逐步妥善处理。解决问题要联系各个重要决议去看，不要孤立地看，最好实际调查，就地解决，希望济南小组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将来成为模范小组。

马歇尔将军表示美国的困难，只是双方的评判员，不过评判罢了，不能执行，这等于打棒球的评判员一样。美国应国民政府的邀请，派代表到中国来参与此事，好像干涉别人家庭闹事，做得不好，会引起批评。打棒球的时候，双方都不喜欢评判，没有评判又打不起球来。所以执行起来，希望双方去做。

评判固然不打棒球，只是评判，但评判员态度公正与否，是个关键。如果评判偏袒一方，表面上不参加打球，暗中实际上支持那一方了。马歇尔回避了这个实质问题。

省党部屋子里在开会，省党部大门院子里在表演。院子里聚集了许多群众，有山东省立医科专门学校，济南市立中学，培才中学，济南中学，鲁西南16县民众代表请愿团……我站在学生队伍旁边，看到一个神气活现的中年人，胸前挂着济南各界欢迎马歇尔元帅筹备会出入证，跑到学生前面授机宜：“一定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你们就呼叫那些口号，外表要和缓，态度要诚恳，内容要强硬。”这位先生一走，我听见站在省立医专校旗下面的同学谈：“我们是学生，不是党员，别的事不管，我们只要求回家……”

这时，我看到一位穿黑制服的济南中学学生，叫张肇才，跑到群众面前动员，叫他们要求谈三个问题，一是流亡在外没饭吃；二是许多同学家乡沦陷，要求回家；三是讲一讲东北现状。学生中有人说张肇才的意见不能代表大众的意见，他大概听到了，急急忙忙跑过来向大家说：“原谅咱们小弟弟，你们都是老大哥，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指教。”他不等“老大哥指教”，却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去找三位将军去了。马歇尔答应讲；张将军事忙，不准备讲，周将军说明是三人小组，都是双方同时接见，只要张治中部长讲，他一定来讲。张肇才转身出来，颠倒是非，谎称：“周恩来不愿意给我们讲话，叫我们回去，你们同意不同意？”在他歪曲与煽动之下，大家自然不同意，群情大哗，纷纷要求周恩来将军讲话。

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周恩来将军的英文秘书黄华，他亲自听见周将军回答的。黄华走过去找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希望何先生对群众

解释。何先生说，张、周两位将军很忙，叫学生回去。何先生说得含混，黄华接着原原本本说明事实真相，群众立即热烈鼓掌欢迎。

马歇尔走到群众面前，高声说：现在是中国最严重的时期，我刚到中国就看出来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恢复和平，你们，青年们，尽你们力量为此目的而努力吧。我们在这儿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工作，你们青年们，要努力，要得到一个和平繁荣强盛的中国。谢谢你们。

张将军虽忙，不得不出来了。他说，“对你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要如此，才能保证远东和平，也才能保证世界和平。山东是最有文化最优越的一省，中央关怀山东父老兄弟姊妹的幸福，山东的父老兄弟姊妹一定能得到和平安乐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央和中共的共同意见。”

穿着将级的黄呢镶红边的军大衣，英姿飒爽，站在群众前面花坛上的是周恩来将军。他频频点头，向欢迎群众致意，说：

“……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马歇尔、张治中两位将军不断努力的，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八年抗战中，山东在敌人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来慰问诸位。乡村和城市现在不应该再隔绝了，应该恢复往来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们应该保证供应。刚才我看见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两位将军握手，可以保证实现山东的和平。这次我们三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一定要实现的。”

他的话不断为群众的掌声打断，句句说到群众的心里。张肇才布置的那一套，没人提，群众满意地走了。

这一幕戏，没有按照导演计划完全演出，那些先生们不免失望吧？

餐厅相当暗，虽然是中午，也要开灯。在淡黄灯光照耀下，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雪白的台布上，用苍绿的松针拼写了两个英文字：“欢迎马歇尔”。马歇尔旁边是王耀武将军，他的斜对面，就是曾经交过手，即刚刚握了手的陈毅将军；陈将军邻座是何思源，坐在何先生斜对面的是共产党的山东省主席黎玉。这些人曾经刀对刀枪对枪干过，现在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互相碰杯，在和谐融洽空气中进行午宴。我希望和谐融洽的空气永远保持下去。

马歇尔吃完了最后一道菜，站了起来，感谢王耀武、陈毅两将军对和平的努力，希望他们继续努力，达到中国幸福安居乐业的前途。前途困难颇多。整军问题，根据重庆《整军方案》，一定能办好。许多事要靠交通来解决，如法市的流通，城市与乡村交流，整军复员等；军费可以减少，人民生活可以改善。恢复交通，对人民生活有很大影响，粮食运输就不成问题了。双方同意做出恢复交通决议，各自负责有关路段的恢复。谁是谁非问题，可以放下，现在做应该做的事，当地小纠纷一钱不值，大家不要从这方面着想。他举杯，建议大家为中国前途幸福干杯，玻璃杯碰玻璃杯的清脆的声音，音乐般地响彻整个餐厅。

四、“广寒宫”里金钥匙

徐州的原野是一片润湿的黄土地，上面残留着白色斑痕一样的春雪，寒风阵阵，吹得我身上都有点抖索了。从济南到徐州这个战略要地，飞行了1小时1刻钟。在飞机场迎接三位将军的是蒋介石、八大亲信之一的顾祝同，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现在是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他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学蒋介石装模做样那一套，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以“服从心好”著称，蒋

介石调动他的工作从不还价，何应钦赞扬说：“顾墨三百依百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派他控制战略要地徐州。

顾祝同头发有点发白，满面笑容，彬彬有礼地欢迎三位将军及其随行人员走了，我们这些记者却留在机场，车辆似乎不够。政府新闻发布组池先生、《申报》张剑梅和《大公报》徐盈先生碰到徐州绥靖公署张参谋长，由他安排车子把我们带到绥靖公署，交给交际科。那里无人负责，桌子上却有崭新的信纸和信封，上书朱红字：徐州各界欢迎马歇尔元帅筹备会字样。徐州筹备了半个多月，打扫街道，洗刷墙壁，门面工作筹备得相当充分，我们这些记者却没人照料，不知下榻何处。我建议到三将军开会地方，打听去处，那边不知道，说是在花园饭店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前往。到了花园饭店，没有房间。池先生忍不住发了牢骚，“这是官僚机构。交际科有30个左右副官老爷，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住的地方都没有？也没人负责，这算什么筹备？”张剑梅幽默他说：“人家筹备的是欢迎马歇尔，也没筹备欢迎你，当然找不到地方住。”不久来了一位官员，总算有了归宿：记者各自住所在的代表团里，美国记者住在日本领事馆美国代表团处，我和周恩来将军他们住在一起。

顾祝同将军在中央准备银行设晚宴欢迎三将军一行。我在宴会上碰到徐盈和张剑梅，他们住在政府代表团地方——广寒宫里，徐盈伸出双手，用嘴对手掌哈气，仿佛冷不可耐。

徐州的确很冷。但是会议开得相当热烈，小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交通，二是枣庄。

陈毅将军随三位将军一同到了徐州，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第四师副师长韦国清等在我们到徐州以前也来了。三将军和他们会谈，双方都同意恢复交通和解决枣庄诸问题。不过，国民党部队沿铁路线建筑了比敌人统治时期还要多的堡垒工事。既然国民党也要和平，建筑工事意图何在？工事不拆除，交通怎么恢复？经过会谈，确定由执行小组沿线视察，凡属交通线上不需要的工事，一律拆毁。

枣庄共有三口井，国民党占了一口，中共占了两口；电在国民党手里，水在中共手里，双方都不能出煤，却又都要煤。决定双方军队撤退，共同经营，美方担任顾问，负责技术方面工作。

会谈以后，我写好新闻稿，托人发出。这次出巡的新闻报道明争暗斗，相当激烈，分秒必争，新闻要求真实和迅速，不能弄虚作假。惯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中央社，各地有分社，通讯条件优越，而且在国民党地区采访，比我方便，可以找任何人采访他们想得到的消息，甚至制造所谓“民意”。法西斯独裁者有一条控制舆论的经验，谎言重复上一千次便可以变成真理。中央社深明此中三味。巡视完一地，美联社记者罗德尼克上了飞机坐下，立即打开打字机嘀嘀嗒嗒埋头写稿。中央社记者也在紧张执笔。当飞机降落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就把稿子交给当地有关的人发了出去。新华社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分社，等我上飞机写好，到下一站安顿下来，再到电报局发稿，便晚了一大步。

我改变了做法：在三方会谈的时候，在当地军政要员宴请的时候，在三方代表与省长或市长他们讲话的时候，执行小组发生什么新情况的时候，不用记录，不打草稿，当场执笔疾书，会谈与宴会一完，新闻稿业已写好，重要内容的稿子，我请恩来同志审阅，防出差错。离开当地以前，我托人到电报局发出，既保证了真实性，又注意了时间性。当国内外广大读者看到新华

社的消息早于中央社和美联社时，感到惊奇。秘密在于牺牲在宴会上吃喝以及少参加一般活动，当场挤时间写稿发出。

真实性与时间性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采访中经常受到冷遇难办，对方原来热情接待，一发现我是新华社与《新华日报》特派员，面孔顿时一变，冷冰冰的，带理不理，甚至给我们吃闭门羹。有的对方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干脆避而不谈，使我尴尬，无法排遣萦绕在心头的苦恼。我向恩来同志倾吐，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要通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来开展采访活动，又要通过采访活动来宣传和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决不要单纯为了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采访。采访不到新闻，你会苦恼，也完成不了任务。统战工作，团结工作，你首先要从记者做起，尽可能争取友军。这次记者当中不是有《大公报》的、《申报》的、美联社、合众社的吗？要和他们多交朋友，就是中央社的和《中央日报》的记者，也不是不可接触，也可以做点争取工作。和这些记者团结工作做好了，你在采访中遇到的困难自然会大大减少……”

恩来同志给我一把打开采访大门的金钥匙，言简意赅。他接着说：

“作为新华社与《新华日报》的特派员，你的职责范围，不单纯是做好采访报道工作，还要向同情我们的各界人士约稿，征求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搜集各种反映和参考资料，供领导上参考……”

恩来同志在百忙中这样关心新闻工作，谆谆教导，茅塞顿开，我感到两个肩膀上沉重的分量，同时增加了信心与勇气，努力去做。我加强和《大公报》、《申报》记者的关系，注意和美联社与合众社记者往来，在集体采访中和中央社《中央日报》记者保持接触，交友的圈子扩大了，工作方便得多了，消息来源增加了，甚至中央社与《中央日报》得不到的消息，我也可从“友军”方面及时得到，暂时不宜发表的，重要的送给恩来同志看，或者作为参考资料送给组织上了解。

五、阎锡山与傅作义

太原是阎锡山王国的核心。辛亥革命后，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山西成了独立王国。他是一级陆军上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等。这些职务给他统治这个王国带来了方便。他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既坚决反共，又暗拒国民党势力入侵，拉拢各方，左右逢源，王国始终在他的手掌心里，抗战期间，他采取“降日拥蒋反共”路线，高喊“无条件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日本那个“鸡蛋”碎了，他就在国共两个“鸡蛋”上跳舞，拥蒋反共。去年9月，他指挥部队进攻上党地区遭到八路军还击，击毙他的第上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史泽波等被俘，当地人讽刺他：“上党一战，实力损失了一半。”他于是吸收地主富农成立“还乡团”，实行“自清”、“自卫”、“自治”的“三自传训”，胡说什么“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越能解救，因为大家看到害怕，便不敢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提出“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掀起晋中各县“三自传训”杀人竞赛的浪潮。

济南王耀武以欢迎马歇尔为主，太原阎锡山却以欢迎军委政治部张治中部长为主，讨好张治中，向蒋介石暗送秋波。我从太原机场沿途看到的标语是：欢迎张部长、张书记是青年的导师（张治中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欢迎张部长指示军队政治工作……阎锡山不以欢迎马歇尔为主还有另外一层

意思：表示他不希望国共团结，实现和平。

三位和平使者下榻复兴饭店，就是过去法国修建的铁路饭店，面对太原铁路车站。我和其他记者住在饭店左侧的一幢小平房里。太原，我感到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三位将军和执行小组开会，记者无事可做，我们乘车进城观光独立王国的统治。

出入太原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百姓要呈验居住证，经过严密检查，才能出入。执行小组代表原先不许进城，后来放宽，可以进城；一要带执行部臂章，二是由交际处陪同，否则不能进城。我看到城口有铁丝网设备，等待检查的老百姓排成一条长龙，竟有 100 多人。我们有交际处人员陪同，才免检。

太原城市不大，还是个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古老的平房，古老的街道，建筑设备装璜也很古老，显出闭关锁国的风貌，和独立王国的国王有些相象。阎锡山虽然是上将，又是战区司令长官，却穿了一身袍子马褂，严然是位地主豪绅，翘着两撇八字胡，文质彬彬，似笑不笑。他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将军，应付一番，没有解决什么重要问题。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和王耀武、阎锡山迥然不同，他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并不以谁为主。傅作义原属阎锡山部下，但是抗日坚决。抗战初期，他是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平绥线作战。娘子关失守，太原危急，阎锡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无人承担防务，傅作义挺身而出：“太原城我守”。并且写了遗书式的信给家人：“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1940年3月“五原大捷”，击毙日军水川中将等 3400 多人，俘敌 300 多人，就是他指挥的。在蒋介石命令下，傅作义打内战也不手软。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后，他曾率部袭占集宁，八路军反攻，歼其官兵 1200 余人，集宁成了“会战场”。这次三将军到归绥来，进一步商谈怎样解决集宁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 3 月 4 日上午 11 时 35 分乘机飞到归绥，受到傅作义将军等欢迎。他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马、张、周一行进到城里，就在绥远省政府会议厅举行会谈，因为归绥执行小组撤销，由傅将军代表政府会谈，破例允许国共双方记者参加，各派一名，中央社代表是赵效章，我代表新华社列席。

会议厅里横放着拼起的特大长桌，铺着白布，当中正面插了中美英苏四大国国旗，三方代表围坐在四周。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三将军在欢迎掌声中坐在正中的上面席位，傅作义坐在下首，正对着马歇尔。他身边两旁坐着马占山将军和省政府委员、厅长等。

马占山，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曾率骑兵 500 抗击日军村井旅团，在中东铁路嫩江江桥激战，日军伤亡 108 名，村井少将切腹自杀，马占山名震一时。现在是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是熊式辉将军。马占山年近花甲，精神健旺，穿了一身黑色军服。我看见他，不禁想起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同胞，那边和平问题，有待解决。傅作义以浓重的山西口音，致词欢迎，认为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需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次三人小组努力，使中国能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绥远人民非常高兴。他说明三点原则：合作、真诚、民主，愿意和绥蒙军区互派联络

组，调处争议地区（如集宁），避免冲突。

张治中感谢傅作义谈话的和谐态度，说明世界要和平，中国要和平，有了和平，才能建设，才能谋幸福，满足人民的愿望。从《停战协定》到《整军方案》颁布，一切问题有了法律的坚实基础，实现和平有了保障。

周恩来将军站起来说，很高兴在绥远和各位见面，今年的确是中国的和平年。一二月内，中国有了张治中将军所说的这些协定，和平民主有了可靠的基础。协定是定下来了，要实行。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切协定真正地完全实行。中共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过去的幸冲突、对立，有18年之久，现在做起来，一定有曲折、有困难。双方负责人要克服困难。这次来是为了这个目的。首先在自己方面做起，克服困难，这样工作才能做好。非常同意傅将军所说：要合作，就要忘记过去，坚持和谐友谊的态度，这样才能如我们所希望的停战，恢复交通，整军等等，照人民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周恩来将军强调“实行”，也就是反对空谈，述而不作，说谎骗人。他字斟句酌他讲，听到翻译译得不准确，立即指出改正。他语惊四座，不断博得热烈的掌声。

马歇尔接着站起来，望了周恩来和张治中一眼，认为这两位同事已说得很详细，几乎没有再说的必要，但他还想说两句。在重庆有了许多决定，北平成立执行部，执行决定，每件事都有中立人参加。现在已进入新阶段，有新的任务，立刻要和平统一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在华美国军官应该努力帮助去做。中国朋友也许认为太快，可是不能等待，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在世界各国之中，才能保卫自己。

马歇尔的重点是统一整编军队，恢复交通，也是为了调动军队，统一整编，帮助蒋介石把军队抓到手里，同时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但他没有明说。

在掌声中结束了会谈，傅作义将军请大家到餐厅入席，一共两桌，我们这一桌主人傅作义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马占山将军那一桌主要客人是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张治中身体不大舒服，怕伤风感冒，进了餐厅不好不脱军帽，旋即戴上一顶蓝毡帽，衬得他的“孩儿面”越发红润了。他指着第一客座的位子对马歇尔说：“pleasesitdown！”马歇尔吃惊地望了他一眼，因为这是第一次听他说英语，和他开玩笑，说他只会讲一句。他不甘马歇尔讪笑，立刻向译员学了一句，转过身来对马歇尔又说了一句：“Haveonemore！”马歇尔伸出一个手指，仿佛说这也不过是一句。傅作义为马歇尔敬菜，解脱了张治中的窘境。马歇尔十分赞赏中国菜，吃了又吃，他幽默他说，这次出来，吃了这么多，回到重庆，可以许多天不吃饭了，就是碰上饥荒也不在乎了。张治中连忙给他敬菜，又敬酒。马歇尔马上改口，这次出国，吃菜吃得少，喝酒喝得多，不仅回到重庆，就是回到美国，也不用再喝酒了，否则要酒精中毒了，周恩来和他碰杯，风趣他说，这白兰地酒不错，保险不会酒精中毒，可以放开大喝。他们两人干了一杯。周恩来的酒量很大，喜欢喝烈性酒，他又羊杯对傅作义说：我们干一杯……

六、人人争说延安城

午宴结束，傅作义将军他们欢送三位将军到机场，专机起飞，向西北黄土高原飞去。记者专机里，绝大多数记者没有到过延安，话匣子打开了，人人争说延安城，仿佛这座古城富有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令人好奇。我离开延安已经一年多了，也想看看宝塔山，喝口延河水，瞧瞧古城内外的变化。

我和大家一样，面朝机窗，注视天空的云海和地面的变化。各架专机分别穿过云海，陆续降低，一转眼的功夫，我看到宝塔山。飞机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在东门外机场徐徐降落。飞机场搭了一座红布牌楼，上端插了中、美国旗，在西北高原的黄土层上空迎风飘扬，引人注目。机场右边，上万的欢迎群众有秩序地站着。

当有五星标帜的银色四引擎专机降落的时候，马歇尔穿着那身淡棕色呢大衣走下去，周恩来给他介绍前来欢迎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负责人。

马歇尔看到那么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领袖来欢迎他，兀自一惊。他早就知道这些著名人物，也约略知道他们一些事迹，没有料到在延安同时都见到了。他惊异中共那些政治和军事领袖，这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一支强大的力量。马歇尔最大的长处是明于识人又善于培育人才。他当过陆军大学和不少军事学校的教官，是宾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以及伊里诺和麻州等国民军的首席教官。在他手下做幕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就有布莱德雷五星上将、霍奇上将、史迪威中将，李奇威中将等。据说在宾宁堡步兵学校的教职员、学员中，在二次大战中升任将军的就有 160 人左右。他自己做过潘兴元帅、贝尔将军的侍从副官。他在弗吉尼亚州军事学校毕业，最后一年获得最高分数，被选为全班的第一上尉（Firstcaptain）。他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人才，并非指挥大军的统帅，官运也不亨通，1936 年才升任准将，1939 年晋升少将，继升上将，到 1944 年才升到五星上将。将军爱人才。他敬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济济人才，认为这是战争中胜负重要因素之一。他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感谢他们前来欢迎。

毛主席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同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然后走向路边那一长列的汽车那儿，车上挂着中美国旗。汽车在上万的群众面前缓缓开过，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响彻云天：

——欢迎马歇尔元帅！

——欢迎张治中将军！

——欢迎周恩来将军！

沿途的标语牌上，贴的也是欢迎马、张、周三位和平使者的红红绿绿的标语，三位和平使者一行先到了王家坪朱德将军的住处，出席毛主席举行的茶会，宾主寒暄。这以后，马歇尔到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去了，接着拜访毛主席和朱将军。

我和记者们下榻南门外交际处。

记者们吃了点心，怀着好奇的心情，步行到新市场参观访问去了，匆匆赶回来，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洋房，进门有个小客厅，里面主人和陪客已到了，陆续来的还有：刘少奇、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蔡畅、杨尚昆……记者们见到这些著名人物，立即散开，各自寻找采访的对象，无拘无束，畅谈开来。

正在记者兴高采烈访问的时候，交际处的招待人员请大家参加宴会。走出小客厅不久，便是宽敞的大厅，宴席已经排好，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和三位和平使者坐在第一席，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坐在第二席。等大家坐好，毛主席站了起来，伟人发出宏亮的声音，欢迎三位将军和各位到来，大家都知道三位将军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的努力，

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他建议为杜鲁门总统、蒋主席、马歇尔、张治中将军和在座各位朋友健康干杯。毛主席和客人一一碰杯。

紧接着歌咏晚会开始，朱德将军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一切政协三人小组协定，中共都愿意忠实实行，彻底实现。国共合作，国际团结，中国定能成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幸福、强盛的中国。马歇尔接着讲话，认为在短时间内，得到停战的成绩，令人满意：现在要致力于恢复交通，减轻人民负担。已得到毛主席保证，中共尽其能力恢复中国人民正常生活状况。这次巡视各地，目的是看何处有困难，设法解决，并且表明他和美国处于中立地位，协助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中国。张治中讲话富有风趣，十分激动，他说，黑暗已过，光明在望；破坏已过，建设要来；《整军方案》十分重要，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和平事业的完成要感谢盟帮美国的协助与蒋主席毛主席的领导，让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高呼万岁。呼了万岁以后，他自豪他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他的热情洋溢的话，立即引起满堂热烈的掌声，全场活跃，充满了和平友好团结的气氛。

毛主席也鼓了掌，风趣地问张治中，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他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小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主席说，是的，我们将来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的时候，就到南京去！

歌咏晚会上，除秧歌剧《兄妹开荒》与《黄河大合唱》外，还演唱欢迎马歇尔将军之歌，也唱了歌颂张治中将军为和平所做的贡献。

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一晚，人们沉浸在和平、团结的友好气氛中。

红日从桥儿沟后山冉冉升起，东门外机场上和昨天一样，热闹非凡，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他们陪着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边谈边走。张治中热情地对毛主席说：“欢迎您早日到南京去。”记者从旁插问：“请问毛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去？”毛主席微笑答道，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他转过身去，对将要上飞机的马歇尔将军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马歇尔走上舷梯，转过身来，向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他们挥手告别。

七、终点和另一个起点

从延安到汉口，飞行了两点 40 分钟。马歇尔他们住杨森花园隔壁大成路三号，张治中一行住璇宫饭店，周恩来将军等住四民街德明饭店，从宣化方面来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和郑位三、吴德峰早在德明饭店住下等候，我也住在德明饭店，这在当时的汉口算是第一流的饭店了。例行会议举行以后，军委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副主任兼参谋长郭忏等举行宴会，程潜到重庆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由郭忏主持。

汉口，是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的终点，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要解决，宴会将完时，接着举行歌咏晚会，听了女高音歌唱家管夫人等演唱，轻松愉快，时光迅速流逝，静寂的夜空中，传来江汉关悠扬的钟声，当当地敲了 12 响，报告客人，夜已深沉了！人们并无倦意，在谛听高昂的歌声。

这次三位将军出巡五日，飞行 16 小时，经历冀、察、绥、鲁、苏、豫、晋、陕、鄂九省，行程一万七千华里，对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事

业，做了重大的贡献。我一边听着歌声，一边继续写随行记。等周恩来将军回到德明饭店，我请他审阅。他迅速看完，改正个别地方，还给我，我又看了一遍，深深感到恩来同志看稿十分仔细认真，在他智慧敏捷洞察秋毫的眼光下，立即看出个别纪录原话的差错，连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也逃不过他的犀利的眼光。我把稿子托人带到重庆日报社，以便在报上连载，报道人民渴望这次巡视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 10 时，我随大家一同到机场，欢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去重庆，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回北平，我留下来，住在德明饭店，访问李先念和郑位三同志。

国民党在和谈的幌子掩饰下，把美械装备的大军用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运到东北，内战的烽火即将点燃了。

春夜 梅阡

5月的夜风，飘着道边槐花的清芬，轻轻地吹拂着路人的面颊与发鬓，吹拂着人们的胸襟，温柔的慰抚，有如慈母的双手。

时间是1957年5月12日的午夜，一点。在北京人艺的三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招待泰国艺术团的酒会结束了。周总理送走了晚会的客人们，又回来，和几个青年演员们围在一起，谈得很热烈。忽然，他望了望酒阑人散的会场，转身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说：

“你们住在哪里？”

“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

“远吗？”

“不太远，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只要15分钟。”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周总理含笑他说：“去看看。”

演员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不知怎么来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怎样来表示内心的激动和欢迎的心情，又考虑，时间很晚了，总理的身体不太累吗？正在踌躇，周总理却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汽车开过来了。总理却摆了摆手，问演员们：

“你们怎么走？”

“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有个演员抢着说。

“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

“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象是锻炼身体。”

“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走吧！”

这样，在午夜，静悄悄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轻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更加年轻的人。他们像一家人，父亲和儿女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他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也谈到怎样开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大家压低着声音，怕惊吵了夜归的行人——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空的汽车。

5月的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芬，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

在宿舍里，演员们并没有完全入睡。有的在灯下阅读剧本，准备着明天要排的戏：是《北京人》里的愫芳，是《布谷鸟又叫了》里的萧甲，或是《名优之死》里的云仙……有的刚刚散戏归来，丢开方才扮演的四凤或是繁漪，点一支烟，坐下来闭目凝神，想把激动的心情宁静下来，准备入睡。

当周总理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门，有的从床上跳起，有的从灯下抬起头来，但，差不多都是同样惊诧的神情，嗫嚅他说：“没想到……是您！”最有趣的是林连琨，坐在床上，睁大了朦胧的睡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引得大家发笑。他事后向人说：“我实在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在做梦呢！”

在谈话中，周总理非常关心剧院企业化的问题，说：“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们常常客满，还不能企业化，而有些民营剧团，虽然上座率差些，却能自给自足呢？”

没有人马上回答。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一笔帐。终于还是周总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全体240多人，80个演员，70多个舞台工作人员，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行政人员了吧，是不是行政人员的比例太大了呢？剧院

不要机关化。希望你们把编制名单送一份给我看一看。”

周总理走进了剧院新盖的排练所，它像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小型剧场一样，宽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暖气的装备……周总理连连赞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

有位剧场经理，站在旁边得意他说，“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着两个更大的排演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她们有意见了！她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也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她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总理继续说：“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她们用，帮助她们，她们会感激的，你们要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有人也提到了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在戏曲界里，差别更大，这是不公平的。周总理表示应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还很穷，都往上提，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一些呢？演员的生活，也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当周总理知道1953年从师大戏剧系毕业的青年演员王洪韬，每月工资70多块钱的时候，就笑了笑，说：“是不是太多一些了？”

“你们年轻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他们吃了很多苦。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周总理说着，顺手指指室内的一盆花：“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些话，他讲时是十分亲切而严肃的。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体味着。在这些话里包涵着多大的期望与多大的鞭策呀！

深夜两点了，周总理悄悄地离开了剧院，但他的声音和笑容却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有的人久久地凝视着地上放的那一盆花，那是一盆秋海棠，花开得挺鲜艳，但显得多么娇嫩柔弱呀。

有的人推开了窗子，窗外吹来的是温煦的春风，但也带有一些沁人的凉意，使人更清醒地思考着一些问题。

许多人经历了一个并不宁静的春夜。

附诗一首

幸福的回忆 ——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梅阡

一曲悲壮的《国际歌》震荡着太空，
去年今天，一个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敬爱的周总理啊，
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那时，还是阵阵妖风、乌云压顶，
哀悼和愤懑捶击着我们的心胸。
看今天，乌云尽扫，万里晴空，
举国上下都在悼念您的伟绩丰功。
在这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
在我们心里，每一刻都浮现着您的笑貌音容。
想起您对我们广大文艺战士的关怀培育，
想起您对我们年青一代的阶级深情，
想起您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关心爱护，
想起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
我们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您也曾多次到我们中间，
带来毛泽东思想的春风。
那些幸福的时刻历历在目：
在排演场您曾仔细地看我们的大字报，
在舞台上指示我们要深入火热的斗争，
在休息室，娓娓不倦指示剧本的修改，
在大厅里，领着我们一齐高唱《东方红》。
这些幸福的回忆，
在我们悲痛的心里，增添了——
战斗的力量无穷。
记起周总理在那暮春的深夜，
跟我们一起漫步在静静的大街上，
走向演员宿舍——史家胡同。
那正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边走边谈啊，多么亲切慈祥。
记起那动人的情景，
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回旋激荡。
十九年前的往事——
就象是昨天一样。
那是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啊——
那天晚上，就在剧场三楼的宴会厅，
当总理送走泰国艺术团的客人，

您把我们留在身旁。
您关心我们的成长。
您问我们排过什么戏？
演过多少场？
了解我们学习的情况，
了解我们对未来的理想。
那时，毛主席的光辉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刚刚传达，
这是对马列主义卓越的发展、贡献，
伟大的意义无可估量……
您要我们好好地学习
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您心里充满对毛主席无比的崇敬、热爱，
在我们心上也照耀着红太阳的万丈光芒。
您不愧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您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
十九年啦，时间的长流啊——可以水滴石穿，
可永远也不能磨灭我
那深刻的印象。
谈着，谈着，周总理忽然问起——
你们都住在哪里？
我们回答：就住在新建的宿舍里。
您问——离这儿有多远的距离……
不太远，二十分钟的路……
您听了突然站起：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看看去！
当时，大家都愣住了……
是啊，是激动！
是激动啊！是惊喜！
敬爱的周总理啊，
您的足迹曾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
您的足迹曾踏遍大河上下，五岭东西。
南昌城头，您把“八一”的战号吹起；
遵义会议，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长征路上，您踏遍雪山草地；
从瑞金到延安，二万五千里。
重庆的红岩，南京的梅园，——
您深入虎穴，和敌人战斗到底，寸步不移。
……亚非拉美，
您送去对被压迫人民的深情厚谊。
今天，今天，您也要到我们演员的宿舍去，
怎不令人意外地惊喜。
我们怎么回答啊？
怎么回答啊？
我的嘴唇在抖啊，说不出话半句。

可是内心激动啊，
象八月的江潮，奔腾冲激，
内心激动啊，
象地下的熔岩，要冲开岩层，腾空万里。
我在想怎么接待您啊，
怎么表示我们欢迎的心意？
我在想啊：时间很晚了，您不累吗？
怕影响您的休息，
那时我们大家正在踟蹰，犹豫，
可是您，您已健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剧场门口，汽车开过来了，
您却摆了摆手，又把车门关闭。
——你们怎么走啊——
我们走着回去。
请您上车吧，总理——
我们让一个同志上车陪着您。
——不，我陪着你们一起走着去。——
总理，我们每天走惯了，
好象是锻炼身体，可您……
总理笑了：——
——那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嘛……
就这样，我们只好紧紧跟上去。
我们簇拥着您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五月的夜空啊，是如此清澈、宁静，
五月的春风啊，是如此温柔、和煦，
路边的槐花啊，散发着醉人的清芬，
盏盏路灯啊，也象向我们激情致意。
夜风啊，轻拂着行人的面颊、发鬓，
花香啊，沁透着路人的胸襟、心脾。
就在这春夜寂静的北京街道上，
我们心情激荡地走着，走着，
倾听着您亲切的询问、话语。
我们一群青年簇拥着一位心地更加年轻的人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半路，您看见一个清洁工人在扫地，
打扫着路边飘散的纸屑、垃圾。
您就朝他健步走去，
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同志，感谢你呀，人民都感谢你！——”
工人睁大激动的眼睛，
半天，半天，才说出：“是您啊……
怎么想得到是您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时，我的热泪夺眶而出啊，
那时，我的热血在心头冲激！
象是一曲雄美的赞歌，
点头赞叹，你们今天的条件太好了！
您曾语重心长地告诫：
——你们的前辈吃过很多苦啊，
有多少烈士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我们的生活要往下看，
今天，在建设中的国家还很穷。
要我们警惕，不要变成精神贵族，
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您曾指着我们那个新建的排练大厅，
要我们别关在高楼深院，
要无条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
您曾意味深长的指着窗边的一盆鲜花，
叮嘱不要做温室的花草，
不要觉得已经是天下太平。
要经得起骤风疾雨，
要知道为了下一代，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您讲时是那样严峻、亲切，
听得大家都肃静无声——
这是多么诚挚的鞭策呵！
是多么深切的叮咛，
是及时的春雷呵。
是长鸣的警钟。
我们永远不能忘呵，
您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关怀的深情。
这是革命前辈的深情，是党的深情，
多么幸福呵，永远铭刻在——
我们的心中。
深夜两点多了，您才离开了宿舍，
我们久久地向您注目远送。
有人回来，再去看看窗前的鲜花，
那是一盆娇艳的秋海棠——
是啊，根叶多么嫩弱啊，
经不起冬霜秋风。
有人用力把窗子推开，
吹进来一股温暖的春风，
但也带有沁人的凉意，
使我们头脑顿时清醒。
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平常的春夜，
我们的心绪啊，象春潮起伏不平。
敬爱的周总理啊，
想起十九年前那一晚幸福的情景，

我们怎么能不泪如泉涌。
您在我们青年身上花了心血啊！
您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无限深情。
这是您对广大文艺战士的关怀啊，
震荡着夜空，弥漫天地，
象是一首壮丽的诗篇啊，
您用巨笔挥写，不着半点墨迹。
您赞颂着伟大而平凡的劳动啊，
您赞颂着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不朽的真理！
当我们继续向前走着，
回头望，那位清洁工人啊，
还在远远地凝思、仁立，
望着您的背影，泪飞如雨。
您跟劳动人民心连心啊，
人民怎能不热爱您！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不能忘，这是对我们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那时，宿舍里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
有的正在灯下用功，深入地
揣摩着角色的动作心情。
有的刚刚把脸上的油彩洗净，
在创作日记上写下新的收获内容。
有的工人端详着舞台设计草图，
商量着怎样更好地修改服装、布景。
当发现您突然进来，
同样都露出惊喜的神情，
没想到是您啊，是您……
都感到意外的幸福如梦！
有的突然从床上跳起，
一再揉擦着朦胧的眼睛，
“我是不是在做梦？”
您含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才真的相信了自己的眼睛。
是……真的是您啊，
敬爱的周总理。
宿舍里立刻沸腾了。
沸腾了。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周总理来啦……
周总理到我们演员宿舍里来啦……
到我们工人宿舍来啦，
也到我们家属宿舍来啦，
欢声、笑声，冲激着五月的夜空，
欢声、笑声象海洋波涛翻腾。

您是送暖的春风，
您是碧空的明星。
人民热爱您啊，
您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今天，我们要把革命文艺的红旗高举，
把您的遗志——坚决继承。
今天，祖国的山河一片春光，万紫千红。
我们要继续向一切旧世界的残余勇敢冲锋，
让文艺的百花开得更美更红！
这是一个难忘的幸福的回忆
1957年那个春夜，一直闪现在我的心中。

他教我们事事想到将来

张骏祥

(一)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近结束时，周总理召集戏剧界、电影界的各地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要大家谈谈工作中的问题和设想。我记得电影界的代表们当时提的基本上都是电影厂场房破烂、设备陈旧的问题。当时接收下来的国民党政府所属的电影厂，虽然由于工作人员护厂有力，基本上没有破坏，但这些厂本来就是些寒酸的烂摊子，至于民营厂，更因资金所限，设备极不像样。因此代表们不免偏于诉苦，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政府能马上拨款来修建厂棚、更新设备。作为一个刚开始做电影导演的人，我当然也是抱的这种心理。我记得很清楚：周总理听完了大家的意见，首先肯定大家所说的都是事实，大家的要求也都是合理的，他相信这些要求不久一定会得到安排和解决。但是他又说（大意）：目前我还不能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我现在急于要考虑的，是几十万解放军南下，南方的蚊子多，战士们没有蚊帐，怎么办？几句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但是周总理却又提出一个问题，问大家（大意）：拍电影要用胶片，胶片的来源怎么解决，你们考虑了没有？代表们谁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最后，是袁牧之同志老老实实回答：“胶片吗，看来还得进口一些。”总理说（大意）：一个时期内进口一些，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将来一年要拍好多部影片，一部影片在全国发行，要印很多部拷贝，这就需用多少胶片？不仅我们自己用，还要考虑到将来朝鲜、越南、缅甸等许多国家，都可能要求我们提供胶片。你们想想这个问题要不要考虑？要不要解决？

是这次座谈会后，司徒慧敏等同志才大力筹划建立我们自己的胶片厂。而我却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领会到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接受了他的教诲；在工作中既要分出轻重缓急，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又要能高瞻远瞩，对于事业的将来，要从一开始就有所规划，心中有数。

(二)

1954年苏联举行中国电影周，中国派了代表团去参加，在苏联各大城市轮流放映了《智取华山》、《鸡毛信》等影片。在与观众见面时，少不得要陪着看影片。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苏联观众，一看到银幕上有战争场面就低下头不看。后来我和另两位团员去了波兰参加那里的中国电影周，又发现情况与苏联一样。当时，我国还派了一批导演在苏联学习，见面时他们也向我们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还接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信，要我们转给文化部，提醒以后要少拍战争影片。回国之后，代表团进行总结，就把这一条认真地写了进去，建议以后少拍战争片。有位导演因为自己的影片人家低头不看，还开玩笑说：“以后再不敢做战争贩子了。”

总结交上去没有两三天，周总理就通知全体代表团到中南海开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总结中的这一错误。他说（大意）：苏联人民经过残酷的卫国战争，几乎家家有惨痛的损失，他们怕看战争场面。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却千万不能因此就不拍战争影片。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蒋介石还在梦想反攻大陆。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丢弃战争的警惕性。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

我们这些原来看了到处画着的和平鸽，就把呼吁和平与和平主义的区别

也分不清的人，听了周总理的话，真如醍醐灌顶，清醒了过来。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秦怡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生活告诉我，对于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人，无论他离开自己多久多久，但他的精神，他的话语却永远伴随着我，鼓舞着我。

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忆中的重庆却始终占据着我心灵的重要地位。使我难以忘怀的当然不是那潮湿阴冷的寒冬，也不是闷热难熬的炎夏，而是在我年幼无知时所接触和认识的好人、伟人，我所崇拜的人，尊敬的人，热爱的人，影响我一生的人。

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1939年春节期间，我的同事请我去他家中吃饭。我年方17，长得胖乎乎，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可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傻丫头的一切都起了质的变化。它成了我一生历史长河中的源头，这虽然是一次偶然相遇，然而它影响着我整个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同事是位摄影师，他的太太是个湖南人，他们也许以为我认识同桌吃饭的人，因此没有给我介绍桌上任何一位陌生的人。可虽然没有介绍，我也确实好像毫无陌生感，特别是那位有着一对使人记忆深刻的浓眉和一双黑白分明透着锐气和慧气的大眼的英俊男子引起我注目，他谈吐爽朗、潇洒。他极其亲切自然地向我问长问短，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工作了？我告诉他我在山城合唱团工作，现在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唱团唱歌，还兼跑龙套的演员工作。他笑着说，“好啊。”我对他的评语有点不以为然，我说：“这好什么，没意思，整天在里边混，我本想去前线去不成，我想去深造，可没条件，这纯是为了吃饭。”他又问：“那你在唱什么歌？”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他朗朗大笑道：“这怎么能说没意思，这可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参加了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么真诚、坦然，完全象一位老师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耐心爱护、我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象老朋友一样地聊天了。

他的话语象磁力一样牢牢吸引着我去思索，去感受。那次见面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我很想知道这位朋友的姓名，于是我又去找请我吃饭的同事，打听这位朋友是谁，我的同事哈哈大笑：“他就是周恩来，你真的不认识？”我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我曾在一本书中或是一张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我确实不认识，然而又认识。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责怪自己那样愚蠢，说那些无聊的话，但是周恩来同志却不嫌我无知，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关心我，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铭刻我心中。

在重庆既艰难困苦又充满活力的岁月中，我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早婚和早产使我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没有精力，能力和财力带领自己的孩子，我生下的小可怜虫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可我这个连自己还是个孩子而根本不会做母亲的母亲，总还有着天生的母爱，为了让孩子生存下来，我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所得，请了一个奶妈，把孩子放在她家中寄养，自己整日整夜在舞台上、剧场里度过。

有位朋友忽然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孩子，他告诉我，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到一位姓孙的朋友家中去，在弄门口看到一个妇人抱着一

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告诉他这就是秦怡的孩子，她自己无法带领，只能全部交给奶妈。周恩来同志久久地看着孩子，深表同情他说：“一个有名的有才华的演员的孩子搞得这样可怜。”他询问孩子是否有病，我的朋友告诉他，孩子在轰炸中生下，没有营养，没有母乳，东西吃乱，得了胃病，经常呕吐。那天周恩来同志虽有要事，但他对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倾注了爱心，他还打听了孩子的名字叫菲菲，还关照朋友们要多关心我，好让我安心地为话剧艺术献身。我当时听到朋友对我转告这段话时，泪水象泉水般涌出。对于我这个孤苦伶仃，身处异乡的人来说，这几句话给予我的慰藉是难以形容的。因此，我也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

1957年亚洲电影周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这次盛会。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他忽然问我：“菲菲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否已经治好？……”时隔16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总理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1942年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又没有分析剧本的能力，又不理解政治上的复杂性，中华剧艺社把我借给施超组织的话剧《野玫瑰》中去担任一个角色。开始由路曦同志担任女主角，我演一个女大学生，以后导演苏怡同志在排戏过程中感到路曦个子矮小，不适合女主角的角色，让我与她调换角色。没想到这一下可大祸临头了，该戏的编剧得到了国民党颁发的剧本奖，《新华日报》的社论141论批判了这部戏为国民党涂脂抹粉。虽然我们剧组得知情况后，演职员立刻商议罢演停戏。但我这个主角已臭名远扬。于是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想到此事就有说不出的心烦。1961年在中南海紫光阁，有一次周总理和我边跳舞时边说：“你《野玫瑰》还是演得很好的。”我吓了一跳，全身汗毛直竖，不敢相信，只是轻声他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可总理却轻松地笑着说：“这跟你没关系，那个戏的政治思想是不好，但你的演技是好的，戏的内容是编剧写下的，好的演技是你的。而且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怎么可能知道！好的演技不要丢掉。”周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牢牢记着，在这里提及此事，决非为己开脱。因为这是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了，并且在当时的戏剧界已无人不知，无需开脱。但如果没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领导人真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宽大胸怀，如果我真象“文革”中被人批判的那样是属于“敌系”，那么如今我也许连骨头也不存在了。

我忘不了，又怎能忘，那一年我得了甲状腺瘤，经医生诊断需住院动手术。我住进了重庆歌乐山的医院，我的病房是在后院，忽然邓颖超大姐到病房来探望我，我喜出望外，因当时无人知我住院，也无人会来探望我。邓大姐穿着合身的旗袍，领口别了一枚漂亮的别针。她的亲切、诚恳、爽朗的音容笑貌与周总理一样可敬可亲。她告诉我：“恩来知道你也住在这医院，一直想过来看你。目前他也动了手术，暂时不能过来看你，希望你勇敢地向疾病作斗争。如果要动手术，也不要害怕，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周恩来同志的心意和邓大姐的探望，使我的病已好了大半。这种精神强心针不是药物所能替代的。当时我早已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也关心入微，我一辈子深感于心。

在歌乐山医院里，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在医院后院的夕阳下，看见周总理和邓大姐在青石板路上漫步谈心，我默默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陷入一

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中。我竟然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未动手术就出院了。

抗战八年，我在重庆住了六年半，成都一年，无论住在哪里，周恩来同志始终是直接或间接地关心着我们的工作、生活，以上只是几个小小的例子。有时在某些集会上见面，有时我知道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自领导着我们的事业。在阳翰笙同志编剧的《塞上风云》摄制组从内蒙回来经过延安回到重庆后，许多人都想去延安，其中也包括我，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们说：“周恩来同志认为我们如能留在重庆多做些抗日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留到抗战胜利。胜利及解放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周总理见面，听他的报告，向他汇报电影事业的情况了，“文革”前我们的每部电影周总理几乎都看过，或是表扬，或是提出中肯的意见，使我们感到不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愧对周总理，今天重又回忆我青年时代在重庆的一切时，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依然那么清晰。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

于 1991 年 12 月 24 日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桑弧

1952年，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他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给我一个任务：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优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银幕，以满足全国广大城乡电影观众的需要。

这一年冬天，在首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以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这也提供了条件，使全国各戏曲剧种创作人员有一个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黄佐临同志和我相偕赴京观摩，这对正在筹拍《梁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是在第一届戏曲会演中，我们得以饱览了全国著名剧种的代表剧目和演员。例如川剧的陈书舫、周企何，汉剧的陈伯华，桂剧的尹轰，豫剧的常香玉等。这一次全国大会演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族戏曲的丰富蕴藏和宝贵传统。会演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主持会演组织工作的周扬、田汉等同志都讲了话，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表演艺术大师也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也亲临会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的言论丰采。

在赴京前，我和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徐进同志已经根据《梁祝》的舞台演出本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会演期间，我们观摩了各地如此丰富多彩的优秀剧目，拓宽了视野，也为把越剧《梁祝》搬上银幕增强了信心。

1953年上半年，摄制组进行了排戏，分镜头、美术设计、彩色片摄影、洗印的各项技术试验。影片于7月初开拍，对这部新中国第一次拍摄的彩色戏曲艺术片，周总理和陈毅市长都倾注了很大的关心。1953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集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周总理还详细询问厂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三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上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却把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1954年，周总理出席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他把影片《梁祝》也带了去，招待各国代表，还邀请电影大师卓别林来观看。卓别林十分欣赏《梁祝》，他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梁祝》于1955年获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并获中央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周恩来总理生前经常和文艺界人士接触，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1958年，他曾倡导电影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

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使创作人员多接触工厂、农村的实际，来弥补生活底子不厚实的缺陷。可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电影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不免头脑发热，跟着工农业“放星”，强调产量和速度。摄影棚内用闹钟来限制每个镜头的拍摄时间，甚至一天要拍一百多个镜头，根本顾不上艺术质量。因此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这股风虽然不久就被刹住了，周总理却深自负疚，在很多场合作了自我检讨。我们都明白这个现象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形成的，我们都为周总理的勇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襟度所感动。

1960年12月中旬，上影厂派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和我四人随同周总理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去缅甸作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以及军事、边界、佛教、新闻、文化艺术、体育、电影等分代表团组成，人数多达数百人。电影代表团由八一厂厂长陈播任团长，团员除上影四人外，还有田华、崔鬼、李恩杰、王心刚、秦文、庞学勤、王苏娅、杨丽坤等。我们到达北京迟了几天，总理已经接见过全体团员了。12月15日上午，总理专门派车来接我们到中南海他家里去吃午饭，邓颖超同志也亲切地会见了我们，总理显然是因为我们报到迟了，特地接见我们一次，以示关怀。他向我们讲了这次出访的意义和应注意的事项。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理家的饭菜十分简朴。午饭后他还和我们在林荫道上散步，并且和我们一起打乒乓。总理谈锋很健，庄谐并作，他的音容笑貌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就在总理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电影代表团就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搭专车离开北京，转道昆明去缅甸了。

周总理的座机是在1961年1月2日中午飞抵缅甸首都仰光的，和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先期到达缅甸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到机场欢迎。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在总理座机着陆后，走上飞机，迎接周总理到机舱门口，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机场上出现了无比热烈欢腾的景象，充满了中缅两国人民友好的“胞波”情谊。当天晚上，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总统府的大草坪设宴欢迎由周总理率领的全体中国友好代表团。中缅两国总理在宴会上作了热情诚挚的讲话。缅甸是佛教国家，当晚的宴席全部是素食，并且按照中国口味烹调，这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电影代表团于1月6日在总统电影院举行“中国电影周”的揭幕仪式。两国总理都莅临参加。缅甸影剧协会主席吴丁内和陈播团长先后讲话，接着介绍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我们合唱了“缅中友好之歌”和“中缅两国是胞波”，并由王苏娅独唱“美丽的祖国”，王心刚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幕仪式结束后，放映了新影厂摄制的纪录片《欢迎你，缅甸胞波》。这部影片是纪录1960年10月吴努总理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盛况。影片放映时，观众反应强烈，不断爆发热烈的掌声。陈播团长还代表周总理将该纪录片的拷贝两部赠送给缅甸政府。在这次“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上，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深刻。原来在电影周准备放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崔鬼和陈怀皑同志导演的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因此在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中，就有穆桂英的扮演者杨秋玲在内。周总理隔天晚上审看了登台者的名单，他认为饰演穆桂英的杨秋玲和饰演余太君的王晶华都是光彩照人的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所以也应该把王晶华列入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之内。好在王晶华这次也来了缅甸，她和杨秋玲都是文化艺术家分团

的团员，要到缅甸各地去参加歌舞戏剧演出的，因此在开幕式上，王晶华就和杨秋玲一起登台，接受缅甸电影演员的献花。从这一件小事，我深深体会周总理考虑事物的周密，以及他对艺术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们在缅甸逗留了半个多月，在缅甸政府和电影界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访问了几个城市，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几个电影制片厂，也观摩了一部分缅甸影片。在这期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肖明参赞代表中国政府向缅方赠送了上影厂拍摄的《缅甸歌舞》纪录片。影片内容就是纪录去年随同吴努总理来华访问的著名艺术家们的一部分精采节目。

周总理在离开仰光回国的前夕，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缅甸总统吴温貌和总理吴努都出席了，气氛十分热烈愉快。宴会后由中国艺术家表演了精采的歌舞节目。散席后，客人们相继离去，周总理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留一留。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他明天就要回国了，他认为这一次友好访问很成功。他说，代表团的各分团还要继续进行各种访问活动，他要我们谦虚谨慎，本着热情诚恳的精神，胜利完成作为友好使者的任务。总理的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制订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英明伟大。

1961年6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6月19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讲话。著名的“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主张，就是他在那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总理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页。）

不能忘记周总理讲这一段话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就电影战线说，从《武训传》于1951年被批判开始，《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相继受到批判。1957年到1959年的反右扩大化，电影界也有不少人被错划。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以及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使许多创作人员逐步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扭曲心态。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各故事片厂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献礼片，周总理充分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就，并且勉励大家努力奋进，拍出更多革命的、健康的又是艺术的影片来，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以及“左”的影响仍束缚着创作人员的手脚，1961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纠“左”，使创作人员解放思想，敢于大胆创作。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大家曾对长影王家乙同志导演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展开讨论。家乙同志曾提心吊胆，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所以影片中该让观众哭的地方，也不敢让人流下泪来。直到有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周总理也肯定了影片的成就，不过他也指出导演思想上显然有许多顾虑。总理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在总理的鼓励下，大家比较能够敞开心扉，在会议上互相交流几年来的切身感受。有的同志讲到慷慨激动处，不免声泪俱下。6月28日，周总理让大家到香山休息一两天，以消除开会半个多月来的紧张疲劳，6月30日晚上，又让我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庆典。当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兴奋雀跃，达于极点。大会由周总理主持，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散会后我们仍坐车回香山休

息。第二天7月1日，是党的生日，周总理特地到香山来看望大家。他和我们共进午餐，并和大家一起散步游山，闲拉家常，使我们感到十分快乐和幸福。

创作会议于7月2日闭幕。会议期间，周扬、夏衍、陈荒煤等同志多次讲话，或参加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电影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这两个文件终于没有实施，成为一纸空文。在上海，连周总理的讲话都不允许传达。电影创作会议是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在“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诬称为“新侨黑会”。在十年浩劫中，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前几个月，看了革命历史巨片《周恩来》，不禁感慨万千。王铁成同志饰演的周总理形神兼备，演得十分成功。他把周总理一生最后十年的忍辱负重、支撑危局的形体和内心活动展示得非常充分。凡是曾经和周总理有过接触或者听过他讲话的人，看了片子无不为之感动。“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悼念逝者的话，可有时用得滥，也会变成“套话”。但是，我感到这句话用在周总理身上却十分恰当。周总理逝世已经16年了，我们痛切悼念他过早地离开我们。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上国际间的风云变幻，我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感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周总理的光辉一生中汲取力量，这将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征途中，增添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1992年1月8日

“三年了，你还外行！”

谢晋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对各行各业充实干部，加强领导。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夏公是电影界的前辈，当然是懂行的。而具体抓电影创作、生产等工作的是刚从中南局调来当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同志。他是搞评论、文学工作的，对电影生产规律，确实下很内行。他上任之后，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但自己总觉得对这一业务不是很熟悉的。有一次在国务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讲到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许是出于谦逊，或是作自我批评，更是对领导表示愧意，说自己本是搞文学的，对电影是外行，以致有些工作没做好。因为一连讲了几次“外行”的词儿，周总理就插话问，“荒煤，你调到电影界有几年了？”荒煤同志回答说，“三年了”。总理马上严肃地说。“三年了，你还外行！”

总理这句带有感叹色彩的批评，给荒煤同志很大的刺激，对他以后的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敢再说自己是外行，而是专心钻进电影业务中去。以后几年，他在抓创作时，无论是提意见，指导生产，安排计划都较符合电影工作的规律，大家也喜欢和他谈创作，谈业务，听他作报告。他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威信的“内行”了，在我拍了《红色娘子军》以后，有次在火车上跟他同在一个车厢，他谈起了总理的这句话，事隔几年，仍很感慨又很遗憾。他说，虽然搞电影工作七八年了，比较熟悉了，你们送来的剧本，看了，也谈了，但我没有象夏衍同志那样能看分镜头剧本。夏公可以在分镜头剧本上批注详细的具体的诸如镜头作用，长短等意见，我就不能，只能笼统的谈一些意见和看法。接着又很诚挚他说：哪一年有点空，把工作安排一下，到你的摄制组去蹲点，专心待一段时间，看你们是怎样分镜头，怎样具体拍摄的。很遗憾，他的这个愿望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确实在掌握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生产方面，我们走过不少弯路。由于当年领导电影生产的同志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终于逐步掌握了电影生产的规律。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左”的路线，在文艺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风暴，终于在“文革”前，夏衍、陈荒煤成为“夏、陈文艺黑线”的代表，被迫离开了电影界。时隔几十年，当我想起周总理的这句话“三年了，你还外行”，仍感触很深。我认为，总理这句话不仅是对主管某一项业务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有它的规律，熟悉了，掌握了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我们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对各项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但在担任总理以后，也有许多方面是新的事物。正是由于他善于由外行变内行，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治理得有条不紊，博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看来，党和政府派你来到这个岗位，领导这门工作，你就应该从“外行”尽快地作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刻苦学习，摸清规律，变成一个内行。你不能老是拿外行来搪塞，好象我是外行，工作没做好是应该的。当时荒煤同志如果刚调任三个月、半年，说“我是外行”情有可原，不致挨批。可是已经三年了。从他自己来说可能以为时间不长，而在总理看来，三年就不算短了，你还没有掌握工作规律，自称“外行”，就不可原谅了。

周总理 30 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启迪，我们主管各项工作的干部应该从“外行”尽快变成“内行”。搞科学有科学的规律，搞商业有商业的规律，商业的规律不同于文艺的规律，即使在文艺领域中，

音乐有音乐的规律，电影有电影的规律。当然，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的水平达到导演、摄影师的专业水平，但应该要求尊重各个行业的规律！今天在纪念周总理时，温故知新，重提“三年了，你还外行”这句话，我认为仍有现实意义的。

“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

白淑湘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 1958 年 6 月 30 日晚上，那天是世界著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彩排演出。这个舞剧只有世界上有名的大剧院才能上演，它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剧目，除了要求演员有高超的技巧和优美的舞姿，还要对剧情和音乐有深刻的理解。我当时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同时担任白天鹅和黑天鹅的主要角色。对我来说困难是很大的，但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古雪夫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彩排圆满成功，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外国的芭蕾舞名剧，而且成功了，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更使人兴奋的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文化部领导的陪同下来看彩排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陈副总理和文化部领导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职员。周总理神采奕奕、精神振奋地对大家讲：“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很不简单嘛！这么短的时间就排成了世界经典舞剧《天鹅湖》，我祝贺你们！”总理的话音没落，大家立即欢呼起来了，总理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跳得不错嘛，听说你很用功刻苦，要继续不断努力啊！”我听到总理的鼓励和教导，心情万分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重复的说了几遍：“我一定努力。”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剧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后挥手和大家告别。

我第二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 1959 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晚会主要内容是跳交谊舞，总理很喜欢跳交谊舞，他说：“跳交谊舞可以消除疲劳，还可以锻炼身体，人应该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总理的交谊舞跳得很好，舞姿端庄大方、轻盈潇洒。晚会上很多人都想和总理跳舞，我也非常想和总理跳一曲，我的交谊舞水平不高，怕踩了总理的脚，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走到总理面前说：“总理，我请您跳舞好吗？”总理笑着说：“好哇。你是跳芭蕾舞的白淑湘吧！好，我和芭蕾舞演员跳跳。”总理说着站起身来，我们一起走进舞池中央，音乐响起，总理的舞跳得确实漂亮。我怕踩总理的脚，心情有点紧张，也顾不上和总理说话，总理看看我笑着说：“你们学外国的芭蕾舞，要学精了，学到家，这样才能把我们民族的艺术溶合进去，学这门艺术的黄金时代很短，掌握它不容易，要精益求精，成为专家。”听了总理的教导，我说：“我一定记住总理的话，努力学习，争取在芭蕾舞艺术上有所成就。”总理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好！”乐曲结束了，我和总理握手道别，一种幸福感久久环绕在我的心头。

我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 1960 年秋天。这天晴空万里，清爽宜人。我们去机场欢迎非洲的一位国家元首。外宾的专机还未来，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都在机场上等候。总理兴致很高地和大家谈笑、聊天，见到我很关心他说：“噢！天鹅来了，你们排演些什么剧目呀？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不然飞不动了，听医生讲喝豆浆比牛奶好，有劲又有营养，还不会发胖。”转过身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财神爷，他们舞蹈演员，武功演员，两条腿可是不得了，太重要了，你给他们拨些木头，铺在宿舍里保护关节，这是一辈子的事啊！”李先念同志诙谐地笑着说：“总理的话，哪个敢违抗，一定照办。”大家听了高兴极了。从那以后，我们早餐有豆浆又有牛奶。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宿舍楼地上，都铺上了像大会堂大宴会厅一样的水曲柳木地板了。总理的话确实实现了。总理那么忙，日理万机地处理国家大事，还时时记着我们这些青年舞蹈演员的生活、学习……。又一次见到总理

是 1963 年冬天，我们团到上海南京巡回演出。在上海演出的是《天鹅湖》、《巴黎圣母院》。演出期间有一个休息日，上海文化局在上海市委礼堂主持开了一次联欢会。当时，周总理也刚好在上海，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联欢会。参加联欢会的都是上海文化界和各界知名人士，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印象很深的，是越剧演员王文娟有点“发福”。总理看到后逗乐他说：“这个林妹妹，身体健康了，再不会哭鼻子了。”引起大家一片欢笑声。这天来的人特别多，都希望与总理多跳舞，也很想听总理讲讲。总理说，“交谈、跳舞都要做，咱们先轻松一下，跳跳舞。”听总理说先跳舞，大家都争先恐后要同总理跳。跳过舞以后，总理稍事休息一下，站起来对大家说，“上海及华东地区正在搞现代题材的戏，很多，各种艺术形式都在改革，演现代戏就要做革命人，就要改造自己。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党的阶级政策是‘重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请大家不要背包袱，出身不好是可以改造的。我出身就不好嘛，毛主席及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出身不好的也很多，不要有负担。我们共产党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请大家记住这个真理。”总理讲话不长，但很真挚、很诚恳、很亲切。我时时在想象周总理这样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还不忘学习，改造自己，真是我们中华民族学习的楷模。

我那幸福的十二月

王丹凤

12月，是一年中的岁末，它孕育着新的一年将诞生，春天将降临。

北京的12月，总是瑞雪纷飞，银装素裹。在这千里冰封之中，唯有那青松挺拔，傲梅吐蕊，把芬芳留给人间。

我爱12月，更爱北京的12月，因为，我曾在北京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幸福的12月”。

那是在1960年岁末，我接到上海电影局的通知，让我和张瑞芳、桑弧、秦怡四人立即去北京，参加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缅甸访问。这一突然的喜讯，使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激动得夜不成寐。

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在旧社会演员是被社会所歧视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地位。而今天，在新中国，不仅受到社会的尊重，观众的热爱，还能有机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我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所以，这次去北京的心情不比往常，是格外的兴奋。

我们四人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个400人的大型代表团，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还有北影、八一、长影等电影厂的导演、演员参加。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招待所里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要早来两天就好了，前天晚上周总理接见并宴请我们全体代表团成员，就缺你们上海几位呢！”

离赴缅甸只剩没几天了，一天上午，团里没有安排活动，我和瑞芳、秦怡三人去东安市场看看，还没有逛上一圈，突然，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急促的话音：“请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张瑞芳、秦怡、王丹凤注意，请你们听到广播后马上回招待所去，马上回招待所去！”这时，我们三人都愣住了，什么事？谁也摸不透。此时此刻，也只能急匆匆地寻找出口处，赶紧回招待所。

“你们总算回来了！”桑弧导演着急他说：“刚才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们上海来的四个人在招待所里等，一会儿就派汽车来接我们去中南海，总理要接见我们。”

听了桑弧导演的一番话，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太幸运了。

当我们坐上总理办公室秘书来接我们的汽车，驶进绿荫葱葱的中南海时，我的心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真想这车开得慢一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十亿人民的中心，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我要把这里的一草一木看个够，可是我又嫌车子开得太慢，因为我迫切地想早一刻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汽车在一座宁静的小院里停住。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在客厅里等我们，我们赶紧上前，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们就座。

我是第一次来到周总理的家，又是第一次见到敬爱的邓大姐，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可是当我握着邓大姐温暖的手，望着她慈祥的笑容，和蔼可亲的神情，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周总理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没能赶上前天的宴请，今天我和邓大姐请你们吃一顿家常便饭。”

总理亲切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溶入心田。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操

劳着国内外的大事，工作如此繁忙辛劳，然而，对我们上海代表没有赶上宴请这样一件小事都想得这么周到，这么细致入微，特地在百忙中把我们请到他家中做客，陪我们吃饭。面对这样一位受亿万人民尊敬又处处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一顿饭，是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共进午餐，饭桌上简朴的菜肴，胜过宴会上的山珍海味，邓大姐还不时地给我们夹菜，关照我们不要客气。饭桌上，我们又说又笑，洋溢着极其和谐的气氛，真好似是在家中一般。

饭后，总理又陪着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时值岁末，寒风扑面。然而，这一天，我们围在总理周围，边走边谈，直觉得温暖如春。总理十分关心我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情况，他几乎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了解。我们在总理身边显得无拘无束，心地舒坦地交谈着。

不知不觉地，我们踱步至一间休息室，总理领我们进去，只见室内陈放着一张墨绿色的乒乓台。看来，总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注意锻炼。

当总理拿起乒乓板，与瑞芳她们对打时，我这个好静不好动，平时对任何运动都不碰的人就心里怦怦地跳，我直躲在他们的后面，想最好总理别点我名。谁知总理与他们三位打完后，真的要我上去打。这时，我的脸涨得通红，胆怯地跟总理说：“总理，我不会打的。”总理却一再鼓励我：“不要紧，来试试。”总理就是那么亲切、平等待人，他要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一遍，我只好拿起球拍上了。可想而知，面对这么一位国家领导人，我的手脚就格外地笨拙，球儿不是碰网，就是出界。总理看我确实不会，也就不难为我。他放下球板后叮嘱我：“打乒乓是很好的运动，以后要学学。”我听后忙不迭地频频点头。这一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一年以后，有一次，周总理来到上海，接见了文艺界人士，总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王丹凤，学会打乒乓球了吗？”真没有想到，总理还记得这件事，我们的总理真关心人啊！

敬爱的周总理，在您博大的胸怀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心，处处想着人民、热爱人民，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30多年来，我的心中一直怀念这幸福的12月，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91年12月写于上海

遗爱翔寰宇

林林

一

我到日本京都，总要到岚山谒周恩来同志的诗碑（诗是1919年4月5日写的）。头一次是1980年春，陪巴金同志、冰心大姊诸同志一起去的。一到碑地，就看到碑前有不知名的日本人摆满了香花。那之后，写了一首五绝，诗曰：“沿路赏樱堤，岚山谒石碑。绵绵无尽意，默念雨中诗。”

最近一次，1991年冬，日中友好汉诗协会的棚桥算峰先生陪我们去的。未到前，天下了潇潇的雨，到了诗碑，雨已停，从云层里露出一线阳光。棚桥先生抢景照了相片，高兴他说诗碑的诗景出现了，难得有这么巧遇。与此同时，我们又理会到周恩来同志年轻时，苦于探索真理，在模糊中偶然看到一线光明愈觉娇妍的喜悦心情。

恩来同志东渡之后，1920年冬至1924年夏，为勤工俭学，又旅欧数年，当时住在巴黎一家旅店二楼的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内有一桌一床。在这里，他曾写两篇长文章，寄往天津《益世报》发表。直到如今，主人怀有隆情厚意，保留这房子做纪念，供人参观，大门口还挂个小牌子。1984年夏，我访西非路经巴黎时，也曾访问这个地方，该旅店仍照常营业。我们不禁深深地感谢这旅店的主人。

一东一西，无论日本人民与法国人民，对周总理都怀有敬爱的情意，永不磨灭。

二

周总理重视民间外交，重视文化交流。

1959年，中印一度曾发生不愉快的军事冲突，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往来，周总理重视与这个亚洲大国的关系，认为民间往来应该进行，遵照这个嘱咐，与印度有工作关系的同志，开了一个会议，研究执行这个任务，结果从印度国外，请了一个印度朋友来京访问。

顺便再说，周总理于1956年访亚欧11国，第三站到印度的两件事。当时我是驻印度使馆的文化参赞，他抵达新德里后，就关照说，新华社记者发消息不要把副团长贺龙同志漏掉，正副团长都报道。这可见他对待贺龙同志的亲切周到。另一件是那时候已在印度的达赖有离心倾向，不回西藏，总理苦口婆心，晓以利害，说达赖离开家乡，不能有所作为。经总理做工作，达赖这次是回西藏了。

1963年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决定派一个歌舞团访日，这个团以武汉歌舞团为主体外加舞蹈家赵青、琵琶名家刘德海、唱评弹的杨乃珍等。在离出发三天前，周总理了解到，团领导没有熟悉日本的人员，不放心。于是我被安排参加这个团的工作。出发到广州后，时过子夜，我已在梦中，忽然听到长途电话，周巍峙同志传达总理的吩咐。我常常感到总理对出国团关怀备至，考虑到别人应加考虑而没考虑的问题。我们永记周总理的教导。在这次出访中，虽有台湾坏人的干扰，但没有出疵漏。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访华，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他，提到他的成吉思汗小说（即《苍狼》）。井上先生后来念念不忘，以为周总理日理万机，怎么还关心到他的小说，钦敬周总理对文化工作的关心。

1973年，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要来访，周总理以为他1938年来过武

汉，时隔30多年了，可向廖承志同志了解他的情况，我遵嘱去请教廖公，廖公又要我去询问司徒慧敏同志，之后终于请伊文思来华访问并拍了一些记录片。在《周恩来书信选集》出版后，看到1938年春周恩来同志有信给郭沫若同志，请他派员陪伊文思到抗日前线去拍制记录片。

周总理深知文艺的作用，也喜与文艺家交谈，关心文艺工作者思想工作，他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与指示，令文艺界人士都口服心服。

三

再谈谈周恩来同志的民主精神。

周恩来同志谈过耳朵问题，曾这么说，领导同志很容易自己被人家放在孤立的地位，一个人如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就只有一个耳朵了，生两个耳朵就是要听两种不同的意见。

又在另一个地方说：“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

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有一次，在人大会堂某厅开会，我也被通知参加，听周总理讲话，牵涉苏联某些问题，讲过后，在座的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王荃卿同志，提出些不同的意见，我就看看周总理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下，就表示赞同王同志的意见。他说开会就是“集思广益”，有不同意见，考虑问题就会更全面些、准确些。他的民主精神给我们言传身教，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追念在现代史中，中国每一事件重大关头时，周恩来同志总起着积极的作用，为党为国为人民创造了伟大的业绩，我心中为之异常激动，曾写了一首五言诗，题为《无尽的缅怀》，未曾发表，兹录之如下：

忠诚怀壮志，重任集一身。

操劳无日夜，荣誉满乾坤。

临危张大义，拨乱净妖氛。

无私忘生死，有骨显坚贞。

四海存知己，五洲见故亲。

遗爱翔寰宇，丰功催史轮。

巨星终不落，光华照万春。

1992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16周年纪念日

我调北京工作的前前后后 阿依吐拉

最近看了影片《周恩来》，我是流着眼泪看完影片的。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了许多使我难忘的往事……。

1960年年底的11、12月间，我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借调来的五名演员参加中国艺术团随周总理出访缅甸演出。访问结束时，总理在我国驻缅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招待缅甸朋友和各国驻缅使节，我们艺术团为来宾演出，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总理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对演出所取得的效果表示非常满意，并讲了许多话。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懂汉语，只懂得部分讲话的大意：

总理说：“大使们做不到的工作，你们做到了……今天演出的效果很好，每当你们演出某国文艺节目后，该国大使就起身到我身边，热情握手表示非常感谢。你们要好好学习各国优秀文艺节目，为我国外交服务。今天阿依吐拉一个人表演了三个国家的舞蹈节目，很成功，如果你们一个人学会一个外国节目，那是多少节目啊！”（我演了苏联塔吉克族独舞《热孜》，尼泊尔朋友为周总理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编的独舞《赞五歌》，印度独舞《婆罗多舞》，后两个独舞由著名歌唱家帕夏·依仙伴唱——阿注）。我想总理要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想法很可能是这样产生的。

从缅甸回来，我们住在北方旅馆，有一天接待人员让我们上车，上车后说总理要请你们到他住处做客。我们到达中南海总理住处时，总理、邓大姐迎接并领我们进客厅。我们入座后，总理请我们喝茶并说：“你们离家时间太长了，想吃家乡饭了吧！今天特地给你们包羊肉饺子。”我们入席后，总理一面动员我们多吃一点，一面亲自动手往我们盘子里夹饺子，我们很久没吃饺子了，吃得真开心。在吃饭过程中总理问我们：“你们想不想家？”我们不好意思说想家，只说了一句：“不想家。”总理哈哈大笑又问我：“阿依吐拉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说：“愿意。”我们回到住处，很激动，到全国人民的总理家做客，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但我们真的做客了，这是我们一生中的荣幸。

第二天，我们还没有起床，接待人员就把我们叫醒了说：“总理让你们回家去看看，给了五天时间，回来后有新任务。”我们把不用的东西留在旅馆，接待人员把我们送到机场。

1961年年底把我从新疆调来北京，要我在东方歌舞团工作，1962年1月13日东方歌舞团成立时我成了头一批演员。当时，我只知道是总理点名调来的，但详情不了解。1990年我们独舞演员培训班汇报一年教学成果时请了全国人大赛福鼎副委员长，他在讲话中详细谈到我被调来的经过：总理从东南亚访问回来，有一天问赛福鼎同志：“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待放的花蕾到北京工作，你看怎么样？”赛说：“你指的花蕾是阿依吐拉吧？”总理：“你怎么知道？”赛把阿依吐拉参加艺术团，随总理访问缅甸，总理举行答谢宴会时，她表演了三个外国舞蹈的情况说了一遍，并表示双手赞同。从这件事看出，总理调一名文艺工作者，还特地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见，是多么尊重少数民族领导同志。

我来东方歌舞团后，多次见到周总理。他是全国人民的总理，日理万机，太忙，所以见到他时我从不多说话。有一天我们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总

理到后台看望我们，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寒问暖，问父母在不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一一回答，说团里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没有困难。总理微笑，表示放心。

60年代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我们生活也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主要是买不到羊肉，有一天团里行政干部送来6斤牛肉说是总理特地指示有关部门送来的。这不是6斤肉，而是十亿人的总理的一片心啊！我感动得不知怎么说好，流下了热泪。困难时期总理带头不吃荤，他为全国度过困难日理万机，还是想到我们，特地给我们送来肉。收到肉后实在舍不得吃，当时没有冰箱，就把肉切成块，晒干后吃了好多日子。后来根据总理指示，商业部门每月发给6斤肉票，到西单菜市场买。

还有一件事，在“文革”中总理委托邓大姐打听我们三位少数民族舞蹈家，这事听别人讲过，但想不起来是谁讲的。

我对总理的感情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由于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有的事想不起来了，但上述感人之事不写日记也永远忘不了。我永远怀念亲爱的周总理。

殷切期望细心关怀

杨秋玲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有 16 个年头了，每当想起他老人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我很受感动与教育。他日理万机，对广大文艺战士，关怀备至，下面回忆几件事来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敬意。

“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演员”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转过年来，1950 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持成立了中国戏曲学校，培养一大批京剧事业接班人。经过八年的培养（艺术、文化、政治），现在这批人已在全国各省市生根、开花、结果，上演了许多优秀剧目，《杨门女将》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剧本内容是爱国主义的，演员都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批青年人，总理很高兴，每当演《杨门女将》一剧招待国宾时，总理都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演员”，足见总理老人家对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接班人心里是多么的喜悦与高兴，寄托着多么大的期望。

感人的关怀

1960 年是中缅建交十周年，由文化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组成大型综合艺术团随同周总理出访缅甸。有一天，周总理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内开招待会。使馆内充满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那天演出的文艺节目，有歌舞、京剧、龙灯等。京剧演的是《挡马》，演到一半，因该演员突然晕倒，没有演完就停止了。赶忙把下面的节目提上来，继续演出，晕倒的那位女演员经过救护，很快恢复了知觉。台上的演出结束了，送走了外宾，总理不顾劳累，马上就去看望那位晕倒的女演员。那位女演员见总理亲自来看望她，激动万分哭着说：“总理，我没演好，没完成任务。”总理笑着安慰她说：“你演得很好嘛！这不能怪你，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并叮嘱医生及有关人员，好好护理她。

冬天的北国是冰天雪地，而缅甸地处亚热带仍很炎热，气温很高。艺术团排练紧张，再加上刚到外国气候不适；又是给外国元首演出，难免紧张，那位女演员身体虚弱，在台上就失去知觉。

经过总理亲自关怀，她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使我们在场的很多同志深为感动，数十年来，印象极深，难以忘怀。

黄豆、鸡蛋、肉

1960 年，在那三年灾荒的年代里，我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人民吃饭要定量。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 7 个月不曾吃一块肉，周总理在食堂排队买饭与大家同甘共苦，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请问哪个国家元首、领导，能和人民在一起忍饥挨饿，与人民共患难呢？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如此。那时，我们剧团天天有演出，我们还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在艺术上没有什么造诣与成就，工资低，还得养家、养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什么高级营养证，也买不起高价食品，大家都是过集体生活，吃食堂、住大宿舍，吃碗面片汤，就去演出去了，回来就是白薯面窝头，像煤球一样黑。有时去晚了就卖完了，饿得受不了，有的同志就吃两丸牛黄上清丸。有人浮肿了，有的演员在台上演着演着，眼睛直冒金花。后来不知怎么周总理知道了，了解了我们的生活，在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批给

了全团工作量大、病号等同志，及工作需要的同志每人不同定量的黄豆、鸡蛋、肉等，并嘱咐院领导要抓好我们这些青年演员的生活、伙食。并鼓励我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传播中日两国人民文化和友谊的种子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艺术往来，早在中日建交前就开始了。50年代中期，梅兰芳大师就亲率京剧艺术团访日，其他各种文化艺术交流也相继不断。1963年，秋末冬初的时候，一位日本朋友来到中国见到周总理，要求请一个艺术团赴日，总理听后，思索了一下，对这位日本朋友讲，“我推荐给你一个我们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团。”后来我们接受了剧目审查，《杨门女将》、《野猪林》等剧被确定，不久我们接受了赴日的任务。在我们集中学习，为赴日打下良好思想政治基础的过程中，每个演职员都齐心努力，团结合作，突出政治，为推进中日人民友好做不懈努力。在敬爱的周总理关怀下，我们全团同志在日本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长河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见周总理 臧克家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你会觉得心的太阳
到处向你照耀，
当你以自己的心
去温暖别人。”

我以为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总理，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时时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感人动人。死后，他的遗爱象阳光，普照人心。

周总理为革命献身，临危不惧，作出了伟大业绩。他的高尚品格，忘我精神，我心仪已久，从40年代直到他离开我们，在各种场合亲睹他慈祥的面容，聆听过他动人的宏声，可是对面交谈只有三次，机缘很浅，而感印却似海深。

1942年秋，我从抗战前方到了战时陪都——山城重庆。约二三年以后，有一天，得到通知，周恩来同志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当时好似只有二三人。他坐在我对面，面带笑容，亲切地问我：“臧克家同志，你是山东诸城县人吧！”一听这话，心里热乎乎的。接着又说：“你的老同学李宇超同志在延安谈起过你，他在做外事处的副处长。”我的家乡，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一些小事，恩来同志都记在心里，而且自然而亲切顺口说出来，象谈家常一样，我十分感动。他又问了我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我老家情况。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使我永远忘不了的事。记得当何其芳同志在做恩来同志助手的时候，我和他私下谈心，曾谈及我老家的情况：老家只有一个继母，一个妹妹，乡村妇女，不识字，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我县解放较早，无法通邮，我家庭生活各方面都很困难。其芳听了以后说：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设法解决。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回了一趟故乡，这才知道，几年前，省委通知了县里，曾给我家送来优待粮，二斗麦子，二斗豆子。我听了，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你日理万机，连我个人家庭的一点小事也挂在心上！

40年代最后三二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环境恶劣，郭老、茅盾、叶圣陶等许多前辈先后秘密去了香港。1948年底，我无法立脚，也追踪而去了。第二年3月，党组织包了一只外轮“宝通号”，载着100多位文化界同志回北平，其中有严济慈、阳翰笙、史东山、徐伯昕、张瑞芳，等等，冯乃超同志领队。那时过台湾海峡还是有危险性的。到北平之后，住在前门永安饭店。第三天上午，周恩来同志看我们来了。一听恩来同志到，全都涌出房门，拥向他去，象家人久别重逢，情景动人极了。恩来同志满面带笑，向大家打招呼，亲亲热热地高声说道：“同志们辛苦了。生活安排得怎么样？现在你们回到老家了，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几句话，引起掌声雷动，我笑在脸上，泪在眼中。想到在白区受苦受难，立身无地，而今回到刚解放的故都，尊敬而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就亲自来欢迎、慰问我们。新的天地，新的社会，新的国情与人情。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双泪流！

195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作家，约有七八十位，文化部负责人钱俊瑞、齐燕铭、周扬……全到了，韦明同志为招待客

人而奔忙，记得一共七桌。吃饭之前，总理先行座谈。没有题目，没有长篇大论，象家庭团聚，亲切随意交谈，大家情绪轻松，会场上充满了欢乐融洽的气氛。总理先亲切询问，只记得他问，“冰心同志，你身体好吗？”“巴金同志，你生活怎样，每月开销多少？”临到我的时候，总理目光注视着我，说：“臧克家同志，你是作家，怎么不在作家协会工作，而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这突然一问，出我意外，回答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总理不再说什么了。会后，我想，大约总理看了介绍我的材料，随便问一问，隔不多久，忽然一位女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是臧克家同志吗？周扬同志请你来谈谈。”那时，周扬同志与茅盾、阳翰笙两同志住在旧文化部西边的一排三座小楼上。过年过节我总是去看望茅盾，他家我还没有去过。放下电话以后，心里揣想，有什么要事找我？有点费疑猜，不免紧张。见了面，周扬同志态度和蔼亲切，问了我的年龄，然后说，“我比你小四岁。”这句话，以后几十年来，成为见面礼。闲聊了几句，然后归于正题：“臧克家同志，我们想请你，还有吴组缃同志，到作家协会书记处工作，你看怎样？”我没有思想准备，觉得担子重，怕担负不了。我说：“服从组织分配，怕做不好工作。”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和周总理在宴会上对我工作的提问联系在一起，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件关系我一生的大事，把我从一天八小时办公室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回到了文艺队伍，可以专心从事文艺工作和写作了。对总理的关注和组织上的安排，我心潮翻腾，充满感激之情。过了不多的日子，葛一虹同志忽然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前几天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化部的长篇工作总结，还有关于你工作的事，你看到没有？”我说：“我没有看到。”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其中有这么几句：把臧克家同志安排在人民出版社达七年之久，这是不应该的……（大意）。我读后，再一次感到，周总理领导国务院工作是多么的深入和细致！

我一生仅仅只有三次与周总理交谈，我感到很幸福，感到我们好总理的伟大胸怀，崇高品德。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民的崇敬与爱戴；他逝世后，去后之思，如此深厚，如此强烈，如此普遍，这就是他立功、立德、立言，为国为民，结成的硕果。

1992年元月12日

雪之韵

叶文玲

年年花似雪，年年雪如花。

难道是天公有意？十多年来，每年每年，总有这么一场旷如无天密如无地的豪雪，落在令人无限感怀的元月。

记忆的长河里，总有撕不掉的日历，我总也忘不了 1976 年元月 8 日那个阴霾满天浩雪遍野的夜晚，那个日月惊心江山同泣的时刻，我们的好总理，只因心疼人民为他哭得肝裂肠断，选择了最简单最朴素的告别；他悄然离去，唯把一腔忠魂撒在素装坦坦的江河湖海，唯把满心的慈祥关爱化为一片不容玷污的清白长留人间。

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爱上了雪，这是和儿时的雪球雪灯以及一切雪戏绝不相同的挚爱；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懂得了雪，懂得了它的身价和别种含义，懂得了当它和一颗伟大的灵魂结合时，才有的真正晶莹和高洁。于是，雪在我眼前，更加整洁而诗化；于是，我便觉得此时的雪和今后的雪，不单单是天象物象，而是我们总理在天之灵所幻化成的灿烂无比的精神花朵，它带着一种祥兆，静静降落人间，就象细雨无声地润湿大地一样，永远抚慰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16 年前元月 8 日的那个无眠的雪夜，我虽然没有捶胸顿足，却切切体验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肝胆俱碎、心绞如裂的痛苦，凝视着总理的那帧小小的黑白木刻的头像，凝视着总理那慈蔼澹荡如中秋明月的笑容，我热泪涟涟，整颗心却冻成了一挂血碧的寒泉，纵然心里回旋着千句万句的啼唤，却半声儿也喊不出来。

我终于掏出了搁置多年的笔，挥写了一首小诗：

恨不午门死，
愧在人间立。
碧血沃青枝，
再报春消息！

我平素荏弱，因此这壮烈激越的表露，曾使目睹的家人不无心惊胆战，因为我的亲人非常清楚当时是什么样的时刻。

我也不会写诗，虽然在 18 年前——在 16 岁的花季，在故乡那朝露暮霭的田畴中，我开始了文学创作，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却从来不曾写过诗。可是此时此刻，因为忧国之愤，因为这圣洁的白雪，因为人间天上这最平凡也极伟大的一颗灵魂和一副忠骨，我要写。也许我的诗句很蹩脚，也许我不懂意境又不懂韵律，但这一切无关紧要，我只明白，假若此时不吐心声，胸中的愤怒之火，会烧灼得我坐卧不宁，我会活活憋死闷煞。因此，即使心如垂铅，即使手中的笔杆沉重如铁，我也要蘸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写出这血脉之音！……

言有尽，意未了，寒窗外，连天大雪纷纷落，如银的雪光，又象道道闪电，照亮了又一页珍贵的记忆；泪水迷蒙中，我的眼前又现出一种幻象，我们的好总理，已经被我们千声万声的啼唤催醒回转，他亲切地向我们招手微笑，逼真真真地就象 18 年前……

那是金风送爽的秋季，那是在湖山如画的杭州，我这个偶来杭州的乡下少年，竟然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获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幸福的瞬间，而且偏

偏又是过失和幸福相交的瞬间。这件事，直到今天，就连亲历的我，在一边用记忆的丝网将它甜甜包裹时，一边还觉得不可思议。

哦，我深深地记得那一天，那是一生最狂欢也最忘情的时刻。

头天晚上，我的姐姐喜形于色地向我透露，“明天，周恩来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访问杭州，我们厂的欢迎队伍，将排在湖滨路……”

我的心腾地一热，急跳如鼓，多么羡慕、多么嫉妒姐姐的这份幸运呵！

我往哪里去集合？没有任何人向我发过这项幸福的指令。姐姐是有模有样的工厂干部，而我呢，除了身上的花布衬衫蓝布裤，除了脚上的这对沾着家乡田畴土粒的圆口市鞋，除了头上的这双挂着稻穗谷屑的长辫，还可以证明我这个16岁的乡下妹子身份外，我是地地道道的“外来客”，实在无队可“集”，无处应召呵！

但我绝不不甘心，气喘吁吁地飞步奔跑，还没等我挤到湖滨，如潮涌集的人龙，早将我挤得象溶入人海的一滴水珠，我早已不是我了！……

我努力“还原”自己，幸亏当时的我又瘦又小，我象一只小猴，在人们如林的腿脚间钻来钻去，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落脚地场时，我的前边，又是一堵黑压压密匝匝的人墙！

我挣足了劲，拼命踮着脚尖，象个最蹩脚的芭蕾舞演员，翘起着在人墙后一寸寸逡巡。渐渐地，我的脚踝足趾又痛又麻，当我觉得双脚好象也不再是脚，而是两根木棒，我的身子也差不多整个儿从这两根木棒上齐膝断裂时，忽然，人群爆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而我也因祸得福地被推涌的人浪抛向一个高处——我就势翻身一立，竟立在了了一张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八仙桌上。

哦，我终于看见了，看见了周总理和金日成乘坐的敞篷车，披着彩带彩纸，穿过鼓乐和花雨交织的沸腾之海，缓缓地驶过来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总理他脸庞红中略略透黑，是那种非常非常健康的气色，他浓眉如剑，炯目如炬，他挥摇手掌，启齿微笑，就象中秋的一轮皎月，温煦而又明亮！

我和狂奔的人群一起纵情欢呼跳跃，我多么想教时光这一刹那凝成永恒，多么想教时钟在此刻停摆！……我的奇想刚刚闪旋，摧拥着我的人潮又翻腾成浪，一个后倾，我的那对又长又碍事的长辫，立刻象根马尾巴，把桌上的两只小碟齐齐扫向地下，于是，如喧的欢声中，立时夹杂着“豁啷”的一声清脆！……

尽管“上帝也会原谅”我此时的过失，但我依然惶恐而窘急，我不知道这一声响是否传得那么远，但我分明看见周总理恰恰在此时略略侧过身来，挥着手，端端地朝向我们这边道上的人群，再次亲切地点头，慈蔼地微笑；周围的一切，都被他的微笑再次感染了，欢活了，人群又沸腾成一片活泼喧闹的海洋……

哦，这一瞬虽然极为短暂，这一瞬却令我年岁猛长，这一瞬，我真正理解了世问既有至崇至敬的爱戴；这一瞬，也教我实实在在亲睹了举世无双的“周恩来式”的微笑，这微笑端的是温煦清亮的中天明月，令人无比激奋，永远感怀！

几十年来，我曾忘却许多往事，却不知为何总能深刻记得这个瞬间的枝枝叶叶。于是，我从此明白人的记忆有各种归类，而我的记忆储存库，绝对是情绪型的，它的钥匙，明晰地刻着那一瞬的年月日；于是，这一天的这把钥匙，也象以往一样长悬我的心锤，只有水的洗涤火的熔冶，才能开启。

因此，又一个 18 年之后，当那个我们极不情愿的寒冬来临之际，我在那个雪夜该然涕泣时，便又记起了 1958 年秋季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日子。于是，在雪火相撞的刹那间，我仿佛突然成熟，仿佛从此更明事理，我懂得了宇宙人世，是有一种寥廓绝尘的大自然，有一种绵密苍雄的境界，而只有如太阳般光明磊落的胸怀，白雪般素洁无暇品格的人，才能畅游其内，才能取其精、得其神，才能寻其道，悟其真。于是，我在炫然涕泣的同时，立下了一个誓愿：我将以磨杵为针的心志，重握那支搁置多年的笔，孜孜不倦地磨练，今后要写，我一定要写那种经过雪与火熔冶洗涤的文字，写出一篇对周总理的敬仰和与之有关的文字，哪怕仅仅是一首诗……

今天，又一个辞岁迎新的时刻，我总算实现了 16 年前的誓愿。

今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被“周恩来式”微笑温暖滋润过的人民，终于用自己辉煌的劳动，谱写了壮丽绚烂的诗篇——

总理呵，您一定谛听到了这个举国欢腾的喜讯吧？21 年前，您对和平利用核能，发表了英明卓见的“七·二八”指示，21 年后，我们的自强自立于世界尖端科学之林的科技战线的科学家和广大职工，终于在三羊开泰之年，在我们浙江海盐的秦山，造就了一个雄浑无比的太阳的摇篮——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总理，我们最敬爱的好总理呵，我在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之夜，禁不住再次热泪潸然；因为，这厢高悬头顶的，是明亮如昼的电灯，那灯管里流动的，是秦山发出的核电；那厢电视荧屏播送的，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反映我国核电建设光辉里程——秦山核电站的电视剧：《太阳的摇篮》。虽然，我所尽力的，仅仅是编剧之一，但是，我清楚我们这个创作集体，是因为怎样的使命感去讴歌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我也清楚自己，又是在怎样的责任感和原动力驱使下，几次去秦山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抒写我们伟大民族的丰功伟绩和精神品格的。我记得初到秦山时，是 7 月流火的夏季，可我在深入采访中，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几十年来一直撑持自己的那份沛然涕然之气和爽然人心的幽凉！

今天，是 1991 年 12 月的一个使举国上下千千万万人激动的不眠之夜，推开窗扉举目眺望，窗外，恰恰又是一片苍洁旷迥银雕玉琢的世界！但见白雪如絮静静落，西子湖山美似画！于是，我幸运地在这时刻再次聆赏了这美妙的天籁和地籁，于是，我再次在这一瞬间顿悟了真正的永恒。

总理，我最敬爱的好总理呵，我禁不住再次在心底轻唤您了！总理，请让我再次“天真”一回，再向您诉说一句悄悄话吧：往后，每年每年的飞雪迎春之季，我这个步入中年的人，虽然不可能再有烂漫少年的冰雪之娱，但请允许我恪守一种圣洁的礼拜吧！我将尽情漫步光华皑皑的天地，细细地品读寸寸地叩听这教我神思飞扬的雪之韵……

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 赵青

今年是我从事舞蹈艺术生涯 40 年，回想 40 年所走过的路……，是谁哺育我这棵嫩小的幼芽长大成才？是谁让我能在中国民族舞剧道路上从开创一直坚持到今天？又是谁使我在艺术生命面临垂危时候唤起了再生的希望？又是谁使我在今天商品经济冲击着正统艺术情况下还能坚持为艺术奉献的精神？哪儿来的毅力和恒心？哪儿来的不畏困难、中伤的胆量？哪儿来的充沛精力与坚定信念？哪儿来的这股傻劲？哪儿来的这个疯样？说一千道一万，这都是因为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老人家崇高思想，伟大胸怀、谆谆教诲、慈父般的爱心、无微不至的关怀，倾注在我周身的血液中，对敬爱周总理的崇敬与爱戴，成为我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精神支柱。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还是在我少年时代的 1955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北京舞蹈学校举办实习出演，一晚上我出演二个节目，苏联专家辅导的“滑冰舞”和舞剧“天鹅湖”中“西班牙舞”，晚会唯独这二个节目反场表演，初次登台，获得极大成功，引起各界注目，周总理亲自观看二遍。有一次演毕后在天桥剧场后台大厅，周总理接见全校参加演出的师生，周总理神采奕奕进入大厅，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突然问：“赵青来了吗？”我胆怯地站了起来，总理问我哪年来学习？多大年龄？我一一回答，他那爱怜的眼光，使我渐渐平静下来，感到父亲般的慈爱注入我全身，从此我再见总理，已是这样亲切、随便，就象见我爸爸一样松弛，无话不说。

1956 年舞校毕业后，随中国艺术团去南美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出访演出，总理前来审查节目，看毕后，上台接见大家，总理问当时艺术团副团长赵 同志：“赵青去跳什么？”赵 同志回答：“去跳西班牙舞，那些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总理和大家讲完话后就拉我一边问：“你看过松山树子来我们国家演出的《白毛女》吗？”我说：“看过！”总理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跳《白毛女》呢？”这句话，如同一盏灯照亮了我，他老人家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在南美演出阶段，看到的是外国的“天鹅湖”、“吉赛尔”，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也启迪我“为什么不搞中国的《天鹅湖》呢？”、回国后我立志从事中国民族舞剧事业，执意来到我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当时民族舞剧还只是萌芽状态，可伟人的话左右着我，坚定不移地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

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的创始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成功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一角色。该剧演出，轰动了海内外，1959 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演出，200 多人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大，完全能代表刚建国十周年伟大气魄。

大会堂宴会厅内，周总理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电影界全体文艺工作者，我与周总理坐一桌，本来不挨总理坐，总理让别人与我换了座，紧挨着总理身边坐着，总理问我：“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我说：“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后来把影片调来看了，我看

了很喜欢，看到了你们庆祝沉香百日那场戏好不热闹，我就建议国庆大典演这场戏，而且人加到 200 多大场面。”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我们每一点点成绩，就看成他自己亲生孩子取得的一样，据我所知，各行各业朋友们都和我一样能说出不少总理如何关怀他们的小故事，可见总理胸怀装着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中国几亿人口，全世界的人民，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胸怀。在他身边感到无比的幸福与幸运。在那些年，我演什么戏，拍什么电影，出国，下一步作什么，都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我庆幸在我艺术成长道路上遇到了这样伟大的理解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么年轻时候就能成为代表中国民族舞剧而有盛誉的舞蹈家之一。

1961 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 22 大，并发表了劝苏共不要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举世闻名的重要讲话。那次我院幸运地随周总理前往苏联、波兰演出舞剧《宝莲灯》、《小刀会》、《雷峰塔》，我领衔主演前二部舞剧。当时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周总理在莫斯科委托刘晓大使给我们在列宁格勒全体团员打来了长途，关照：“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当团长向全团传达时，大家纷纷感动得落泪，总理自己在困境中还这样关怀我们，后来周总理先回国，我们来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宝莲灯》，这在莫斯科大剧院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中国人的舞剧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神圣的艺术圣殿，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观看，苏联观众在大剧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万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语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周总理的耳中，归国后周总理和陈毅老总、张茜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我们舞剧团全体领导和演员，并把我父亲赵丹请来当陪客，那时正困难时期，总理直道歉，没大鱼大肉招待大家。就这样大家暖在心中。总理边吃边听我们叙说在苏演出的盛况，当我们说到苏联老百姓把米高扬比作哮天犬时，总理和陈老总开怀大笑，总理说：“看来艺术也有很大政治现实意义，以后应该多出访演出。”这一天，我感到总理不特别，先问我演刘彦昌的演员是谁？我给他介绍了付兆生同志；总理又问我演沉香的是谁，我又介绍陈云富同志，总理实在憋不住了，就直接问我：“你爱人到底是谁？”我把刘德康介绍给他，总理哈哈大笑，“我一直听说你爱人是《宝莲灯》的男主角。”我说：“以前是，演我儿子沉香，因为身体不好，换了别人演。”总理接着就问我爸爸：“听说你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啊？”我爸爸理直气壮说：“搞艺术就应该有所牺牲，尤其是搞舞蹈，”周总理说：“阿丹！你不是 20 岁就开始恋爱了吗？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呢？”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总理的话真管用，我爸爸从此倒是再也不反对我的这桩婚事了，临终时还对这位女婿非常满意。

困难时期我膝盖坏了，总理知道后，在北京饭店舞会上把夏衍公公找去，当时他是文化部副部长，还有当时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同志，大发脾气。当着那么多文艺工作者说：“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情感到十分可惜，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总理从我父亲口中知道我住的是水泥地，总理特派周巍峙同志到我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地板为我们全体舞剧团舞蹈演员盖起二幢地板地楼房。一位总理心中国家大事又有多少啊！可对一个小小演员的一点点小事却这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啊！难道不让人们感叹吗？

1963年我去日本访问演出，周总理亲自来大会堂中小礼堂审查节目，看后给大家讲了话，特别夸奖了我：“赵青，我看你跳长绸舞多少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国古代妇女含蓄内在的美表达出来了，而且表演很有层次，但你千万别骄傲！”多么恳切的教诲，永不骄傲，永远想到这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这句话我一直告诫自己一生。

要说总理和我谈话、接触，故事大多了，一时是无法写全写完的。

最后我必须告诉大家：

十年浩劫，我心全死了，艺术二字我在心中坚决抹去了，不看报、不听音乐，总之我与舞蹈一刀两断，下决心下乡当农妇，一气连生二个儿子，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堕入了深渊。有一天，大家都下放张家口劳动，我有病躺在床上准备晚几天再下去，这天清晨七点一过，工宣队庄师父（是北京二毛厂的）叩门，进来激动地告诉我，昨晚深夜二点周总理接见工宣队，问起了剧院几位老同志，其中问到了你，“赵青还能跳吗？你们在政治上要好好关心她。”顿时我的眼泪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时的感情，我这支不是文学家的笔是写不出来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从那天起，我挺起腰杆，咬紧牙关，不怕骂，不怕苦，把我已长到120多斤的中年人体型练回到96斤，功夫不仅是恢复，而是长了功，还有了飞跃，我还来到印染厂用长绸创作了“印染工人之歌”新舞蹈，由施光南作曲，受到广大工人欢迎。可“四人帮”说我是“旧瓶装新酒”，节目被扼杀了，但我不气馁，幻想有一天和郭兰英一起拿到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的病床前表演一下，但噩耗来了，周总理去世了，如同天塌了下来，郑凤荣打电话给我，“赵青，周总理去世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死去吧！”当时我比她冷静，我劝说：“死，并不是周总理希望的，我们只有战斗下去，周总理才会在九泉下放心！”

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我攻克各种难关，同行个别人的造谣中伤，少数官僚领导的不支持，商品经济的冲击，多少困难啊！没钱排戏，我就学当年武训一样四处乞求援助，没地方排戏，找各界朋友帮忙，舞台不够我施展，就打开电影电视的大门另找一番新天地，总之我一直在执著地追求，坚韧不拔地奋斗，为中国民族舞剧事业不停地奉献。

心中有着敬爱的周总理，我相信我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教诲，将永远做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为中华民族舞剧事业攀登高峰而奋斗不已。

1992年1月13日北京

爱心永留人世间

张瑞芳

—

1991年春天，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郑教授自台湾来到北京。他探亲访友的日程中，要为我母亲扫墓也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我陪他去八宝山烈士陵园。

这是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又正巧是清明节。在去八宝山骨灰堂的路上，人群络绎不绝，更显得在八宝山一角的墓葬区分外幽静。

在松柏笼罩的浓荫下，我们仁立在我母亲的墓前。我注视着石碑上端我母亲穿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白玉石碑的中间横着书写的《廉维同志之墓》六个闪着金光的大字，轻轻对郑教授说：“这墓碑是周总理题写的，他没有署名。”

郑教授献上手里的鲜花，神情非常肃穆。他可能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前，他经常在我们家里见到的慈祥伯母，会安息在革命烈士陵园里，并得到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

我体味着郑教授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涌向我心头的许多往事。站在这墓前，我在思念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齐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1943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无不景仰的周总理。他具体关心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的作风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榜样。

我望着这六个庸洒俊逸的金色的大字，许多往事带着更深的含义，强烈地激动着我。

我的母亲是1960年7月22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71岁。

我当时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住在我的妹妹和妹夫张昕、陈荒煤的家。

中央商业部为我母亲安排的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我母亲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同志；姚依林和周彬同志，吴波和邸力同志，曾双双前来吊唁。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我如同见到亲人，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我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我“嗯”了一声，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主张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永留纪念。

现在，我找出当年留在笔记本上的信稿，将这封带着时代烙印的信，原文抄录如下：

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的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您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是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枏和王拓均可。

此致

敬礼

瑞芳敬上

1960·7·26。

又：我正参加《万紫千红总是春》续集的编剧工作。现正修改第三稿，是四个人集体创作的。领导上还安排我将来做这个戏的副导演。导演仍是沈浮同志。他在文代会开过后就准备开拍这个片子。我们想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献礼。

我原来演的王彩凤，在续集里做了里弄委员会主任。戏写到公社挂牌为止。

瑞芳又及

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理的住所——西华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60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刚刚纠正了共产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喘过一口气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横扫一切”的矛头实质是对着谁？在当时我还是困惑不解的。

1976年10月，恶有恶报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我高兴地接受了北影厂《大河奔流》影片的拍摄。同时荣幸地被上海选为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8月8日，我从开封的外景地赶到北京去开会。全体“十一大”代表都住在前门饭店里。邓颖超同志就在住地接见了我们。

这还是周总理逝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小超大姐。我奔过去拥抱她，心中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落座之后，小超大姐一一询问我们全家每个成员的情况。我最后总括他说：我们全家人都受到了冲击，但是还没有人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大家都还健在。目前除陈荒煤外（他1978年才恢复工作）都宣布解放重新工作了。

小超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娘的墓还在吧？”

我有点没想到，立即回答说：“还在！”我又补充说：“我来北影拍《大河奔流》，参加过几次在八宝山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我特地转到墓地上去看过了。”

小超大姐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永安公墓就被砸掉了。”（任锐同志是烈士孙炳文的夫人，烈士孙维世的母亲。）

小超大姐说得很平静，我却震惊万分，我突然明白了“四人帮”的矛头所向……

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重庆地下党时期的组织关系是在周总理手里，“文革”期间却逼着我交代所谓叛徒和特务的罪行，并一再启发威胁说：你应当越不敢想的越应当想下去，你应当交代出爆炸性的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两年零一个月……

我明白了——我的哥哥张伯绍，抗战胜利前是国民党炮兵营长，是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话，并且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安排我的母亲从延安秘密到重庆和儿子相见，使他坚决投身于解放军，参加了平津战役，以后并在抗美援朝中任十九兵团炮兵主任，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教导，而“文革”中偏偏为此把他定为暗藏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得几乎丧生……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文革”期间还活着，就凭她是北伐军炮兵将领的遗孀，就难逃“四人帮”罗致的罪名。他们会说：象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去受苦，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从一滴海水可照见大海，从我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情况，我懂得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又从我们一家人都能从“文革”中走过来，我更深感周总理平日言传身教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小超大姐的这一句询问，也使我感到特别心酸！由此我可以想象出，周总理在最后十年里，他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如今，在春天的阳光下，我能陪同从海峡彼岸来的老朋友，站在这洁白庄严的墓前，我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纪元，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途无限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敬爱的周总理，让我站在母亲的墓前向您致敬。您对人民的伟大爱心永

远留在人世间。

1992年1月19日上海

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吕骥

提起总理，我自然要回忆起 50 年前，第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听他作形势报告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听我党主要领导同志的报告。他的鲜明的观点、科学的分析、精炼的语言。充沛的精神，一口气讲了五个多小时，中间没有间歇，既不吸烟，也仅喝过一两口水。结束时，大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说明 1000 多人被他精采的报告带出了迷雾，对国内外的军事政治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胜利的信心大为提高。

大约在听了鼓舞人心的形势报告之后，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薄一波同志的率领下，向五台山前线出发了。第二天，在行军路上，白炎（夏川）同志交给我一首词《武装保卫山西》，晚上宿营后，我就谱了曲，第二天上午，看到了白炎同志，交给了他。他回队之后，就教大家唱起来，从此，这首歌就开始在山西前后方流传开来。这首歌，可说是我们听了周副主席的激动人心的报告后的一个实际行动。

一、鲁艺有了钢琴

1941 年以前，鲁艺音乐系是没有钢琴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大后方的朋友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没有钢琴，怎么能办音乐系呢？他们不了解鲁艺音乐系不是以钢琴为基础，我们是以革命音乐为基础的，革命音乐又是以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基础的，革命音乐是需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钢琴我们是需要的，但没有钢琴，我们的音乐教育照样要进行。当然我们并不拒绝钢琴帮助我们进行工作。虽然全系师生都希望有一架钢琴，不过大家都知道，钢琴是下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抗战初期，谁会想到要捐送一架钢琴给鲁艺呢？

从 1938 年到 1940 年鲁艺是没有钢琴的，但《农村曲》产生了，《生产运动大合唱》产生了，《延安颂》产生了，《开荒》产生了，《黄河》大合唱产生了，培养了安波、郑律成、马可、李焕之、张鲁等这样一批创作领导骨干力量。

正在大家希望有架钢琴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1941 年三四月间，听说周副主席决定把一位华侨捐赠八路军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艺，这是由中央办公厅传来的消息，并说不久就会由重庆运到延安。

当这个消息传到鲁艺音乐部时，大家都欢跃起来，仿佛开了一个欢迎会。正巧，以钢琴为专业的寄明同志，也在这以前不久，从中国女大调到鲁艺来了。钢琴于 1941 年 6 月运到了。音乐部马上研究决定，这架钢琴由研究室瞿维和寄明专用。刚到音工团不久的小同志刘幼雪由寄明同志教她钢琴。瞿维同志由于有了钢琴，扩大了他的工作领域，也增加了他对于钢琴音乐的探索。大约在以后不久，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首钢琴作品《对花》。1942 年 1 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落成，鲁艺决定在新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出为祝贺郭沫若 50 诞辰而谱写的《凤凰涅槃》（郭沫若诗）这部大型声乐作品，演出时伴奏就是钢琴，由瞿维同志即兴伴奏。在这次音乐会上，张贞黻同志的大提琴表演到延安后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出现，他的独奏节目，也是有钢琴伴奏的。夏青同志的男高音独唱节目，也是钢琴伴奏。寄明同志也在这架钢琴上演出了第一次钢琴独奏音乐。总之，自从这架钢琴运到延安以后，延安开始听到了钢琴音乐，也可能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在内，都是第一次出现了有钢

琴的音乐。饮水思源，不能不想起周副主席对于延安鲁艺的关心，这也是对于发展根据地音乐艺术的关心。当时，周副主席是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之后，政治斗争既复杂又紧张，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鲁艺音乐系在他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使鲁艺师生及边区所有从事音乐工作的干部铭感于心。

二、“大后方也需要干部”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大家都知道，党领导的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镇压和限制，许多地方难以进行工作，因此，许多文艺工作者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许多人希望能到延安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以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当时，鲁艺由于学生迅速增加，各系深感师资不足。因此院部决定向周副主席求援，请他考虑选派一些干部进边区工作。院领导写了封信，并附寄各系希望聘请的人员名单。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他手中，后来，大约两三个月后，回延安的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周副主席非常关心鲁艺的工作，也了解鲁艺缺乏师资的困难。不过，他认为鲁艺需要干部，大后方也需要干部。特别是这个时候，决不能全面撤退，把大后方的工作放弃不管。将来，到一定时候，一定会介绍一些同志来延安，要我们设法克服困难，坚持一个时期。

大约一年左右以后，果然有几批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来到延安，先后来鲁艺参加工作。由此可见周副主席确实一天也没有忘记鲁艺的困难，不过，他是从党领导的文艺事业的整体出发来考虑的。根据地、大后方都在他的考虑中，他要从全面安排来决定问题。

三、延安有了音弦乐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延安鲁艺大部分人员调往东北新解放区，延安留下的音乐干部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分散在各单位。1946年2、3月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央管弦乐团，这是根据周副主席的建议，为不久将进入大城市作准备。3月间金紫光同志去北平购买了一批管弦乐器，11月李德伦同志又从上海携带一批管弦乐器来到延安。7月中旬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了，贺绿汀任团长，张贞黻任副团长，金紫光任副团长兼秘书长，指挥是由李德伦兼的。这个团在正式成立以前，已经演出过一些外国作品，这时候贺绿汀同志已经着手将内蒙古民歌森基德马改编为管弦乐作品，同时还创作了管弦乐小品《晚会》。乐团正式成立后，演出的节目除外国小型管弦乐作品外，也开始加入了我们自己的创作。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央乐团，却不知道早在40年代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已经有了中央管弦乐团，实际上，她就是中央乐团的前身。不过那时候李德伦还不是专职指挥，主要是大提琴演奏员。那时候，我们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还很少，还处在创始阶段，而党中央周副主席已经看到她将来的发展前途，在建国以后，管弦乐在整个音乐领域中将占有重要地位。她的成长，又需要较长的过程，即使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困难，也应该着手进行。所以中央管弦乐团的成立，不仅说明周副主席对于音乐领域的全面关注，也从侧面说明党中央对解放战争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已经有了充分把握。

四、第一个军乐团

1949年5月，我从沈阳调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前，我邀请各解放区部队和地方音乐方面的负责同志开过几次

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新的问题。以便在音乐界大会上介绍解放区的音乐工作情况和经验，使大家对进入城市以后将面临的新问题有所了解，以便共同合作，展开新的工作。座谈会上和会后，解放军的不少同志向我提出要建立一个专职的军乐团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必须向周副主席汇报，并且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干部会上，休息时正巧遇到周副主席，我即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有什么带政策性的问题么？”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会研究，以后再汇报。

周副主席的简单明快的回答，使我确信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果然，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大家都看到有两百人左右的大军乐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大会一开始，他们就演奏了久已振奋人心的庄严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头天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全体通过其为代国歌。据当时指挥这个军乐队的罗良同志告诉我，这个军乐队是将几个部队的军乐队集中起来组成的，但已经初具规模。到1952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建立了一个近1000人的军乐团，这是一个固定的常设机构，担负国家大典、国家重要会议、欢迎外国元首庆典等等的演出任务。

五、中西音乐比较

大约是在1960年前后的一天，一次会议后，在大会堂出大门不远的地方，我正和总理一同走向大门，这时他毫不在意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看，拿中国音乐和西欧音乐比较起来，究竟如何，虽然我整天生活在音乐中，不是西欧音乐，就是中国音乐，不是被西欧音乐所感染，就是被中国音乐所激动，但是，我却从未在理论上将两者全面加以对比，究竟谁高谁低。在他提问之下，真不知如何回答。为了不使他得到一个排外的印象，我说，在抒情上西欧音乐还是有其长处。没有想到这句话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对于自己的民族音乐重视不够，他马上回答说：“不见得吧，你说《洪湖水》不会抒情么？”当时，因为要出门的人多，他也没有想就此再展开讨论，匆忙地向外走了。我只能怀着他提出的问题，再作探索。

从他所说的几句话来看，他对于我国音乐和欧洲音乐是有过多番思考的，也可能做过多方面的比较，才会随时不在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惜后来再没有机会听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更多的意见。我也没有再向他汇报说明我的意见。应该说是各有所长，由于工具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生活不同，审美思维更是不同，确实难以在比较中得出谁高谁低的结论。

不过，在工作中确实有些人认为欧洲音乐高于我国音乐，要发展我国音乐，必须把欧洲音乐全部搬过来，才能实现。这完全是偏见，是由于他们对我国音乐缺少了解。

六、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歌剧舞剧艺术

从1949年建国以来，到1976年总理逝世之前，“文革”十年除外，17年中，音乐界的确做了不少工作，比起解放前，真是有了惊人的发展。仅仅音乐院校就多了两三倍，管弦乐队更是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一两个音乐歌舞表演团体。可以说，这在过去几乎大城市也难找到。到70年代，地方和部队，全国约有上百个专业表演团体。如要问这么多的音乐干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我国民族音乐有多少了解？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音乐干部是用欧洲音乐培养出来的，用我国民族音乐培养出来的干部只有极少一部分。大

多数音乐干部对我国民族音乐了解是不深的。

上面所讲的情况，周总理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越到后来，他越觉得不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因此向文化部提出来，除了原有的中央音乐学院之外，必须创办一所中国音乐学院。她的教学必须建立在中国音乐基础上，用中国民族音乐培养学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国音乐能有系统的了解，并且能在中国音乐基础上进行创作，能创作出中国风格的作品，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发展我国音乐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此，1964年诞生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安波，副院长是马可、关鹤童。

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仅仅有中国音乐学院还不够。在创作演出团体中，还必须建立一所创作中国风格歌剧、演出中国风格歌剧的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诞生了。它以演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歌剧舞剧作品为其特色，与中央歌剧舞剧院并行。

这是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民族的音乐的两大重要的具体措施。

七、展开“三化”讨论

多年来，周总理认为音乐舞蹈界相当普遍地存在一些重大思想问题，许多人都不很清楚。因此，在1964年1月间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虽然音乐与舞蹈问题各有不同，但都属于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有关。会后，总理和几个领导同志又交换了意见，决定在《光明日报》上，进一步展开关于“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以他看来，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深入加以思索，思想如不明确，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是相当困难的。此后，音乐舞蹈界分别展开研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讨论进行了一年多，直到1966年春才结束。

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宏观来看，革命的社会主义生活题材是最根本的问题。其次，民族风格、民族音调则是属于外部表现方面的问题，但和题材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仅抓住题材，而不在意外部形态，不一定能达到广大群众的审美要求，也难以深入到广大群众心灵中去。所以革命化、民族化是社会主义音乐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三、群众化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难解决的问题，只要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不成问题了。其实，未必如此。群众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你的作品要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喜欢，你就得抓住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题材，也要懂得广大群众共同的心理和审美趣味，这两个问题就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周总理要我们深入讨论这三大问题，希望我们对这三大问题有较深的理解，能够逐步解决这三大问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才能顺利发展，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总理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关心我们的音乐舞蹈艺术，并且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这可见他的思考多么深远！可以说，到今天，有些问题比之60年代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我们音乐舞蹈界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也是有关的某些领导部门更应该注意加强领导的方面。

周总理在60年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与发展我国的音乐艺术，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的最关键性的问题。联系到1949年夏天他问我还有什么政策问题来看，总理在6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重大措施，完全不是没有经过长期思考向文化部提出来的建议，而是经过长期调查、周密考虑才提出来的。今天，也还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再联系起建国前，他将当时八路军所得到的唯一的一架钢琴送给鲁

艺，在延安将要撤退之前，从北平买来一批管弦乐器和乐谱，又把从上海接收送给八路军的一批管弦乐器运回延安，建设根据地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从这几桩事情来看，周总理完全不是排斥西洋音乐的，他之希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措施和理论思考是十分全面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

新风霞

1949年我们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前扭着秧歌，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劳动人民翻身了！

这时我才知道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见周恩来总理是在那时的旧北京饭店的一次大会上。

刚刚解放，在我脑子里还有怕官的思想，可是周总理讲话那么和蔼可亲，这是我对共产党“官”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1949年在中南海演出“刘巧儿”。头一次在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演出，我的心情十分紧张。头一场大幕拉开，巧儿坐在窑洞炕上纺线，灯光打在窑洞中间满屋通亮，台下立即一阵热烈掌声，我被这想不到的效果吓了一跳，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故？这时，音乐大过门已经拉起来了，我该唱，“巧儿我生来手儿勤，织市纺线都认真……”可是我精神受了影响，忘了唱词，但在台上忘了词也得开口唱，这是作演员的规矩，这时我只能有调没词的哼下来了。

效果一直很好，戏散了，主持演出的负责人钟灵同志来通知我说：“凤霞别下装，去休息室，首长要接见……”我心里害怕见首长，心想一定要受批评。可是和我想的不一樣，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我都见到了，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还表扬说：“不错，很好。在北京舞台上看到了延安的窑洞十分亲切……”毛主席说：“唱得不错，好听，可是一开场几句听不清楚……”我心里想，听不清楚是因为我把那几句唱词忘了。周总理亲切耐心地问我：“你会纺线吗？”我摇摇头说：“不会，也没有看见过纺线。”周总理热情地比画着做出一手摇纺线车，一手送线，一高一低地纺线的样子。朱老总指着周总理对我说：“总理可是纺线的能手呢！哈哈。”大伙都笑了。总理说：“上了线才能摇起纺车来。你手里拿着棉花不上线，老摇纺车不对……”从此我知道了左手上线，右手摇纺车。这次接见，我对首长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这样一个小演员，中央首长那么关怀，特别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纺线的动作，边说边做上线的示范给我看，还让我身子随着转动的纺车动。“你身子不动，手老摇，哪里是纺线哪？”从此，再演这场戏纺线的动作就对了。

我和祖光结婚时，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客人很多，祖光的客人都是文艺界的作家、导演、演员们，郭沫若是证婚人，阳翰笙是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是女方主婚人，老舍先生是介绍人。还有金山、张瑞芳、上海赶来的赵丹、黄宗英夫妇等人。我的朋友大都是戏曲界的，有京剧演员，有评剧演员，有天桥说书的，有天桥“赛活驴”关得俊、关金凤两口子，有算命的、耍把戏的、卖老豆腐的，这个婚礼很热闹。周总理叫人打来电话说要来看看很多老朋友。由于场面很大，保卫人员提出人太多很复杂不好保卫……半小时以后，又来电话，总理临时有重要外事活动不能来了。大家反而放心了。

我们婚后不久，接到周总理约我们三对夫妇去他家里吃饭，有老舍、曹禹和祖光与各自的夫人。我印象中邓大姐非常贤慧，她以主妇身份热情地招待我们：“恩来喜欢热闹，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大伙说：“总理现在不是当年，太忙了。”邓大姐说，“是，可是跟文艺界朋友一起他就

是休息……”

这一次，总理对我们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对老舍先生说：“你做的大媒很好，这一对很美满。凤霞是民间艺人贫苦出身，祖光了解生活中的民间艺人也很好；凤霞需要文化，能得到祖光的帮助，凤霞应当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戏曲演员……”

我在总理家吃饭，看到我们国家的总理用餐只是四盘菜一碗汤，简单清淡，十分俭朴。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也没有感到是国家的领导人，而象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辈。饭后邓大姐亲自安排把我们三对夫妇送回，总理和邓大姐送到门口。至今总理那慈祥的微笑仍历历在目！

记得不久在中南海小礼堂演出祖光的新编剧本《牛郎织女》，总理和陈老总上台接见我们，陈老总说：“牛郎哥哥出门做生意唱：我出门作买卖忘了带本钱……”总理说：“这是吴祖光的词！”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总理同演群众的演员一一握手，大家都深受感动。我们先后在中南海演过七八场《刘巧儿》、《牛郎织女》、《春香传》。

总理看我的戏看得很细心，有时指出“咬字不清啊！乐队声音太噪哇！”演《春香传》因为景片太多换景闭幕时间很长，总理让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你们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总理的细心和关心使大家十分感动！有一次演出《牛郎织女》演到很晚了，总理让给每人加一合点心。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大伙儿别忙着下装，吃了点心再走。”

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在评奖时有很多争论，给我评了个四等奖，我因在全国演员中还算年纪最轻的，当然也没有人替我争。田汉同志来告诉我：“总理看了名单提出：新风霞的《刘巧儿》唱得全国人喜欢，应评一等奖。”这才改了一等奖。周总理管国家大事这么忙，对我这样一个演员这样关心，真叫人感激呀！

1959年我们剧院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排出《金沙江畔》，我演藏族土司女儿珠玛，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招待班禅，请领导审查，周总理和北京市的领导吴晗、王昆仑都来了。当时因为我1957年被划了右派，带着右派帽子，虽然需要我演，但报上没有我的名字。在谢幕时我虽是主演之一，但不能站在第一排，要站第三排。戏散了，总理和大家都上台来接见演员。我们第一次谢幕是全体，第二次拉开幕三排演员下去，再拉开幕第二排下去。最后只剩下几个主演。总理上台说：“珠玛哪？班禅来了，怎么珠玛不在？”大家都慌了，我已习惯地下场脱了服装了。领导陈某某飞跑地来叫我，还摔了一跤，来后台说：“…决……凤霞快穿上服装……总理在找主演……快！”我赶紧穿上藏族大袍，她拉我又跑到台上，总理作生气的样：“你这个珠玛！太不懂礼貌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班禅双手台抱胸前打佛礼，我对着班禅深深的行了一个鞠躬礼说：“对不起了！”我又鞠了一个躬。“以后要懂点礼貌吧！”自从总理这样说后，谢幕时把我提到前排了。最后也和小白玉霜一起谢到最后了。赵连喜、赵丽蓉兄妹对我说：“这个双主演是周总理给你争出来的……”

1957年我因受丈夫吴祖光牵连，领导逼我离婚“划清界线”。我想到祖光没有反党的心，全是为党好；但他不被党理解，我可不能不理解他，因此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那日子真苦啊！丈夫被送到北大荒，我上有公婆，下有三个孩子，大的还没上小学，小的刚刚满月。台上唱戏，台下还得劳动改造。记得有人向我们的团长胖子领导陈某某汇报，说我在排演场打毛线，

狠狠批斗我。还批我给祖光寄了一个木盒子，为右派丈夫寄吃的，困难时期说这是“犯罪”，我心里好难受。寄木盒也是为了让他在北大荒好好劳动，能早日回来。但没想到批斗了我三个小时。

因为我怕受冤，丈夫走后我就搬到剧院集体宿舍住，劳动、演出也都方便，出入都有交待，一言一行都让人知道，我怕再有人暗害我。

有一天晚上快12点了，白天挨批斗，晚上演完戏，回来我正在听新闻，门外有脚步声，又在叫：“新风霞！”是胖领导陈某某，我开开门，她进门就说：“我来有件事，你改造得好，明天给你摘掉右派帽子，你赶快写一个要求摘帽子的报告。”我心里不明白什么报告，我说：“我不会写，你替我写吧！”她说：“就写要求给你摘右派帽子，还不会？”我真害怕她，点头说：“行……我写，明天一定交。”她说：“八点钟！”第二天八点钟交了报告，九点在会议室开会，党委书记薛恩厚宣布：“新风霞劳动改造得好，宣布摘掉右派帽子，降的级也恢复。”就在1959年9月20日我不是右派了。

下午我们剧院的灯光设计苏丹来了，他对我说：“凤霞，你知道谁给你摘掉右派帽子的吗？”我说：“陈某某。他昨天深夜找我说我改造得好，真奇怪了，上午还主持批斗我，说我给吴祖光寄一盒食品是犯罪呢，晚上又说改造好了。苏丹小声说：“是……是总理！”啊！我心里轰的一下子，又不理解，怎么是总理哪？苏丹说：“我们解放前，抗战时期在四川，总理跟文艺界都很熟，祖光也在，我那时也是负责舞台工作。总理昨天去人艺看戏，我爱人杨蔽在人艺。总理还是老习惯，看完戏跟演员见见。在休息大厅总理看见我，问：‘苏丹你在哪里呢？’我说：‘在中国评剧院。’总理问：‘你怎么搞评剧了？’我说：‘是新风霞把我拉进评剧院的。’……总理就问：‘吴祖光哪？’我说：‘已去了北大荒。’总理又问：‘新风霞哪？’我说：‘新风霞也被戴了右派帽子，真可怜哪！……’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新风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们了解。你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院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摘去帽子，去了处分……，’我听得呆了。苏丹又说：“我连夜找了院党委书记薛，薛又立即通知院长陈某某，她连夜找你。看，这一下子都解决了。”果然市文化局也来了人找我谈话，说“总理很关心你。”并说：“应当关心吴祖光，新风霞……摘掉右派帽子。”

1964年我随团去云南演出。总理和陈老总访问非洲回来，知道我们评剧团也在昆明。总理只在云南一天，但晚上要看我们的戏。记得在原龙云公馆大剧场演出《会计姑娘》，我演会计李秀英。省长阎红彦、副省长赵增义和文化界各领导都陪总理、陈老总来看戏。戏中有段唱是会计李秀英劝犯了错误的干部钱小满：“小满哥，你是咱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村人，你伤了党的心，寒了乡亲们的心；贪污腐化忘了根本，你忘了为人民办事暖人心；你是共产党员应自重，可不能用手中的权坑害人民；当干部克己为公是党性，团结关怀百姓乡民。我劝你早日回头早干净，掉入浑水越陷越深；你是干部、人民的公仆，你不是人民头上一尊神；亲人痛仇人快六亲不认，你给党带来脏水一身；良药苦口你听不进，这是我心里话是真亲。贪污腐败了名声丧尽，小满哥呀，你该早回头早认错，早日革面洗心。”这段唱是轻松说唱板式，最后甩高腔达到高潮。总理拍手，立即满场热烈拍手。钱小满叫会计秀英报一笔不应报的帐有一段对话，小满说，“你报不报？”秀英说：“不报！我当会计是乡亲给我的信任。这把钥匙是人民的，应报必报，不应报一分我也不报！”小满说：“我是你小满哥呀？”秀英说：“你是我娘也不行！”总理坐在前

边立即拍手，全场又热烈拍手。看完戏总理上台接见，握住我的手说：“好，女会计说得对。是把住国家财经大门的当家人。唱得也好，有进步……”

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习惯了一切事不抢先，吃饭时候在后头和舞台工作人员一桌，总理和陈老总问我们领导，“新风霞哪？”我们领导陈某某张口结舌不好回答。总理说：“快，叫她来……”领导亲自从饭桌把我叫到总理桌前，总理亲切的关怀是理解我的心情啊！总理问，“吴祖光怎么样？”我说：“他很好，在写剧本……”。总理还说：“看了《会计姑娘》，这出戏不错，应该让会计们都看看。”

我们回北京不久，李先念同志来前门外鲜鱼口大众剧场看我演的《会计姑娘》，那天效果也是非常好，散戏后先念同志上台接见我们。记得先念同志穿的是中式小棉袄，中式大盖棉鞋，在台上跟我们讲活非常亲切随便，他说：“总理介绍我来看这出戏的。我是管理经济的，应当看看这个负责的好会计。总理说，会计是国家把住经济大门钥匙的管家人。我建议当会计的都应当看看这出戏。”这时正是在开全国财经代表会议，我们为会议演了三个月近百场。每次演完在场的领导人就说：“这是总理说的，会计是把住钥匙看住财经大门的当家人。”

总理喜欢文艺，关心戏剧事业，爱看南方戏也爱看北方戏。记得总理看了我演的《临江驿》提出：“评剧是用普通话唱，很好听，字字清楚。为什么念白要上音呢？应当统一好些。”总理在解放初期知道我们在小礼堂演全部《玉堂春》，告诉钟灵：“不要从嫖院起，只演‘起解会审’就行了，太长了演员太累，看戏的也累。后头‘会审’也都唱出前边‘嫖院’事了……”。总理真是内行，他总是从关心人提出自己的看法。

记得1963年我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花为媒》回来，总理来看戏，散了戏看乐池，指示说：“你们唱戏是给观众听的。看看你们这个乐池子满是乐器，把演员和观众隔开不能交流，又听不见，乐队还是搬上舞台去，是咱们民族习惯……”从此乐队又上了台，观众也反映很好。后来传说乐队在乐池子里是江青的主张，因为乐队无限扩大，台上摆不开。

1958年统战部长徐冰同志来我家看我和老人孩子，那时祖光已去北大荒了。徐冰同志给了孩子一盒糖。他说：“我来看看是总理的指示，以朋友的情分应当去看看新风霞，问问吴祖光可有信？他有什么困难……”总理好细心。当时我婆婆抱着孙女流了泪，我的眼睛也湿了。

总理对我们的感情一生也难忘啊！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死的、自杀的死了多少人啊！我的命是总理救的。北京市8月26日“打全堂。”我们中国评剧院是打人出了名的单位，因为1958年招了一批学员，他们正是十七八岁不懂事的青年，打人过瘾。刘敏庚条件不好，当时在学员班不被老师喜欢，我建议调来我们一团，为了培养他，我演李三娘，让他演小王试试看，可是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人红了眼，所谓的走资派，主演什么“牛鬼蛇神”的他打得最凶，八·二六“打全堂”我被打得血沾在衣服上，一个星期都脱不下来。

另一打人黑手张连喜，他打人都是在星期六，剧院大部分人都回家了，他偷偷地打人，一次他抓住我狠狠地打，打得我口鼻出血。

天安门红海洋，首长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后我被造反小将赵甲申叫去关在牛棚。宣布：“没有革委会领导的话，不许随便抓出新风霞批斗打骂。”

在这之前，剧院里的、剧院外边的红卫兵只要带着红袖章就可随便把我

抓出打骂批斗。自从赵甲中宣布了这一规定，我虽被关押牛棚，心里安定多了，不再随时挨打了，赵甲申这青年人是我选进剧院的。人很聪明，他在乐队学拉大弦，在我关押时，他看见我常常小声说句安慰我的话：“我等着您上台，我给您拉弦……”现在他是我们剧院很好的拉大弦的琴师。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也被迫害成了残疾。甲申来看我说：“新老师，您知道1967年把您关起来是谁保护了您吗？”我说：“不知道。不过，要不是你保护我，怕是也得像小白玉霜一样活不到今天了……”赵甲申说：“不……我哪敢保您哪。是总理！在天安门红海洋接见红卫兵，不是各个单位打着自己单位的门旗吗？周总理看见咱们中国评剧院的门旗问：‘中国评剧团的负责人来了吗？’我是负责人，赶快跑过去见总理。总理头一句话问：‘你们评剧院演员怎么样？’我说：‘小白玉霜自杀了。’总理立刻满面怒气，把我吓坏了。又问：‘新风霞哪？’我赶快说：‘活着活着……’总理有点生气说，‘新风霞贫苦出身，我们了解她，你们要注意她的安全……’听了总理的话就把你安排在后院小过道那间房子里，虽然形式锁上了门，那是把你放在保险柜里了……”说着，赵甲申看看我在擦眼泪就说：“老师你别难过了。总算你还能看见‘四人帮’倒了台……”我说，“我这条腿膝盖被打伤，叫我跪搓板，我不跪，用棍子打的。他们的罪恶，今天报应了。”

“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时间地迫害我，让我在30多米深的地下挖防空洞达七年之久。我患高血压不许休息，1975年12月交了医生开的休息两周的假条也不许休息，通知去平谷乡下劳动。我背起行李下楼时摔倒，患了脑血管病，从此成了残疾。

1976年我在河南洛阳空军医院治病，听到总理去世的不幸消息。哎哟！天要塌了！总理可不能走啊！他救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呀！好总理不在了，多少人悲伤啊！医院全体医务人员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举行了追悼会，很多老红军来向总理的遗像告别！

我因哭得太伤心，血压又高了，影响了睡眠，多少日子都觉得无依无靠，头脑里空空荡荡的。

“四人帮”被粉碎大快人心！第一个春节邓大姐在曹禺同志的陪同下来和戏剧界文艺界朋友见面，邓大姐亲切地问我：“凤霞你好吗？”我说：“不好，走路不方便了。”儿子把我背到大姐身边坐下。我看见邓大姐不禁想起总理，流了泪。大姐给我擦着泪亲切他说：“眼泪不能革命！要有勇气，过去的人没有办完的事，活着的人接过来……”

很多演员有唱有说的，都是为了“四人帮”倒台而欢乐，为邓大姐来祝同，我也唱了几句：

喜得是一举粉碎“四人帮”，
文艺界团结欢乐聚一堂，
我们记住总理的教导努力向上，
祝愿敬爱的邓大姐身体永远健康！

这使我回想起1965年在中南海小礼堂演越南题材的新编评剧《阮文追》。我演潘氏娟，这个戏我创了轻板、散板唱段，利用自己真头发造形，跪搓步翻身，表现她坚真不屈的性格。

总理陪同越南范文同看戏，散戏后总理和范文同上台后说：“戏演得好，又有新的唱腔，好极了……”

第二天通知：总理要我们《阮文追》剧组主演、导演、编剧等去吃饭，

由院长薛恩原领着我们去了中南海，范文同和总理表扬了我们演越南戏演的比越南演员还好……总理说：“新凤霞演中国的刘巧儿、朝鲜的春香、越南的潘氏娟，都有创新。这次又上一层楼，特别是用头发创造的形象更显出人物的个性，东方女性的美和坚贞……希望再看到新凤霞创造的更多坚贞女性的形象……”

真没有想到，这出《阮文追》演出后就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了，我被害致残，也是我最后在舞台创造的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了，从此再没有上台演戏的机会了。总理也去世了！但一个人坚持真诚，是最重要的。我虽不能上台演戏了，但总理对我的教导，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是我永不忘记的。如今我认字了，还能写些小文章。从 1980 年出版我的第一本回忆录，如今已写了 300 万字的文章，出了 13 本书，有的译成英文，乌尔都文。多少次运动都整了我，运动了我。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西单墙、王府井……大帽子扣的数不过来，但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批我品质不好的。批倒、批臭却是越批越香，越得到好人的同情。我还是要：台上作戏，台下做人，台上作戏讲戏法，台下做人讲人格。做个新时代真正的戏曲演员来纪念总理吧！

做人的楷模革命者的典范

李光羲

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不平凡的政治家、国务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还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象是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专家，文艺界许多同志都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怀念他。

解放初期，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请来苏联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请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不久，周总理来看演出。我在台上被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吸引住了，但二幕以后再也没看到他。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祝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是为了了解剧场的结构、声音效果（当时是不用电声扩大的），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等。

60年代初，周总理邀请十位女高音一起演唱（其中除专家学生外，还有张权、张家馨、梁美珍、徐有光等），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研究声乐上的土洋结合等问题。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我常被国务院请去参加周总理宴请国宾时的演出。记得一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张彦同志告诉我，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我唱了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60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号召大家学习。我们剧院也排演了《洪》剧，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1964年国庆节，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指示要挑选最优秀的舞台演员，从现场演出到拍电影，各个角色都统一由一个演员担任，不要别人配音。在排练过程中，他常请老师、老将、副总理等几十位领导到现场观看、提意见，终于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东方红》于1965年拍成电影。记得8月的一天在北京饭店录“松花江上”，周总理突然到场，是抽空来看看大家，身边只带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严良堃、演唱者张满燕和我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啊”好，还是“同胞啊”更积极？和我们商量，使大家深受感动。

1957年以后，张权调离北京，去了北大荒。1962年，一次北京饭店的晚会上，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了，还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张执一同志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我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并向总理表示歉意。总理当场批评了张执一，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尤其令大家感动和惊异的是、他能记住并叫出许许多多演员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过去只见过一次面，以总理的地位、国内外的影响，他深知凡与他见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纪念的愿望，我曾多次看到周总理主动建议请客人一起合影留

念，每当此刻，总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文革”开始后，江青大搞宗派活动，拉帮结伙，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1969年，周总理为了保护文艺队伍，指示所有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的人员，离开北京，下放到北京军区各部队，边学习、边劳动。1972年秋天，周总理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过50岁生日，按照亲王的愿望，请中国的歌唱家演唱亲王自己写的歌曲，举办一场“祝寿音乐会”。由于亲王特别提出“不要那种闹哄哄的演唱，要抒情优美的”，周总理就把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和音乐学院的一些歌唱家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当晚周总理和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都出席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江青始终板着脸。音乐会后，我们这些曾被“文革”赶下舞台的演员，又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电台也敢约我们录音了。这使得江青一伙人十分恼火，他们把我们的演唱说成是“黑线”回潮，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借“批林批孔批周公”把迫害矛头指向周总理，直到周总理逝世。1976年1月，全国上下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周总理，文艺界有那么多人泪如泉涌，不少同志一天天地仁立在北京医院附近的街上，希望能有机会瞻仰总理遗容，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在周总理生前，我曾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感受到他的关怀、培养与信任。总理的学识、修养、人品、威望以及受到包括国际友人在内各行各业人士的崇敬，是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的，尤其是他那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成为我们的楷模，文艺界同志不会忘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并将继续跟随着他的足迹，献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永远地走下去。

清风亮节

李準

(一)

大约是 1956 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个小型作家座谈会。五六十年代，总理经常召开一些小范围的座谈会，征询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有时三五人，有时十几人不等。

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因为当时的稿酬偏低，作家们有些意见，而文化部又要取消印数稿酬，所以周总理请了十几个作家来座谈，作一些调查研究。

参加会的作家我记得有郭老、老舍先生、曹禹同志，还有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同志。约摸有十几位。大约因我也是一种类型，属于青年作家，也通知让我参加座谈。

大家陆续来到，周总理很平易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本来很紧张的我，顿时感到如坐春风。正在这时候，周扬同志进来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学艺术。曹禹同志在门口沙发上坐。看到周扬同志进来，曹禹同志稍微起身让了个座。

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不料被周总理看见了，待周扬同志坐定后，周总理温和他说：“曹禹同志，你是作家，作家是为民者清，我们是当官的，为官者俗，周扬来了，你就赶快起身让坐，可见也不太清嘛！”

当时听了这一席话，在座的作家虽然鸦雀无声，但是内心无不激动万分。我当时 28 岁，看到总理这种高尚的风范，觉得我是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一直到今天鬓发皆白，仍然不敢忘记。

稍作沉吟，总理又微笑着说：“曹禹同志，我今天这样批评你，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偷眼看看曹禹同志，他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月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得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 65 元，有三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按当时的物价，每月要 300 元左右，当时 10 个人去吃烤鸭，一顿也不过 12 元左右，所以大家都十分欢欣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好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说话间，到了中午时分。总理又说，“大家今天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们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菜，请大家吃包子。”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那一顿包子的味道好极了。因为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以以温”。

(二)

1962年春天，电影《李双双》刚拍摄完成，张瑞芳同志来到我住的宾馆说：“不要抱太大希望，大概还过得去。”说话时脸上还有一丝忧郁。她走后，我体会到她大约是怕我企望过高，看后反而会失望。另外这是她的谦虚，她不爱说过头话，话虽这么说，心中毕竟有些牵挂。

到了5月份，全国公开上映，大出我的意外，受到全国观众热烈的欢迎。就在这时候，瑞芳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李準，我告诉你，周总理看了《李双双》了，非常喜欢，那天总理还请我在他家吃了饭，总理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在吃饭间，总理又告诉我说：‘李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总理那么忙，居然连我的小说也看了，特别是总理审美的品位，太令人感动了。一部黑白拷贝影片，只投资了那么一点钱。布景荒村茅屋，服装荆钗布裙，但总理却能于风尘中看出它的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

同时，我体会到总理是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他那“高屋建瓴”的风格，真知灼见的识见，不受任何舆论所左右，特别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他大力提倡，不遗余力，但他还严格的把握着艺术关，单有政治，没有艺术，他决不随便肯定。

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五项奖。

“百花奖”领奖时，当时我在河南信阳于家村搞社教。我是真想去北京领奖，倒不是想参加那个热闹场面，也不是想去领我那块“最佳编剧奖”之牌，主要是想看总理一眼，好多年没有看到总理了……

因为社教工作刚开始，工作团的领导劝我请假。我请假了，那天晚上我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听了广播……总理出来了，我好象看到了总理……也好象总理看到了在一团茅草上躺着的我……

1992年1月2日北京

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水华、于蓝

1964年12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有些领导同志看过后，都给以赞扬和鼓励，林默涵、周扬两位同志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但，12月下旬某天，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厂里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同志（厂长汪洋当时已经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受到批评而开始靠边站了）和导演张水华以及演员于蓝陪同观看。厂内尚有有关宣传人员具体安排这项工作，地点在新街口北大街，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

听说江青要来看片，大家知道她是30年代的老演员，50年代初又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因她的身份，大家一直很尊重她，所以对于她的到来，大家是真诚而又认真地愿意倾听她的指教。在热情的等待中，江青身着一件黑色斗篷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迎来的是这样的冷漠和有责怪意味的语气，不理解她话里的究竟，顿时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她坐下看片了，经常带有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这本是一个工作样片，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在“混录”时肯定要加以调整的，她是一个老电影工作者当然是会知道的。一会儿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令人感到不安，气氛有些紧张。看到中间，她说要休息一会儿，暂停审看。她身着斗篷到院里去散步，走来走去，我们跟着她，准备倾听她的指教，她却一言不发，只是走来走去，既冷漠又高傲，气氛十分紧张。

看完影片，大家围坐在她的前边，平心静气，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第一句话，冷冷他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已调往四川，夏衍同志已受到批判靠边站了，指的是他俩？党内的同志为什么要讲成“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令人感到异常！她为什么要这么强烈地责备？这么对立的情绪！话中有内含却又不明说！是说他们对革命题材不重视，还是其他？真令人不解，大家心里非常纳闷，气氛沉重极了！

大家沉默着，聆听着，等待着。江青停顿一阵开口了，她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象桌椅板凳做好以后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又停顿有顷接着说：“也不要象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大家批判嘛！……发行公司也可以赚一点钱嘛！……”

真是晴天霹雳！大家懵了，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还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吗？！没有！就是要批判！”“不准改！”“不准收起来！”“要大家批判！”问题真是严重极了！只有等着批判！到底批判什么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错在那儿？大家更是不知道。痛苦、苦闷笼罩着我们！大家想小改一下，也可以少受点批评呀！这只是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按工作程序，还要仔细剪接调整呀！甚至她对演员不满意，也还可以调整呀！可是她却说不让改要批判！厂里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在苦痛中熬煎。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沙滩（中宣部办公地址），见到周扬同志，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给我们一点办法。他知道我们希望做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他说影片可以适当地作些修改，但剧本不要再改了，

后来，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慢慢他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也是当时已得到普遍好评的影片……”继之，他思索了一下，并不十分顺畅他说：“……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我们并不十分明了，为什么要批一些已经得到好评的影片呢？！只感觉到他是尽力宽慰我们，但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那天，他尽量未流露什么信息，但也使我们感到他并不平静。

几天以来，我们心神不安，这里边有什么政治性的原因吗？（当然我们做梦也难以想到以后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竟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再说中宣部、文化部都不认为是坏片子，而江青却认为要批判，而且态度那么严重！要批判什么呢？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十分十分苦恼！

就在这苦恼万分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时机，我遇到了许明同志（周总理的秘书）。她十分兴奋地问我：“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马上告诉她，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她听后十分惊讶。我请求她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她点头应允了！

敬爱的周总理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听到了我们的困惑和要求，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敬爱的邓大姐也和周总理一起来到了钓鱼台，准备审看《烈火中永生》双片。那天，由于机器有故障，画面跳动，影响视力和新片效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周总理来到了原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那一天到场的还有文化部的许多领导，象管电影的赵辛初副部长，电影局李榕局长等等。都是周总理邀请同来审看的！邓颖超同志因身体关系未来。这次审看与江青看片同是一个地点，但是气氛却完全不同，周总理向在场的同志一一打了招呼，平易近人，亲切安详，大家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关系自然，有轻松愉快感。

看片开始，影片字幕中编剧写的是“周浩”，周总理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诉他这是笔名。周总理对电影的创作干部还是十分熟悉的，这个名未听过，所以十分关心，这是总理一贯关心新人的态度。看到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竟自言自语他说：“很感人嘛！”周总理看片时的反应，给人消除了紧张，有安定感！和江青看片全然不同，他不是挑剔，如有不足，他总给以积极的建议。他并不回避江青已有批评，该肯定的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看完双片，总理认真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除了这些意见，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看的人不少吧？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发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大意）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亲耳听到了日本人的意见，就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日本代表团团长说：“象《早春二月》拍得很好，但日本有很多这类影片。而此片（即“烈”片）在日本是没有的。影片告诉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部好影片，我们很喜欢！”（大意）也有人汇报了日本代表团的作家井手雅人等当夜就给日本国内打电话，说看了一部好片子。总理听后点点头，又向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他不是那样武断，定调子，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允许大家讨论后拿出意见。他又问赵辛初：“文化部有什么意见？（此时文化部已换成肖望东、石西民、赵辛初等部长）。今天是14日，最好两三天内

就把意见拿出来！”在讨论过程中还研究了影片该叫什么名字，（《烈火中永生》还是周总理后来帮助定下的片名。）又对影片中许、江一拉出监狱，画面就转到迎接解放军的场面，总理说：“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出：‘共产主义万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这时，我们又担心他说：“赵丹已经回到上海了，怎么办？”周总理说：“打电话叫他来嘛！”其时，赵丹已在上海受到批判（批判 30 年代），抬不起头来！周总理说可以叫赵丹来补戏，是对赵丹的关心，同时也是帮助解决赵丹的银幕形象可以更好些！多么细微的关怀呀！总理还说：“今年上映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节振国》……”意思是说这些影片都不错！给电影工作以极大的鼓舞！临别时，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笑着对我们说：“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周总理的到来，和江青多么不同呀！总理坚持组织原则，不独断专行，允许大家讨论，让大家拿出他们对影片的意见，同时又是多么鲜明地保护对人民有益的影片呀！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烈》片经过一部分修改，1965 年夏终于上映了，而且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当扮演江姐的于蓝到山西南柳去劳动，路经太原市时，受到了少年宫少先队员的热烈欢迎。1966 年 3、4 月间，此片还要送到日本，又遭到江青的阻拦。但，中宣部因此片受到周总理的关怀，还是坚持把影片送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观众极大重视。……这一切都说明影片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因而在当时并没有达到江青所希望的那样——“大家都来批判”的目的。

然而，1966 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建国以后 17 年的一切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说“文艺黑线”是又粗又长（从 30 年代左翼文联批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烈火中永生》当然不能逃脱厄运，也受到了批判。1966 年所谓的“造反派”揭发“文艺黑线”的材料中，就公布了 1965 年 11 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批判了的众多部优秀影片，都列为毒草。其中就有《烈火中永生》一例。说《烈》片等大毒草，是为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翻案，是把华莹山的斗争说成城市领导了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等等。总之，说《烈》片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不难看出 1964 年 12 月下旬江青去责难《烈》片的用意所在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捍卫者，在 1964 年（“文革”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了，他毫不回避，勇敢捍卫人民的利益，他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他的心和人民连在一起，他的感受与爱好是和人民一致的！他要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受到人民欢迎的文艺作品！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烈》片完成至今已有近 30 个年头了，它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节教育了几代人！演员都因此片受到人民过厚的爱戴！这部影片是整个摄制组在革命先烈精神感召下刻苦努力的结果。（当然不是说它已十全十美了！）同时，这部影片更凝聚了敬爱的周总理所给予的关怀与扶持！周总理不只是对这一部影片如此爱护，可以说“文革”前，50 年代，60 年代，许多优秀影片都得到了周总理思想光辉的辐照！建国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周总理的汗水和爱抚！

把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

邵宇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整整 16 个年头了。可是，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时刻展现在我的面前，特别是周总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创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支新的文艺大军的成长，始终给予满腔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 1949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我当时作为一名业余美术工作者来北京出席大会。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步入怀仁堂休息厅休息，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纷纷拥上前请主席签字，我和丁聪也挤上去想请毛主席在自己的本子上签上名字。这时，周总理走到我们身边，对我们和蔼他说：毛主席太累了，能不能下次有机会再签。事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时，总忘不了周总理那带着微笑的面容和他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的感情。

约在第二年的下半年，我已调北京工作。一次我听周恩来总理给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做报告，地点好象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还不知疲倦地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饺子。当时，我有幸和周总理共一餐桌，心里兴奋极了。周总理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东北人，总理语重心长他说：“现在东北解放了，你真的‘打回老家去了’。你们文艺工作者要始终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的教导至今我记忆犹新。

1950 年我在新闻总署（新闻出版署前身）新闻摄影局任党组书记。当时的局长是萨空了，米丹同志任秘书长。1951 年新闻总署决定成立美术出版社，组织上让我们筹建此项工作，当时，我们一起商量，成立美术出版社由谁题写社牌呢，最后一致意见请周总理题写。经向总理提出后，没过几日，周总理果真为美术出版社题写了社牌。自美术出版社成立一直沿用到今日。现在周总理题写的社牌手迹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出版物荣获过多次国际上的金、银、铜奖，其中《苏加诺藏画集》荣获国际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出版《苏加诺藏画集》是在周总理主持指示下进行的。

周总理在参加万隆会议之后，有一天，他请廖承志同志把我找到中南海。廖承志同志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让我组织一个代表团，并任团长，到印尼去筹备出版苏加诺藏画集。当时会的还有安静、姜信之等四人。临行前，陈毅同志又向我们谈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及注意事项等。我们带着总理的委托前后三赴印尼，共编辑出版了六册苏加诺藏画集。此画集作为国礼由总理赠送给了苏加诺。此后，我还作为周总理的使者，到印尼把一尊木雕佛像赠送给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苏加诺访问中国，他来到荣宝斋参观，对一尊木雕佛像很感兴趣。这事总理知道了，立即请陈毅、廖承志向我询问此木雕的真伪。我讲，佛像是复制的，但木头是唐朝的。后来总理指示，再复制一尊，把那尊送给苏加诺。于是我们请民间艺人颜景文老先生照原样又复制了一尊。当时在美帝对我封锁与孤立的情况下，总理的这些外交活动都大大地改善了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周总理对国内的老画家十分关心。有一次参观完齐白石先生的画展，周总理对我说，“这个展览很好，为把这些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应该出版

一些老画家的画册，像齐白石、徐悲鸿等人。”按总理的指示，我负责编审稿件，卢光照同志编辑，先后出版了齐白石画册上、中、下册和徐悲鸿的三本画册以及一些老画家的作品。

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艺术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迫害老干部，不少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老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送进监狱或批斗。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但他尽力排除阻力，设法保护干部“过关”，周总理对我的关心我终生不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一次，造反派来通知，要我立即回京。我回京后从几位老同志和张论同志处得知，是周总理把我“解放”了。原来，在我国同第一个北美国家加拿大建交后，由我们接收台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的展览馆，并主办展览。他们告诉我，在周总理同对外文委负责人谈到这个展览应为美术方面的展览时，问到：“搞苏加诺藏画集的邵宇哪去了？”叫他带团去加拿大，有人说：“听说他是叛徒？”总理说：“对他我们早已审查过了，他没问题嘛……”我知道此事后心情非常激动，周总理不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是最爱护干部、最尊重人的总理。

1975年9月30日，我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当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依然坚毅不屈的周总理步入大厅时，会场沸腾起来，雷鸣般的掌声不断地打断他的祝词，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花，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用最快的速度画下了周总理做报告的场面。

人民大会堂由傅抱石和关山月画的“江山多娇”那幅画，是经过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帮助构思并多次提出对草稿的修改意见而最后完成的，这幅画现在已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走向光明未来的象征。

如今，周总理去世已经16年了，为缅怀总理，我曾画了一支通红的蜡烛，题为“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磊落始终”。

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一帧定格在心中的合影

李谷一

那是 1965 年，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中南五省举办了现代戏剧汇演。为了向国庆献礼，9 月，中南局特意选了 16 个获奖的剧目晋京向首都人民汇报演出，作为获奖的湖南花鼓戏《补锅》的女主角，当时不满 20 岁的我也有幸来到北京。

来京后，我们住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煤炭部招待所里，最初是在长安戏院演，后来又转到青艺剧场，一连十几天，演出效果非常好。首都各大报纸都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许多在京的文艺团体还纷纷前来学戏，而学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补锅》。

就在国庆节前夕，中南局的负责同志选定了 3 个戏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我记得一个是陶铸同志家乡的祁剧《送粮》，还有一个是《打铜锣》，我们的《补锅》作为压轴戏排在最后。

晚上 7 点整，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进行。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都是按时来到剧场。演出开始后，在前两个戏的表演中间，周总理有两次被秘书请到场外去接电话。接着，有消息传到后台，说总理接到电话，催他赶快回去，有重要事情等他处理，估计要提前退场，最后一个戏可能看不成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补锅》剧组的演员，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心想，真不该把我们的戏放在最后，别的戏总理都看了，偏偏看不到我们的戏了，这可怎么办呢？此后，又从前台传过话来，说总理又一次被叫走了。听到这里，我委屈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正当我们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中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我们中间，说：“请大家别着急，总理说了，今天的戏他一定看完，但我想恐怕不能上台接见大家了。”这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轮到我们的《补锅》上场了。我从台上清楚地看见周总理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们表演。在我们演出时，总理再也没离开座位，自始至终看完了《补锅》。演完戏我们刚回到侧幕，就见舞台监督匆忙地跑过来催促大家：“快！你们快准备，总理要上台接见全体演员。”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听旁边的人说，是周总理坚持要上台与大家合影留念的，顿时，我觉得我们的总理太伟大了，他国务繁重，却如此关心文艺事业，更是这样理解我们演员的心情。

全体演员返场谢幕时，我幸运地被安排在前排最中间，我们的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依次走上台来，与大家逐一握手，我看见总理走到一个小演员面前时，亲切地用手拍了拍那小演员的脑袋问：“小鬼，多大了？”当总理来到我跟前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演得很好啊！谢谢你们了！”霎时，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因为太激动，我一时不知该对总理说什么好。合影的时候，我正好蹲在周总理的跟前，随着摄影师的“咔嚓”一按，这张珍贵的合影便永远地定格在我心中……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那次演出的半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的《补锅》也难逃厄运，被勒令停演。陶铸同志也为这个戏遭受牵连，被打成所谓的“补锅派”，而中南五省的戏剧汇演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我从湖南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听知情的朋友说，就在 1965 年我

们晋京演出之后，江青在一次文艺界的会上说：“……陶铸在中南片搞戏剧汇演，还出了什么《补锅》，请我看，我才不去看呢！”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考虑，我才真正理解了我们的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越来越体会到总理所具有的伟大的人格力量。

时至今日，我还时时翻开这张难忘的合影，久久端详，细细回味。而每看一回照片，对我都是一次莫大的享受和难得的教育。它使我深深感到，要做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就应该象我们的总理那样，去尊重别人，理解别人的劳动。回顾这些年来的艺术生涯，不论演出还是其它活动，不论是在国家级剧院还是乡村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面对的不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普通工农士兵，我都是满腔热情，艺术上严肃认真，从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松懈。对观众要我签名和合影的要求，我总是克服困难，尽量满足，因为从我们周总理的身上，我真正明白了演戏与做人的道理。

那张黑白合影照片，将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中，周总理对人生的搏击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将是我终生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周总理引导我学《讲话》

白杨

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 周年的日子里，当我重温这篇光辉著作时，不由得想起 50 年前那些难忘的岁月，忆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引导我们学习《讲话》，坚定地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和上海一些电影工作者溯长江而上。沿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演出。到达重庆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活动，1938 年底周恩来同志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这时，我有幸随阳翰笙同志到曾家岩 50 号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热情的话语今犹在耳，鼓励我们要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希望我们多演些抗日救亡的戏。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了。重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文化人士加紧迫害。一个剧团在四川演出阳翰笙编剧的《李秀成之死》，竟惨遭横祸，扮演李秀成的演员被活埋。20 多个团员被枪杀！同时，我们在重庆的工作也非常困难。在国民党控制的电影厂搞抗日影片和话剧就更困难了。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恩来同志主张利用话剧打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在他亲自关怀下，由阳翰笙策划，应云卫出面成立了民办中华剧艺社，党曾给予资助。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用写历史剧的办法，以借古讽今，针贬时弊，阳翰笙便创作了反映太平天国斗争的剧本《天国春秋》，由中华剧艺社演出。恩来同志关心过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接着“中艺”演出郭沫若同志刚创作出来的《屈原》，恩来同志非常认真，反复观看我们的排练演出，《屈原》的成功演出，当时轰动了整个山城，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积愤，说出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恩来同志对我们这些团结在党周围的文化界人士，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安全和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思想。他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团结教育文化界的朋友，他经常派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和我们联系。记得那时，恩来同志的秘书陈舜瑶、张颖同志就常悄悄地过江到南岸我家来，给我详细介绍党对全国形势的分析，解放区的信息和领导同志对工作的意见等等。

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帮助我们建立学习小组，提供学习材料，使我们拨开云雾，看见了希望。经常参加学习的有周峰、石羽、林相、江村等人，学习的场所就在我家里，在那种环境下，这当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学习材料大都是恩来同志让张颖送给我们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延安的整风文件，除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外，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了。

那是在 1942 年的春天，《讲话》在延安发表了。但在重庆不能全文公开发表，恩来同志给我们送来了《讲话》的小册子。1943 年，恩来同志有一段返回延安，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仍惦念着帮助我们加深对这篇极其重要的科学论著的理解。他特地派刘白羽、何其芳同志随林伯渠同志到重庆，向文艺界介绍《讲话》的精神、背景，以及在《讲话》的推动下，延安文艺工作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话》精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明确提出了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读后感到耳目一新。当时，我虽然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已走上进步的文艺道路，积极投

身到抗日的文艺战斗中，但是，对什么是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并不十分明确，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讲话》中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心里豁亮起来。

当时，我们都很想知道《讲话》以后，延安创造出的新的艺术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恩来同志那时又来到重庆，他就让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来演出。就在《新华日报》庆祝成立七周年的那天晚上，我们赶到重庆郊区化龙桥，在新华日报社院内的广场上，看了三出新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和《牛永贵负伤》。尽管参加演出的同志都不是专业演员，由于有的同志刚从延安出来不久，崭新的演出散发着质朴的风格和浓郁深厚的泥土气息。富有战个性的工农兵形象，就象烂漫的山花一样富有生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延安文艺的表演，也从中看到了延安边区沸腾的生活和觉醒的人们。内心非常激动，演出结束后，我们大家还一起下场，学着扭起了秧歌舞。

夜深了，回城的路上，恩来同志让我搭他的车，一直送我家。一路上，我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倾吐了学习《讲话》以后，恨不得立刻飞到延安的心情。恩来同志亲切地肯定了我向往革命的热情，并语重心长他说：留在这里也是抗日，想去延安，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还对我谈了《讲话》的重要意义，并鼓励我阅读些鲁迅的著作，学习鲁迅精神。

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我留在了重庆。在以后的艺术生涯里，我一直牢记着恩来同志对我的教导，要求自己努力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去做。从那时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成了我坚定的信念。深信没有生活的感受，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再好的演员，单凭技巧也难以成功地进行创作，然而，在旧社会国民党统治下，想接近工农群众，前脚去，后脚就被盯梢，是不自由的。只有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你走到哪里，人们伸出双手欢迎你。为了演好工农兵的形象，我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也到过部队，如拍摄影片《祝福》时，我们摄制组到浙江的山区体验生活，没有交通工具，只好一天走上百里的山路，为了演好祥林嫂，我跟着到深山老林的小山村里住下来，熟悉当地的人民和生活，这样做，当然要苦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次深入生活，我都有一种深山探宝的感受，受益无穷。

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 周年，怀念当年指引我们学习《讲话》的周恩来同志，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在 50 年前给我们指出的文艺道路。联系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明确指示：“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们要力求实践的。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荒煤

—

进入 1992 年的春天，作为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退役兵，回忆在建国 40 周年和建党 70 周年双庆的日子里，看到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禁感慨万千！电影界的朋友们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反映我国重大革命题材的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等。这些影片塑造了我国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革命领袖人物栩栩如生、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再现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崇高的品德与智慧，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对历史的真实有着深刻的揭示，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噬力。这些影片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仅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也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写下了一页崭新的诗篇。

中国电影艺术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回顾中国电影事业在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缅怀周恩来总理对电影艺术那些无微不至的热情关怀，亲切教诲，我不能不心情激荡，无限感慨。

我回忆起和周总理的一些重要的会见和所听到的教诲，衷心希望电影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反映重大革命题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反映现实题材的严重不足，继续前进。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周总理许多生动的印象，但最难忘怀的，还是 1959 年 4 月的一次会晤。

1959 年 4 月 22 日深夜，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周总理明天上午在北京医院要接见上海全国政协电影界几位委员，让我去参加。

接到电话后，我不免有些疑虑，前两天还看到总理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见面，怎么住医院了？又为什么在医院还急着找我们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立即联想到，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柯庆施已经宣布过，上海不欢迎夏衍、陈荒煤去干预上海的电影工作。我又触犯了什么呢？

而且，刚刚在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经和我们见过面。总理见到沈浮、赵丹、郑君里、张瑞芳、陈鲤庭他们，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陈毅既是上海的老市长，又是上海文艺界的老朋友。所以这次见面，有如家人久别重逢，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当时准也没有想到要向领导汇报什么问题，希望总理讲点什么。

更没有想到陈毅同志突然向总理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总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让他们搞一部电影看看吧。”

总理也被陈老总那“请求”的神情逗笑了，就让我去安排。我赶忙给电影局打电话，得知放映室里只有一部刚刚送来的译制片（片名我忘了）。我问总理看不看，没等总理答复，陈老总就说。“可以嘛，可以嘛。”笑嘻嘻地站起身来要走了。这时候，总理才说他还有点事，不去看了，要我们陪陈老总去看。

于是，我们就到文化部大楼地下室一个小放映室里，陪陈老总看了这场

电影。

回想这些情况，我越发感到奇怪。总理突然进了医院，为什么还这样急于找我们谈话，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禁犯了职业病，把这一年赵丹、君里、瑞芳、沈浮等正在拍摄影片——特别是我喜欢和支持的影片，都在脑海里滤了一遍，想想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想到上海的一些情况，一夜没有睡好。

上海电影界的情况的确相当复杂。它的确是中国革命电影的发源地，有一大批从 30 年代起就从事电影工作的老同志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又的确有人认为这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最典型的例子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时，批判钟惦棐同志，有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就是惦棐同志讲过一句话：

“上海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是企图煽动上海电影界搞“复辟”活动。我也亲自听到一位吉林省的宣传部领导人对我讲。

“我们中国电影走面向工农兵的方向，要靠赵丹、白杨他们这些人，真可笑！”

在 1958 年 12 月我写了一篇很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判了许多影片，认为这些影片的错误：

“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动摇和背叛，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何庆施的不满。尽管后来我作了检讨，柯庆施也还是宣布，上海不欢迎陈某人来干预电影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 1956 年我到上海时，柯庆施亲自我我谈话，让我回去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上海不欢迎夏衍同志再过问上海的电影工作，上海自己能够管好电影——不期料到了 1958 年又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总之，柯庆施，张春桥实际上是要由他们任意控制电影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早就伙同江青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了。

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就宣布电影界有一条夏（衍）、陈（荒煤）修正主义路线了。

二

4 月 23 日上午我到了北京医院，才听到护士长告诉我，周总理因为痔疮复发，但正在忙着开人大、政协会议，不肯住院治疗，只让医生打针止血卧床休息一天。这位瘦小的护士长流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忧虑神情叹道：

“可又把你们找到病房里来谈话！”

总理住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们一走进去就把病房挤满了。

周总理平躺在病床上，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前两天和我们会见时，他原想谈谈他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没想到陈老总突然要看电影，结果没有谈成，所以趁着在医院休息一天的时间里，“请你们来谈”。

他然后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一张纸条来，看来他还是作了准备的。

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

“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

总理听后又把纸条摸在手掌里，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指着

赵丹等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候就认识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

于是，君里又直点头，笑着表示道歉。赵丹着急地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忙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神情，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高兴地笑了起来，一面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吧：一位总理和几个演员之间却有这样亲切的交谈。周总理后来不时看看那纸条，给我们谈了许多。当时我没有带笔记本，没有作记录。现在保存的只是张瑞芳同志当时记录下来的较简单的记录稿，但周总理当时讲的重要论点和精神都保存下来了。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周总理后来又重新归纳起来，于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

总之，周总理根据他观察到的文艺界、电影界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他的看法。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艺术客观规律的问题；就思想性与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形式与风格等等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即对待艺术创作，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比喻来说，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

我现在根据记录稿和回忆，尽可能按照总理讲话的顺序和一些感受写下来。周总理一开始就讲，他通过每次会议，发现我们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会两条腿走路。他认为：

两条腿走路，这是做一切工作的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非常熟练。

两条腿走路，去体会一下，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走不好的。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有片面性。尤其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一张画有几处败笔，画坏了，就很突出。一部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叫人看不下去。

这是从广大观众的角度来要求。

从我们领导上看，只要作品基本上是好的就可以了。可是艺术产品是给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的群众。

我现在回顾一下电影的历史，不能不感到惭愧和内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周总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

要求创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主要是照顾到广大群众的需要，要考虑到广大群众。

在电影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创作人员中形成一种思想：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我们搞艺术生产的领导同志也往往是看重把政治关，而忽视艺术质量，

只要领导上对政治上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了。我们很少想到“艺术创作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因而要求艺术上的更加完美。

周总理却是从群众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从领导的角度，他反而强调不要求全责备。

他认为：

“艺术创作不能粗糙，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工作。但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创作每一次都成功是没有的。所以不能人人作诗。毛主席作了很多的诗，发表的并没有许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多少。因此，创作也不能为有一次失败就失去信心。作家不可能创作大多的作品，电影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

第二点，总理指出：

“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认为领导什么都行，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要善于集中。想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这时候，总理就指着我说：

“荒煤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没有和大家商量，就被袁文殊攻了一下。”

——这就是指我前面讲到的那篇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受到了袁文殊的批评，我同时也写了回信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承认：

“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做‘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白旗’的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

我当时也向总理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周总理随即又提出来，制片厂的领导要发扬民主的作风：

“电影厂的领导可以召集各级干部的会议——发牢骚的人也可以吸收，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就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要学会集中群众的意见。不会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不能领导群众。当然，人云亦云也不行。”

第三，周总理又强调指出，既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又要把握主导的方面，也就是引导正确的方向。事物的发展总有主导的方面。

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跳舞，也有主导的一面。两个人都主导就不行了，就会乱了脚步。

他还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既要求十分细致，又不要求全责备。但应以要求细致作为主导方面。

他又指出：“导演也应该是这样，要善于听取集中群众的意见，并且坚持下去。之后，又不断吸收群众的意见，这就会使得创作更加丰富起来。”

第四，周总理对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创作提出极其宝贵的意见。

首先，他指出：“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大家心情舒畅，不要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之后就会带来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工作还是要一张一弛。

国庆献礼片不要搞得太多，要在可能条件下进行。

以后4个月不要再催制片厂了，必要的条件要给予支持。有些献礼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

上影有八部影片献礼，又和新疆合拍《绿洲凯歌》，是否太多了，可以

与袁文殊说一下。

八九部献礼片，如果国庆节搞不出来，到年底交也可以。

好的影片，宁可不惜功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的下马。”

现在，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周总理和我们的这次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明确指出：

“ 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细致一些好？ ”

他还举国庆工程为例，北京要上 14 个工程实在太紧张了，有两个工程决定下马了。

“ 而艺术是精神产品，就更应该注意质量。 ”

可惜，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发挥，在他 5 月 3 日紫光阁的讲话中也没有再强调这一点。

到了“ 文革 ” 期间，我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传达并阐述了我对总理这种意见的看法，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的跃进》。

特别是我在 1959 年 7 月厂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对 1958 年电影界搞“ 大跃进 ”，刮浮夸风，最后归纳为三条：

1. 许多影片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浮夸风。
2. 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3. 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强调政治，忽视艺术。

而文化部党组 7 月 19 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非常明确指出：

“ 1958 年艺术片生产中，这种只满足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 政治 ’ 不注意艺术性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

结果，到了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右倾思想，受到了批评。我和夏衍都成了文化部党组“ 重点帮助 ” 的对象；到了“ 文革 ” 期间，就更加成为反对毛主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 罪行 ” 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周总理在那时候提出，艺术生产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多快好省，应该注意质量的问题，的确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一种科学态度。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工农业生产也未必都能够多快好省，何况是艺术生产？

所以总理最后特别指出，一定要注意，使得创作人员“ 既要鼓足干劲——这是主导方面，又必须心情舒畅 ”。还举演员为例：

“ 不可能设想，演员要他哭就哭，舍不得用胶片。什么事都一样，要求过头了就成为荒谬。漂亮的人，如果脂粉抹多了，反倒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开。不然，创作人员就不能精神舒畅。 ”

第五，周总理指出：

“ 对国庆献礼片，也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 这个经验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国家工程的例子就是如此。你们献礼的影片，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了。如九部中有四部不好的，我宁可上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还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集中使用了，人力物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一些了。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人力、物力、胶片都应该如此。 ”

他特别讲到演员不宜大紧张：

“ 演员刚刚把自己这个角色准备好，情绪集中了，你又让他去搞别的事

情，他怎么能演好那个角色？

毛主席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都不管——当然，也有人要跑龙套，比如我。但你们可不要学我。（总理指着赵丹他们说）你们演员拍的影片不能都是满面倦容的样子，拍我的片子可以。而演员是要和广大观众见面的啊！”

总理这里一再笑着以自己作例子，我们既感动又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高高兴兴笑了起来，病房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友情的气氛。

第六，周总理又指出：“影片既要强调思想性，也要讲究艺术性，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而主导方面是思想性。”

他以反映教育改革题材为例，说道：

“如表现教学改革的戏，要好好研究。因为还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弄不好就要犯错误。教学改革报告中写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只有半年的时间，还会有很多的地方未必成熟。

所以，国庆献礼的影片，实际上是十年经验的总结，要合乎时代的精神、思想、政策。

前两年的影片可能粗糙一些。我听邓大姐讲，例如《你追我赶》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

电影还是应该注意人物的色彩和动作。”

回忆总理这一段讲话，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电影这一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电视、录像的冲击，从电影生产的总体上来讲，如何正确地理解周总理的这一总体的要求？

电影艺术到底怎样去反映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政策，怎样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仍然是电影界值得深思的一个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一个根本任务。

国庆40周年和建党70周年双庆的一些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取得重大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因为作家创造了各种真实感人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所揭示的种种矛盾，从而展示出时代的潮流，启发人们思考，走什么道路，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实质上终究是以一个时代的侧面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去反映时代精神。

这正如周总理在1962年讲话中提到的：

“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不能反映各个侧面。”

这仍然是电影艺术不断前进、发展中始终不懈去追求、探索、攀登的一个高峰。

第七，周总理关于政治和业务学习问题讲了以下的意见：

“政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但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总理指着自已脸上的一个小疮作例，说护士要等脓熟了再挤，否则就会挤出鲜血来。人人身上都有细菌和病毒，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身体健康加以吸收而排泄出去，再一个办法就是开刀——这就是革命。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是要革命，而对于资产阶级就是改造。

总理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应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认为，“脱离实际，生吞活剥地学习理论是没有用的。”

对于业务学习，总理认为创作人员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还专门问我电影学院的教学情况，我告诉他，表演系学三年，除基础理论外，有基本训练：如舞蹈、太极拳等。

总理认为演员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基本训练，要练嗓子，包括语言发音。他举例说，政协大会上由电台广播员读的文件就特别清楚。总之，“演员从身体到运动、歌唱都应有基本训练。”

现在我还有些记忆，谈到政治学习时，我当时听到总理那样讲：

“政治学习不要占很多时间，领导同志每周和大家谈谈就可以了——占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就有些担心某些领导人可能通不过。

事后，文化部党组有位重要领导人果然议论起来，认为这一条不能往下传，政治学习只占十分之一时间太少了。当然还没有想到后来决定整个讲话都不向下传达。

周总理讲到艺术创作人员的业务学习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创作人员“既要精通一行，又要是一个多面手”。“对演员来讲，基本训练是主导方面，主要是精通一行，但又要做一个多面手。”

“而且应该重视文艺修养，丰富演员的修养，使演员有多方面的才能。”

总理再三强调演员要精通一行，又是多面手，必须要有丰富的文艺修养时，还特别指出，不这样做，“就是一个杂货摊”。

他又一次以自己为例，说他是一个“杂货摊”，当然大家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然而大家也能领会总理的胸怀：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凡是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他总是竭尽全力，倾注满腔热情加以关注，切实解决。他作为一个数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从不以主宰人民命运的领袖自居，始终谦逊地把自己称作是一个“跑龙套”的人。他真正是中国人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

第八，周总理谈到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也有一个重要的看法，他认为，“下放劳动锻炼，要保护身体健康，也要保护人的坚强意志。”

他认为，在新社会，既要求干部下去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甚至认为当时规定下放的时间是一年——“其实一年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方式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医务人员可以到农村作一个时期的卫生工作。”

而我觉得，提出文艺工作者去下放，劳动锻炼，要注意身体健康，要锻炼人的坚强意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象有些同志所想的，下放劳动，就是和群众一样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周总理当然一再指出，号召我们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然而他没有把下放劳动仅仅看作是一种改造的方式。而是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既是对干部的信任——不是把他们当作永远没有改造好、甚至难以改造的对象，而是希望他们保护健康，更重要的是锻炼坚强的意志，在与人民共同劳动中保持一种革命的坚强意志，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样来看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意义，是真正地高瞻远瞩了。

可惜的是，总理这个思想并没有为许多领导同志所领会。劳动锻炼始终

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惩罚的一种代名词，到了“文革”期间，“干校”不过是一个变相的劳改所罢了。

第九，周总理谈到政治挂帅和物质福利两个方面，也要注意两条腿走路。既要强调政治挂帅，又要注意物质利益。政治挂帅是主导方面，需要强调。但是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那就有偏差。

总理特别指出，在工农业方面应很好注意这两方面，否则，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会受影响。

“全同群众不可能都是先锋队。不能忘记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群众背后是有意见的。”

第十，周总理谈到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指出。

“我们既要理智又要热情，要二者兼备。而理智是主导方面。艺术家们容易热情激奋。领导则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把群众的热情鼓动起来，但义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工作方法方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当然要有科学的根据，不然就成了浪漫主义的空想。

敢想、敢说和敢做要连结起来。”

“一定要对敢想、敢说、敢做进行科学的分析。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的分析。”

第十一，周总理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要注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既要兼容并蓄，又要有独特的风格。”

他认为，他近年看到某些越剧是退步了，大概是听到别人批评它单调，作了一些修改，却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总理主张话剧、电影都要考虑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对沈浮等讲：

“沈浮、鲤庭、君里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理举例说，他看了江西大阳腔排演的《昭君出塞》，觉得很好，也觉得有些话剧色彩。到后面去看到了石凌鹤，才知道是他排的。他从重庆时期排《棠棣之花》，到这台《昭君出塞》都很成功，就因为独特的风格。

所以，总理认为：

“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其不同的风格。”

“其实，演员表演也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员‘自己’，就是主导的方面。”

四

从以上这次谈话的重要内容来看，周总理这次谈话，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感受，而是对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中一些错误思想有了很深的感受，进行反思的结果。是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解决一下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期望文艺界按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常健康地发展。

可是，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谈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不让向下传达。上海柯庆施只批准郑君里在20多人左右的少数创作人员中传达。

到了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文化部党组重点批判夏衍和我都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更谈不上对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好在，国庆十周年终于献出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尽管上海的同志回去不能公开广泛的传达，可是总理讲话的内容还是不胫而走，如一股春风激荡着

创作人员的心灵。他们献礼影片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等等，终究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部对夏衍和我进行的批判还正在热烈进行中，却又传来周总理的建议：国庆献礼影片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文化部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庆祝会？于是文化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新片展览月的庆贺会。

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次庆祝会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进步，电影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周总理 1961 年 6 月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特别说道：

1959 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1962 年 2 月，周总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中又重申：

“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重温这两次讲话，和 1959 年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相对照，就很清楚，后两次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上次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总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发展到“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思想泛滥，违反艺术规律，缺乏艺术领导民主，瞎指挥，搞浮夸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现象的纠正和批评，希望电影、文艺界掌握和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去改正领导作风，纠正“左”的错误。

这些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又是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对创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文艺工作能够遵循这些教导，纠正错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如电影界称国庆献礼片所取得的成就，叫做“难忘的 1959 年”一样，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文革”的灾难发生了，周总理也无法预料到，新侨会议、广州会议都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会。被周总理称作“老朋友”的人毫不例外地纷纷被打成黑帮分子，黑干将，甚至叛徒、特务，被投入监狱！有的同志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了。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工作尽管饱经坎坷，却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论是戏曲、话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各种文艺事业，都不断地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所以他能够洞察到“左”的思想的危害。可是，这不以他个人的意见为转移。他从 1959 年 4 月对电影界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谈话开始，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亲自主持会议批准了“文艺八条”的试行。他亲自抓国庆献礼片问题，要求也应有轻松愉快、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而拍摄了《冰上姐妹》、《五朵金花》这样的影片。他亲自寄资料给郑君里，供拍摄《林则徐》参考。他曾亲自问我：“谢芳担任《青春之歌》的主角是否胜任？……”

是他亲自建议文化部开新片展览月的庆祝会，并到会讲话。

1961 年又是他亲自建议，并在香山与电影界朋友们共庆“七一”党的生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欢乐的日子。

.....
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用“一根很粗的，自 30 年代就开始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根绳子绞杀了一切。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绞杀了周总理对文艺界的一切关怀和讲话，周总理也终于和文艺界的朋友们永别了。

我永远无法忘却，也永远怀念 1959 年 4 月 23 日这一天——这一天听到周总理如此真挚亲切的教诲！

我也受到了一次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尽管我已经退离电影界了，有时候，看到听到一些电影界复杂的处境，我也仍然难免想到：

假如总理还健在？

假如总理又看，他 1959 年的这次讲话！.....

假如我们问青年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讲话？又有多少中老年同志还记得这个讲话？

30 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学会了两条腿走路？！

1992 年 2 月 8 日

巨人的风格

胡絮青

我已经 87 岁，我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个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教我一想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么一点难忘的回忆，使人能安静地坐在窗前，望着自己一生的旅途，对自己悄悄他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这点回忆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最高的得意。它使我知足，它使我满意。全是因为我见到过世上最完美的人。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回忆说出来，留在世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党着，上苍塑造这么一个完人真是不容易，千载难逢吧。

我要说的都是一些小事。我的生活环境教我只能看到这些小事。使我自豪的是，正是这些小事让我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卓越的革命者、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不，或者正好应该反着说，恰恰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发现他惊人的脸力来自何处，体会到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才称得上是达到了顶有“人味儿”的最高境界。

大约是在 60 年代初，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路西，好像刚开张不久，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她们俩成功地给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那天饭后，周总理象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像片后面注有“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摄于向阳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邓大姐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类似的小聚会，我还参加过三四次。1954 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禹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出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工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华厅外面，当院，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了情趣的晚宴。1961 年 6 月有一次规模稍大的宴会，是借溥杰夫人嵯峨浩的母亲访华之机接见在京的整个傅氏家族，包括载涛和溥仪在内，要舍予和我以及程砚秋夫人景素贞去作陪，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满族人。总理还特地将我们三人一一向大家做了介绍。谈到我的时候，总理说：“她中年学画，拜齐白石为师，现在和陈半丁、于非闇等画家合作巨幅的国画。”

通过这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他会按常规的仪礼去答谢人家，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去款待人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去关注大家，如果人家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诞生了；而这，往往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舍予的一句常说的话是：“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的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在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试想，在那些小型聚会上，为什么总理老要邀请几位并无直接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去出席作陪呢？

这是他的风格，他的高明。

有吸引力，便有凝聚力。

有尊重，便有回报。

有了这种新型的关系，有话便能直说，完全坦荡，完全真诚。

该批评的便批评，该顶的就顶，朋友嘛，开诚布公。

一次，中朝友协宴请朝鲜朋友。舍予到过朝鲜，在那里写过小说，有不少认识的朋友。他又是中朝友协的副会长，朋友相见，酒兴大发。舍予醉得不省人事，怎么回的家，全然不知。过了几天，他下班回来，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挨了一顿好批评！”这件事让总理知道了，不客气地批了他一顿。这是舍予一生之中最后一次醉酒，此后，再无这事。

也有舍予“将”总理的时候。在一次人大会议上，舍予登台发言，说会议太多了，成了灾，挤了他的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社会兼职，多写几个剧本。总理后来在政协“老人会”上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

在一次座谈会上，舍予提出来要去新疆石河子地区去体验生活，话音未落，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舍予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舍予写的戏，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光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

有的甚至由头到尾直接参与创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出台。没有他的慧眼卓识，有的戏，包括《龙须沟》和《茶馆》在内，恐怕都是另有一番命运。《龙须沟》写成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金》，一时演外国戏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总理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下出他所料，《龙》剧上演后大受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出大型话剧。

到话剧《茶馆》彩排的时候，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认为《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看了《茶馆》排演之后，总理在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他以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谈完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理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了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总理曾经仔细询问我关于白石老师的起居情况，我向他详细地禀报了，使他下决心为老人找一处更大更安静的住处，这便是雨儿胡同13号的来历。后来，总理委托李可染、我和美协一位工作人员去帮老人迁居。这件事的结局并不好，内部原因比较复杂，老人只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1953年，总理为齐老人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邀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闇、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也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下放北京之后，改称“北京画院”。从那时起，我一直是它的成员之一。

总理对北京画家举办的个人画展和联合画展，几乎是有展必到，非常熟悉情况。有一次春节，在小礼堂听戏，舍予和总理坐前后排，我不好意思坐

在总理前面，自己找了个偏座坐下。总理向我远远地招手，示意让我过去，我走到总理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连串地问我：

“为什么坐那么远呀？”

“你身体好吗？”

“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

他说的好大夫，就是蒲辅周老先生，医道极高，后来，舍予和我都求他看过病。

总理还告诉我，他去看过我的画展，他说：“你进步很大嘛！”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心里却乐滋滋的，得意了好些日子。

白石老人举办画展，外国向他赠授院士证书，在对外友协举行授证仪式，我去参加，一进门便被总理看见了，也是硬拉我坐在他的旁边。当时，我的感觉只能用“受宠若惊”、“如坐针毡”这样的词来形容，总之，鼓舞得不得了，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加倍地练，加倍地画，千万别辜负了总理的一番好意。

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际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跳舞。总理的舞姿非常潇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找他跳，准能跟他跳上一回，小伙伴们都能把她围起来，庆贺一番，羡慕得很。哪晓得，总理径直向我走来，说：

“我请你跳舞。”

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会。”

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我后悔极了，舍予呀舍予，于吗咱俩不学跳舞呀！

记得，那天黄继光的老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她问寒问暖，谁知道，越安慰越糟，勾起了老妈妈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轻轻地为她用于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着老妈妈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模样。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

民族文化宫里举行音乐会，是洋嗓子，有大乐队在乐池里伴奏，散得很晚。总理把舍予留在休息室里谈意见，我一个人先退出来，坐在车子里等舍予。谁知道，总理派警卫员来找我，说要我也去听听。我进去的时候，听见总理正在说“是听唱歌还是听音乐？”他转过头来招呼我，说：“你也来听，没有关系！”这一听，听到了夜里十二点以后。

也还有说话不要我听的时候。总理上家来找舍予，谈了一小会儿，舍予出来叫我：“黎青，你到西屋去吧，总理要和我谈点事。”我回避到西屋，一点也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心想，一会儿就会完吧。哪知道，一气谈了四个小时，由两点一直谈到六点，该吃晚饭了，总理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好不容易盼着舍予叫我，却吓了我一大跳：总理要在家吃饭！

我毫无准备，出了一头汗，“抓”出来两样菜——摊鸡蛋和一块蒸鱼。总理一看菜就乐了，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舍予一直对这次长谈守口如瓶，至今，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除了那丢人的摊鸡蛋和蒸鱼，简单无可记述。我只记得舍予偶尔露出过一两句“机密”，说总理不主张他入党，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用。我可是闹不清楚，

这一两句机密和那次长谈有没有关系。总理去世后，我在报上读到一封他的信，才明白，那点意思由来已久。那封信是总理 1944 年 9 月由延安写给郭老的。信中嘱他不要轻易出面，“创意须出自舒洪姚等”。舒者舍予也，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而“文协”是个统一战线组织，以团结作家抗战为唯一宗旨。可见，总理以为舍予留在党外更有用是他的一贯想法了。

对舍予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 1938 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另一次是 1949 年 6 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台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禹、田汉、冯雪峰等 30 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 11 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

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出自周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舍予的引路人，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也许，正因如此，当舍予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这是 1966 年 8 月 24 日凌晨，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头脑里唯一坚信不移的一件事。或许，一切一切都破灭了，只剩下了这个。

他是怀着这个信念在当天的深夜走入太平湖的……

舍予撒手而去，苦了另一位活着的、他的引路人、他的好朋友。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舍予的突死使周总理大为震惊。

8 月 24 日上午，舍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

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做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25 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会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许多多事情。

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絮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见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总理说他虽然已见到上报的材料，但是他认为仍有必要由他自己再做详细的调查，他要王昆仑把他知道的关于老舍之死的情况一一讲给他听。王昆仑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当时唯一还在台上的人，虽然没有任何实权，但对情况还是多少了解一些。巧得很，对23日孔庙那场武斗，王昆仑就知道得很详细，因为他当时正在市府，接到紧急报告之后，他便匆匆赶到现场，发现那里的情况完全失控。他完全无法进行任何干预，只是闪在一旁痛苦无奈地焦急地看着他多年的好朋友活活地受折磨受污辱。老舍的伤势最重，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王昆仑远远地也注意到了老舍的异样的神态，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疲惫。对随后在市文联院内发生的悲剧，因为没有亲身到场，王昆仑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信息。总的说来，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比孔庙内的事态又严重了许多。老舍和红卫兵直接发生了冲突，几乎被活活打死。等到把他好歹地抢出来之时，他已奄奄一息。这两场疯狂的丧失了任何理智的武斗，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内，实际上就断送了老舍的性命。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得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五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于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人，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8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象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子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明显地可以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总理病逝两年半之后，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为舍予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大姐到得特别早，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

邓大姐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

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她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孩子说：“你们的妈妈很了不起，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你们要好好照料她，并且要向她学习！”

舍予去世之后，我没有痛痛快快地哭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听了邓大姐夸奖我的话，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劈嗒吧嗒地往下掉，一点一点也不坚强。

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湖畔，总理已经郑重地祭奠过舍予了。

那也是一个8月24日，总理重病，被安排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详细细他讲给你听。”

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做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费力不讨汗的《春华秋实》而这一切，部白费了，多么令人沮丧。

也许，他想起了他对胡絮青的批评，那时是唯恐照顾不周，命运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象八级风一样，把他心爱的一切和精心扶植的一切一扫而光，刮得无影无踪，极其残酷，而且极其难堪。

也许他为舍予感到惋惜，他知道舍予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也许都凝聚在北海的湖面上。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面对这么多遗憾，他的悲哀是不言而喻了。他便死在这遗憾里了。

不过，这遗憾，这悲哀，使我更加看清了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我想说，这湖畔的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舒乙记）

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林默涵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做《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周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做法的。

二

建国以后，1952年，我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对于他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我国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艺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气氛下，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注意。为全面了解情况，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年12月28日晚间，周恩来同志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到西华厅开会，共同分析研究了这些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鼓励大家要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他要我先汇报中宣部文艺处了

解的情况，其他同志也汇报了各部门的情况。接着，他要大家讨论如何纠正这些不适当的作法。周恩来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求马上停止。在文艺方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对提出“文艺放卫星”之类的口号。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华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原来准备在1959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纠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召开，使事情发生了变化。1959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负责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开这次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时，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右，要继续反右。消息传来，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我当时心里想，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许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倾向确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搞得很厉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揪出了所谓“九条大鲨鱼”。在这种情况下，原定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一直推迟到年底才开，会议改变了议题，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些同志作了解检查，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样，就使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了干扰，“左”倾的错误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三

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重新纠“左”的开始。

1961年6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深入到会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活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

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条例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到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才又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送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华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这个条例称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原有十条，后改定为八条，于1962年4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四

1964年国庆15周年前夕排演《东方红》大歌舞，是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一次审看时，我与周总理坐在一起。我告诉他，“芭蕾舞团有些人在批斗白淑湘，理由是她的父亲反动。白淑湘被斗得有点精神恍惚。”周总理说：“不能这样，赶快告诉他们停下来。白淑湘的事我知道，她的姐姐给我写过信，写得很好。她父亲被镇压的事我也知道，当时是可以不必那样做的，何况女儿不能代父受过。东北一解放白淑湘就参军进关，表现很好，应把这情况告诉团里的负责人。”我马上照总理的指示办了。我曾对白淑湘说：“任何人不能自己选择父母，但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决定的。”

还有，当时我总觉得《东方红》大歌舞没有专门表现“八一”起义的场面是个缺憾，但总理认为：“八一”起义方向不明确，大军到潮汕后就失败了，只有“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单独表现“八一”，应该表现井冈山会师。

五

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政策，他对文艺各个部门，如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主张音乐、舞蹈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在一些音乐舞蹈工作者中存在着不正确的

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落后，不科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舞蹈是进步的，科学的，可以不加改造地接受过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认为民族的艺术要发展，学习两洋的艺术也要逐步使之民族化。比如芭蕾舞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不能急躁，要分步骤，首先要题材革命化，可以演一些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从古代题材到现代题材。但是，他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艺术工作者的创造精神。他最初认为芭蕾舞一下子表现我国现代生活比较困难，应该过渡一下，先搞个反映我国古代生活的节目，但当他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后却大为称赞，给以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演得好，我比你们保守。

周恩来同志不赞成民族戏曲中加太多的洋乐器，他认为那样做有两个缺点，第一是破坏了原来的艺术特色，第二是乐队音响太大，压了演员的歌唱，对演员的声带有害。

周恩来同志多次找我们研究音乐、舞蹈的发展问题，并亲自过问《小刀会》、《宝莲灯》等剧目的演出，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还建议在报刊上发动音乐界的同志对音乐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展开全面讨论。他在给我的信中明确提出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召集各方面人士座谈，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持续了一年，影响很大，对于纠正音乐、舞蹈工作中的错误或偏颇思想，使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6 年了。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廖心文整理）

犹闻总理击节声

王昆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 16 年了，每当我翻开那本《不尽的思念》，那篇篇用蘸满感情的笔墨写成的有血有肉，但又极为平实文章，都能引发我的泪珠滚滚，使我不能释卷。前些时看电影纪实片《周恩来》时，明知银幕上的总理是演员扮演的，但那熟悉的身影，那一言一行，一伸手一投足都使我激动不已，特别是追悼贺龙元帅的场面展现时，我几乎嚎陶大哭起来，为什么？皆因为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我对总理的怀念是超过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一切亲人的，我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长远长远直到终身的。

（一）延河畔赠言

1944 年我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敌后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学习。鲁艺在桥儿沟，那时我的三叔王鹤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在党校三部，三叔住的窑洞就在彭真同志那排窑洞的上面一排。星期六或星期日，我常去三叔那里过假日。

有一次我在彭真同志的窑洞前的险畔上玩，见到一位中年女同志从彭真同志的窑洞那边过来，她脚步悠闲，象是边走边等什么，看见我，她停下脚步，用眼睛端详我。在这之前有一次我去杨家岭看望我六叔王眉征（他是洛甫同志的秘书）和姑姑林浦，曾看到他们及其他成年人都称呼她为“邓大姐”，于是我按照我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如何对长辈排行的知识，叫了一声：“超姑姑”。她歪了歪头，笑着重复了“超姑姑”三个字，问我是谁？多少岁？在哪里学习？我一一告诉了她，她说：“噢！是的，是的，真是很象你叔叔。”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呀？”（在我们那个年代的 19 岁还是懂事很少的孩子，而我又特别不懂事，竟问了一连串象这样不得体的问题）她说：“我在上党校学习”。我问：“在党校尽学什么呀？”她说，“学路线呀……什么的。”我说：“路线还不好学？看看地图，再不就找个向导带着走一次就认得路线了呗？”邓颖超同志哈哈大笑，这时周副主席从彭真同志窑洞那个方向走过来，邓向他介绍我说：“恩来！’快来看！王鹤寿这个侄女。19 岁，从前方刚回来，在鲁艺学习，侄女怎么会这么象叔叔呢，真有意思。”邓又转问我，“你一定是根象你父亲喽！”

周副主席跟我握手，问了我些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19 岁，正是学习的年龄，要好好学习！”

1945 年，歌剧《白毛女》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演出了首场。“七大”是自 1928 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敌占区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人，为迎接抗战即将胜利，全国即将解放的局面的大会，《白毛女》是延安鲁艺专为这次盛会而创作和演出的（现在叫做献礼节目）。首场演出是 5 月几日在党校礼堂。那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这样一个大歌剧的主角——喜儿，从开幕前直到结束，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及其他同志都在前台或幕缝里观察观众的反映。为了鼓动演员们的情绪，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导演们来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周副主席来了！还有……还有……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第一幕很成功，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导演们特别嘱咐我几句，叫我别紧张，其实那天我没有功夫紧张，我初学乍练，脑子里想的都是戏里的台词、潜台词、内心动作、外部动作等等导演排练的要求。

那时的延安演完戏不兴演员谢幕，也不兴首长上台和演员一同照像留念的，整个戏演完之后，很多代表都拥在化妆间来看望演员。所谓化妆间，只不过是礼堂外接出来的一间小房子，来看望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门外和窗外。那天，我精神过于集中，六幕演下来很累很累，脑袋疼得快裂了，我不认得几位首长，加上那时不懂礼貌，没大没小的，我只顾自己卸妆，没有理会都是谁在那里说话，只听得有人问：“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刘澜涛同志（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位首长，我认得他）回答：“这可是我们晋察冀的小姑娘啊！”有人说：“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哟！”罗瑞卿同志说：“喂！同志！不要对小孩子这样说话，一鸣惊人也不能骄傲哟！”罗瑞卿同志对我说：“王昆！今后可不能骄傲哟！”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行伍出身的叶剑英同志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记得人们各自走了之后，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在那里议论着，邓说：“恩来！你发现了没有，这孩子化起妆来，多么象张瑞芳呀！”周副主席说：“是象！特别是嗓音很象瑞芳。”那时，我不知道张瑞芳是谁，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看过电影，连电灯也没见过，因此，也不知道什么电影明星的人，从那时我才知道大后方有个明星叫张瑞芳。进城之后，也有人说我的嗓音很象瑞芳的妹妹张听。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准备随艾青同志带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前方去之前，有一次从桥儿沟鲁艺搭周副主席的汽车到中央组织部三叔那里去（那时候见总理或者搭一下他的车是比较平常的事），当时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坐的是一部卡车（大概在延安也是仅有的一部或两部吧），我站在卡车后面的车槽里，那次也是我第一次乘汽车，觉得美的不行。车经过了飞机场，顺着延河拐了弯，到了党校三部的对面，我该下车过延河去了，车为我停下来，周副主席夫妇二人也下了车，和我在延河边散了一段步。记得那次周副主席和我说了很多话，周副主席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问我：“你一个晚上唱《白毛女》这样大的歌剧，嗓子累不累，有没有保护措施？”我说：“组织上每演一场发给两个生鸡蛋。”周副主席问：“不演时有没有？”我说，“没有”周副主席问，“其它演员有没有？”我说：“林白和我一同演白毛女，她演的时候她就有，我没有；我演时她没有”，其他演员一律没有。”我记得周副主席好象叹了一口气似的说了一句：“哦！——我们现在还很困难哪！”那次周副主席还问到《白毛女》的创作和排练的情况，叫我转告大家：“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因此感人至深，希望你们再加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他还说，“革命形势很快就改变了，你们文艺工作者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有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在等着你们，你学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吧？！讲话的核心就是文艺为人民，你是唱歌的喽！你要记住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歌唱这几个字，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我国农村土台子上，或在前线医院紧凑在伤病员的耳朵边歌唱；也不论是在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或在某国总统的国宴上歌唱，都是这几个大字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

（二）“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哟”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结束了战地生活，从农村走向城市，文艺队伍也要从文工团走向专业剧团，去占领新中国广大城市剧场这块重要的文艺阵地。

我是13岁参加革命队伍的，1939年14岁时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

选调到团里，主要在合唱队边学习边工作，1944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除向民间艺人学些民歌、戏曲之外，学院没有开音乐基本课，也没有声乐个别课。《白毛女》从1945年演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从张家口演到华北冀中平原，全国解放后，从北京演到苏联及东欧，我一直工作很忙，没有脱产学习过。1954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了一批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请了苏联声乐专家来教学，我是否应该请求进学院学习几年？我思想处于矛盾中。在几年来的“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中，我当然被划为“土嗓子”之列的。我的唱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我是知道的。刚入城时，我上台独唱，也不知道是象我这种“土嗓子”唱法，观众感到新鲜呢？还是那时的观众特别热情？记得我唱《王二嫂过年》《南泥湾》等歌曲，唱一句一鼓掌，唱一段的间奏一定会有热烈的掌声。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唱法的重视，我也是深有所感的。50年代，出席周总理的国宴有一个固定的名单，文艺界的老舍、曹禺、梅兰芳、程砚秋诸位先生都是在名单之列的，我也有幸经常出席总理的国宴。国宴上，总理常邀我即席清唱民歌，那时没有“麦克风”，没有乐队伴奏，没有小舞台，当主客和我碰杯时，总理总是很高兴他说声：“谢谢你！”

1953年总理在怀仁堂审查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节目，当时代表团中已有的歌唱家是林俊卿、李志曙、郑兴丽、高芝兰、楼乾贵，还有一个唱民族歌的是黄红，总理发现民族唱法的分量太少了，点名要我参加。

早在1951年我和中国歌剧院的几位演员随苏联第一次访华文化代表团向苏联人民演员哈里玛·纳赛洛娃学习。纳赛洛娃是乌兹别克民族唱法、当时受到中国观众最热烈地欢迎和由衷地喜爱。我和她谈起中国的所谓“土唱法”、“洋唱法”问题，她说在苏联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她偷偷地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什么学院去学那个‘洋嗓子’，千万不要重复我走过的弯路。”“在苏联我有千百万观众，我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后来为了学科学的唱法，我上了音乐学院，等我学成回到乌兹别克，我的观众再也不认我了，我丢掉了‘自己’，心里很痛苦，后来我下决心，关起门来，一面打着鼓，一面流着泪练呀！练呀！终于才把‘自己’找回来。中国人民有好几亿，不用多，你如有十分之一的听众也就够了。”这些话更加重了我是否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矛盾心情，但是我考虑再三，感到自己在歌唱方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过去演《白毛女》是凭着爹妈给的一副好嗓子，本嗓本色，瞎唱瞎闯闯过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音已显得紧张，我很担心自己的嗓音不能持久，加上有些专家、教授都在断定土嗓子不科学，我也很想去寻找一条能把西洋发声方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请求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上进修声乐，并且被批准了。

临行前，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见到总理，总理为我去学习的事，郑重地同我谈过一次话，大概的内容是：“你去学习是好事，但学归学，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好？就是你学完之后，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来了。而只能让我们觉得你比以前唱的更好了，但还是王昆不是别人。什么叫学坏了？那就是我们在收音机一听，听不清是谁，以为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总理还举了一两位原来民歌唱得不错，后来学了西洋唱法什么也唱不好的老同志为例子，要我引以为戒。

到了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对我既感到是“困难户”，又感到有兴趣，他认为我已是一个有名的歌剧演员，并且还是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已近 30 岁的年龄，又有丈夫、孩子在北京，竟然肯去天津从头上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他说我是“英雄”“了不起”；但他在唱法上那可绝不客气，对我是“否定一切”，要我“彻底改造”，他说我好比从“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改造到“社会主义社会”，要革命，就要“拆除所有的旧基础，因此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阶段，要忍受，要去克服它。于是我也只好在课堂上和别的学生一样，整天练咪咪玛玛，学练俄罗斯学派，从拉赫玛尼诺夫的《紫丁香》、格林卡的《云雀》等小歌练起，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草原牧歌》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唱，期中考试，年终考试，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教授都为我的主课打“5 分”（满分），并且说很多夸奖的话，而我觉得这样唱“很可笑”，他们都说这是“改造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却不放心。每当学生洗澡日，我偷偷地在澡堂练练《白毛女》唱段，第一年过去了，还行！唱原来的歌还是原来的模样，两年过去了，我能唱威尔第的《奥赛罗》的咏叹调了，但唱民歌却使不上劲，吐不清字，唱不成调，每到这时，想起总理的嘱咐，心里非常苦恼。终于我提出了请求，经批准我离开了音乐学院，另找学习门路去了。

从 1954 年到 1963 年之间，是我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的八九年，这八九年中，遇到需要唱《白毛女》时就用原来的唱法唱，歌舞晚会上就换一组曲目用“改造过的”方法来唱，两种歌唱方法来回“拉锯”。“不上不下”、“里出外进”很是痛苦。

1962 年 12 月 29 日（这时我已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政协礼堂，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所谓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还有我。

那天，我知道总理要来参加，我曾考虑这是我学习后第一次见总理，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我想《白毛女》那种唱法五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我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要见公婆”，就让总理听一听我学的新唱法吧！那天我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我就不相信这样唱法是属于我的，也明知总理不会承认我这种唱法，所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悬悬乎乎”唱完之后，出了一身大汗，心里难过极了。

音乐会后有一段联欢舞会，通常总理总会邀我跳一场舞的，可是这天的音乐会结束后，总理只跟王玉珍、张权等同志说说笑笑。我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晚会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像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我安排在总理的右手，我惭愧得几乎流出眼泪来。

这晚，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也别无选择了，我决心把“自己”我回来。

（三）今晚你的歌声使我回到了延安

1963 年 5 月初，也就是距政协礼堂独唱会 4 个多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

信，请通讯员送到了中南海南门国务院，告诉总理6日和7日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我将演出独唱节目，请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选其中的一天来看。果然，7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剧场，那天我唱的是《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那时也还没有把演出后请首长上台和演员一起照像形成一种“制度”。没想到落幕以后，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田雨同志陪同下，从台侧走到舞台上，总理满脸兴奋，握着我的手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邓颖超同志也和总理一起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到了延安！”

（四）关于音墙问题

196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20周年，邀请了当年在延安演出《白毛女》的原班人马在天桥剧场再次上演《白毛女》。7月2日总理到场，根据我的记忆，这是自延安之后总理第一次再看我们演的这个戏。他看了之后认为获得很大成功。但对乐队伴奏提了不少意见。

总理的座位被安排在池座的最中间，他对陪同看演出的导演舒强同志说：“我在延安看《白毛女》的时候，王昆的嗓音是很嘹亮的，那时剧场也不讲究，也没有麦克风，但是唱词句句清楚，怎么今天什么都听不清？”导演解释说：“这个天桥剧场建筑有毛病，前几排愈好的位子音响效果愈不好。”第一幕结束到剧场休息时，总理移到二楼就座，第三幕结束时，总理又上到了三楼的紧后一排位置，为的是自己亲自去察看、去听、去判断，找出听不清演员歌唱的原因。那天，总理最后的结论是：主要原因不是剧场不好，是乐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音墙”。乐队人太多，声音太大，喧宾夺主。他对指挥黎国荃说：“也可能象你们行家说的，是乐队配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歌剧是以演员的唱为主的嘛，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人家来买票看戏，听不见唱怎么行，这也是群众观点问题。”

周总理日理万机，来看一场戏，三易其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理的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时刻关心着文艺工作的改进，时刻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五）伟大的政治家、浓厚的人情味

总理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人所共知的。

周巍峙同志长期在文化部做艺术管理工作，从创作、演出到和艺术有关的内事外亨，甚至组织每年的天安门游行的文艺大军等，（总理曾戏称他为“艺术总理”），其中有些重要的事情总理常常是一竿子管到底的，因此，有时候总理的电话直接打到我们家里来，时间也往往是在深夜。

通常都是总理的秘书先要通电话，其实秘书来电话已说明是谁来电话了，受话人知道国家总理深夜来电话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没有不全身心在倾听的。但是，总理从秘书手里接过电话，还是首先通报一下姓名：“我是恩来呀！”有时说一句：“对不起，打搅你了。”

总理不但对干部平等相待，就连对小孩，只要他老人家当时有这个功夫和小孩们说说话，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他们。我的大儿子周七月幼年时见总理的机会较多，有一次总理弯下腰来问他：“我知道你姓周，你是小周罗！我是老周，那么你爸爸是什么周呀！”“噢，你爸爸是大周。老周、大周、小周我们三个周，五百年前是一家！”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开玩笑。

大概是 50 年代末，有一次在政协礼堂看演出，廖承志同志先到，已坐在中间一排左侧最边上的一个位子。总理后到，从左边甬道进场，他的位子廖承志同志在总理面前象孩子般的淘气，他有意挡住总理，不收起自己的脚，总理将拳头高高举起，貌似用力但却轻轻打在廖承志已摊满座位的大肚子上，廖承志双手接住总理的手，嘴里连说：“投降，投降！”站起身来让总理过去。此情此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曾被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私生活中保持了如此纯真的童心，保持了如此浓重的人情味而感动。

总理记人姓名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界他的朋友很多，不管是哪个时期，哪个剧种的演员、导演、编剧，只要总理见过一面，说过一次话，甚至介绍过一次之后，不管相隔多少时间再见，总理都能准确他说出这个人的姓名、籍贯、何时演过什么戏，以至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刚刚向总理介绍自己叫华松如，天津人，总理马上问：“你是华世奎的什么人？”“你祖父还在么？”于是总理反过来向华松如介绍：华世奎在清朝是什么官、有什么学位等等。中央歌剧院的演员邹德华，1950 年从美国学成回来，总理认识她之后，每逢公开场合，总理总要向人介绍：这是原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农业首席代表邹秉文先生的女儿。并介绍她哪年回来，在什么地方工作。总理这么富于人情味，又善于做统战工作，不知征服了多少党内党外人士的心。

（六）对演员们的父母情

总理对演员、艺术家总是那么宽容，那么关怀备至，对老演员亲切，对年轻的演员也从来不忽略，总是给他们以鼓励和关心，为他们解决问题。

60 年代初，总理召集中央直属文艺院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在紫光阁开座谈会，直接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当有人汇报到芭蕾舞女演员在月经期间为了坚持演出，只好打针吃药强行“闭经”的时候，总理猛地把头往后一仰，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喊了一声：“哎——呀！”当时总理的声音和表情我至今清晰在耳、历历在目，我也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觉得总理象自己的长辈，不是一般的长辈，而是象自己的父母，他那一声：“哎——呀！”只有父母疼爱自己儿女的痛楚时，才会从内心中发出来这样的声音。

从那以后，中央文艺团体执行了一条没有成文的“决定”，舞蹈演员和歌唱演员特别是女主角，演出时遇到经期可照例享受一天假日，不参加演出。当时总理还说过：“如遇到哪个团的领导不执行这个‘决定’，演员可以抵制；甚至可以打电话给我。”

1962 年 12 月 29 日在政协礼堂 11 位女高音独唱音乐会上出现的一幕，也是我终生难忘并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的：张权同志自 1957 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发配哈尔滨，第一次来北京在总理面前表演，那天张权同志的演唱特别动情，演出很成功。按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她还是一个摘掉政治帽子的一个不可接触者。当她唱到第二首歌时，总理从座位上学着一杯茶，走到台口，双手递给了张权，当时四座为之一震，台上的人台下的人各人有各人的思索，我顿时感到有这一杯茶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张权请求政协工作人员把那个茶杯赠给她作为纪念。我内心受到很大的感动。1957 年后我曾为文艺界几位有才能的好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平，有时尽我所能地偷偷安慰他们或给他们的子女以帮助。1958 年我受过全院范围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同情右派是我的罪状之一，对这些批评和斗争，我一次都没有往心里去过，

我心里总想起总理的那杯茶。

（七）充分信任干部

那是在 1963 年。

北影为东方团的建团节目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彩蝶纷飞》。当时的副团长田雨同志参与领导这次拍摄工作，田雨同志对影片中印度舞的布景和柬埔寨宫廷舞蹈的氛围不满意，认为有些俗气，但她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影片已到最后的工序，如不修改，成为定稿，不但会造成浪费，更可能使柬埔寨的皇室及印度艺术家不满。为此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联欢晚会上，田雨和张均向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总理当机立断，把我叫去，对我说：“你代表我立即去北影找汪洋同志，假如汪洋不在厂里，就去他家，就说影片暂停，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秘书给我安排了总理的座车，直驶北影（那时北影在安定门外小关）。一路上我感到总理是那样相信干部，既相信田雨、张均同志的意见应该考虑，也不轻易指责北影，而是让影片暂停，总理也相信我能去完成他的嘱托。总理的工作作风是那样雷厉风行，事不过夜，马上解决问题。

（八）二十年后的《农友歌》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成功，是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本身是那么壮丽无比；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词作家、曲作家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是因为《东方红》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了包括作词家、作曲家、导演、演员（包括业余演员）在内的三千人努力的结果，我在完成《农友歌》的唱段时，结合湖南语言的特点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同时我的歌唱方法，由于先后向林俊卿、王福增、曹静波等同志学习，并结合戏曲、民歌唱法锤炼之后，已比较得心应手，每次演唱这首《农友歌》都感到是一种自我享受。毛主席看过《东方红》后特别给了我以称赞，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几次说过：“王昆是 20 年前的白毛女，20 年后的农友歌呀！”直到 1964 年总理访问亚洲 14 国归来，在紫光阁接见东方歌舞团部分演员（那天总理用自己的工资请我们吃了一顿简单实惠的饭），临别和我们一起合影时，总理还提起《农友歌》，总理说，“王昆！你的《农友歌》唱得好！今天我要鼓励你！来！这次你坐在中间，我坐在边上。”总理又拉张均同志和我同坐中间。并说：“为什么总是我坐中间，演员坐边上，没有这个道理嘛！今天改一改就不行？”我们哪里肯让总理坐边上，可是在总理的坚持下，我们哪里又能够不尊重总理的安排呢？

那天我心中对总理的鼓励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 1961 年政协礼堂总理对我的批评，哪会有今天对我的鼓励呢？总理对演员坦诚相见，见到缺点就批评，有了进步就鼓励，他那长者风度，坦荡的胸怀，又一次使我感到一种父母般的温暖。

（九）十里长街送总理

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发生的超级浩劫，是人类进入文明历史之后罕见的。

几个人搞阴谋可以把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抓起来，下大狱、流放、虐待，置于死地，有的领导人含冤故去，成千上万个革命几十年的干部和正直的老百姓可以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挨打、受辱，株连九族。而一个同家政府的总理却不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他想保护贺龙元帅保不了，他想保护艺术家刘开渠，还得费尽心思来个“迂回战术”。一个国家总理想解救成千上万被冤枉的好干部，

却无能为力，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啊？

1970年和1973年总理两次为我和周巍峙所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争辩，他说：“……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作了《志愿军战歌》影响很大嘛！至于王昆就更没有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在延安她首演了《白毛女》，对革命文艺工作是有贡献的……”。两次讲话不但没有使我们得到“解脱”，反而受到江青们变本加厉的迫害。这使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不是一两个人受委屈的问题，而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我们个人已无法向恶势力公开抗争，不论是在“集体所有制的监狱”（指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还是下放军队农场和“五七”干校被“劳改”的时候，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盼望着……我们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嘴里跟着喊祝江某人“身体健康”，心里却暗暗地力周总理身体健康祝福。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我暂时离开了那间用木条钉着窗户、并经常在门外上了一把大锁的房子，晚上可以回家了。我们每天希冀着经历十年黑暗的中国，快快“天亮”起来，我们和几十万家庭一样希望骨肉早日团圆，然而，我们听到的是总理的身体有病了，总理病危了……

1976年1月8日清晨，我的二儿子周月匆匆地从街上赶回来，他说看见成串的红旗牌汽车进了北京医院。过一会儿收音机里放出了哀乐，啊！天哪！不好了！天塌下来了！我穿上大衣奔到街上，我已不记得怎样走过去的，只记得那天的风特别凛冽，只记得我面前的马路一忽儿往左倾斜，一忽儿往右倾斜，路旁的雪一忽儿是白的，一忽儿是黑的，泪珠滚泼在胸前，胸襟冻成了一块硬板。我站在北京医院住院处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踟蹰，我知道总理就在眼前那个房子里，但他再也不会招手让我去到他跟前说话了，我的心好疼好疼啊！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肝胆欲裂。我向北京医院门口三鞠躬，忍不住嚎陶大哭，身体失去控制跪在了地上，把脸埋在双手里，一个女民兵过来把我抓起来，带到一个房里盘问，直到她给我团造反派打过电话，证明了我的身份之后，才令我回团向造反派报到，噢！我明白了，“黑帮”是连向总理致哀的权利都没有的。

此事已过去16年了，16年中我常常幻想，当年抓我的女民兵，也许有一天突然来找我，向我解释当年她的行为只是在执行任务或者是受了蒙蔽，如果她说自那以后她觉悟到当初不应禁止我哀悼这一伟大的人。那末，我就可以成为她的好朋友了。

我们扎了花圈，不敢写真名，只写上了周月（大儿子周七月因受江青、康生迫害，被判13年冤狱）及全家人。晚上，全家步行送至天安门广场。

总理到八宝山那一天，我豁着再挨一次斗，最后也要去送一送老人家，我步行到南河沿路口，千百万为总理送行的人早已站满了东西长安街，总理灵车过时，我跪在一片嚎哭的人们中间，我为我们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失去一个卓越可贵的领导人而痛哭，为我们这些尚在“四人帮”的魔掌中忍受厄运的数万干部和家庭失去了总理这一臂的帮助，因而失去了一线希望而痛哭。我的泪在十里长街上洒尽了。

16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哭过，母亲去世，我很难过，却没有掉过眼泪。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在世时，对国家有大劳大功，您的去世，唤醒了人们，人们呼喊您的名字打倒了“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十）最恶毒的矛头指向总理

“革命”进行到1969年时，我的政治命运被逐步“调级”调得也差不

多了。“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直到“大特务”帽子之后已没有更新更大的了。“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也已经“凑够”一百例了。

上至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元帅、将军揪的差不多了。江青、康生们把罪恶矛头指向总理，批什么孔老二、批什么中国现代大儒。

忽然一天夜里，团里的一派组织把我叫到一间空房突击“提审”。这次夜审不同往常，往常还要迂回一番，象演话剧一样拿腔拿调，这次几个造反派众口一词，矛头指向很明确，要向总理泼污水：“你对总理有过什么想法？”“关于总理，你说过什么不要脸的话！”起先，我还以为我写过的材料中有笔误，或许把敬爱的周总理写错一个字？或许誊写材料时由于太疲劳，灯又昏暗，眼底出血，致使抄错了行，出了差错？但我看他们这次逼供很特别，气很粗，一种有恃无恐的架式。

突然，我的头脑里象被雷电击中一样，一下子想到不久前曾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过一条消息！江青点了一个外交部女同志的名，因为江青发现一张集体照片中这个女同志坐在了毛主席身边，于是江青给了她一个罪名“不要脸”。我一下明白了，又是这个江青在搞鬼，她要借着整我对总理下毒手，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大声地回答问题，为的是让外面有可能听到的人知道他们在整总理的黑材料，使用的是何等卑鄙的手段。之后在写书面交待材料中，我有意将他们如何逼供、诱供写清楚，为的是给这些人的罪行留下记录，例如我清清楚楚地写上：“你们要我交待对总理有什么想法”、“你们要我交待和总理的关系”等等。并把这些材料的底稿保存好。后来工宣队进驻东方歌舞团，工宣队中毕竟有些有社会经验的人，当然他们懂得这就是在货真价实地整总理的黑材料。他们当中或许有人主持正义，反对整总理；或许有人当时还拿不准，整了总理将来究竟是能飞黄腾达，还是落得可耻下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千方百计地夺去了我的底稿。

1974年正是“四人帮”掀起批周公，批当代大儒、批孔老二的高潮。有个造反派的头头，多次给江青写信发誓说“关于王昆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中央领导的指示：一个是您的批示（按：指江青公开宣布周巍峙这个人很坏，他是法国特务；王昆也很坏，他可能是香港特务）；另一个是总理的讲话，我们是按着您（指江青）的指示办的。”

（十一）“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的成员是1970年。舞蹈演员李亚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从舞蹈学校分配来团的演员，那年她被借调去为一个晚会报幕，那天总理陪外宾观看。当总理知道李亚媛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之后，象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似的，对她十分亲热，总理对她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1974年总理完全知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东方歌舞团已被江青解散，下放军队农场劳动好几年了，他完全知道以后再见到东方歌舞团的人已很不容易了，这两句话是他对东方歌舞团从1962年至1966年四年业绩的肯定；是对“四人帮”解散东方歌舞团的不平；是对未来东方歌舞团的重大嘱托和希望。

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

1960年12月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仰光参加缅甸的国庆，同时出席中缅边境条约的会议，代表团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其中有电影工作者及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的演员们。

会议期间，总理招待缅甸吴努总理和驻缅各国使节，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 14 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反映极为热烈。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他们国家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时，他们的使节和代表都来和周总理及中国代表碰杯，说些千感万谢的话，甚至当场跳起来、唱起来。当晚也有些国家的使节打电报回国，作为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褒奖。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的路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联络会副主任张致祥进行了研究。在飞机上作了一个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一个政府的首脑在飞机上作决定成立一个歌舞团，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呀！

总理回国之后，亲自主持从几个自治区商调最好的演员，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和已在北京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这次调到东方歌舞团来的。

周总理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建团时有 30 多个演职员，团长暂时空缺，后来从广州军区调来了戴碧湘，副团长是田雨同志，我是艺术委员会主任。

1961 年到 1962 年是“大跃进”的后期阶段，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反右派”仍心有余悸，对于东方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大多数反映是好的，但也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或冷眼观看，等待我们有朝一日挨整，因此遇到我们拿不准的问题，就直接请示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有一天，两位总理都在场，我们问：“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大幅度地扭胯，这些舞蹈我们学不学？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总理说：“你们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应作些调查研究。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非洲舞蹈是扭胯的，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你们给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们国内如何演，也要看情况，你们可以扭得含蓄些。”陈毅副总理操着纯粹的四川话插话说：“噢！我才不信，我们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肚皮就把中国扭垮了。”总理也哈哈大笑说：“总之，以我为主嘛！以我为主，是以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是否有利为主。”

有一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客人在人大小礼堂看了我们学的朝鲜舞蹈《鼓舞》，由于我们服装上的飘带的花纹和他们原来的不一样，客人向总理提出了意见，为此，总理特地向我们查询：“为什么会不象，原因出在哪里？”“他们反对民族艺术中掺进洋的东西，是否你们给人家改了？”“过去我同你们说过，一定要学好学象，因为这不仅是艺术问题，如影响了人家民族自尊或习惯，就是政治问题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 年 9 月东方歌舞团恢复了原建制，我们以总理最后的嘱咐“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为全团人员的精神支柱。

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教导我们的“学好学象”，已深入到东方歌舞团的几代后来人的心中。

1985年8月20日，我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演出，那次我们表演了坦桑尼亚舞蹈《乌卡拉》，当时我坐在总统后排。尼雷尔总统起先以为在台上有着黧黑皮肤浓密的头发使出浑身解数扭动着胯部的演员，是他们来华的留学生，继而就对我们的演员称赞不止，我回头看见坦桑301尼亚的随员们，有的竟抱着肚子从座位上滑下来，喘不过气。

每次演出的成功，都使我再次体会到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手建立东方歌舞团的远见卓识，进一步体会到总理为东方歌舞团制定的方针的正确。

东方歌舞团恢复建制以来，我们以培养受全国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大多数干部所喜欢的唱歌、舞蹈及演奏人才为己任，以演出受广大平民百姓及广大干部欢迎的歌舞晚会为目标。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我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更加增多，东方歌舞团的工作领域更加扩大，东方团的舞台色彩斑斓。久演不衰。我们所追求的“既扎根在民族的土壤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晚会风格，已成为东方歌舞团的特点，东方团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始终是我国最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文艺团体之一。

我们敬爱的总理啊！我们多么期望您回到世上来再次检阅我们的队伍，再次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看看我们是否按照您的嘱咐，保持了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洁白的骨灰已随着祖国的江河注入了中华大地，那么，就请您委托大地上的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工作吧！

（十二）犹闻总理击节声

1955年国庆节招待会是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那时我正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国庆节放假回到北京，那天我也参加了招待会。

席间总理的秘书走到我的座席这边来说：“总理请你过来一下。”我立起身来走到总理的身边，看见田华已在那里了，总理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田华，引我们到他同桌的一位女宾旁边。记得总理说：“这是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先生，她们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已在日本演出了。”总理向松山女士介绍了我们俩人，并对她说：“你已走在我们前边了，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向你们学习。”然后总理转身对着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说：“同志们！朋友们，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在延安第一个扮演歌剧白毛女的王昆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先生，松山芭蕾舞团已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整个大厅响起了掌声，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新闻记者匆匆地向我们这里移动，我看见松山先生很激动，当总理和我们三人一起照像时，总理坚持站在旁边的位置，他说：“你们三个白毛女不能分开！”

总理很称赞松山芭蕾舞团以古典芭蕾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现实题材的勇气，同时也称赞松山先生在日本的社会制度下敢于上演中国革命题材的勇气。

松山树子先生1955年来中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成行的。当时日本国内还处于“只要谁一提到中国，人们就会对他避之唯恐不远”的情况，松山不能在日本领到访问中国的护照，而是从赫尔辛基转道而来的，松山先生

没有钱，卖掉了她丈夫清水先生的祖产——800 平米土地，才凑够单程路费。清水先生在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曾说：“周总理从松山首次访问北京那天起，就理解我们，使我们和中国建立了 30 多年之久的关系。”“他是那样一位以诚相待、能理解人、帮助人的领导人。”

从 1955 年至今已 38 年了，由于中国和日本政府之间恢复了邦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年复一年地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和平环境，每每回忆起 1955 年国庆招待会上总理“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情景，我都衷心地敬佩总理的高瞻远瞩，并为我们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总理而自豪。

1958 年 3 月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华演出《白毛女》，为了她们的演出，我们中央歌剧院停下了歌剧《白毛女》的公演，把天桥剧场让出来。她们很想看看歌剧《白毛女》，我们选择了一晚在她们演过芭蕾舞《白毛女》观众退场之后，突击装台，化妆，为日本朋友演了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总理邀请她们回娘家来探亲的，我们演完之后，日本朋友几乎个个都用手遮着哭肿了的眼睛跑上舞台和我们拥抱，树子的热泪流到了我的面腮上，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是心连心的异国姐妹，是周总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同台人。

1977 年 5 月我随天津歌舞团到日本访问演出。6 月 21 日到松山芭蕾舞团做客，树子和清水先生及全体团员在宽绰明净的大厅里接待了我们全体。

我和树子是自 1962 年北京相会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时隔已一十又五年了，但好象是在昨日，这时我被“四人帮”断续关押十年之后刚被解放出来不久，不知是为什么，那次我不住地暗自拭泪，总觉得总理也许过一会就来和我们共旱团聚的欢乐。这时的树子也已是谢绝表演生活从事教学多年了，那天她竟然又重登足尖鞋，穿上松山芭蕾舞团第二代“喜儿”森下洋子（树子的儿媳妇）的服装，跳了一段《北风吹》，我也亮起喉咙为她作了伴唱。

回到旅馆后，我竟用我从来没写过诗的笔写了一首诗：

赠松山先生

1977 年随天津歌舞团访问日本，6 月 17 日拜会松山芭蕾舞团，松山先生舞《北风吹，雪花飘》一段，我为之伴唱，忽忆当年周恩来总理介绍先生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因以成句，书奉松山先生。

五五北京初识君 总理牵手且叮咛
三个喜儿传佳话 异国姐妹同台人

七七东京杜鹃红 鬓丝几缕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 犹闻总理击节声

1977 年 6 月 21 日在日本埼玉县大宫市写成。

周总理逝世时，松山先生曾说：“对于松山芭蕾舞团来说：总理是慈父般的人物。”

“周总理是懂得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我和树子有同感。

敬爱的周总理！你走了已 16 年了，但你在我们的心里一刻也不曾离开过。

1992 年 3 月 12 日

腊八粥

冰心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橱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1930年1月7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们也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洗红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他说：“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他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1976年1月8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泣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

1979年2月3日凌晨

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诲

徐肖冰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已有 16 个春秋了，他那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革命精神、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举世罕见的，也是他留给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是炎黄子孙最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指引我参加革命时，我只是一个不满 20 岁的小青年。如今，我也是一个 76 岁的老人了，每当缅怀他为开创党的电影事业付出的艰辛与建立的功绩，他对电影工作者的爱护与关怀，尤其是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对他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难以克制，并仿佛他依然还在我们身边。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平远郊宛平县的卢沟桥对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从此，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和生活在大后方的众多的青年人一样，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要投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那时，我在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任摄影助理。有一天，我和从上海来山西采访的新闻记者沈逸千、余仓硕路遇，志同道合，希望早日赶赴前线，为的是向海外报道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实况。我们一路之上经受了从来没有经受过的艰苦生活。当我们到达离平型关不远的大营附近时，不料遭到从前线溃逃下来的一伙国民党的散兵拦路抢劫，差一点送掉了性命。在我们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幸亏遇上了开赴抗日前线的一支八路军队伍，他们非常亲热地接待我们，让我们饱餐一顿，并通过八路军的兵站把我们送到太原。八路军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回到太原，太原已成了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人们都在惶恐、混乱与焦急之中过生活、求生存、找出路。西北电影公司已经决定搬迁到四川成都去经营。我的老师吴印咸则打算到上海去谋职业，我是下定决心要参加八路军的。吴印咸同志为了鼓励与支持我而把他自己的一台“莱丁那”照相机送给了我。

9 月间，我在空袭警报声中又一次跑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去打听申请参军的答复，办事处秘书赵品三告诉我，今天我们的周副主席要见你。顿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感到非常紧张。赵秘书把我带进一个有一排平房的小院子，我一眼就看到周副主席站在院子里和一位同志在议论什么，周副主席朝我一看就说：“来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笑呵呵地把我介绍给叶季壮同志。

“他叫徐肖冰同志，‘小兵’，这个名字好记，好记。”

周副主席的几句风趣话，使我立即感到和蔼可亲，那紧张的心情似乎消掉了一大半。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呵？”

“我是浙江桐乡县人。”

“桐乡县我听说过，沈雁冰就是这个县出生的，还有沈泽民、金仲华和张琴秋都是桐乡人。这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叶季壮同志和赵秘书都在频频点头，显然都很熟悉，而我自己是个桐乡人，却对周副主席提起的这些有名人物感到陌生，表情很不自然，只好问非所答他说：

“那时我家很穷，桐乡县也很穷，所以从小就离开家乡到上海电影公司当学徒。”

“在哪家公司啊广周副主席问。”

“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不久进了电通影片公司，后来还在武昌的蒋委员长行营政训处电影股干了9个月，又回到上海进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我在西北电影公司只有半年时间。”

“你在好几个电影公司工作过，从南到北就有不少社会经历和生活体会吧？”

“主要在电通公司担任《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等影片的摄影助理，受到夏衍、阿英、司徒慧敏、聂耳、吕骥和很多先生的思想熏陶，使我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同时在上海三年多几乎天天可以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英国兵、法国兵、日本兵还有美国兵，他们欺负我们太甚了，恣肆侮辱、毒打，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这同亡国奴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参加过国民党政训处电影股的卫作，自认为这样就可以报仇雪恨了。一到那里便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军官，政训处长贺衷寒经常向我们进行反共宣传，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简直使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不久，我是冒着危险开小差回到上海的。在上海，我进了明星公司。现在是在西北电影公司当摄影助理，前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吕骥先生，他非常赞成我参加八路军。”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呢？心里有点打鼓，但我感觉到周副主席似乎表示同情、理解而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不跟西北电影公司到大后方去，我要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拍摄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的电影。”

“你这些想法是好的。现在你是西北电影公司的一个职员，而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阎锡山。”周副主席朝着叶季壮同志和赵秘书说，“这种关系，我们同雪枫同志一起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同意你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解决了。”当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周副主席笑着说：“至于拍摄八路军的电影，这种想法是好的。我知道，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也是很重要的宣传与教育的工具，要搞，总得需要一些专业人才，需要一些技术设备，需要一笔经费。可是在目前我们想多拍些照片都有困难，何况拍电影？从实际出发。我们实在摆不到日程上来。”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太幼稚了，把拍摄电影看得太简单了。

“不过，我们解放区将会发展得很快，全国老百姓拥护我们共产党，支援八路军，我们完全有把握有信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这样一场伟大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党不能没有自己的电影这一行，我想我们总是有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建立起来。当然，这要看时机，也得有个准备过程。”周副主席的话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他又接着说：“那么你来了以后，可以到前线去。最近，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住在我们招待所，他们休整一下就到前线去。这里经常有人到前线去。过去，你在电影行业里工作，那是一个小圈子，你生活在大城市，那是一个畸形社会。正因为如此，你先到我们部队里去看看这个革命大家庭，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革命大熔炉，这对你来说，会有很多的不习惯，生活很紧张很艰苦，有时甚至吃不消。”这时我感到周副主席怕我吃不了苦，所以我一再表示自己不怕吃苦。周副主席继续说：“思想上有准备就好。我的体会是大家都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也就不觉得艰苦了。”叶季壮同志接着说，“过去，我们长期连咸盐也没得吃，后来，国民党逼着我们离开苏区，在过草地、爬雪山时有时连树皮草根

都吃不上，凭两只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不是也过来了吗？这就是说干革命不怕艰苦是不够的，做一个革命者，要有个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才行。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起码有饭吃、冻不着、也有个住处。这也是来之不易的。”这些意思我好像都能听懂了，就是无论多大的艰难困苦都要忍受得住。但是我对于参加革命要走那么远的路，有时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还得同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却是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周副主席又说，“现在，我们战士们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也还可以。我看你还是先去前方，从这里去前方就很方便。首先你应该到前线去同战士一起过过生活，即使听听枪声炮声，这对于你今后要走的漫长的道路也是很有好处的。以后，你再去延安，我们党中央所在地，那里有抗大和其它学校，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受比较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上有个好基础是最重要的。”这时，有人给周副主席送来一叠文件，我怕耽误了周副主席的公务，就边起身告辞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临别时，他一面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一面告诉赵秘书：“你再同他谈谈，还有什么问题，由你来帮助办理吧。”

此刻，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对历史、对现实、对事业、对人生与前途……确实有点开窍，心胸开阔多了。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作为一个新入伍的抗日战士，一个年轻而普通的电影工作者，在踏上革命征程的时候，能够聆听到周副主席如此亲切的教诲，这是我一生中幸福的。

我没想到

黄宗英

是奇遇？是缘分？是运气？这辈了总是碰到一些出入意外的事。

在旧社会，我 23 岁时，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到了新社会，我又变成新解放区的青年代表了。1950 年我 25 岁，一天，我接到于伶同志电话，要我马上去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问：“这个会在浦东大楼开？还是在南京路开？我骑车赶来。”

于伶同志答：“在波兰开。途经莫斯科要停留。你去北京报到吧。”

“10 月底，北京的天最蓝。”我在夏衍同志送我的紫红布硬皮笔记本上写着诗，登上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代表团有 60 多位团员，一个个名字都够我一愣一愣的。

两场大雪后，代表团回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做总结。一天下午，正开小组会，秘书组一位同志来到我身旁，轻声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好。是在我屋里还是在……”

“车来接您了，您穿上大衣吧。”

“那我把人家送我的礼物也带上，好玩极了。”整个代表团除了团长郭沫若同志外，就属我的礼物多，有好些美丽的娃娃。我认为是夏衍同志要见我，退回去 40 年，我也当他阿伯的。

黑色的小汽车载着我驶过长安街、南池子，驶进有战士站岗的大门。红墙透迤有致，丛林炫碧映雪，车在一幢房子前停下，有人给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童话里或话剧里才有这样的场景，我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东张西望，没觉得这间客厅有什么特别，沙发套子都洗得泛白了。外间看来是个书房，没得主人同意，不便去浏览。主人是谁呢？我坐在沙发上翻画报，屋里挺暖和，经历了 9 天 9 夜的西伯利亚列车的长途旅行，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我睡着了，美美地睡着了，连梦也没有做。

我不知道我怎么醒的。还好，我居然醒了。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望着我。我推开不知是谁为我披的大衣，边叫喊边站起来：“噢——我认得你！我认得你！游行的时候，会场里头都有你的照片。”

他笑着，仿佛是说了一句：“我是周恩来。”也许没说，也许是公务员送茶来，叫他总理。而我则沉浸在醒来竟然看到了游行标语牌的人像，不是梦、也不是在演戏：“真有意思！”

“快喝杯热茶吧。”

我把杯子捂在手里转呀转呀的，“有意思……好玩……”不管是谁要见我，起码的礼貌我也不该睡着啊，窗外已是暮蔼依依，我好难为情，说来大家不信，当时我既没闹清周恩来是谁；也不清楚总理是管什么的，我只觉得标语牌上的人进入我的现实生活挺神奇。

“昨天我请来了你年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代表张澜先生来聊天，今天请年纪最小的代表——小黄你来聊聊。谈谈你们一路见闻，都看到了什么？随随便便讲讲故事。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们这一路可有意思哩！”我无拘无束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说到我们是离开祖国之后在西伯利亚列车上听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战报；我说到廖承志在车厢里拉起手风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都会哼了；说到蔡廷锴将军在餐车联欢会上做游戏；说到莫斯科的红场、地铁；

说到华沙在一座废墟上，以最快速度建起了和平大会会场；说到参观奥斯库宰维集中营后，巴金半夜里大声惊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大会会场传来受阻未能与会的黑人歌唱家的录音讲话和绕梁三日的歌声……讲故事的一会儿忍住泪花，一会儿唧唧咯咯；听故事的也极专注，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蹙起双眉，一会儿张大眼睛……

天暗了下来。公务员进来开灯、摆碗碟，邓大姐来了，留我一起吃晚饭。吃我最喜欢吃的薄饼卷肉丝炒绿豆芽，喝小米粥。我吃得很香。饭桌上，我又讲了些苏联和波兰的好客的主人，怎样盛情地给我们吃“中国饭”——烘面包里夹大米；红菜汤里下饺子，象上炸牛排似地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盘酱菜……

“总理，邓大姐，我请你们欣赏人家送我的礼物。”吃完晚饭，我打开带来的小箱子把礼物排列展示在长沙发上，自己坐在地毯上讲礼物的来源。而我是听公务员这么称呼，我才学着称呼的。这个夜晚，他们对我只是一对和蔼慈祥好客的夫妇。

“真漂亮。”邓大姐说。

“我的礼物最多，我送你们一人一个，你们自己挑，可不许多拿。”我真怕周总理拿我的娃娃。还好，他们俩各自拿了一枚波兰共青团的团徽。我不过意，又取了一对用呢料剪制的色彩斑斓的和平鸽别针，站起为他们一一别在胸前。

总理还在端详我的娃娃。我问：“总理，你能说得出哪个娃娃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吗？”

总理兴致勃勃地：“你把底座的字蒙起来，让我猜猜看。”

呀，总理猜对了好几个，他怎么那么大学问！当他面对一个黑人的造型时，他唱起了：“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 I was Young and gay……小黄你会唱吗？”

“Old Black Joe。”我和着：“I'm coming, I'm coming……”

一曲终了，总理半晌不语，秘书送进一叠文件。

“我该走了。”我把礼物收进小箱，从地毯上站了起来。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故事。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总理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以后你到北京来，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还想听你讲故事。”

“暖。”我穿上大衣，答应得挺干脆。

“小黄你学习马列主义吗？”总理象问一个小学生。

“组织上规定的学习时间，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学。”

“你自己呢？”

“自己不学。我啃不动。”我不经意地，也很坦率地：“一碰上理论我脑子里的小门就关上了。”

总理又哈哈大笑，旋又：“还是应该学学。”

我哭啼呜拉地点点头，连“暖”字也没敢应声。

我离开了透迤的红墙和花园里的点点灯光。以后，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是去了中南海西花厅；也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总理是除了国家主席之外，统管着全中国的大事；也才知道周恩来就是影剧界一直常常提到的“胡子伯伯”。噫，我怎么竟然在等着总理接见的时候睡熟了？！

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每一次他都要我讲故事，讲一讲我都看到了什么？去了哪些新地方？结识了哪些新朋友？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

梦里。不过，我今生今世也没有用过总理给我的电话号码，虽然此时此刻我多想打个电话给他。

1992年2月22日重写

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时刻

夏梦

想起我们的周总理，他亲切的笑容、风趣的语言、洒脱的风度，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位杰出的伟人，他日理万机，却每时每刻关心着每个角落里的中国人。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当他和我们谈话时，我面前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思维敏捷、精力超凡。

记得在 1957 年的“五一”节，我和韩雄飞、费鲁伊（费穆的弟弟）、刘芳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和首都人民共度节日。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了我们，然后和我们共进午餐。总理举起杯中茅台酒，风趣地对我说：“最近北京感冒很多，我没有感冒，因为我喝了茅台酒。”我说：“我也不想得感冒，我得和您喝茅台。”在席间，我们无拘无束地谈天，就象回到家里一样。

在联欢舞会上，我和总理跳舞。在跳舞时，我说：“请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点指示。”总理笑着说：“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影片团结华侨，宣传爱国主义。”在和总理共舞时，记者拍了不少照片。当我把照片拿回电影公司时，同事们看着照片笑着说：“你平时拍的照片都是正面的，这回却全是背面的了。”我也笑了。但我心里在想，能有机会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拍照，就是留个背影，我也是从心底觉得非常荣幸的。

还记得那年，在广州举办全国戏剧会演。我和陈娟娟从香港过来参加这次盛会。在座谈会上，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还送了我一块白绸（尼龙制品）。总理说：“这是我国第一次生产出这种产品。”我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一直仔细地收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每个百姓的总理。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个百姓的心中。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吴雪

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所崇敬。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却的是周总理的教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讲话总是充满着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酷爱，在我的心中时常燃起为人民奋发的热情。我敬仰总理，因此我十分珍惜同总理的接触，虽然是有限的，对我却是永恒的，兴许是我行将进入耄耋之年，这种永恒的思念更显得有份量，仍在不断地激励着我。

那是在延安时期的 1941 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个戏《雷雨》在党校礼堂演出。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年轻人，对这次演出抱着极大的热情，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又饰演周萍，陈戈饰周朴园、雷平饰繁漪、尹文源饰施萍、朱漪饰四凤、田兰饰周冲，戏演得很紧凑，因为是在解放区，我们都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有一天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百忙之中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很紧张又非常地高兴，总理看过戏后，给了演出很大的肯定，特别是赞赏雷平和陈戈的表演。谈话之中，突然问起剧院需要什么，我们被这突然的提问弄懵了。谁都知道在延安演戏，要比在其它地方条件好得多，特别是我们有着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空气，大家表示已经很满足了，不再需要什么。我在总理身边只是轻轻地提到在延安想读些书。总理走后又去了重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继续为民族存亡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我们带着一种幸福感，继续排戏，继续演出。有一天突然从党中央所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总理从重庆给你们带回来一批书，派人来取吧。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时的心情，总理日理万机，还想着我们有个读书的愿望。书从重庆带到延安，不知要经多少艰难，当我们手捧这些书籍，我们意识到的是总理巨大的关怀。正是这一批数百本书，在延安青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的园地，也成为我们附近兄弟单位读书的地方，大家传递着总理送来的书，传递着党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就是在那以后，总理能叫上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名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更为伟大的征程。正是在总理的关怀下戏剧进入正规化建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 1949 年 4 月在北京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剧院的每个戏，总理都来看，有时从国外回来，由飞机场直接到位于东单的青艺剧场，他关心剧院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创作，还包括舞台灯光，演员的台词，特别是戏剧舞台与社会、人民、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那是 1959 年末，西藏出现分裂国家统一的叛乱，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制造所谓西藏的归属问题，田汉同志奋笔写出《文成公主》，1960 年 1 月总理亲自主持座谈会，有史学家、理论家、剧作家以及当时各方面的领导共议如

何把握这出戏。总理在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精辟地阐述和强调了《文成公主》的主题是民族团结友好，指出写历史剧，可以避免不利于今天的历史，也可以强调有利于今天的历史，但不可更改历史，要写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要自始至终围绕着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同时要注意松赞干布形象和的气概。总理责成周扬、汪锋、阳翰笙、吴晗、田汉为这部巨著的工作小组，指出戏要有规模、有气势。《文成公主》这部大型史诗戏剧，是总理亲自用满腔热情和一片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我在这部戏里饰演松赞干布，也是总理亲自指定的，文成公主由郑振瑶扮演。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艺术创造，它的影响远远超出舞台本身。总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人民戏剧同民族命运的血缘关系。

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迎利陀娑，青艺排演了《沙恭达罗》。将印度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这大概是首次，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陌生而又严峻的舞台实践。总理陪着印度使节来看这出戏，他用十分严肃而又十分亲切的话告诉我们：有了这部戏，我在同印度就中印关系的接触中，就可以少说许多话了。总理是把戏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让我们来意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使命。这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透澈的诠释。1964年的5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了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豹子湾战斗》。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叶剑英、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演出。当舞台上展现出当年延安的生活情景，听到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时，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场的演出时都未曾见过的。戏演到一半，总理特意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后台告诉我们：因为有事，他不能看完，有机会他还要看这个戏。总理又亲自委托陈毅同志看完戏后留下来给我们谈意见。

过了不久，总理果然到青艺剧场来看演出。这是1964年的5月31日，演出结束后，大家无比兴奋地围在总理周围，陪着总理向剧院东院的休息室走去。到了休息室门口，他停下脚步，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每一个人都让进休息室，他才最后一个进来坐下。总理问我们：你们这个组总是演兵的吧！这次谈话，就是从“演兵”这个题目开始的。他细致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多大岁数？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的学生出身？过去下过部队吗，身体如何？下部队生活，粮食够不够吃？……又询问了我们到部队深入生活的情况：到哪个部队？什么时候去的？都当了兵了吗？参加了哪些训练？射击和刺杀的成绩如何？……同时，还询问了剧院的体制、规划，其它几个队深入生活的情况。这是总理深夜向一个演出团体的一次实地调查，他那样细致，那样认真，那样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是在昨日。总理说：深入生活，向部队学习，是件不容易的事，长期下去就好了，你们不但要演工、农，而且要演兵。你们这个队，不要一会儿搞农村，一会儿搞工厂，一会儿搞部队。要抓住部队搞，要搞就搞透。你们青年剧院，可以一个队搞工厂，一个队搞农村，一个队搞部队，下决心搞他几年。你们下部队能把部队的本事学会就好了。学射击、学刺杀，还要学通信，学侦察等等，借此机会入伍。一次搞三个月，搞它四次就是一年，八次就是两年……总理问：你们年纪最大的是谁？当兵吗？50岁当兵，了不起。搞事业要有决心，要有毅力，象陈总的名字一样，陈总名毅，字仲宏。要有毅力，持之以恒。你们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过了15年的和平生活，缺少劳动。你们缺少战斗生活，缺少阶级斗争，缺少和工农兵结合……你们最好半年下部队生活，半年演戏。下去

生活的时间，一次可长可短，但起码要下去三年，到建国 20 周年纪念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演出高标准的好戏。算起来并不算长，才几年的时间。演员演得好，可以干到 60 岁。你们平均才 30 岁左右，应当有信心，总理要求大家到部队当兵，拿起枪来能打仗；到农村当农民，拿起锄头能种田；到工厂当工人，开动机器能出产品，总理进一步指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要与工农兵同吃同住，你们分几次下去，搞个四到六年，就可以出现新局面。

这次谈话，总理对《豹子湾战斗》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我作为这个戏的导演，真是受益匪浅。总理谈到有些作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造成先进人物的四平八稳，概念化和千篇一律。他对如何克服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剧本主题的分析中，总理谈到大庆精神在今天就是南泥湾精神的再现。提出自力更生是个严肃的战斗任务。他主张作为一个有着革命历史传统的青年艺术剧院，一年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下面，把戏送给群众，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最好机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总理十分亲切地以《抓壮丁》在延安时的演出同今天的演出相比较，认为那时接触民众，心目中都有个讽刺对象——地主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现在不如过去了，多少失去了那时的一股气氛，只是在演戏，由此他再次强调到生活中去，到斗争中去。

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邓止怡同志以导演的身份带着演员到宣北部队去当兵，是不会有《豹子湾战斗》的舞台氛围的。总理之所以肯定这个戏，其意义就在于体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关系。当我们悟到了这个深意之后，剧院采取了措施，在巩固部队生活的同时，由石羽同志领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山东，向农民学习，排演反映农村生活的《丰收之后》；由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大庆。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孙维世同志也是根据总理的教导在大庆生活，那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代，大庆的工人家属立志开创工农结合的大局面，建立大工矿的农业基地，由此结束石油基地的粮、油、蔬菜靠农民的历史。这个伟大的创举和艰苦的实践，被金山、孙维世以他们的才智形成一部很有影响的戏，那就是脍炙人口的《初升的太阳》。因此，总理的教诲，总是带着隽永的思想，带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记得，青艺还曾请于村同志带着一部分同志去大西北，周扬同志曾就此希望青艺在自身建设中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有朝一日在大庆召开各路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交流……

我追忆这些往事，我也留恋那些令人振奋的生活。同时，我也时有愧疚，有些事却带着点历史的遗憾，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总理的期望未能坚持。而今，当我重温这些往事时，我仍然觉着总理的思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总理一生，心中只有人民，人民心中永驻总理的音容，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党的戏剧工作的老兵，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我仍然想的是，只有人民的戏剧，才有戏剧的未来。

三件小事

李世济

在我成长过程中，周总理对我的教诲、帮助实在太多、太多，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谈三件“小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谈“小事”似乎是不恭的；但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总理的“小事”。在他是“小事”，对于我却成了大事——一生一世永难忘怀的大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 50 年代中期，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京剧团唱程派戏，总理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总理知道我有一个拜程先生为师的心愿，一次（大约是 1956 年），他和程先生一起看我的演出，总理就问：“你看她像你吗？”程先生点点头，答：“像。”总理又问“她是你的学生么？”先生回答：“她，是我的干女儿。”总理畅快地笑了：“干女儿——那好啊！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么？”先生停了一下，淡淡地笑着说：“干女儿，是家里人……”总理高兴他讲：“那么，我让她拜你当老师怎么样，由我周某人来请客！”程听了也很高兴，因为“由我周某人来请客”这几个字，实在是极高的政治荣誉。

非常可惜，总理说过这话，随即就去亚非拉访问了，程先生也去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我在北京京剧团是青年演员，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巡回演出。这样一下子就耽搁了半年多。1957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为了参加这次盛会，中国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我的京剧清唱也有幸被安排其中。程先生担任了整个联欢节的艺术比赛的评委。在筹备这件事时，总理又亲自托付了程先生，要他对我参赛的节目进行加工。后来，在北京开赴莫斯科的九天九夜的火车中，我不时去程先生的车厢请教，红线女也热心“旁听”。到了莫斯科，我们普通团员住在奥斯坦丁旅馆，程先生住在乌克兰大酒店，其间的距离比较远，担任总带队的周巍峙同志，便经常用他的车接送我去程先生那里。我的清唱在联欢节上得了奖，程先生也很高兴。他因有事先期回国，曾对我讲，“回去就可以拜师。”我回国之后，才知道他遇到一件事，心情不好，拜师的事又耽搁了下来。没过多久，我需要去内蒙巡回演出一周，走之前，忽然接到夏公（夏衍同志，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的电话，讲周总理又在关心你拜师的事。我讲自己马上要去内蒙，一周就可回来。夏公说，那好，等你一回来就举行仪式。我高兴地去了，也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谁知就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得到程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

后来，在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苦。总理见了，劝我化悲痛为力量，要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话，都是很普通的话，说话的声音也很轻，但是在此时此刻听来，却格外感人。总理啊总理，您一天得有多少国家大事得操心，象我这样一个普通演员的拜师问题，您还时时挂在心上，您还每隔三个星期就要向夏公打听一番我的近况！这，我又如何承受得起！

第二件事，是在程先生逝世一周年时，首都京剧界举行了纪念演出，我演了《锁麟囊》。演出结束，周总理请了部分演员到他家里吃饭。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梅兰芳先生也应邀出席。席间，总理先笑着讲，“我请大家吃饭，饭钱不收，但粮票是要收的，每人半斤。”

总理要我挨着他坐，我的另一边是梅先生，梅先生的另一边是贺老总，我们的对面则是陈老总。吃饭当中，总理给我挟了一筷子菜，放到我面前的菜碟里。那菜看上去粘呼呼的，像是一种什么胶质，我当即就吃了。总理问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摇摇头。总理讲，这是熊掌啊，是贺老总送给我的啊。

席间，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贺老总大发雷霆，仿佛点名狠批在场的一位官员，而那位官员脸红红的，只低头不说话。周总理出来“打圆场”：“老总啊，这些事你别操心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好了……”陈老总更有意思——他用自己筷子敲打自己面前的瓷碟儿，还一边吟着什么诗，有滋有味的。三下两下，把贺老总的火气给岔过去了，这时总理又转过脸问梅先生对我演出的印象，梅先生张口就说：“挺象老四——”大概是怕总理听不明白，赶忙又补上一句：“挺象砚秋。”

当然，这时总理又转过头对我进行勉励。

我从来没在这样的场合中吃过饭，我真佩服总理，他能从容不迫，把四面八方的事情处置得有条不紊，没有一丝忙乱。

第三件事，是在“文革”前的政协礼堂。那天，我和乐队准备坐电梯去三楼清唱。打鼓的谭世秀同志刚刚前脚迈进一楼的电梯门，就听见开电梯的服务员轻轻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谭世秀立刻把脚抽了回来。我就站在谭世秀的背后，我想，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都会这样做的。我们一转身，果然总理就站在几步之外，并且迅速走到电梯门口。总理问电梯服务员，脸上的神情有些生气：“你们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服务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谭世秀连忙为服务员开脱：“不赖他，是我看见您来了，想请您先上。”总理说：“不可能！任何人的眼睛都不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望到背后？”遂又转向了服务员说：“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让别人给我让位子？……”总理说着就想走，我急忙上前，总算把总理给拉住了。这时，邓颖超同志慢悠悠走上前，慢条斯理、轻声低气地指着总理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就是不能让他到了哪里，都叫老百姓立刻躲开……”最后，是我们提出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这间电梯，总理同意了。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力“提着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瘦”一些——就这样，我们十多人和总理紧紧拥挤在这一间电梯里我前心紧贴着总理后背，大家心紧连着心，向上升、又向上升着……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沙博理

我出生于美国纽约。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借复员军人可以重新学习的机会，我前后上了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学中文，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学，听过冯玉祥将军的报告，对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发生了好奇心，向往到中国去作一次探险似的旅行。

1947年4月1日，我乘一艘货船，经受了长达一个月的颠簸，到了上海，这时我身上只有几封中国同学写的介绍信，手上只有200元美金。

国民党疯狂进行内战时的上海，官僚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我亲眼看见。可是，同所接触的进步文化人士交谈，我萌发了到解放区去看看的愿望。

1948年冬，一个偶然的机，游览北平时，认识了同北平城工部有联系的同志。城工部同意派交通领我和我妻子凤子去石家庄，我们匆匆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凤子刚好拍完电影《关不住的春光》，我清理了我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把钥匙交给上海福利会英文秘书谭宁邦。他把要到解放区找未婚夫阳早的寒春交给我，我们三人飞到北平。在地下交通带领下，乘火车到天津，不料过天津闸口就走不了了。地下工作同志来天津把我们接回北平，只好等待解放。解放后先我们顺利到达石家庄的田汉先生对我们说，周恩来听说我们未能进入解放区，还向田汉先生询问了情况。

北平解放，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先生，是在北京饭店大厅，我们参加两位熟人的子女结婚典礼。周总理先生也来了，他和我们热情地握了手，还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

50年代初美国反华声浪中，特别是美国侵略朝鲜，中国抗美援朝高潮中，作为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处境，精神感到一种压力。

这时我已被安排到对外联络局任编译，在等待工作期间，翻译了《新儿女英雄传》，美国出版。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安排来自总理的指示。

不久，我从对外联络局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艺杂志社，任文学翻译。这时，我要求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不料不仅未被接受，却把我和其他外国工作人员改为专家待遇，我十分不解，和中国同志比，不仅政治待遇不一，而经济待遇也差得远了！我不拿专家待遇的钱，只拿生活费，谁知“文革”结束后，组织给我一笔存款，也就是我不肯要的专家待遇的款！

1963，我申请加入中国籍。我想不到申请入籍手续如此简单。写一份申请书，不久我就拿到批准入籍的证书，批准人签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入籍后，我也被吸收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了。

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凤子被她的单位点名是重点审查对象，留住机关，不能回家。这时我的工作仍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因为是期刊，不能停刊，我的工作不能停。一度参加造反派组织。不久，所有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造反派组织，说这决定来自国务院周总理。这指示是对我们的保护，可当时我却想不通。

1971年杨振宁回国探亲，有人问我，你不也可以赴美探亲吗？我写了报告，果然批准，虽然中美尚未建交，我能返美探亲实属意外。当时凤子正在干校劳动“改造”，她得到我的信，请假回家料理我的远行。当时，我们这个家，只我一个人，妻子下放，女儿在工厂，保姆也走了，邻居四口人也都

在各自的干校，我一走，锁大门的钥匙交给谁？妻子所在干校的军宣队不批准她的假，她给我写信说，别管她了，回家无望。谁知在我行前两天，她竟被人“押送”回家了。据说军宣队领导找她谈话，事后我们知道是国务院外事组给干校打了电话，指示他们批准凤子回家。我是中国籍的外国专家，我出国，妻子应到机场送行，这是国际惯例吧。凤子十分诧异怎么会批准她回家的？我心里明白，是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抗日战争时期，凤子就在重庆参加抗日演剧活动，在党的外围工作。她早已认识周恩来总理。我知道总理是了解凤子的，我写了信给总理，不只要她回家送我远行，我更想弄清楚凤子究竟有什么问题被拘留在于校。但我未告诉她我给总理写信的事，我怕她埋怨我在这个时候增添总理的麻烦，1975年，她“解放”回家，曾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告诉她，我给总理写的几封信，她都看到了，可是总理当时有多少重要事处理，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凤子批评我不该写信打扰总理，而且总理正身患重病啊！在当时，我除了请求总理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先到加拿大和我母亲、妹妹通了电话，她们立即开车到加拿大来看我，几十年的分别终于重聚，我从心里感激周恩来先生！

结束美加之行后，我曾到英国访友，中国驻英使馆突然通知我到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当时从中国到瑞士的还有马海德大夫。斯诺终于不治！我和中国营救小组的大夫们一块回到北京。派马海德和我去瑞士探视斯诺，也是周总理的决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还派了医疗小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斯诺的关心，这一行动的决策者就是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崇敬的周恩来先生！

我和周恩来先生见面多次，较多在大会议厅上或宴席上。他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他炯炯有神的两眼，直射进我的心底，透出热情的光芒，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和人握手谈话，就象一个多年相识的老友。不似某些人，甚至职位并不高，却一边握手，一边眼望他处。

1973年，“三八”妇女节，这天却召开了一个外国专家招待会。总理已身患绝症，仍然支撑着到会，而且作了重要讲话。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对外国专家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几位被诬告受害的外国专家恢复名誉，并且道歉！也对个别所谓革命派实际投政治机的外籍人员点了名。这个会开得人心舒畅，他的讲话如此坦诚，字字句句深印人心！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1974年10月1日，在大会堂大宴会厅，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病中的总理竟来和大家见面。人们兴奋地热烈鼓掌，久久不息，谁都忘了他是病人，谁也不愿意接受他是病人这个事实！熟悉的总理消瘦得脱了形，可他似乎有意来和大家告别，支撑着病体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他的声音仍然那么宏亮，谁知道这是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想不到病魔竟夺去了这位伟人的生命！他的死是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

我怀念您，敬爱的周总理！

“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糌粑味”

才旦卓玛

与同时代的藏族文艺工作者相比，我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了，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聆听他们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随着时光流逝，多少往事都被忘却，而周总理的句句教诲，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总是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樣的深刻，那樣的親切。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 16 年啦，16 年，五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每当看到和总理一起合影的照片，幸福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1959 年 9 月，我从正在学习的上海音乐学院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参加庆祝军事博物馆开幕的联欢会，当我唱完歌，找了个座位正准备看节目时，忽然看见总理正笑吟吟地向我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就是才旦卓玛吧，刚才你唱得不错嘛。”听到总理的表扬，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在上海生活还习惯吧，要好好学习，毕业回去很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我真没想到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快四年了，总理还能记得我，并且叫出了名字。总理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注入心田。我心想，总理呀。您放心吧，您的教导我记住了，我一定要把藏族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用歌声表达出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一辈子。

1964 年，我被挑选到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一天，一位负责同志通知我们，说中央首长要接见，并告诉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接见时大家不要拥上前去握手，因为首长们工作很忙，很辛苦，时间也十分宝贵，照了相就走。我站的位置恰好在中央领导座椅的后面，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了，大家使劲儿地鼓掌呀，当时我心想，要是能同毛主席握握手该有多好哇，其他中央首长也跟在毛主席后面走过来了。当周总理发现我时，他好象立即看透了我的心思，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给毛主席介绍：“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西藏歌手。是‘百万农奴站起来’的领唱。”我握着毛主席那宽厚温暖的手时，真是百感交集，幸福得热泪直往下淌。

1965 年，周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带了一个艺术团同去，我有幸作为艺术团的一名成员出访。有一次在我国驻印尼使馆搞联欢时，周总理让马玉涛同志唱“洪湖水浪打浪”。然后对我说：“才旦，你唱‘小曲好唱口难开’这首歌很适合。”唱完这首歌，我又用印尼语唱了一首印尼民歌“丰收歌”。当时周总理向前来参加联欢会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询问是否听懂了才旦唱的歌同，咬字清楚不清楚。艾地告诉周总理，说是可以听懂，只是有两处发音不准确。总理立即叫翻译记下来，然后帮助我纠正。第二天，总理要回国了，我们都到机场去欢送，临别时总理握住我的手说：“那两处不准确的发音改过来了吧，要好好记住哟！”连这些细小的事儿，总理都挂在心上，让人终身难以忘怀。

从 1956 年第一次见总理到 1976 年总理逝世，20 年间，我先后七，八次见到他老人家，聆听他的教诲，总理常对我说，“你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藏族歌手，要回到西藏去很好地为藏族人民服务。你的歌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糌粑味呀！”刚开始我还不太清楚酥油糌粑味的真正含义，后来才渐渐明白总理是让我不要丢掉了民族风格和自己的演唱风格，总理对我们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是多么关怀和爱护啊！几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够常盛不衰，关键是我遵

循了总理的教导，注意保持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没有丢掉酥油糌粑味。
周总理的亲切教诲我终身难忘，将永远激励我奋斗不息。

一个当年孩子剧团团员的回忆

严良堃

1938年初，一群8岁到15岁的流浪儿，由一位19岁的小学教员带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当时叫作“孤岛”的上海，到了武汉。又唱歌，又演戏，在街头、在渡轮上，以及在一些公共场所宣传抗日。引起武汉三镇各界人民的热烈反响。这支队伍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剧团。

那时，孩子剧团有一首特别感人的歌，叫做《流浪儿》。由一位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领唱，一唱众和，唱出中国儿童在日寇铁蹄下所受的凌辱和悲愤。特别是唱者有亲人在敌人炸弹下身亡的经历，唱来情真，催人泪下。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在听完歌声后，含泪说，“我们对不起孩子，我们这辈人没有把中国的事办好，让孩子们当了流浪儿。”旁边还有当时驻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王明、博古等，当时周恩来同志摸着孩子的头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事办好，让这些孩子不再流浪，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不当流浪儿。”

不久，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举办了一次“红小鬼”招待“流浪儿”的欢迎会，郭沫若、叶挺和办事处的大人也在场，在这些有过长征经历的小战士面前，流浪儿不只是唱悲愤的歌曲，也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表达了我们的豪情壮志。会上郭沫若、叶挺、博古等都讲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话，最后，周恩来同志鼓励孩子们要“救国、革命、创造。”这六个字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这些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孩子的心里，指引我们这一代人走上革命的道路。正是这样，我们孩子剧团的成员，追随着革命前辈们，在抗日救国、民主革命、创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战斗历程中锻炼成长。

我们孩子剧团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上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心里总是装着我们这一群孩子。我们一到武汉，他就派邓颖超同志代表他和“办事处”来看我们。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解危难，指出路。当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要强迫收编孩子剧团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听取汇报，当机立断，妥善地使我们摆脱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羁绊，然后归政治部（国共合作的机构，周恩来任副部长）收编，隶属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与十个抗敌演剧队等由三厅中共“特支”领导，此后，我们一直都在周恩来、郭沫若的亲自关怀下进行工作和学习。

周恩来同志说，过去是颠沛流离，现在相对安定些了，要搞好学习。于是三厅派了先生来教我们。最初是常任侠同志教语文，曹荻秋同志教英语；杜国庠、何成湘同志教社会科学、大众哲学。我们这时才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祖先是在劳动中由猴子变成人类的；我们围着一把椅子争论：这把椅子是静止的还是在那里运动着的物质。何成湘同志在课堂上宣告，希特勒不如你们十六岁的小林聪敏，别看他现在横行欧洲，打到莫斯科城下，最后他必定失败，因为他不懂社会发展规律，而小林懂得。

另外，还派了好多专家培养、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石凌鹤教导演，辛汉文教化妆，周令钊教素描，星海、张曙教乐理和指挥等。

到了1940年以后，我们在艺术上也成熟一些了，能演较大型的戏。每当我们演出六幕带歌舞的大型儿童剧，如《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时，

周恩来同志都要来看戏。看完了到后台会见演员，指出剧本和演出的优缺点，指导我们进一步加工。

后来，不少从孩子剧团出来的同志，成为各行的专门人才，这都是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哺育下走上专业道路的。

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特别有感情，孩子们也爱戴他们，关系十分亲密。刚到重庆不久，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穷乡僻壤去宣传抗日。有一个剧目缺少服装——日本兵的军装和钢盔，我们想，八路军打胜仗，有的是战利品，派两位小同志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借。那时办事处还在重庆机房街，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桌子边工作，问两个孩子干什么，说是借日本军服和钢盔。一会，那位中年男子到里面取了两套交给去的孩子，还鼓励说要好好演戏，向老百姓多做宣传，团结更多人们抗日。回到团里，经熟悉的同志了解才知道那位中年男子就是周恩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到重庆乡村郭沫若同志住处商定三厅今后应付形势变化后的对策。孩子剧团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当天夜晚，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位同志和孩子们见面，听我们唱《太行山上》、《红缨枪》，还特意听了《流浪儿》。当年领唱的男孩子已经长大了三岁，正处在变声期，可没有把这支歌唱好，周恩来同志说，你的唱歌水平很是提高了，可是感情不如以前那样打动人心，要注意呀！邓颖超同志则讲了一些鼓励我们准备应付恶劣时局的话。“孩子们，你们都开始长大了，也比以前能干了……”当她一开口叫那一声“孩子们”时，在场的我们真是感到亲切。

1942年，时局越来越恶化，戏也演不成了，“特支”书记冯乃超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有步骤地妥善安排孩子们集体撤离。一部分随着周恩来同志率领的车队奔赴延安，大部分则留在大后方就学或就业。大的考江安剧专、青木关音乐院和沙坪坝工校等大专学院，中的小的则分别考入中小学就读。临行时，冯乃超同志给部分大同志叮嘱，要遵照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努力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他说，新中国的船头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你们要象普罗米修斯到宙斯那里去取火一样，学好本领，将来为新中国所用。特支冯乃超同志还安排了专门同志与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保持联系，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1980年和1984年，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先后两次接见前孩子剧团成员。遵照她老人家的要求，第二次会见时，我们把自己的“伴儿”和儿孙都带上。她笑着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有第三代了，连我也跟着升级当上太奶奶、大姥姥了。”

“回忆扔多年前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同你们——可爱的孩子剧团认识，结下了革命的友谊，我一直没有忘怀，关心你们成长和工作生活。

“你们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时代，分散在各地学习、工作……，你们不但受到各种锻炼，而且成长了，绝大多数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成绩，你们无负于党和人民和老一辈革命战士的希望。”

是啊，岁月流逝，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记得那时周恩来同志在汉口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再也不当流浪儿了。50年前我们儿时唱的是“流浪儿”，现在我们的儿孙们却是在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愿他们能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第三代、第四代。

1992年3月22日京丰

产生了强烈的系统学习欲望和提高歌唱技巧的迫切需要。同时我搞的是民族声乐和中国歌剧表演。在“洋”，“土”之争中深感有种压力和受歧视之苦。执意要摸个深浅，坚决要求脱产学习。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本科。（就在这次报考体检中查出已患大面积肺结核病）哪晓得，一个在地方上工作的小毛毛文艺兵上学的踪迹，惊动了千里之外，日理万机，日夜为人民操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操碎了心的总理。这种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的作风，多么叫人钦佩呵！当时文化部艺术局长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到北京西堂子胡同1号，先给我看了用铅笔写的一张便笺。我背诵不下原文，其内容是总理知道我考音乐学院，劝我“要在原来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艺术要人民喜欢”，“各条艺术道路必须有人扛旗，不能没有人行走”，等等。我惊呆了，总理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也受之有愧。我除完成每个戏的角色、唱好每首歌外，从不认为还会有什么作用。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为了真正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为了让年轻人能以自己的特点发展各自的道路，处处关心备至，时时谆谆教诲。周巍峙同志给我谈了许久，并想尽办法为我解决学习提高的实际问题。真是一位好领导者呵！我接受了劝告，拼命工作，用其他办法加紧学习。就这样我没有得到个文凭，也有人认为“土包子”不能用，轻视民族艺术。但是，我不后悔，死心眼儿一个，我并不想在事业的奋斗中，索取什么。老老实实照周总理的引导走，一直到死。倒是使我非常愧疚的是，病魔缠身，肺病越来越重，咳血不止，一晃便是十年过去。在那十年里。除了支撑完成每年演出任务外，周总理的高要求，我对自己设想的理想唱法的探索、追求便无力完成了。1966年病刚愈，却遭浩劫，又一个十年过去。按理说，“四人帮”被粉碎，我才44岁，还来得及继续干一番事业，人生能有几个10年20年哪！……

（三）

1973年5、6月，周总理带病陪同越南黎笋到陕西访问。先去延安，再到西安。陕西省歌舞剧院担负在西安招待晚会的演出任务。周总理出于深远的考虑，对延安的晚会感到内容有欠缺，立即电告西安，让西安的晚会里合唱中加进由贺绿汀同志作曲的《游击队之歌》。当时，舞台动作都是甩头、瞪眼、直脖子、挺胸、硬膀子、弓箭步等等八大“文革”动柞。在那种气氛下哪敢处理表现作品的艺术内涵呢。演出之后当晚周总理让身边工作的同志，立即向我传达意见，歌唱得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歌唱不是唱得越强越好，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样板戏也有抒情嘛，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群舞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多么在行的一席话呀！从一首歌曲的处理，到舞蹈用的人数，指出了艺术表现的追求，作品的深度。指出了要百花繁茂不可千篇一律的道理。他非常尊重艺术规律。

（四）

也就是1973年周总理陪同黎笋去西安，西安的群众早早自动从飞机场到总理下榻的招待所“丈八沟”，十几里长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期望能看一眼周总理，我更是拜望心切。但是当时我虽以“革命干部”被结合进班子，实际在控制使用。招待晚会中，我从侧幕缝看到周总理就坐在紧靠台沿第一排沙发上。近在咫尺却不让拜望。周总理知道了我在舞台上，向在他身边的陕西同志问：“刘燕平为什么不下来？”是呵，就是没让我下去看看老人家。同年数月后，得机在北京首体见到周总理，他意味深长他说，“噢！总算在

这里见到你啦。西安时你为什么不下台来？”我无言可答，不敢吐真情，于是噤声噤气说：“我看您很忙……”话未说完，被总理略带责备的口气打断，“哪里那么多框框”。多么暖心哪！接着又亲切地问我：“我们去东北是哪一年哪？”我回答：“是1953年。”唉呀！20年前跟随他老人家工作了几天，却仍留在他的记忆中。这种干群关系多么感人肺腑呵！

(五)

从1966年8月初起，我被扣上“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尖子、黑标兵”、“走资派”、“叛徒”、“反动军阀孝子贤孙”等几顶反革命帽子，一直顶了近十年。“文革”后期，幸运地被召来北京，得到周总理接见的机会。当时，我怀着久别亲人、急切扑向父母怀中要倾诉满腹委屈、困惑、疑问、忧虑……许许多多话语的心态，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周总理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我早已泪眼蒙蒙，咽喉哽塞，面部抽搐地一个字也说不出，心在颤抖，几乎放声嚎陶。周总理亲切地问我：“最近排什么节目？是不是还是在西安看的那台？”我抑制住自己，回答说：“搞了一台新晚会，但是质量不高。”周总理含意深沉地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第一个歌剧是《兄妹开荒》，你们为什么不演？应该演演。”接着又关心地问：“你还唱吗？”我说：“1966年就不唱啦！”周总理慨叹他说：“噢！八年没唱啦！”我说：“现在我头发也白啦，眼睛也花了……”总理看看我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也还可以唱呀！把民间的东西加加工，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保留下来。”稍停顿后又说：“把你那首‘红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哎那叫什么？”我说：“信天游。”“对‘信天游’好好改改，改成纪念刘志丹的东西。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陕北人民很尊敬他。在山西牺牲了……”毛主席对刘志丹同志曾有高度评价。周总理对革命先烈的光辉品格和辉煌业绩更是念念不忘。记得1943年刘志丹陵墓落成时，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题写了二十个闪光的字：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它凝聚着周恩来同志和亿万人民，对人民英雄无限缅怀和敬仰之情。可见当年周总理听“信天游”时是动了感情的。这时要求我改改这首歌，并“搞几首革命民歌”，是想的很多、很多……已远远超出了歌曲本身。

《信天游》歌词改好后，当地领导为了慎重，让我将改过的词寄给总理。虽然我寄出，却认为总理日夜操劳，料理国事，还要顶着“四人帮”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哪有精力顾及这么一桩很具体的小事？！没准儿，信还到不了总理之手咧。但是当总理逝世，很快从北京传来说，周总理病重时，曾有过一位认识我的同志去探望老人家，他老人家又一次关切地提及：“刘燕平那事不知办的怎么样啦！（指的修改词、歌剧复排等）看来我帮不了她了……”哪敢相信这是真的？周总理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还在关怀着文艺，怎不叫人心碎肝裂！至今想到周总理，那种撕心扯肺的感觉总消失不掉。

周总理关怀、教诲“毛毛兵”，绝不仅仅是关怀、教诲某一个人，而是关心党，关心国家和民族，关心人民的事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是国家的领导人，更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贴心人。他是属于人民，人民时刻在呼唤着他的英灵！

总理与我的一家

项堃口述 项智力整理

我是南京国立剧专（现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的早期学生，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主持下，于1940年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巡回演出，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三年后，返回祖国的。当年24岁的我，原打算经滇缅公路，过重庆后到延安。途经重庆时，有幸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结识，并在总理和阳翰笙、王瑞麟挽留下，留在了重庆，进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拍摄阳翰笙编剧的《青年中国》影片时，我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山洞中结识并相恋了厂里的演员阮斐，结成了一对抗日夫妻。当时的结婚启事就登在《新华日报》1941年1月1日版上，主婚人是阳翰笙。准知婚后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抗议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当时，周总理不再参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活动，郭沫若也采取相应立场，我和阮斐随阳翰笙、应云卫退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和阮斐是不惜放弃高薪坚持抗日立场的。随后在总理直接关怀指示下，由阳翰笙、陈白尘同志经过短时间的积极筹备，迅速创建了中华剧艺社，用文艺武器配合形势向抗日的大敌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我和阮斐就参加了中华剧艺社。当时的中华剧艺社条件非常艰苦。在重庆山上租了几间房，又是住房又是排练场。那时剧团不论演员大小、干何工种一律吃的是大锅饭，忙起来大家竟能连续一个月见不到太阳，一天三场演下来人累不说而且每人最多只能多分一碗面钱。我外出内江、自流井办外交租剧场、因穷得买不起象样的衣服，经大家认可，只能穿着戏里的剧装去办事。我们一对新婚夫妇也因剧团只能提供仅有的两间房而各住各的男、女宿舍。但大家工作效率极高，抗日情绪高涨。一星期或八九天便排出一个新戏。中华剧艺社的开场戏之一便是阳翰笙同志用40天赶写的剧本《天国春秋》。与总理当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相呼应。成了总理题词的具体形象化的缩影。我当时是与白杨、舒绣文、耿震同志分别饰演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杨秀清的。每当戏一演到台词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敌当前不要再自相残杀了！……”时，观众都禁不住呼声雷动，全场起立，群情激昂啊！《天》剧首演即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他们假扮伤兵，砸戏院子直砸到后台，大打出手，以为能恫吓住观众与演职人员。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后台化妆，中国电影制片厂送给我、阮斐、应云卫等人每人一份解雇通知书。并当众宣布我们几人被解雇了！我们几个人接过来看都没看，一边当场撕了解雇通知书，一边笑着说：“我们早已不在你们那儿领工资了！到底谁辞了谁大概还没有搞清楚吧？！”引来后台一阵哄笑……。

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总理为了支持我们，每当剧艺社上演新戏时，就带新华日报社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到场看戏。有的戏甚至每次复演都来看，看到精彩之处还带头鼓掌。戏散了，总理还到后台来，象老朋友一样与正在卸妆的演员拉家常，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工作并和大家谈一些国内外的形势，给我们以鼓励与关怀，使我们斗志更加高昂。在总理的关怀下，我们的演出很成功，首演时卖座就纪录空前，久演不衰，观众人数创当时话剧的空前高纪录。也不知何时，在我们中间无形中形成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这些人每排一出戏或要接什么角色，只要总理

点头我们就去于，反之坚决不去。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剧艺社不仅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演，还多次到成都、内江、自流井等地巡回演出。为大后方的团结抗日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日寇投降后，在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形势，我与王瑞麟（曾任长春市副市长、长影厂第一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商量后，剧团第六次复演了《天》剧。当敬爱的总理在国民党的张治中先生陪同下来到抗建堂剧场再度观看此剧时，观众发现了总理、张先生自动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迎，表达了全体演职员与观众一致呼吁不要打内战的真正心声！应该说：在总理亲自关怀支持下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组织群众坚持抗日，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每每想起总理与邓大姐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总是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们婚后不久，由于营养不良与长期的疲劳导致了阮斐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总理得知后不仅见面时间长问短多方关照，还多次派秘书徐冰同志（建国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亲临病床前探望。在病情严重时，为避开重庆雾季与白色恐怖，经地下党组织安排阮斐回到了上海家中养病。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有一天，总理鉴于政治与军事形势危机，得知日寇马上就要全面攻占上海时，让人通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新华日报馆二楼。当我赶到那里时，周总理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嘱我火速启程把阮斐接出即将沦陷的地区，并对我往返旅途作出详尽周密的安排。我按照总理制订的时间表，日夜兼程接出了阮斐。同时，一批剧团家属也随阮斐转移到了重庆。回来的途中我们前脚刚离开金华，金华就沦陷了，进攻金华的日寇飞机一直追着我们乘坐的火车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余悸未消呢！我们的二儿子项智力出生时，总理亲派秘书张颖同志前往宽仁妇产医院看望，知道阮斐肺病无法自己喂奶。还专门送去了当时紧缺的炼乳。红糖等营养品及鲜花，并作了细致具体的关怀。阮斐出院后，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为避免国民党对我们的注意与迫害，又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邀请我们夫妇到苏联大使馆与他们晤面。当我们来到苏联大使馆（现人民医院）院内主楼前，见总理与邓大姐早在台阶上等候了。寒暄后，总理与我一旁说话，邓大姐双手紧握着阮斐的手关心地询问她和孩子的近况并对她产后和治疗肺病要注意的事项逐条给予了关怀和叮嘱。在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地下党又通过司徒慧敏给我和阮斐两人发了周总理亲笔请柬（当日接见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共六人），把我们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里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见面。上午在“八办”会客室里我们聆听了毛主席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方针的精辟论述，晚上大家一起座谈了重庆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状况与工作特性……。在那里，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共进了午、晚餐。席上总理还风趣地告诉我们：“大家请放心吃吧，这里的菜全是我们办事处同志们自己种的！”当时“八办”外，巷子里全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有的化妆成焊洋铁壶的，有的扮成卖香烟瓜子的，还有的化妆成卖麻糖、椒盐花生，炒米糖开水的……。挤满了整条巷子，进出“八办”的人全被拍下照片来，当时要不是我已被报刊杂志誉为大后方的“话剧皇帝”，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恐怕那时也早

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了。会见结束了，为防意外，总理考虑非常细致，由他亲自指挥用他仅有的一辆汽车把我们男女六人分二批在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下安全送返了各自的驻地。

上海解放后，我是天马电影厂第一任演员部主任兼工会主席，全上海市的优秀工会工作者、劳动模范。当上海庆祝《鲁迅纪念馆》落成时，我主演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饰演阿Q一角，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市。不久，在一次见面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你该把重庆时的一些好戏再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演一演，也好给青年演员们做个示范嘛！”我笑着说：“我老了，一些戏又演又杀又武刀斗剑的，我怕演不动了。”总理当时转向大家放大声音风趣他说：“你们大家说项堃同志老了吗？我看不老嘛！”望着总理那充满信任鼓舞与期望的眼神，谁又能拒绝呢？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我高兴地答应了总理，一定好好为培养新中国的年青演员们多做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错划成了右派。当了22年“摘帽右派”。多种因素造成了我主动断绝了与总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这样残酷的事实自己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心里自然更不愿给总理以拖累。直到1962年，我这个当时全国仅有的重返银幕的“摘帽右派”，在临时借来参加拍摄故事片《停战以后》时，当总理与陈毅、贺龙、叶剑英元帅同来北影厂审查样片时，才又得知了我的下落。当时总理没能见到我（其实是我内心很矛盾，当了“右派”后，不知如何再见总理……而故意没见的），就通过该片导演成荫同志转达问候，他一边称赞我的戏仍然演得那么好，一边动情他说：“我打听了他好几年了，听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从样片里看到他很瘦很虚弱，你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身体，一定要让他恢复健康……”（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后，1959年1月举家被赶出上海，我到山东去接受劳动改造。正赶上全国渡灾荒，山东又是重灾区，生活异常艰苦，以至一年中三次肺炎差点送了命）那次我是带着病参加拍戏的。当时总理通过成荫对我和全家表示了真诚的关心，并对全家五口人逐个做了细致的了解和询问。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百忙中仍没忘了我和全家，对我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了如此深情的关怀，听着听着，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随后不久，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通过彭真同志亲笔致函山东省委，将我们全家迁入北京，我才得以正式重返了电影界。

十年浩劫中，因无故地批斗、打骂、非人的折磨，导致我整个人几乎全面崩溃，使我原本很严重的神精官能症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面对我当时那吓人的病情，“革命造反派们”三次被迫把我送到了当时的红卫医院（即现安定医院）看精神科。是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我们全家，挽救了我本人。当时我被内定为“六厂二校”经验中所谓的“从严典型”，准备报批后，第二天要戴上脚镣手铐送往秦城监狱的。整我的重点正是我庄重庆这一阶段历史。我的三个孩子也因我而受株连。几个单位的工、军宣队串连起来，我和三个孩子纷纷在各自的单位挨批斗，被办专政学习班，其中老大和老三还先后被戴上了“专政对象”的帽子……，全家人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整我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幸好总理亲自过目，当时不但没有批准，相反还做了明确的具体批示，以至工、军宣队紧急开会，第二天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我一口一个：“你要好好感谢党！”“好好感谢中央首长的关怀！”并马上宣布我被“解放”。一夜之间，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奇迹出现了——我竟成了“从宽典型”！

我们全家的几十年来虽然备受波折坎坷，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通过总理体现出党的政策在时时关怀、保护着我们，才有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和我们全家人的今天啊！是历史把我们一家与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敬爱的总理离开人世的噩耗传来时，真似一声晴天霹雳。我和老伴阮斐在七口人十平米的斗室里哭昏了过去，几个孩子也都哭肿了双眼。当时，由于“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时刻都狠狠地盯着我们，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和老伴只能在二儿子项智力的陪同下，趁着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时偷偷骑自行车跑到西单，为总理送行。春寒中的十里长街，挤满了自动前来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我们三人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挤到前排去的机会，最后我们只好沿着人海的“墙”，跑到稍微宽敞些的民族文化宫门口西侧，找了个前排几个人个儿都不高的地方，等候良久。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人群中一片哭泣，突然东边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追着灵车跑来挤到了我们前面，一下子啥也看不见了。急中生智，当年已61岁的我赶忙在智力的撑扶下，站到了自行车后座上，老伴紧紧抓着儿子的肩膀半骑半站在自行车横梁上，好看清楚点，再清楚点，最后看一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灵车来到了我们跟前，当时我们脑子几乎都空白了。除了悲泣外只知道使劲伸长脖子，穿过无数人的头顶使劲往灵车里看。当时也搞不清是人挤还是忘情，老两口差点失去了重心，从自行车上半摔半跳了下来。灵车继续缓缓向西开去了，周围留给我们的除了一片悲恸，就是一片昏天黑地。然而，隐约中使人感到人群中蕴藏着一股无法压抑、征服的内在爆炸力和总理用他那伟大坦荡的一生在人们心中所激发的巨大凝聚力。面对这些，我突然感到热血在我胸中涌动，使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清明节来了，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严厉封锁，全家还是派儿子项智力去了天安门。在英雄纪念碑前给总理献上了一束自制的白花。低声地问总理倾述了全家人的心愿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回来后，他把看到感受到的那感人心魄的一切告诉了我们，不料他这一去差点又成了全家挨整的把柄。有人在会上检举揭发：“项智力去了天安门！……”一时间又上窜下跳嚷着要揪智力的后台——我。眼看大祸又要临头，全家人只能围挤在十平米小屋内，压低了嗓门商量如何订立攻守同盟以渡雄关……

春雷一声：“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欢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锣鼓声中，我和老伴在中断了演艺工作十余年后，再次得以重返银幕。第一部戏便是我、老伴阮斐和儿子项智力三人一起拍摄主演的《生活的颤音》。影片拍出来了，送到中南海审查时，邓大姐高兴地一连看了两遍，不但对影片纪念四五运动悼念总理的主题、演员的表演、音乐、美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还关心地问到了我们全家。其中还特别问到了片中“韦立”的扮演者项智力是不是就是当年在重庆亲自抱过的在宽仁医院生的那个孩子？听说是时，邓大姐又详细询问了孩子项智力现在在哪个单位？搞什么工作？生活近况……并满心高兴地相约我们到了中南海总理和邓大姐的住所——“西花厅”去话旧。当邓大姐得知我们至今珍藏着毛主席当年去重庆谈判时总理给我们的亲笔请柬及总理和邓大姐当年为见我们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出面邀请我们的请柬时，非常地高兴、珍惜。马上安排中南海机要局的老惠同志借去影印复制后，又还给了我们。在那刚刚渡过严冬的日子里，邓大姐的关怀就象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全家。拍完《生活的颤音》七天后，我们三人又满怀对总理的爱与缅怀之情，一同拍摄了纪念总理当年战斗在重庆的影片《山城雪》。回

想起来，粉碎“四人帮”后那一年，竟成了我建国以来最高产的一年。当年63、64岁的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人拍电影演话剧（《于无声处》饰何是非）近十部。这工作量之大，连年轻高产的走红演员也望尘莫及啊！而这一切又都真正来源于我们一家人对敬爱的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缅怀；来源于对总理的真情与热爱啊！

要写要说的还大多大多，千言万语汇一句：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全身心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

借此纪念、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际，我们全家也在此衷心祝愿敬爱的邓大姐健康！长寿！

1992年春于北京

难以忘怀的教诲

周小燕

1949年7月“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国统区”的代表来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这对于刚从国外归来的我是件多么新奇的事呵。在那次大会上，我看到和听到许许多多来自解放区的戏和歌，使我激动得几乎天天浸在泪水中；更使我激动的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初次会晤，总理就“将”了我一“军”，总理说：“你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会唱《马赛曲》吗？”我在法国学习时主要是唱西方古典歌曲，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等，《马赛曲》只是自己拿起曲谱唱过，熟悉它的旋律，没有背过歌词。因此，没唱几句歌词就“啦，啦，啦”地啦起来。总理听了笑起来，并象提辞似地轻声和我唱了下去。虽然当时的气氛仍然很轻松，但却由此引起我的思索，联系我在会期间看到的革命文艺，读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领悟到周总理是在告诉我，文艺工作者应该唱革命歌曲，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大会结束后，回到上海，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在法国学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唱革命歌曲，如《西北农民歌唱毛主席》、《青年参军》、《刘胡兰》……等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歌手”。参加土改时，我学会了一首用上海方言唱的《啥人养活啥人》的歌，后来我到北京时就唱给总理听，总理听了很高兴，以后总点名，要我唱这首歌，我更以为我把自己的“洋嗓子”，逐步化为“土嗓子”是做对了。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我来北京开人代会，又见到了总理。总理一如既往关心地问我：“你们学校最近怎么样？”我兴奋地向总理汇报了上海音乐学院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三化”的情况，我说：“我们唱歌的正在搞“三女”转化……。总理顿时很严肃地问：“什么‘三女’转化？”我说：“三女是《茶花女》、《七仙女》、《白毛女》，我们这些原来学西洋唱法的《茶花女》要先化为《七仙女》就是要先学戏曲、民歌，然后才能成《白毛女》唱好革命的、民族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歌剧”。我原以为我的汇报是告慰总理上海音乐学院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情况，哪知总理一听非常生气，立刻找到文化部负责人，说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我见总理突然生气，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很紧张。直至又有一次在外来活动之后，我问总理：“总理，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您一天见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首脑，对他们的国情，他们的名字都记得那么清楚”，总理说：“这是我的专业嘛，你们唱《茶花女》的不是要天天练功吗？我也天天练我的基本功的啊。”原来总理仍然要我天天练基本功，并没有要我把《茶花女》完全“化”掉。再回顾我回国以来，无论我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演唱或是在国内的各种场合演出，总理从来没有审查过我要演唱的曲目。他鼓励我唱《马赛曲》、《啥人养活啥人》、《洪湖水浪打浪》都不是以“指示性”的口吻，“指示”我应该唱什么，而总是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启迪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既鼓励我唱人民热爱的，能鼓舞人民的歌曲，但也曾这样对我们文艺工作者说过：文艺工作者能拿出有质量的，高水平的艺术到国际上去，要比我政治家去发表一篇演讲更有说服力，作用更大。总理这句话说出周总理是一贯肯定文艺在社会、外交、国际交往等领域中的作

用的，是最准确，最全面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典范。艺术实践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1984年，我率领四名青年歌唱演员去欧洲的“音乐之乡”维也纳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有40多个国家，240多名青年歌手参加的歌剧演唱比赛，结果，我国两名青年歌手双双夺冠。这一成绩引起全欧瞩目，因为这次比赛被国外报刊视为“万才瞩目”可与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媲美的全球歌唱比赛”，他们是用卫星转播的。最后比赛评委会主任、维也纳的卡博教授对我说：“老实告诉你，在我们接到你们的报名表时，我感到惊奇，你们唱中国歌剧（他指我们的京剧）的怎么能来和我们的歌剧歌唱演员比赛？现在成绩出来了，我仍然感到惊奇，你们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艺术上这么惊人的歌唱家？”在这样的国际比赛中获奖，当然全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们自然会把它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当时我就感到总理的教诲真是高瞻远瞩。

总理对文艺倾注了许多心血。过去，我们来北京开会，总理经常是在深夜找我们到中南海去座谈，我们知道，这是总理牺牲休息时间，关心文艺工作。他在座谈时，总是循循诱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一边，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以自己的专业，去为人民服务。

总理不仅关心文艺工作者演出什么节目，他更关心文艺工作者政治上的成长。

我记得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我见到总理时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什么贡献，却当上代表来到北京开会。总理说：“革命不在迟早，参加革命就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总理还要我好好向我弟弟学习。

我弟弟周德佑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七演剧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在一次演出中突然休克病倒，不幸逝世的。

周总理对我弟弟的逝世十分痛惜，他和邓颖超大姐当时亲自到我们家参加了弟弟的追悼会。事隔12年之后，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总理见到我还关心地询问：“你弟弟的墓上树碑了没有？”他还对在身边的人员说，“象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总理要我向弟弟学习，这是总理对我政治上的极大关怀。

以后，一有机会，总理总是在政治上热情地关怀着我。

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有一次我问总理：“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时，知道了要抓主要矛盾。但我要演唱、要教学、要出访、要参加外事、社会等许多活动，对我来说，哪个矛盾是主要的呢？”

周总理回答说，一个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理这样回答我，我一直琢磨了许多年，“这话怎么理解？”去年，我看了电影《周恩来》，从中找到了答案，总理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十年浩劫，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感到很踏实，一直感到我的身后，有一无形的精神支柱在支持我，这就是周总理的形象。在“牛棚”里，我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我就感到有力量。因此，“四人帮”的一时横行，却动摇不了我以后还是要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信心。

我现在已年逾古稀，但一想起总理，他那朗朗笑声，诲人不倦的话语，

似乎又在我耳际回响，催我奋进。有人说我“一干起来就不要命”，是的，这是总理的精神在鼓舞我，我不能有丝毫怠倦啊。

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邹德华

我父亲邹秉文是 1916 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中国老一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1945 年，国民党政府委派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首席代表，我们全家也都在这时随他一起到了美国。1948 年，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人事矛盾，辞去一切职务，留在美国经商。我有兄弟姊妹六人，我的两个哥哥都是 1938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解放前曾在上海、昆明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大哥在党的安排下通过我父亲的关系于 1941 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国际贸易；二哥参加解放战争，在一次行军中被捕入狱，是我父亲设法营救他出狱的。在党组织的同意下，他于 1946 年随我们全家一起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当然，我两个哥哥都是党员的情况在当时我父亲都是不知道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兄弟姐妹归心似箭，先后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我父母，还有我大姐一家仍留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母越来越想念我们，很想回国和我们团聚。但是他当时不了解党的政策，以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新中国政府会加害于他，因而一时不敢回来。1956 年，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能在香港见一见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感到由于我父亲和我两个哥哥的身份，我们一家去香港会面是不安全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中央统战部作了汇报，并请示了周总理。

总理很快就指示我们不能去香港，要我们告诉我父母先去巴黎。当时冀朝鼎同志正在巴黎开会，总理知道解放前我父亲就认识冀朝鼎，总理就委托冀朝鼎做我父亲的工作，向我父亲说明党的政策和党对他的了解，邀请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父亲听后感动不已，很快地解除了多年埋藏在内心的顾虑，毅然决然地离开美国，由我国政府安排经过瑞士和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父母回到祖国后，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思想上，一直受到总理的亲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总理常对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同志说，“你们让邹秉文先生讲话，他讲错了，不要跟他计较。”总理几次在舞会上见到我们姐妹都要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一次他问我妹妹：“你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吧！？”我妹妹说没有。总理就放心地说：“那就好”。我父亲也把总理看成他可以完全信赖和依靠的领导和朋友，经常是事不论大小，只要有困难，就直接给总理写信。譬如，我父亲要天天洗澡，宿舍里没有洗澡设备，希望住红霞公寓，他就给总理写信。我父亲眼睛不好，订不到大字《参考消息》，他也给总理写信。

总理曾三次接见我父亲，一次是接见纓云台，一次是接见龙云，他都请我父亲来作陪。1973 年 5 月 13 日，总理接见从美国回来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时，他不但提出要同时接见我父亲，还特别提出要我们全家参加接见。当时我二哥已调广州工作，我和我小妹还在下放劳动，只有我母亲、大哥和我另一妹妹参加了接见。等赵元任先生离开后，总理特意留下了我们一家，对我父亲说：“邹先生，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江南三杰之一嘛！”（注：解放前，南京东南大学有三位著名学者，一是工科主任茅以升，一是文科主任杨杏佛，我父亲是农科主任）。总理还说：“你为共产党培养了两个好儿子，我们感谢你！”总理又谈到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受到冲击等，我哥哥和妹妹清楚地理解到总理是在有意识地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要

我父亲放心，说明党对他重视的，信任的，希望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冲击。在这次接见中，总理还对我父亲说：“邹先生，你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总理接着马上对在旁边的秘书说：“邹先生要住红霞公寓，要订大字《参考消息》，你们给解决一下。”很快，这两件事都按父亲的愿望解决了。

我父亲 1956 年回国后，留下我姐姐一家住在美国，有十几年和我们一家中断了音信。“文化大革命”时，我姐姐听到许多谣言，说我父亲已自杀身亡等，急得不得了，但又不知道我们的住址，无法联系。1970 年，她忽然打听到我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就写信到全国政协打听我父亲，终于在 1971 年这封信辗转地送到我父亲手中。信上说，她全家要来中国看望我们。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我父亲马上又想到求助于总理，即刻写信给总理。总理接信后亲自安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五个儿女办了来中国的签证。我姐姐见到了我父母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是没见到我大哥（当时他正在于校受隔离审查）。又是我们敬爱的总理指示外贸部把我哥哥从干校调回北京，让我们全家得到第二次大团圆。我姐姐一家在中国期间在总理的关怀下受到很好的接待。

“文化大革命”前，总理很关心我们剧院，经常来看我们的排练和演出。1960 年，中央歌剧院演出《洪湖赤卫队》，我演韩英。总理说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当天，由于总理有要事，我们演完了第一幕以后，我在台上看见总理来了。总理一直看完演出。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总理还要我再唱一遍“洪湖水，浪打浪”，总理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和我一起唱起来。那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十年浩劫，文艺团体被江青搅得乱七八糟。尤其我们中央歌剧院，原来是总理直接抓的，江青更是千方百计要摧毁它。江青对我们剧院采取了“挖心”战术，抽走了我们剧院一批又一批的骨干，以便最后完全拆散。总理当时识破了江青的阴谋，为了保存我们这个剧院，以“下放劳动”为名，把我们整个剧院交给部队代管。在一段时期以后，还没有把我们剧院调上去的音讯，我们院里几位同志联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我们剧院同志下放以后，已处于无人管的状况，请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这封信由我设法送交总理。我请一位我过去的同学、当时是总理的秘书亲手把信交给了总理。据这位秘书后来告诉我，他问总理：“您还记得邹德华吗？”总理说：“记得！记得！”总理从头至尾非常认真地看了我们这封信，正看信时，见外面有人来，总理就把信揣到口袋里。

1972 年，由于我们这封信，也许还有其他同志也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借着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演出的机会，把我们剧院大部分同志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隆重的祝寿演出。经过“文革”多年的压制，我们的剧院得到恢复，我们剧院每个人的艺术生命又重新焕发出光彩，这都是总理关怀的结果，大家都感到十分激动。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负重任，掌管着繁重的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而在他的脑海中却装着全国人民。千千万万象我父亲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和象我们兄妹这样普通的国家干部，都受到他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总理离开我们 16 年了，我们怎能忘得了他？

后记

《周恩来和艺术家们》这本回忆文集终于付印了。从1991年3月我发起征稿到今年3月编辑出版，正好整整一年的时间。

去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来了一点灵感，觉得应该编这样一本书作为一个深切的纪念。

因为在历次政协会议期间，谈到文艺工作的现状与未来，总是不断地听到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提到周恩来对文艺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教诲，不免唱出了一个咏叹调：

“假如周总理还在……！”

我又想到，今年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周恩来不仅一贯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想到1993年第七届全国政协换届的时候，我和一些老同志也该退下来了，又正好是周恩来诞辰95周年，动员这些同志写下回忆文章，很有现实意义。既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永久的缅怀，也让周恩来的亲切教诲永远指引我们不断前进！

我于是向本届政协文艺界的朋友发了征稿信，也向极少数前几届和地方政协的委员发了征稿信，直到这次政协会议期间，共收到来稿50余篇，歌曲二首。

这些文章大都是回忆自己和周恩来会晤中一些亲切的感受和难忘的教诲，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被错划“右派分子”同志的关怀，以及在“文革”期间尽力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事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干部或专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尤其是这次政协会议期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文艺界同志对文化艺术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伐要快一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大家共同回忆周恩来一贯实事求是，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反对左的错误，坚持“二为”的方向和双百方针的一系列教导，更加感到异常亲切和欢欣鼓舞。

尽管这本书的整个编辑过程，是我这个老人单干的结果，但也得到文化部老部长办公室秘书组周大兴同志的帮助，复印了不少稿件，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周明同志给以大力支援，帮我把全部稿子打印出来，便于我最后审稿，早日付印，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仅仅看了我写的后记和目录，就毅然决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社总编室主任谭德山同志立即全力投入审稿、编辑工作，力争在5月将此书出版发行。他们这种积极热情的支持，使我感动不已。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我今后也不可能再编辑这样一本书了，我这即将八旬的老人也不可能再有机会遇到象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却又和文艺界结下如此深厚、真挚友情的

一个朋友。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对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作更多的探讨。但我坚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探讨。

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

最后，我再一次向所有来稿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感谢那些年过八旬、九旬年老多病的老人们的热情支持：或不能写稿，但来信表示支持，或题词，或亲自撰稿；如 86 岁的老人陈学昭同志于去年 7 月写来稿子，10 月就因病去世了。我怎么能够不深深感谢他们！？

荒煤

1992.3 . 28.

